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03

2006年第3期



赵敦华

赵敦华，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人文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哲学分会主席。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现代西方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最近在努力促进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话和交流，并试图探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研究的积极影响。著有《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基督教哲学1500年》、《当代英美哲学举要》、《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西方哲学简史》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以及《西方人学观念史》（主编）等著作十余部。多次获得“全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3年获得教育部和人事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社 长：李恒瑞

主 编：郑英隆

副主编：叶金宝 陶原珂

编辑部主任：雷比璐

学术研究

(月刊)

2006年第3期 总第256期 出版日期: 3月20日

•学术发展与问题综合•

对人文社会科学现行学术评价系统的确认与辩护	王 宁	5
学术评估中的“级差”理念论析	熊 焰	10

研究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正本清源”方案	赵敦华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马俊峰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界域的哲学厘定	谭培文 汤志华	28
意义、真理与二值原则		
——后现代视野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刘同舫	33
论黑格尔的“感性确知”概念	罗伯中	39

替代跨国公司产品: 中国企业升级的递进	毛蕴诗 李洁明	44
比较优势与超比较优势		
——论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李 翀	49

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综合判断与测度	陈 华	55
我国银行贷款利率的结构性分析	顾海兵 石红艳 刘 玮	62
我国银行存差问题的实证研究(1995—2004年)		
——基于银行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分析	周向雯	66

“政治与行政二分”命题的组织整合理论解析		
——兼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国化与科学化的途径	李习彬	73
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背景	包雅钧	79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	张应祥 蔡 禾	85

传教士与明清实学思潮	汪春泓	90
1930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	曹天忠	96
世俗与属灵之间: 丁韪良与《尚贤堂月报》	王文兵	103
《生活》周刊(1925-1933年)与青年文化	赵 文	109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政法 gzphilaw@yahoo.com.cn
哲学 gzphl@yahoo.com.cn	历史 gzhist@yahoo.com.cn
经济 gzronger88@yahoo.com.cn	文学 gzliter@yahoo.com.cn

(1958 年创刊)

• 消费时代文化批评现状的反思”笔谈(主持人: 蒋述卓)•

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	蒋述卓 116
文化热、文化批评与消费时代	林 岗 118
当代审美文化的消费本质与时代特征	高小康 120
知识分子批评与文化批评	金 岱 122
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迷惑	徐肖楠 124
文学新形态与文学博客群	刘海涛 126
文化批评的多重指涉	李凤亮 128

宋元文章学的作家修养论

祝尚书 130

《焦仲卿妻》旁证

——汉诗中所见之汉代妇女生活和家庭人伦关系

徐国荣 薛 艳 136

• 学术动态 •

关于我国货币一体化的研究综述

彭小发 刘纪显 陈志英 139

• 学海酌蠡 •

《汉语大字典》通假漏释辨读七则

(香港)单周尧 143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辨误二则

王允亮 144

• 书评 •

《宋史》的学术价值

肖建新 145

英文摘要

147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3, 2006

An Identification and Defense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Specialized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ng Ning	5
On the Idea of 'Gradational Deviation' Applied in Academic Evaluation	Xiong Yan	10
A Program of 'Tracing Back Sources to Justify the Foundation' for Approaching Marx's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Zhao Dunhua	14
Some Questions of How Marxist Philosophy Be Melted in China	Ma Junfeng	23
China-style Marxism: a Philosophical Defining of the Domain of Marxism	Tan Peiwen and Tang Zhihua	28
Meaning, Truth and the Bi-value Principle	Liu Tongfang	33
On Hegel's Concept of Sensuous Certainty	Luo Bozhong	39
Substitution of Multinationals Products as a Promotion Wa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Mao Yunshi and Li Jieming	44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Surpass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on a strategy of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Li Chong	49
On the Comprehensive Judgment and Measurement about the Fragility of Chinese Bank System	Chen Hua	55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Bank's Loan Profits	Gu Haibing, Shi Hongyan and Liu Wei	62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blem of Loan-and-deposit Deviation from 1995 to 2004	Zhou Xiangwen	66
An Explan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about the Topic of Politics-and-Administration Division	Li Xibin	73
The Methodology Background for the Study of Robert Dale's Theory of Democracy	Bao Yajun	79
A Comment on the New Marxist Urban Theory	Zhang Yingxiang and Cai He	85
Western Missioners and the Practically Ideological Knowledge Tren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Chunhong	90
On the Voluntary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Sect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1930s	Cao Tianzhong	96
Between Secular and Spiritual: Ding Weilinag and 'Shangxiantang Monthly' (《尚贤堂月报》)	Wang Wenbing	103
'Life Weekly'(1925-1933) and Youth Culture	Zhao Wen	109
Essays 'Reflecting the Situation of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Consuming Time'	Jiang Shuzhuo, Lin Gang, Gao Xiaogang, Jin Dai, Xu Xiaonan, Liu Haitao and Li Fangliang	116
O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ocused on Writer's Cultivation	Zhu Shangshu	130
About the Women's Life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Family Found in the Poetry of the Han Dynasty	Xu Guorong and Xue Yan	136
Points from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ash Unitization	Peng Xiaofa, Liu Jixian and Chen Zhiying	139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47

•学术发展与问题综合•

对人文社会科学现行学术评价系统的确认与辩护

◎ 王 宁

[摘要] 国际公认的两大人文社会科学权威检索数据库SSCI和A&HCI沿袭美国原科技信息所的科学论文索引SCI。在这三大检索数据库中,英文刊物占压倒多数。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索引CSSCI的建设,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但似应改名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CHSSCI,成立动态专家库对来源期刊随机抽查,并发挥专家推荐作用,使之能与国际检索系统逐步接轨。中国是人文社科大国,应加强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借助两大检索数据库的作用和客观影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跻身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大国行列。

[关键词] SCI CSSCI SSCI A&HCI CHSSCI

(中图分类号) G25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05-05

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评价系统主要是三大检索数据库SCI、SSCI和A&HCI。原美国科技信息所(ISI)、现改名为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Scientific)研制开发了目前全球最大且最为领先的引文数据库。1955年,年仅30岁的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博士在著名的权威刊物《科学》(Science)第122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首次提出了利用论文的相互间引用的关系来组织和发现科学文献的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作用。他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引起了科学研究的一场革命。很快地,这种以科学计量法为依据的评价系统推广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迅速地在数十个科技发达国家广为使用。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每年都要发布我国学者收录在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库的论文数量,并邀请专家分析这些论文的影响因子。据最新统计,中国学者2004年在国际科技刊物上发表论文并收录到SCI数据库的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五,而且质量也在稳步上升,这无疑对中国的高等院校能否迅速进入世界一流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的发文量则大大落后,不少学者乃至一些学术机构的负责人甚至对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SSCI和A&HCI都不知道,更无法自觉地将其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上了。这无疑不利于我们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现在,国内一些学者对SSCI和A&HCI颇多指责,认为这些都是“美国标准”,不能用来评价中国的人文社科学术。这样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科学的态度是,我们要想推翻或反对一种学术评价系统,首先必须了解它,熟悉它,在此基础上的推翻或反对才是有力的。对于国内人文社科界的同仁而言,当务之急正是要了解这三大检索数据库,特别是与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后两个数据库系统,然后再作出自己的学术评价标准的制定或选择。

一、SSCI和A&HCI评介及其与CSSCI的比较

也许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SCI(科学论文索引)并不陌生,因为中国的高校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在关注这一数据库所收录的中国学者的论文,并以此作为评估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科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既然上述人文社会科学两大检索数据库是沿袭SCI而创立的,那么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

作者简介 王宁,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们也应当对前者有进一步的了解。但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最近在参与第十次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审核工作时惊讶地发现,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点的负责人竟然对SCI、SSCI以及A&HCI这三大数据库全然不知,甚至将其与国内核心刊物CSSCI数据库混为一谈,或者将其与另一仅用于工程的数据库EI相混淆。其实SCI全称Science Citation Index,由原美国科技信息所 (ISI) 于1963年创立,并回溯到1945年的数据,截止2005年,已经回溯到1900年的数据。SCI数据库创立后不断调整来源期刊目录,最近一次调整和扩大是在1994年,后于1999年又作了局部调整,现收录各种主要语言文字发表的科学技术期刊6041种,其中有5800种作为其主要期刊,共涉及164个自然科学分支学科,这里面包括120多种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期刊。这也就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稍有名气的学者都有论文被收录SCI检索数据库的原因之一。SSCI全称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创立于1975年,但回溯到1956年的数据,后于1994年和1998年两次扩大调整来源期刊目录和数量,现收录1765种社会科学期刊,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少数用社会科学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教育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期刊也收录其中,共覆盖50个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同时,为了防止疏漏,该数据库还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国际性科学、技术和人文类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共涉及6500多种刊物。A&HCI全称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最初创立于1975年,数据也回溯到1975年,后于1994年、1999年和2002年三次增减调整来源期刊数量和目录,现收录1,121种国际著名的艺术与人文类期刊。同时,为了防止疏漏,该数据库还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国际性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优秀论文,共涉及7000多种刊物。应该指出的是,这两大检索数据库都有各自的阵容强大的专家库,参与刊物的遴选和论文的推荐和筛选。笔者最近两年一直参与上述两大数据库来源期刊的评审工作,并对之提出意见或建议。一般说来,一篇论文发表于两大检索数据库之一的来源期刊的三至四个月后,就会被收录,少数非来源期刊上的重要论文经专家推荐,一般半年后也可收录到数据库。因此它们所拥有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应当得到一定的肯定。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少专家因为工作繁忙或其他各种原因,很少对来源期刊以外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进行仔细阅读并推荐,所以,目前收录到这两大数据库的论文基本上是来源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但是任何涉及艺术与人文类以及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学科,其科学性和客观性都不是绝对的,因而难免带有人为的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往往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公认,而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经济学、文学与和平奖则常常引起争议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两大检索数据库的缺陷。这种缺陷首先体现在所收文章无选择:所有发表在来源期刊上的文章,甚至包括综述和书评一概收录,这就容易给一些投机取巧的人钻空子。作为论文的最终评价者应该分清楚:(1)来源期刊的等级和影响范围。以A&HCI为例,第一等级的刊物应包括在整个人文学科内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期刊,第二等级的刊物则应包括大的学科门类的权威期刊,第三等级的刊物才包括某个专门领域内的权威期刊;(2)收录文章的类别。第一类为论文 (article),第二类为综合论述 (survey),第三类为书评 (book review);(3)被他人引用的次数。我认为,量化必须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保证评价标准的客观和准确,应在注重收录论文数量的同时更注重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

其次是语言上的局限。上述三大检索数据库中,英文刊物占压倒多数,这自然与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应用不无关系。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在后两种检索数据库中,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中文期刊,只有少量的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英文期刊。这显然对中国学者是不公平的,对此我已经联合了一些国际人文社科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在多种场合呼吁,并直接致信美国科技信息所 (ISI),希望有一些优秀的用中文发表的中国期刊进入这两大检索数据库,这样,它们才能真正名副其实地成为具有国际性标准的权威性检索系统。最近一个令人可喜的消息证实,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双月刊已于2005年列入A&HCI来源期刊,随之一大批中国学者撰写的中文论文收录其中。这自然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另一方面,我又发现这些论文几乎没有被引用。因此,我认为,使用上述两大数据库作为评价

体系，一定不能只注意数量，而应更注重收录其中的论文的质量，注重论文的被引用率和影响力。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随着“汉语热”和“中国文化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升温，更多的中文学术期刊将收录到上述两大数据库，并将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产生应有的影响。但在这一远大的目标尚未实现之时，我们暂时沿用SSCI和A&HCI作为评价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国际性影响和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仍不失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异议，更不能因为自己的论文没有一篇被收录而从根本上对其应有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予以否定。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既然拥有数量庞大的人文社科研究者，而且每年都会发表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那么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有无强劲的声音和重要的影响？对此我只能先遗憾地回答：有一些声音，但不强劲；有一些影响，但现在还不明显。对其原因我将在下一节进行分析。作为一种权宜之策，由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共同主持的一个期刊评估项目几年前推出了CSSCI（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索引），这一索引已被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视为评价其学术成果的重要标准，对此也有不少人想知道它与国际上权威的两大数据库在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有无差异。

我认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检索数据库CSSCI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在某些方面是接近国际标准的，比如说，首先框定一些来源期刊，而且这类期刊的数量每年都不是固定的，这就给各种收录期刊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竞争状态。其次，它也很注重所收录论文的影响因子，通过检索，作者可以知道是谁在何处引用了自己的论文，以便与引用者进行互动。但它的缺陷则在于某些学科的刊物因为种种原因受到了忽视，大量的以书代刊但质量较高的丛刊或集刊也受到了忽视，而且每年对论文从发表到收录之间间隔的时间太长，这显然也是不利的。再者，不少人对所收录期刊的权威性也提出了质疑，其理由在于：(1)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学术期刊都没有实行匿名评审，更谈不上国际范围内的匿名评审了，往往只是几个编辑根据自己的兴趣就可以决定是否刊用一篇论文；(2)与国际权威的检索数据库相比，专家参与的成分相对说来较少，这样就无法弥补国内刊物本来就存在的缺陷；(3)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未作明确的划分；(4)所收录的来源期刊过多，比较适中的数量应该是100种左右，这样一旦汤姆森科技集团决定大规模收录中文期刊的话，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向他们推荐确实优秀的中文期刊；(5)还有少量的CSSCI来源刊物通过收取版面费来进行创收，这显然会影响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品位。但我认为，对这一新生事物我们无须横加指责，而应当不时地向主持这个项目的机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努力使之完善，真正达到与国际权威检索系统的互补和接近。否则要我们这些专家还有什么用呢？我最近通过和这个评价中心的研究人员接触，发现他们已经采纳了我们提出的有益建议和意见。在此，我再提出一个新的建议，CSSCI是否可以改名为CH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并且成立一个动态的专家库，对所收录的来源期刊进行随机抽样检查，并且也和上述国际检索数据库一样，发挥专家推荐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可以尽可能地使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优秀论文不被忽视，同时也使这一检索数据库更加具有权威性并符合各学科的实际情况。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世界性

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把自己封闭于一隅，而应更加频繁地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种交流和互动式的对话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国门，发挥更广泛的国际影响。人文社会科学一向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那就更不能脱离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人也许会问道，我们自己的CSSCI与国际上通用的、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SSCI、A&HCI是否有接轨的可能？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我们能否以上述两大国际检索数据库作为评价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标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这其中是否会隐含着某种文化霸权的意味？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并试图提出我的解决方法。

首先，令人可喜的是，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也有了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自己的CSSCI正在朝

着与国际上通用的、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SSCI、A&HCI的方向努力，如果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一旦接受我们的建议，打算再收录一些中文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那么我们将建议他们先参照CSSCI所收录的400多种期刊，并从中精选出来源期刊。当然，为了防止疏漏，他们也会包括个人推荐选择的确有学术价值、但发表在其它著名的中文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杂志上的优秀论文，甚至还会在国际范围内邀请另一些专家再推荐一些其价值尚未被发现的中文学术期刊。如果那一目标实现，其中隐含的英语文化霸权的因素便被消解了。而在现阶段，这种语言霸权无疑还会存在。如果我们将两大国际检索数据库再加上CSSCI相互参照，共同作为学术评价的相对客观的标准，应该还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漏掉一些发表在虽未列入检索系统的来源期刊但确有影响的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因此，以上述两大检索系统再加上CSSCI为标准尽管是可行的，但绝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因为有些论文的价值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考验和实践来证明。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SSCI和A&HCI对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借鉴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充分利用这两大索引呢？由于教育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简称985项目）自1999年以来已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十多所高校启动，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也已加快了步伐。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率先订购了三大国际检索数据库的光盘，受到校内外师生的普遍欢迎，利用率很高。这两所学校还采取了相应的奖励措施，鼓励师生用英文撰写论文在SSCI和A&HCI来源期刊上发表。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人文社科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弱势”地位。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走向世界并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方面我不妨略为展开一下。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了解这两大国际检索数据库，使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瞄准对象和奋斗目标。我多次在国外大学演讲时声明，中国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方面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样也应当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应当在国际学术界发挥重要的影响。但究竟如何发挥这种影响呢？首先应该使别人了解你，听到你的声音，然后才能潜移默化地受到你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说的与国际接轨决不意味着与西方的接轨，我们要区分国际化和西化这个界限。当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向西方靠拢，而是真正和国际上最先进、最能代表学术发展方向的前沿理论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未来的世界上要想有效地生存下去，不会目前始终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恐怕寸步难行，你根本无法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80%以上都是通过英语传播的。在全球化的时代，知识可以转为信息的形式，而信息则是一种财富，你如果不能及时地获取信息的话，就等于失掉了很多财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我所处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界，曾出现过这样的担心：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失语了，中国的学术患了“失语症”，中国学者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的声音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个语言的问题。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我们能不能把它准确流畅地用符合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表达出来，还是仅仅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学术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然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语言在全世界的普及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旅游胜地，以往的法、日、西班牙语翻译已经扩展到了汉语翻译的范围，这就说明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要想进入这个市场，不会汉语就很难。同样，当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走向强势时，国际学术界也不得不设法了解中国，这时汉语的强势地位就会逐步显示出来。因此，在目前我国的情报机构尚未拿出一个足以与上述两大检索数据库相对等的检索系统的情

况下，充分地利用上述两大国际人文社科检索数据库来传播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策略。

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中国学者如果自觉地利用了SSCI和A&HCI的标准，就有可能促进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更快地进入国际性的对话空间，最终实现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之目的。但是，在现阶段一下子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困难。我这里仅举我所从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为例。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用汉语写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国外的研究者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讨论和对话。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则不是这样，不少西方的汉学家不屑去花时间翻译中国学者的论著，他们只是借鉴其中的一些有用的资料，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论视角分析阐释并用英文加以表述，最后便成了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失语现象是存在的，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有东亚系，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中国的语言，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而只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状态。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的状况。

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把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而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翻译的中介。实际上，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比如说中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写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失掉了，所以我们要想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时用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倒是与其相反，它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重要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再者，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汉语，可以预见，汉语将成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上最为普及的一种主要语言。“汉语热”的兴起肯定有助于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推广，但是中国的文化和学术研究也应当跟上。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们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对国际同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成就和国际性影响则微乎其微，在有些领域内，国际学术界甚至根本忽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借助于上述两大检索数据库的作用和客观影响，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跻身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大国的行列。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术评估中的“级差”理念论析

◎ 熊 焰

[摘要] 期刊的等级评价不应简单地移作研究成果水平的评价;影响大小不能简单地用以评定成果的学术含量。为了使学术评估更公平、公正和科学可行,有必要引入级差理念,分析不同学科、不同成果形式的学术难易,统计各学科学者和期刊的数量和发文情况,定出相应的分值和权重,细化量化评估,使之更合理。

[关键词] 量化评估 级差理念 水平级差 影响级差 难度级差

(中图分类号) CI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10-04

学术评估可以从不同层面多种方法进行,量化评估是其中颇具可行性且运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关键的问题是,在所有的量化评估中,人们都立足在一个平面上“众生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学术成果,不注重分别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同一学科研究类别的差异性,以及同一研究类别中文章性质的差异性,衡量这些论文的价值大多只考虑到发表刊物档次的差别,有时还莫名其妙地计较文字数量的多少,其他都一律“平等”。殊不知这种看似平等的学术评估中包含着相当粗糙甚至粗暴的不平等。严肃而科学地对待学术的评估人士应该懂得,不同学科之间,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类别之间,同一研究类别中的不同性质的文章之间,存在着研究操作的难与易的巨大差异,存在着成果发表途径的多与少的巨大差异。克服简单粗暴弊病的一个有效然而很少被使用的方法,便是引入“级差学术”的理念,在学术评估中尽可能运用客观的、可统计的方式界定学术成果的“级差”序列,从而使量化学术的评估尽可能体现出学术操作难与易的差异,体现出学术成果发表途径多与少的分别,从而使学术评估体现出更多的公正性。

“级差”本是经济学术语,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安德森(1739~1808)首创了级差地租理论,科学地阐述了由于土地条件不同带来地租差异性的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发展了这一理论,将级差地租分为I、II两种形式。级差地租I是由土地肥力和位置的差异带来的差别,级差地租II则“是以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有不同的级差生产率为基础”(P819)所引起的利润差。后来人们将这一经典理论中的级差概念移用作有关等级差别的规范性表述,例如管理学中有“级差管理”机制,社会分配中有“级差工资”现象,近年来教育部就高校录取工作的有关规定也正式采用了“级差”概念,要求明确“分数级差”与“专业级差”。学术评估所要求的体现某种科学性和公正性的“级差”理念,是要将学术操作的难与易、成果实现途径的多与少作为基本参数,对学术成果进行适当的、富有说服力的学术级差的分辨和评价。

一、“水平级差”与“影响级差”

目前流行的学术评估体系并非没有级差意识,各级评估机构和实施学术评估的单位在具体的评估操作中试图划分出学术成果的“级差”,学术评估的运作本身就体现着学术级差分辨的明显努力。只是,学术评估界没有能够明确地、理直气壮地研究学术级差的确认程序以及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从而导致学术评估中级差理念的相对缺乏、摇摆不定,或者残缺不全。

无论是学术研究者的晋级、晋升,抑或是奖励、分配,学术评估的程序常常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专家评审。撇开这种专家评审中的人情因素甚至不正之风的因素不说,就目前的情状而言,还没有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有关判断研究成果学术水平级差的标准或规范,所谓的专家评审因此常常与专家个人的好恶直接挂连,客观、科学的学术评估往往被这种个性化的评审所冲淡。何况这其中还可能存在着研究领域

作者简介 熊焰,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32)。

的差异所导致的学术歧视等因素。因此,要健全目前已经非常流行的专家评审制度,必须深入研究系统的、公正的、科学的、可行的学术水平级差标准和规范,尽可能将专家评审中由于研究领域、个人好恶甚至是人情、学风所可能造成的评估偏差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分辨学术水平级差的评审标准与评审规范,当然不能像研究生论文评估指标那样简单,只需要机械地打上优、良、中、及格等等级,它必须有关于学术成果观点的创新性,创新观点的可靠性的级差描述,有关于所用资料来源的难易程度及其可靠性、权威性和适用性等级差描述,有关于研究方法的新颖度、可靠性和适用性的级差描述。这些级差描述都应该对应于相应的分值和权重,以此得出较为客观、较为科学的学术水平级差评估的数据。

这就是说,在学术评估的专家评审环节中,除了对评审专家的公正性和良好学风应有相应的倡导而外,需要研究出一整套系统的、公正的、科学的和可行的级差标准和规范,以保证学术成果水平评估尽可能客观。学术评估界和相应的科研部门之所以未能在这方面拿出较为可靠的学术水平级差评估指标,甚至没有在这方面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是因为我国的学术评估尚未真正确立合理有效的级差理念,没有深入思考学术水平级差评估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

如果说学术评估的专家评审环节体现出水平级差理念的相对缺乏,那么,学术评估中的刊物等级的考量则体现出我国学术评估体制中影响级差理念的摇摆不定。就目前我国学术评估状况而言,最为成熟的是通过对学术出版物进行影响因子的分析比较,然后据此评定相关学术成果的价值等第。对于学术著作,主要是看它所获得的书评量和引用率来评判它的学术级差,学术论文则往往是根据其所刊载的学术期刊的等级进行相应的价值认定。而学术期刊的等级,例如SSCI刊物、CSSCI刊物、权威刊物、一级刊物、二级刊物、核心刊物、一般刊物等等名称所代表的,常常又都是根据刊物的影响因子判定的。不过事实上,这种影响因子决定论其实不可能贯彻到底,一些主办机构很具有权威性 or 社会认同度很高的学术刊物,也许影响因子并不很高,但各个“CI”评估系统就是无法将其拒之于门外。这一方面说明,现行的学术期刊分级制度其实在贯彻影响级差的理念方面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术评估单纯靠影响级差来进行评判,其不确定性仍然很多。

对于以刊物等第确定学术成果影响级差的惯常做法,学术界已经相当厌倦,并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2]这确实可以说明影响级差用于学术评估的先天缺陷。这种缺陷首先体现在这样的逻辑悖论之中:一篇论文读的人越多,它的水平就越高;越是普通人所能接受的论文学术水平就越高。一般来说,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的大小固然与学术研究成果的内在学术含量的大小有关,但其间的联系并不是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学术含量越大、学术水平越高的成果其学术影响就越大、越普遍。学术成果的影响往往不等于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有时更复杂的情况在于,常常是那些普及性、通俗性的学术成果其社会影响大于一般的学术成果,其引用率也远远大过一般的学术成果。有些专业性很强,学术含量极为丰富,学术研究很有深度的成果,其影响在一定时间内可能非常窄小。古代音韵学关于上古音的推定,古文字学关于古文字的辨析,体现的都是相当艰深的学问,如果有较为突出的成果,其学术含量远远高于一般的《古代汉语》教程,但在影响、受关注程度和引用率方面很可能不及后者。

在学术界内部也是这样,为一定学术领域所普遍关注并多加引用的,常常是那些概述性、综述性、商榷性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学术含量一般来说低于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但其影响因子会明显地超过后者。以笔者所熟悉的训诂学研究领域而言,一篇《历来关于“离骚”题名解析的综述》,其影响和引用率自然会比《“离”字新解》这样的论文更大,前者的关注面还可能顺利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以刊物的等第直接挂连所反映论文的影响级差,更是“形而上学猖獗”的体现。固然,刊物的影响大小客观上会影响其所刊载论文的影响度,但既然是依仗刊物的影响发散其影响,这样的影响能算是这个学术成果所固有的吗?学术刊物的影响级差如果有重要参考价值,它说明的也仅仅是此前发表的学术成果的总体影响状况,将此拿来为后来发表的论文负责,在学理上确实说不过去。学术界对划分刊物等

第的做法已然异议甚多，更何况将刊物的等第直接与所发表的论文价值的评估联系起来呢？

学术评估确实应该通过公正而严格的专家评审，从学术水平的高低进行判断，从而在水平级差的意义上对学术成果进行差异性论定，也需要从刊载等第等方面分别出学术成果的影响级差，这些都是判断学术成果质量和价值的重要参数。但实际情形往往是，通过专家评审分别出学术成果水平高低的做法，对专家个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道德甚至人格素养有着过多的依赖，离开了这些，所作的评估可能会成为一种荒诞的笑谈。一些省份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形成的负面影响便是最有力的证明。^[3]这是我们的学术评估缺乏水平级差系统甚至评估能力的证明。

二、“难度级差”

更重要的是，从学术评估公正性的角度看，我们的学术评估普遍缺少一种“难度级差”的理念与操作方法，也就是从种类和性质上分别出学术成果形成以及其实现途径的难与易。成果发表途径的多与少实际上也反映出了成果实现的难与易。因此，在学术评估中引入的级差理念实际上是呼吁重视学术成果评估的难度级差。

按照现在越来越流行的量化学术评估方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每年应该发表8-10篇学术论文方算过得去的成绩。相当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完成这样的数量也许并不太困难，但在有些学科，如较冷门的古文字学、考古学等等，每年完成这么多有原创性发现或阐述的论文是否可能？幸好，没有那么多的原创性发现与阐述，可以用与本专业相关的评论文字来抵充，但学术含量和论文质量就不是他们所能考虑的问题了。如果沿用前人所极而言之说法，在古文字研究中识别出一个文字便相当于在浩瀚的宇宙中发现一颗小行星，则研究古文字的人每年发现近10颗“小行星”，那岂不是创造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神话？如果我们承认成功地识别出每一个古文字都相当困难，就没有理由要求这一专业的研究者也像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研究者乃至文学评论者提供数量相同的学术成果。在我国日益健全的学术评估体系中，应当承认不同学科之间学术难易度的差异性的存在，果断地引入难度级差的学术评估概念。

学术操作的这种难易差距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常常体现得相当明显。特别是一些非学术性因素介入其中，这样的难易差距会随之加大。当某个学科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热点联系得较为紧密的时候，这个学科的学术操作就比其他学科来得容易：报纸刊物争相刊载所造成的时代“热岛”效应自不待言，即使其所需要的史料数据或理论素材，也会随着这样的“热岛”效应而得到不时的呈现，从而使得相应的学术操作变得相对容易而受人关注。前些年曾有这样的情形：全社会都在谈论诸如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之类的新概念，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刊载类似的材料、翻译资料与相关文章，并且以越来越巨大的热忱欢迎这方面的文章，于是发表这样的文章固然显得较为容易，写作这样的文章也会显得较为便当。与此相反，那些远离时代热点，远离舆论关注焦点的学术领域，所产生的学术成果一般来说也相应地会遭到报刊的冷落，除了相当专业性的学术刊物而外，它们别无出路。更重要的是，这类论文的写作资料和其他资源也将显得较为稀缺，此类的学术操作因此相当困难。假如上述这样两个学科放在同一个量化标准上进行评估，不公平的现象就会形成。

避开一些非学术性的因素不说，仅仅就不同学科学术规范性或学术规定性而言，其间的难易差异也十分明显。在中文学科的大范围内，这样的差异甚至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语言学研究的学术要求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要求相差很大。许多人认为语言学的研究更接近自然科学，需要相当意义上的实验，需要各种调查数据，需要各种手段的证明程序，甚至需要以上实验的重复性以及调查数据的可验证性。古代汉语研究，特别是古文字研究，其学术要求更繁难，学术规范性也更严格，完成相关成果的难度系数更大。这样的难度系数还不包括当代学术刊物对于语言学特别是古汉语研究的歧视性对待，主持这些学术刊物的相当多的编辑者认为，语言学特别是古汉语研究的论文被转摘被引用的机会要比文学论文少很多很多，刊物刊用这样的论文回报率较差，于是对此类论文常常采取婉拒的态度。全国每个省的社会

科学院或社科联都拥有两份以上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但至少有一半拒绝刊登或者从来不刊用语言学特别是古代汉语研究的文章。相比之下,与汉语研究相邻的一些学科更接近思想阐述,对于材料的要求,对于实验和调查的要求都相当简单,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不需要各种证明手段,也无法证明,于是学术操作要比语言学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全国发表这一类研究和批评文章的报刊数量可能是发表语言学论文的报刊(哪怕将语文教学的也计算在内)的8-10倍,这样的学科与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学术难度级差由此可见相当明显。当学术评估机制将语言学特别是古代汉语研究的成果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放在同一层面进行数量统计的时候,这种评估机制的不公平也就达到了相当荒诞的地步。

可惜,在目前中国高等学校以及其他学术评估机构的眼中,这种学术难度的差异性几乎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被认为没有任何重视的必要,因为既然量化则一切看量的指标最为合理也最为公平。殊不知,这种忽略学术成果的难度级差的指导思想长期执行下去,会对学术自身起到意想不到的危害。这种危害可能导致一些学术研究者投机取巧,放弃或规避学术的原创性追求,将不痛不痒的批评或评论文章拿来抵充学术论文。如果说这样的后果在其他学术领域未必十分明显,则在上述某些研究领域却司空见惯。在现行的学术评估体制中,上述某些学科中的一般批评性文章与同学科严格的研究文章,只要是发表在被承认的刊物上,都归为同一类别的成果进行学术评估,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学术操作难易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一篇有感而发的批评文字可能只相当于一篇普通书评的工作量和写作难度,熟练的快手也许一晚上可以草成,而一篇有理论、有史料、有作品分析和历史解剖的学术论文,恐怕需要花上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功夫和时间才能完成。将这样的两种文章放在同一类成果中作学术评估,就是忽略了学术操作的难易差异,造成了明显的不公平。一些聪明的研究者因此对批评和评论性的文章趋之若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各种话题上频繁出击,发表的常常是同样一通意见,但论文发表出来,数量业绩随之上升。长此以往,学术的原创性就会被搁置在人人忽略的角落,评论之风在低层次上变得愈来愈炽盛。

对这种重批评轻原创的不良学风的遏制和克服可以有多种途径,而在学术量化评估事实上尚无法避免的今天,学术评估中引进学术级差理念,对学术成果获得与发表途径的难易程度予以一种客观的承认与适当的认定,无疑是一种可靠且行得通的途径。具体地说,可以将各个学科研究人员的大致总数与现有学术期刊对于各个学科每年可能的发稿量计算出一种比例值,形成各个学科发表途径难易度的级差参数,再结合各个学科原创性成果每件所需劳动量,特别是在思想性构思之外的实验、调查所需的硬性劳动量进行综合考察,制订出学科之间的难度级差权重,在量化统计的时候将这种难度级差的权重核计在内,以求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学术公平。这种难度级差的认定需要建立合理、公正的统计模型,需要各专业的专家会同管理学者、电脑工程师一起研究、攻关。这显然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复杂而需要慎重的工作,同时,又是学术评估中非常有价值的考量。其实,在目前尚不具备建立级差学术管理模式的条件下,学术评估机构如能够引入健全的级差学术理念,也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

学术评估在学术研究领域是一件牵涉面很广且十分严肃的事情,在这样的事情上尤其需要克服单纯看论文数量和刊物等第的简单化现象。克服这种简单化现象的有效方法与理想途径,当然首先是建立学术成果质量和价值的科学评估机制,其次便是从学术(含量)水平、学术影响和学术难度等方面引入健全的级差理念,使学术评估在科学、公正和有序的状态下显示其尽可能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目前学术评估在表面上已经注意到了水平级差和影响级差的问题,难度级差则远远没有得到关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 黄安年.究竟是奖励学术刊名还是奖励论文质量[J].社会科学论坛,2005,(4);党生翠.美国标准能成为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评价标准吗?[J].社会科学论坛,2005,(4).
- [3] 杨玉圣.学术评奖的负效应[C].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陶原珂

•哲学•

研究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正本清源”方案

◎ 赵敦华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正本清源”的方案,即,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厘清这些根本思想的历史根源。本文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是马克思的新唯物论、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理论的观点,并初步表明这些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显性的和隐性的来源,指出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变革意义。

[关键词] 实践唯物论 人本主义 自由观 人类解放

(中图分类号) B0-0;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14-09

一、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哲学,即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上的革命性的变革,也不能由此而把它与西方哲学隔离开来。其理由是,现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也都自诩为哲学上的革命,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而否认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属于西方哲学;同样,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称或者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而否认它属于西方哲学。西方世界的哲学家大都持这样的观点。不管他们是否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不是哲学上的根本变革,他们都把马克思的哲学当作西方哲学的一个部分。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有褒有贬,篇幅有多有少,但比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史著作都有专门介绍马克思的章节。

另一种相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变革使得它摆脱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和发展道路,使得它与现代西方哲学背道而驰。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只有部分真理,而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甚至连部分真理也失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担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与西方哲学彻底划清界限,不但会把西方哲学史上的部分真理等同于普遍真理,而且还会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谬误。这一种观点曾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但却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其来源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

1947年,日丹诺夫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 (P4)} 根据这一定义,“所有的哲学派别分成了两大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阵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进步的唯物主义路线在这一斗争中的形成和发展,是哲学在许多世纪以来全部发展的规律。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社会的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1] (P373-374)} 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我国影响极大。改革开放之前写的哲学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遵从“两军对阵”的模式。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哲学史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附庸,是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提到的西方哲学家而写的注脚;至于现代西方哲学,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的反面教材，是供批判的靶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哲学界取得了两个令人瞩目的新成果。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等新的解释；并以积极的态度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第二，哲学史界突破了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阵的历史”的模式，从具体的史料出发总结哲学史发展的线索，实事求是地理解和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家。这两方面的新成果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还存在着阻碍相互对话和沟通的障碍。按照中国特有的学科分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是两门独立的哲学“二级学科”；“西方哲学”从属于“外国哲学”，“西方哲学”又被分割成“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两个部分。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哲学思想被层层分割的“学科”限制在狭隘的专业之内，哲学研究者以某一专业的某一方向为职业，画地为牢，以邻为壑，互不来往。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专攻西方哲学的某一派别，某一哲学家，甚至某一哲学家的某一著作或理论，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因此而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陌路，那就未免太狭隘了。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关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如果只是把目光盯在西方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身上，那也不能在广阔的视野中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中国的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当作两个独立的学科的做法，可能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从学理上说，两者的分离是没有道理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消除外部力量在两者之间设置的隔阂。这两个思想领域的贯通，可以澄清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渊源关系，而且也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乃至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和深远影响。

二、“列宁方案”和“斯坦普方案”

从原则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继承西方哲学的历史连续性，又是突破传统的历史变革。但问题是，如何把连续性和历史变革统一起来？在此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是按照从西方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历史顺序，用两者相同之处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连续性，用两者的差异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变革。另一种方案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确定它在哪些方面与西方哲学有历史连续性，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变革。

不难看出，这两种解决方案与前面谈到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两种理解有着对称关系。一般说来，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哲学的人倾向于按照连续性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或历史变革；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西方哲学的人，倾向于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革命性的特征，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来源。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案例的分析，评价这两个方案。

萨缪尔·斯坦普的《从苏格拉底到萨特的哲学史》一书，是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教科书，这本书可以说是上述第一种方案的一个范例。该书按照历史的顺序，在第21章叙述了马克思的哲学，标题是“卡尔·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作者说：“马克思所说的并不完全是独创的。他的很多经济学思想可以在李嘉图著作中找到，他的一些哲学观点和构想可以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著作中找到，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可以在圣西门的著作中找到，关于劳动的价值论可以在洛克的著作中找到。马克思的独创在于他从这些思想来源中，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思想结构，用作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有力的工具。”^{[1] 301-402}关于这个“统一的思想结构”，作者谈了四点：(1) 五种历史形态的理论；(2) 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理论；(3) 劳动异化的理论；(4) 上层建筑的理论。按照作者的解释，(1)是马克思的辩证法，(2)、(3)和(4)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作者完全在社会领域中谈论辩证唯物主义，这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有力的工具”的理由所在。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和性质有不同的

说法。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写道：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的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是什么，列宁没有说，只是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1] 4 P310,311}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更加明确地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来自费尔巴哈（马克思“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辩证法来自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2] 4 P418,421}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代表了上面所说的第二个方案，即，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来决定其历史来源的方案。这一方案在前苏联和我国占主导地位。现在，在已经突破了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的理论条件下，我们可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来源是否只是，或主要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呢？

我们可以通过斯坦普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同解释为例，说明上述两个方案的得失。斯坦普的看法的优点是把较多的西方思想的资源都吸收在马克思哲学之中，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外，李嘉图、圣西门和洛克的思想也被当作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列宁虽然没有提到洛克，但也把李嘉图和圣西门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不过，按照列宁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三个部分，李嘉图和圣西门的思想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这样的区分的主要根据是列宁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三个部分的理解。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存在这三个部分的区分。斯坦普虽然扩大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但却缩小了它的变革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只是“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工具。在这一问题上，列宁有更为正确的看法。列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原则和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应用和推广。虽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区分以及对这两部分关系的论述，并不是无可非议的，但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哲学唯物论”，而不只限于一定的社会理论，这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斯坦普代表的方案有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但却不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意义。列宁的方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出发，说明它的历史来源，具有理论上的优势；但这一方案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来源的全面理解。对这两个方案，我们应该取长补短，使之相得益彰。

三、“正本清源”的方案

在“列宁方案”和“斯坦普方案”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正本清源”的新方案。这一方案把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概括为“本”和“源”的关系。“本”即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源”指它的来源。我们把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变革和连续性的正确理解概括为“正本清源”的方案。“正本”就是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和所实现的历史变革，“清源”就是要全面地梳理和总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说明它与西方哲学的连续性。“正本”和“清源”的关系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和它的历史连续性的关系。这一关系有下面两个方面。

一方面，“正本”才能“清源”。就是说，只有首先对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有正确的理解，才能准确地发现它的历史来源。否则，只是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的理解，到西方哲学的史料中去寻章摘句，难免把西方哲学史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释。列宁的方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特征出发理解它的历史来源，这是“依本求源”的做法，本来是可以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注释式和任意性的理解的。但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之本的理解有偏差，才造成了对它的历史来源和连续性简单化的狭隘理解。现在的任务首先是“正本”，先把关注的焦点调整到正确的方向，才能有进一步的新发现。“正本”而“清源”，就是为了吸取列宁方案的优点，并从根本上克服对马克思哲学

片面的、僵化的理解。

另一方面，“源”不清，则“本”不正。就是说，没有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的全面理解和清晰的疏理，也不可能理解它的变革。从理解的逻辑顺序上说，先要“正本”，才能“清源”；但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上说，西方哲学是来源，马克思哲学是从源远流长的传统中产生出的根本变革。如果看不到西方哲学的丰富源泉是如何汇入马克思哲学之中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会是几条干瘪的教条。斯坦普代表的方案从各方面的西方思想资源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独创性，这是“由源溯本”的做法。但是，他看待马克思哲学的视野太狭隘，因此也没有把马克思哲学的丰富来源梳理清楚。我们提出“正本清源”的方案，结合了列宁的“依本求源”方案和斯坦普代表的“由源溯本”方案的优点。我们的目标不但是全面地解释马克思哲学与它以前的西方哲学的关系，而且是说明马克思哲学诞生之后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我们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根本变革并没有使它脱离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这是因为，影响马克思哲学的那些传统的哲学思想，也影响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只有理解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来源，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解释出两者交流对话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四、“正本清源”是否适用于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至此，我们只是用“正本清源”的方案说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比“马克思哲学”更为宽泛的概念。“马克思哲学”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表示不同思想的集合概念。这个集合包括的要素有：第二国际及其后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之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苏俄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第三国际其他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和最近的邓小平理论，等。不管哪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我们把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风雨雨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响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用开放的态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把某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为一尊，奉之为正统，也不要某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斥为异端，视之如仇敌。为此，更有必要对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正本清源”的分析。

马克思哲学是一切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哲学之本，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不同的哲学，这应如何解释呢？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思想可以说是“合而不同”；两者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但差异也不意味着矛盾和对立；既不能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上的差异性，也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马克思哲学中的不同思想和表达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部分原因。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哲学思想，或者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者以恩格斯所独有的哲学思想为本，由此造成了它们的哲学之本的部分差异。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另一部分的差异，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例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方面出自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在现实中，被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所放大，变得势不两立了。现在，我们要从理论上分析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原因。一方面要看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要看这些马克思主义含有哪些马克思哲学所没有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往往是在“修正”或“发展”的名义下，被增加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的。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相同之处，它们都有马克思哲学的根据；它们的不同之处，既来自它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的不同因素的运用，也来自它们各自增加的新内容。

我们把“正本清源”的方案应用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要看到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都有马克思哲学的根据，由于这一共同的来源，它们有相同的哲学之本；但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哲学

包含着不同因素，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这些不同的哲学因素，而且还有不同社会、民族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来源。在这些特殊来源中，有一些属于西方世界，与西方哲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我们现在当然可以在西方哲学的范围内，研究这些学说的哲学基础。但是，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其独特性来自苏俄的政治和经济的现实与文化传统。而毛泽东思想，我们常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包含着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中国来源。因此，苏俄和中国社会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其哲学基础不能被归于西方哲学，而分别与俄国、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哲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有来源不同的哲学基础，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它们属于或不属于西方哲学。

五、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之本

我们肯定马克思哲学是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本，但马克思哲学也有自身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哲学之本是什么？这是一个涉及到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我以为，把新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学说作为马克思哲学之本是合适的。

关于马克思哲学，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1] 9 P310}说马克思哲学之本是唯物主义，大概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问题是，这是什么样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唯物主义作为他的哲学基础，并不是唯物主义具有某种内在的真理。相反，他认为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解释世界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他的博士论文虽然以公认的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题，但却丝毫没有提及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相反，在论文的题词中，他赞扬“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认为“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1] 9 P9}直到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并说，这一学说“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2] 9 P324}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提法只是表达了他早期思想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错误影响”，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对此，我们要问：在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所做的彻底批判，又应该如何理解呢？在那里以及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一点也不比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更温和、留情。相反，他指出，唯物主义所不知道的人的“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1] 7 P54}这仍然是在肯定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

按照日丹诺夫的公式，唯物主义等于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思想，于是，站到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必然要选择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像日丹诺夫那样理解唯物主义的社会意义。相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说，普鲁士式的“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粗陋的唯物主义”，“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和“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1] 9 P60}在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也没有否认旧唯物主义与保守的、落后的社会力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称为“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 7 P57}以及“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1] 7 P75}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必须同时理解他的人本主义和自由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能够彻底地解释人的学说。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 7 P9}那么，能够抓住“人本身”这一根本的理论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真正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人本主义。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把18世纪的唯物主义观点概括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

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他说，这些“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1] 参 P166-167}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肯定的同唯物主义有着“必然联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性的、摆脱了罪恶的社会环境的、获得个性自由的“以人为本”的学说，即人本主义（humanism，亦译为人道主义）的学说。

当然，马克思既不满足于法国的18世纪唯物主义，也不满足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以往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充其量只是追求特定的阶级或社会组织的政治上的解放，而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人的异化，即消除劳动的异化。为此，他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和价值关系的论述，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消费和流通的全过程的分析，都是以他的新唯物主义为前提和基础的。他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可被概括为以下一个逻辑推论的系列。

- (1) 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
- (2) 劳动在人的历史中被异化。
- (3) 劳动异化最后造成了商品生产。
- (4)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性。
- (5a) 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以自然物的独立存在为前提；
- (5b) 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是人的基本的社会存在。
- (6a) 5a必须承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
- (6b) 5b必须以实践的、历史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 (7)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统一的，6a和6b因而也是统一的。
- (8) 因此，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关于实践和历史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哲学同无产阶级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哲学的物质武器，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因为哲学的批判“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马克思改造了康德的绝对命令。他说，德国哲学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 参 P15.9.6.9-10}

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但是，这一理想，如果没有一种能够说服人的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学说，只能是空想。注意，“解放”（liberalization）就是“自由”（liberty）的普遍化，正如“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现代性”（modernity）的普遍化一样。解放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解放，这个道理是如此明显，以至不需要超出字面意义的解释。但现在，一些人一听到“自由化”，就紧张，就如临大敌，他们把“自由化”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啻于把“自由”、“解放”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须知：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资产阶级的解放，已经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完成，人类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全人类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化。只要这一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自由解放学说就

不会过时。

概括地说，马克思的自由解放学说认为，为了免除压迫和奴役，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压迫和奴役的原因。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产生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的异化所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政治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匮乏，心理上的恐惧，归根到底产生于这一经济上的原因。马克思从争取现实的自由权为出发点，通过消灭劳动异化的途径，最后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1884年，意大利一个名叫卡内帕的社会主义者要恩格斯用一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他说，但丁曾用“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难”来概括旧社会，但还没有人用一句话概括新社会。恩格斯回答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7] P730}恩格斯所引用的那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P294}从恩格斯的概括来看，个人的自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说，经过根本变革的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学说是马克思哲学之本，但这不是说，马克思哲学以三个学说为根本。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学说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属于不同的哲学派别。但在马克思哲学中，这三个学说是相通的，它们的差异只是理论层次的不同。唯物主义是关于人和世界关系的学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使他得以用劳动的、实践的观点，分析“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9] P59}论述自然界的物质形态与社会生产方式的统一。他的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上的“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对立，是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学说。这一学说以人的自由为价值尺度，衡量各种社会形态的进步；并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批判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在实践的层面上，唯物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解放学说的统一，意味着以经济活动为基础，关注人的实际利益，争取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最终通过消灭私有制的途径，使人类彻底摆脱劳动的异化和外在力量的奴役。马克思哲学就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为标准、以自由解放为目标和方向的统一的学说。

说到这里，我想已经不需要就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的可能性说太多的话了。有一些西方哲学史知识的人知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由学说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即使我们承认马克思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那么，这一根本变革的对象是“变得敌视人了”的旧唯物主义，^{[10] P164}是对那种把人的异化只是当作精神和意识的异化的唯心主义，而并不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只是继承了唯物主义以反对唯心主义，继承了辩证法以反对“形而上学”。相反，这一哲学上的变革一方面超越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和争取自由解放的传统，另一方面超出了以往哲学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为哲学规定了更高的任务和实现的途径，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西方哲学在根本旨趣上是相通的，在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不但可以与传统的西方哲学的各种学说对话，而且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对话。

六、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之源

我们现在追溯马克思哲学的西方哲学来源，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显性的、直接的方法，第二种是隐性的、间接的方法。为了全面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这两种方法缺一不可。

第一种方法是迄今为止通常使用的方法，即，说明哪些西方哲学直接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阐述它们如何影响马克思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认的那样，对他们的哲学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包含着从青年黑格尔派到共产主义、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明显的发展线索。作为一个历史事实，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确实与马克思哲学的联系最直接、最密切。但是，列宁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却不是陈述一个历史事实，而是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有着密切联系这一历史事实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我看来，这种解释，一方面缩小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另一方面

又扩大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列宁的解释之所以缩小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不仅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来源，而且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很多观点的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与他的体系密切联系的方法，使用他的方法虽然不一定要全盘接受他的体系，但接受他的体系的部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不是简单地“抛弃体系，接受方法”，也不像“把头脚颠倒的体系颠倒过来”。马克思哲学不但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一些观点，如“存在”、“定在”、“扬弃”、“异化”、“劳动”、“自由”、“市民社会”、“国家”和“法”，等等。黑格尔在阐述这些观点的意义时，把西方哲学的各个环节贯穿起来。可以说，不理解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就不能理解黑格尔哲学，也不能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但因此而说费尔巴哈思想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那是扩大了费尔巴哈的影响。费尔巴哈使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的唯心论和宗教的虚幻，但却没有决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性质和内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主要是他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哲学思想。他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多于继承。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更多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列宁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与哲学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各个部分分别有自身的来源，因此未能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

追溯马克思哲学历史来源的第二种方法，即隐性的、间接的方法，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但却被反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一个范例。这部书的上卷的副标题是“柏拉图的魅力”，下卷的副标题是“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从这些标题就看出，波普尔攻击的重点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他把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解释为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开始于赫拉克利特，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发展到了顶颠。波普尔勾勒的历史主义发展线索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解释，他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当作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伯林评价说，波普尔的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迄今为止的任何作者所能作的最彻底（most scrupulous）、最难对付（most formidable）的批判”。^{[10]（P287）}英国哲学家麦基（B.Magee）甚至说：“我不明白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读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如何还能继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1]（P89）}虽然很多有理性的人在读了波普尔的书之后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至今还没有对这一批判做出有力的回应。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的框架，缺乏波普尔那样的宏大宽阔的历史视野，他们对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做出的反批判，不是在同样领域中和在同等水平上的论战。这一事实从反面告诉我们，揭示马克思哲学的隐性的、间接的历史来源，是必要和重要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一个“希腊迷”，他的著作多次提到希腊文学和艺术的永恒的魅力。如果认为希腊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影响，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希腊哲学的影响是隐性的、间接的，通常是通过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到马克思的。比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说：“这篇论文仅仅看作是一部更大著作的先导，在那部著作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细地阐述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一组哲学。”^{[12]（P10-11）}那部“更大的著作”没有写出来，但我们可以追问：马克思的写作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把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归为同一组哲学？如果联系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分类，就可以理解，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代表了“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康德不同，康德认为，人在对自然的认识中没有自由意识。在康德与黑格尔的不同的自由观中，马克思支持黑格尔的观点，他的博士论文说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达到了自我意识的自由。不难想象，他打算进一步论证黑格尔的观点：自我意识的自由也表现在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之中。^[13]虽然马克思没有实

现他的这一写作计划，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关于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与人的自由相联系的思想，与他对希腊自然哲学的理解，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由观的理解，有着某种隐性的、间接的联系。

阿伦特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乌托邦，而是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城邦的模式中经历了这些同样的条件，这也是我们传统所依赖的基础。”^[13]这段话已经成为西方很多马克思思想产生研究者的共识。他们把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当作西方思想传统里对马克思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主要因素。在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论文集中，12位学者撰文，他们一致指出，亚里士多德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间接的、然而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来源。^[14]近30年来，学者们使用隐性的、间接的方法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比如，哥尔德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学说之间的联系；^[15]卡因说明了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希腊政治观和实践观对马克思的“类存在”观点的影响；^[16]罗克茂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活动”概念对马克思的“类存在”概念的影响；^[17]施瓦茨说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的思想对马克思的“类存在”的影响；^[18]伯伦克特比较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与马克思的社会伦理；^[19]缪斯说明了古典的政治自由和公共领域的思想和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之间的联系；^[20]麦察罗斯谈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法传统对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的影响；^[21]如此等等。这些研究运用隐性的、间接的比较方法，在西方哲学的大传统中，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和资源。我们应该在借鉴和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来源，做出全面、系统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 日丹诺夫同志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 [M] . 沈阳：东北书店，1948.
- [2]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 简明哲学辞典 [Z] . 北京：三联书店，1975.
- [3] S. N. Stempf. Socrates to Sartre,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M] . 5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6.
- [4] 列宁选集（第2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I. Beilin.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M] .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11] B. Magee. Karl Popper [M] . Viking Press, New York.
- [12] H. F. Mins. Marx's doctoral dissertation [J] .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12 (1948) :157- 169.
- [13] 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M] . New York: Viking, 1968.
- [14] G. E. McCarthy. ed. Marx and Aristotle [C] . Maryland. U.S. 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2.
- [15] C. Gould. Marx's Social Ontology [M] . MIT Press, 1980.
- [16] P. Kain, Schiller. Hegel, and Marx: State, Society, and the Aesthetic Ideal of Ancient Greece [M] .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7] T. Rockmore. Fichte, Marx, and the Germ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M] .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8] N. Schwartz.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J] . Political Theory, May (1979) .
- [19] A. Brenkert. Marx's Ethics of Freedom [M] . Routledge, 1983.
- [20] H. Mewes.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in the early work of Karl Marx [J] . Social Research, Summer (1976) .
- [21] I. Mesza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M]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责任编辑：何蔚荣 罗 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 马俊峰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它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化中国的同时被中国化的过程。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形式、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总结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更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研究当今时代人类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利用我们自己的传统哲学智慧,并借鉴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创新,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理论的谋划,为人类解放开出新路。当前最主要的,与其说是组织力量来搞出一个权威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本”,不如说是要创建一种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机制,创建出一套使理论研究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合理配合、相互促进的制度和体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理论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23-05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理论上的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需要。当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已经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搁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搁在了中国理论家们的肩上;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急切需要用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作为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我们更应该有这种历史的自觉意识和责任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铭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话:“以往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种实践取向,规定了它与时代、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内在联系,它是无产阶级的头脑,是广大劳苦大众改造非人的不合理现实的武器。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对旧世界的批判,但它深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依靠物质力量来摧毁”,它只有掌握了劳苦大众并为劳苦大众所掌握,才能变为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传播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它被人民大众所掌握而进行革命性实践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运用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化中国的同时被中国化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又是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两面,中国化是为了化中国,化中国就必须中国化。

我们知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西方各种理论相继被引入东方国家的时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先后或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自由主义、实证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代表和支持者。但在经历了理论争论、相互批判和争夺信众的长期过程之后,最终被化开的,被中国人民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同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开始就肩负起了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民众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相一致的,也直接地依赖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

作者简介 马俊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大而得到播散。无论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多少艰难曲折内外斗争，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直接地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现。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权的力量，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且频繁地发动思想战线的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广泛地渗透和深入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与此同时，规范化、教条化与行政组织化相结合的方式，使民众的日常生活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思想教育成为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使这种实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全面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当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通过改革开放而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的时候，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发展，苏联的解体，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当下实践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反差，引起了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怀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而明确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尖锐地摆在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

之所以简略地回顾这一段历史，是想说明：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是一种实际发生了的历史事实，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的实践活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历史。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一段历史，尊重先辈先贤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功绩。第二，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割断历史，对于我们的先贤们在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失误，一定要抱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抱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不能予以苛求。第三，我们应该用过程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这是一个既化了又需要再化的过程。既是已有的历史又是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面貌包括人们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在化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在当今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下，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重新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并重新思考人类解放的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的研究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目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等，都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我们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这个任务，但在那个时代，我们主要限于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果，被规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固然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谦虚成分在内，即毛泽东思想不能与列宁主义并提，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具有国际意义的普遍性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则只是限于中国的特殊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具体运用中的“应用性”理论。后来我们规定邓小平理论，基本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的，要说有区别，就是所联系所结合的实际的不同，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们遵循着中国式的谦虚，始终保持着学生的姿态，从未有过与老师处于平等地位并以敢于超越老师的心态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创新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情结，对于那些动辄就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结论过时、那个原理失效，并重新提出一套新理论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们，无论他们如何自称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般都将他们视之为离经叛道的不肖子孙，不肯承认其合法性。

站在我们今天的高度和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恐怕就不能再简单地将之理解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当今的实际相结合，具体运用这些哲学思想，在运用中使之具有中

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还应包含着中国的理论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研究当今时代人类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利用我们自己的传统哲学智慧，并借鉴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创新，为人类解放开出新路。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惟有创新才能发展，这个创新不单是运用层面的，更还是基本理论层面的；当然首先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題，同时也必须关注当代世界和人类发展的问題。总之，在今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保持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是一致的。缺少了当代性这个维度，中国化也化不好。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视野、根本目的和基本途径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实践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理论上、文化上的要求，目的是指导我们合理应对和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市场、科技、资源、人才等方面既激烈竞争又密切合作的世界；是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是各种资源全球性流动、机遇在全球交往中产生和风险在全球播散的世界。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实力日益增强、全面参与世界性事务、影响日益重要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稳定、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失误都具有全球性的和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中国的问题许多直接就是世界性问题，国际上的许多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世界历史时代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发展的问题背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实践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认识，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的探讨，都必须具有国际眼光和全球性视野。从哲学的角度上看，就需要从人类当代发展的新高度来讨论中华民族发展的问题，需要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经验来审视中国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当今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科技革命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甚至无法想象的。我们必须根据当代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经验、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一种世界性哲学，它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它的视野原本就是人类性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解放。中国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镇，自然肩负着更多的责任，但又不能仅仅将之看作是一种民族性的事业和民族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基本立场和批判精神，不仅批判性地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批判性地考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矛盾，批判性地考察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所存在的矛盾，同时还得批判性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中所遇到的既有理论与实践经验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创新，我们不仅需要总结中国的经验，还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不仅需要吸取当代科学发展的成果，也要广泛吸取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

在我们看来，今天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强调以中国人为主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中国特色、当代性气质和人类性内容的有机统一，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增强和提高中国人的主体性，办好中国的事情和承担起对人类发展的责任。这些年来，针对过去的一些不足，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问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经典文本解读、与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关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吸取科学发展成果方面，在提炼问题、选择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式方面，也有很重要的改进和骄人的成绩。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途径，各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当然也需要合理地配合和互动共进。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倾向性的问题，比如说为突出学理化而漠视甚至鄙视研究现实问题的倾向；忽视问题背景和

语境，径直将当代西方哲学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当作是我们的问题的倾向；在写作中以引证代替论证言必称西方哲学的倾向；在话语方式上有意无意地“欧化”和学术化而忽略读者接受习惯的倾向；等等。这些问题都显示出我们一些研究者“中国化”意识的淡漠，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民众立言、为民众谋利的基本精神。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华民族正在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形态展开自己的活动，中国文化也正在走向世界显示自己的独特魅力。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既不能仅仅“照着说”马克思的话，更不能仅仅“照着说”西方哲学家们的话，而是应力图利用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智慧，“接着”马克思而又说出我们的新话，显示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为目的，包括实践和学理方面的问题，在世界性哲学对话中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到和优越之处，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这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

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具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总的目标设定。完成这个任务，是全体中共党员的权利和责任，也是所有立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的权利和责任。对于他们的努力及其结果，都应该予以肯定和鼓励。这在原则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问题却不这么简单，如何看待、评价、处理这些努力及其结果，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是走过弯路，有着沉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的哲学理论，在中国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基础，是兼理论性与政治性为一身的学说。从理论本身的发展维度看，它虽然有着统一的根和源，在发展中却必然会长出不同的分支，会存在一些异质性甚至冲突性的东西。因为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依据当时的具体实践，对许多问题关注的内容和侧重点会有所不同，理解的基础和方式也会有所差别；纵使目标一致，各自选择的途径、获得的结果也会有歧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不同的样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有各种争论。但从政治运作的维度看，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取得了政权后的政治宣传教育中，又都在相当程度上不允许分歧和多种声音的存在，话语权力与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以维持理论的统一权威。这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从理论自身的发展看，没有多样性没有分歧和争论就没有创新，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而从政治的操作层面看，重大纷争就意味着思想分裂的危险和行动中的内耗。理论发展需要多样，而政治稳定则需要统一。这是两种不同的且具有排他性的逻辑，是两种在各自领域都具有其合理性而一经结合就难以两全的选择困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其功能的发挥不能离开人民大众，只有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才能实现其使命。但我们不能想象人民大众都能成为理论家哲学家，也不能期望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理论家哲学家。理论家哲学家的使命是锻造和改进武器，人民大众则更多地是在使用武器，其间有一个必需的环节，就是如何使人民大众掌握这个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作为锻造和改进武器的理论研究，必须不断创新，也需要有研究者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故多样性往往成为侧重点。而作为宣传工作，又需要比较稳定比较统一或比较一致的底本，否则宣传的结果就要大打折扣。在中国，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理论宣传都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理论研究和宣传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上述的学术与政治的矛盾的具体表现或集中体现。我们应该正视二者之间的矛盾，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认识解决好这个矛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力求通过制度创新和法制建设的方式寻求一种使矛盾暂时和解的“椭圆式”轨道。

如果说在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治和宣传的统一性原则居于首要和特殊的地位，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理论发展为代价也具有价值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建设转向开放性竞争的今天，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的今天，为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面旗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提供富

有成效的指导，为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有效的整合基础，更加注重理论多样性通过大力创新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应成为更具有优先性的选择。这里并没有贬低和排斥政治宣传统一性，而是说，应该从过去由政治权威所规定的统一性转化为在多样性理论观点基础上形成的共识意义上的统一性，由过去在真理与谬误简单对立基础上的排斥多样性的统一性转化为以多样性为基础的求同存异意义上的统一性。而无论是求同存异还是达成共识，其前提都是尊重理论研究者探索真理的权利和以法律的形式来维护理论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这种法律形式也是消除过度纷争形成理论共识的基本框架。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同时也是中国所有的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整个学术界、理论界的任务，是全党的任务。政治领导人和党的领袖集中全党的智慧，根据整个国家实践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哲学家们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新的命题、新的观点、新的理念，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构成了全党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家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主要还是一种哲学理论，它不可能代替实践的具体方针、具体方案、具体措施，也不能要求哲学家们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由于各自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理解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出现不同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都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的。只有通过百家争鸣，通过各种理论主张之间的相互批判和对话，才可能实现学术理论的繁荣和发展。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将这个正确的方针具体化，具体化为一定的法律条文、制度规定、评价标准、工作机制。依法治国是当今中国自上而下都认同的基本理念，正在各个领域得到贯彻实施。理论研究工作无论有多大的特殊性，也不应视之为例外。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市民社会在逐渐发育，国家事务越来越侧重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公民社会的基本理念正深入人心。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日渐自觉，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的问题特别敏感、特别关注。他们对于传统的那种灌输式教育越来越表现出反感和拒斥，只接受自己理性认同的那些观念和能使人心悦诚服的理论。我们过去的那种宣传模式和教育模式再也难以有效地继续下去了。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刻转型需要深刻的理论设计和理论指导，这种条件下的现代政治实践需要有丰厚的理论储备，需要有多种政策方式作为备选方案，在多种选择方案间的优劣竞争中择善而从或折中妥协。这种新形势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思想探索，必须充分关注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问题，作出一些有现实根据的合理解释，提出一些切实管用的主意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中国的有关管理部门也必须切实解决和真诚相信群众包括相信广大理论研究者问题，必须从构建和谐现代公民社会的高度对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对当前中国的思想理论战线的状况及其成绩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认识，真正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切实改变以权力决定理论争论的是非对错来求得统一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处在过程中，我们今天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总结历史教训，我们认为，当前最主要的，与其说是组织全国力量来搞出一个权威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本”，不如说是要创建一种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机制，创建出一套使理论研究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合理配合、相互促进的制度和体制。可以预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前提下，出现的肯定具有不同特点甚至在个别观点上还相互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际上，这种态势在中国哲学界已经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而正是这些派别之间的竞争和论战，不同理论观点的争长竞胜，才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树的繁荣茂盛，才是其生命力旺盛的表现，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学理的支持，才具有在世界性哲学对话中显示当代中国人智慧的基础。

责任编辑：何蔚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界域的哲学厘定*

◎ 谭培文 汤志华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日常话语中界域不清,有必要从哲学层面来探究和厘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哲学概括。这一过程的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状态,它们既具有质和量的区别,又是连续性和阶段性、历史性和当代性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厘定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28-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我国人们的日常话语系统,成为了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论工作者等论述问题和思考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在日常话语中,人们往往忽略其不同的内涵和界域。这样就造成了使用上的随意性,在应规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有的却表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之,亦然。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科学性。因而有必要从哲学层面探究和厘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其界域。

一、一个时代实践中产生的科学命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个时代艰难曲折的实践中产生的科学命题。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可以区分为传播、结合、创新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等几个方面。

1.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中展现了自己的生命力。鸦片战争的失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最痛苦最屈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发展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一时竞相纷呈,而马克思主义只是当时其中的一种思潮。但是,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了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聚焦点。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三种思潮成为了时论的中心,影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直接成为解决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的文化选择问题、经济制度选择问题和政治制度选择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早的思想启蒙。李大钊等人通过与胡适等人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批判了胡适借研究问题为名所推销的实用主义偏见,最终导致了中国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而不是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同梁启超等资本主义改良者对与文化选择相伴随的经济制度选择问题的讨论。陈独秀等人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

*本文系以陈先达教授为首席专家主持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3JZD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谭培文,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广西 桂林, 541001);汤志华,广西师范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北京, 100875)。

义，此路不通。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幻想进行了批判，其结论是，为了最终不要国家，无产阶级就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争，初步接触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

2.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向前发展。过去人们总是对教条主义绝对地否定，这不符合辩证法。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不顾实际地照抄照搬，这是其消极的方面。但事实上，教条主义也有它合理的方面，那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毛泽东为了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 P111-112}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的正确态度应是，一要坚持和学习，二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时期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论争，实际上接触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和思想理论前提。

3.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肯定阶段，把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发展看作是否定阶段，那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 P499-500}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即“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教条主义的要害是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了一个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被动容器；而中国共产党人应是一个学习、认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动主体。这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联系，而且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这里，毛泽东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武器；在中国掌握这种理论武器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不存在因国家、民族的情况不同而具体化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在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其实，这种改动是策略性的，它们形式上虽然有不同，但不能证明二者有何实质性的差别。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提出则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要晚得多。1945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3] P315}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刘少奇又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4] P333}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表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远远不能反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所包容的内涵。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不仅明确地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而且对其内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他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在这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明确表述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界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产生在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成熟在后。时间上的先后是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科学命题的内涵有着严格的界域。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过程和结果是不能混淆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具有最终性质。事物都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而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和一成不变的。事物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正如图一棵植物，它是一个经由播种、发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的过程的集合体。可见，过程是事物的具体进程，过程所揭示的是辩证发展的观点。发展就是一个过程。集合体就是事物发展过程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正如上文所述，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传播、结合、创新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出场等几个具体阶段。它的特质在于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不是一次完成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们的结合，都经过了长期的曲折的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结合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融为一体，创新为一种中国式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所以，结合也是一个艰难的创新过程。创新的结果和目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它内在地包含这个过程的结果。换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个环节。但是，作为结果的环节，与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又是不同的，它包含了整个过程的全部内容。结果就一个过程的阶段而言，它是这个阶段成熟的标志。它不仅是一个阶段发展过程的终点，同时也是新的发展过程的起点。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变化和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发展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而衡量这种状态的具体标志就是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所谓新的理论形态是指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又能满足一定时代实际要求而形成的比较完整的具有创新内容的理论体系。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形态，都是由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关于某一事物和领域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新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又可以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新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又创新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新的理论形态。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它又是由自己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仅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新的概念、范畴，还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基本原理。这些概念、范畴和基本原理

的提出和创新，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反复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具有质和量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质与量的区别，不是指总的质变过程中质和量的变化，而是指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性质不同的另一种性质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决定其总是随着时代的需要又不断地满足时代需要而增添自己新的内容，这就使它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了部分质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总的量变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出现的部分质变。如，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为根据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在教条主义严重危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们又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同的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过程中总的量变中的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所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总的量变中阶段性的量积累到阶段性的质的飞跃和上升的过程。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事物质量互变的特殊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表现为事物总的量变过程包含了事物的部分质变，这就决定事物的发展呈现出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所谓总的量变过程的部分质变，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保持了其基本本质属性情况下的量的变化过程，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说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保持了其基本本质属性情况下的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的变化，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根据。比如，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本质属性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规定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就有某些方面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发展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按劳分配为主的按资分配的理论等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原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连续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过程，只要共产主义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就不会终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要不断地继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阶段性，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适应一定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目标所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就只能满足这种具体目标实践的需要。换言之，随着这种具体目标的实现和适应一定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具体目标的出现，另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就必然会因新的具体目标的出现而产生出来，以满足新的具体目标的需要。比如，毛

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邓小平理论则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的不同的新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发展的阶段性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一定历史阶段具体需要的阶段性的新的理论形态。因而，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和不断地创新。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还必将产生更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才能适应和满足新的目标的需要。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凸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具体来说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具有何种历史价值和历史地位，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局限性。1945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他说：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3] P236-237 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是19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对立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发展最终动力的原理、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等，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理论原理。这些一般理论原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和意义。但是，由于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所以，以19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为历史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结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条件就表现出它的局限性。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性的因，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结成的果。如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凸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何价值与意义，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它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而，如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 [3]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罗 苹

意义、真理与二值原则

——后现代视野中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 刘同舫

[摘要] 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围绕着语言的意义问题而展开的,其争论的焦点是语句的真值条件是否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实在论坚持以真理概念为基础的真值条件语义学,而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则坚持以证实概念为基础的辩明条件语义学,两种理论的分野在于是否接受二值原则。其中反实在论以抛弃二值原则,诉诸直觉主义而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色,体现了某种革命性变革,具有深远的认识论意义。

[关键词] 实在论 反实在论 意义 真理 二值原则

(中图分类号) B8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33-06

在当代语言哲学领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采取了所谓的“语义提升”(semantic ascent)这一新的形式——从直接争论某类对象是否具有实在性,转变成争论是否一定有语句的真值条件,即某些对世界有所断定的语句,判断它们是真是假的条件,是自然而然就一定存在,还是不一定?这显然是语言转向的结果。语言的转向使得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实质性的,因为它所争论的仍然是:语句的真值条件是独立于我们的意识和知识而存在,还是其存在性必须与我们对它们的把握或与我们具有的把握能力有关?不用说,这乃是后现代视野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所在。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实在论和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对这一问题作了完全不同的回答。

一、意义倚重真理还是理解先于意义

意义与真理,究竟何者更为根本,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戴维森之前的语言哲学家大都倾向于把意义看做先于真理,从而把意义问题看做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正如卡尔纳普所说,要了解一个语句,必须先知道它的意义,然后我们才能够试图发现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显然,在这些哲学家看来,意义理论应当是先于真理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真理理论的。然而戴维森在考察这一问题时,采取了另外一种思路:他把对意义问题的考察置于真理理论的框架之中,并把真理概念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从而构建出了他的真值条件的意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标准的表述是:确定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句子为真,也就确定了这个句子的意义。

戴维森的这一思路是从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中受到启发的。塔尔斯基力图在形式语言中为“真理”这个概念给出一种不仅在内容上恰当而且在形式上也正确的定义。所谓内容上恰当,就是要求真理定义符合我们关于真理概念的直觉,这种直觉就是亚里士多德早已表述过的“真理符合论”的古典定义:说是者是,或非者非,即为真;说非者是,或是者非,即为假。所谓形式上正确,指的是能把清晰明确的定义词项无歧义地使用于被定义词项的外延。在塔尔斯基看来,由于自然语言意义的含混不清,要给真理下一个普遍适用于自然语言的定义,就会碰到所谓“说谎者悖论”这样的难题。为了避

作者简介 刘同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31)。

免这样的悖论，塔尔斯基认为必须区分语言的不同层次。为此，他把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和元语言（metalanguage）区分开来。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塔尔斯基给真理下了一个内容上恰当、形式上正确的定义，即“约定T”（convention T）：X是真的当且仅当P。塔尔斯基指出，一个内容恰当且形式正确的真理定义，都应当具有“约定T”的形式。这就是说，对象语言中的任何一句话X的成真条件就是客观存在的P。例如，雪是白的（P）就是“雪是白的”这句话的成真条件。

戴维森接受了塔尔斯基的这种真理理论，但却不是简单地接受。他在把它与意义理论联系起来考虑的时候发现，“约定T”在我们对真理的直觉和形式语义学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联系。依据这种联系，我们可以把真理定义的形式用作给出意义的形式，从而以真理理论的形式建立意义理论。戴维森认为，意义理论必须首先刻画适合于真语句的谓词，因为只有先确定了这样的谓词为真，我们才能真正谈论意义问题。因此，意义理论必须采取真理定义的形式。这样，戴维森就由意义理论导向真理理论。在他看来，真理理论与意义理论两者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只要把真理理论稍加改动，它就成为意义理论了。改动的办法就是把“X’是真的，当且仅当P”这个公式改为“X’的意思是P”。可见，戴维森是把塔尔斯基原本用于解释意义概念的真理定义，倒转过来变成刻画意义概念的形式，即真理定义变形为意义定义。这样做之所以可行，与戴维森对意义理论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戴维森认为，一种恰当的意义理论必须满足四个条件：(1)它必须使我们能够为我们所使用的自然语言L中的每个句子S提供意义解释；(2)它必须能够说明S是如何从L的有限语词和规则组合而成的；(3)它必须能够说明，对L中的语句是如何具有意义的这一点的证明，是建立在与L中的语句本身相同的一些概念之上的；(4)它必须是可以通过经验进行检验的。这些条件正是给句子的谓词下一个适当的真理定义，从而句子的意义是通过陈述句子的成真条件来提供的，一种语言的意义理论也就隐含地是这种语言的真理理论。但是，这个倒转容易引发这样一个问题：真理比意义更容易界定吗？把真概念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合适的选择吗？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就是问：真值条件的意义理论是能够成立的吗？达米特正是抓住这一点对戴维森的主张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并由此提出了他的核心思想：“理解”先于“意义”。

达米特认为，真值条件的意义理论主张以“真”概念来诠释“意义”概念，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它的真值条件，这种看法实际上预设了这样的前提，即认为句子的真值条件是可以不言而喻地得到的，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样的条件无关。这种超验的真值条件完全脱离了人的认知能力和语言的实践能力，其实质是一种实在论的真理观。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以这种实在论的真概念（realist conception of truth）为出发点，它不能对自己的基本概念“真”和语言的实际用法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也不能解释我们对语言中语句意义的理解。因此，对应于真值条件的T语句形式给出的意义对言语者来说是无价值的，因为从语义学的层面讲，一个言语者在不知道这种双重条件句左端或右端语句之意义的情况下就可以知道它为真。所以，真值条件的意义理论不过是一种以语句自身来说明其真值的循环式的意义理论，是缺乏解释力的。这样的意义理论当然也不可能满足戴维森本人提出的意义理论的四个恰当性条件。

作为修正，达米特指出，对“意义”概念的正确诠释只有通过“理解”概念和“知识”概念才能获得，而不能通过“真理”概念获得，把“真”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在达米特看来，意义与理解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他说：“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当某人理解它时所必须知道的东西。”^{[1] 150}他又说：“意义理论是一种理解理论，即意义理论必须告诉我们，当某人知道一门语言时，当他知道该语言的表达式和语句的意义时，他所知道的究竟是什么。”^{[2] 13}达米特关于意义理论的这一经典表述告诉我们，意义理论必须把人们在讲话时不自觉地掌握的语言知识用理论形式明确地表现出来，必须表明那种知识是如何使讲话者使用这种语言的，也就是说，必须说明讲话者关于语言的知识与他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戴维森的实在论意义理论中，语句的真值条件是超验的，与我们的认识和我们

它的把握能力无关。因此，实在论意义理论没有对知识与使用能力之间的这种关系作出解释，这一点正是达米特所欲反对的。达米特强调，如果我们不能表明我们具有关于句子真值条件的知识，我们的意义理论就不能表明句子的意义和用法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意义理论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因此，达米特站在反实在论立场得出结论：用讨论真理来取代讨论意义，以一种超越的真理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意义理论，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二、默认二值原则还是拒斥二值原则

由于语言转向的结果，传统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采取了“语义提升”这一新的形式。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实质在于语义学之争。在语义学这个层面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分野，表现为对二值原则的取舍上。“二值原则”(principle of bivalence)是经典逻辑中的一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一个断定有且只有两种真值，即一个断定要么为真，要么为假，排中律成立。很显然，站在实在论立场上的真值条件语义学，是预先假定了二值原则这一前提的。因为这种理论把句子的意义看作是由它的真值条件决定的，而句子的真值条件是一种超验的东西，与我们对它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无关，无论我们是否能够说出某一语句有什么样的真值，这一语句都以确定的方式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二值原则总是成立。达米特说：“实在论学说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坚持二值原则——主张每一个命题都是确定地真或确定地假。”^[3]然而，在自然语言中存在着大量无真值而有意义的语句（比如伦理领域中的语句），也就是所谓不可判定的语句。对于这些语句我们无法给出它们的真值条件，但它们却是有意

义的。在这里，真值条件语义学陷入了困境。

如何摆脱这个困境？达米特说：“要找到出路我们必须首先问是什么使我们陷入困境的？答案是清楚的：出现困难是我们倾向于对我们语言中的一切语句假定一种实在论的解释，即认为可运用于陈述的关于真的概念是这么回事：这种陈述中的每一个都肯定地要么为真要么为假，而独立于我们的知识或知道它们的方法。对于可判定陈述，二价性原理的假定害处很小或无害，因为根据假定，我们可随意地决定这些陈述的真值。但在把二价性原理用于不可判定的陈述时，我们发现自己不能把认识到一陈述什么时候已确定为真或为假的能力等同于它的真值条件，因为它可能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为真时为真，或在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为假时为假。若我们能够，我们可以说明赋予讲话者关于陈述的真值条件的知识是怎么回事，这只有在这种知识可以表述为显知识时，即当那真值条件可以有内容地陈述，而理解一陈述可表述为在于陈述它的能力时才有可能。”^[4] (P101)

达米特的这一论述表明，正是对二值原则的默认导致了实在论意义理论的困难。因此，他主张抛弃二值原则。达米特认为，抛弃二值原则是摆脱困境的最好出路，“几乎所有反实在论版本，只要细加分析，均可表明隐含着对二值原则的拒斥。”^[5]事实上，现代数理逻辑中的直觉主义学派早已证明二值原则或排中律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在现代逻辑中不遵守排中律也是可能的。鉴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在语义学上的分歧，达米特主张把是否接受二值原则作为二者的分水岭。这表明，二值原则对于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十分重要，对它持什么态度反映了人们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哲学立场上的分野。作为反实在论的代表，达米特指出，由于二值原则的局限性，建立在二值原则基础之上的真值条件语义学是不可能正确的，试图用语句的真值来说明语句的意义这种想法也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达米特正是通过对二值原则这一逻辑学的深层背景的揭示，证明了真值条件语义学的不确切性和局限性。

达米特的论证是以意义理论的显示性原则为基础的。他指出，对语言意义的说明必须是对语言理解的说明，亦即对意义知识的说明。意义由真值条件组成的论题之可接受当且仅当理解通过真值条件而构成的语句之可接受。由于语言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说话者在理解他所说的语言时拥有的知识必定是在公共语境中获得的，因而这种知识必定是公开可显示的，即是说如果我理解了某一语句，我就能够向我的

对话者显示我的知识。相应地，如果意义是由真值条件给出的，那么真值条件的知识必定是公开可显示的。但是一个人怎样显示他对一语句的真值条件的知识呢？可能的方式有两种。首先是通过对话语句意义的言语说明来显示，但这样一来问题就转换成在说明中使用语句意义的知识这样一个问题了，这明显是在循环，因而不可取。要避免这种循环，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通过对言语者的某种特定能力的显示来显示其对一语句的真值条件的知识。所谓特定能力是指，若一个语句真则可以知其真，若一语句假则可以知其假。显然，这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方式。达米特具体分析了这种显示的可能性。他指出，如果所讨论的语句是能行可判定的，那么对它的真值条件知识的显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理论上可行实践上也可行与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上不可行。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么就可以通过应用一种具体的判定方法，比如做一个观察或进行小数值的计算等，以显示我们对其真值条件的知识，从而获取这种知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即一个语句只是理论上能行可判定而不是实践上能行可判定的，例如需要计算的数字太大等，这时我们不能显示对该语句的真值条件的知识，但至少可以显示我们对它的判定方法的知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说话者关于语句的真值条件的知识是一种明确的知识，说话者能够陈述出这种知识。但是，当我们遇到并不是能行可判定的语句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对这样的句子，我们没有办法担保能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知道其真值，因此不能显示我们对该语句的真值条件的知识。既然意义的真值条件的知识必定是公开可显示的，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却不能显示我们对该语句的二值真值条件的知识，那么，该语句的意义的知识就不可能是二值真值条件的知识。达米特由此得出结论：‘真值条件意义理论必定会违背非循环性要求。’^[341]这就表明二值真值条件语义学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

三、直觉主义——反实在论的新策略

既然不能用“真”来说明意义，那么用一个什么样的更基本的概念来说明意义呢？达米特从直觉主义数学中受到启发，认为可以把直觉主义创始人布劳威尔（L.E.J.Brouwer）对数学的看法推广到自然语言。布劳威尔对数学提出了三点原则性的看法：(1)不存在实际的无穷总体（实无穷），无穷只是一种变化和生成着的东西（潜无穷）；(2)排中律只适用于有穷集，而不适用于无穷集；(3)只有具体给出一种构造某一数学对象的方法（证明），该对象才有存在的理由。显然，数学中的直觉主义是一种隐含着排斥二值原则的非经典逻辑。这样的一种逻辑与反实在论的立场正好相合，因为这种逻辑对于解决不可判定类陈述的意义问题无疑是一盏明灯。所以，达米特指出：‘幸运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模型，尽管对这样一些语义理论而言，这个模型尚待完善，不过，我们已经为直觉主义发展出一种语义理论；对于争论类陈述而言，在这样一种语义理论派生出的那种逻辑中，直觉主义逻辑确实是一个更好的模型。’^[337]达米特认为，数学中的直觉主义为我们用数学语言来重构意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达米特的意图显然是要把这种数学语言中的范例推广到日常语言中去。

走近直觉主义理论不难看出，直觉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证明”。它强调，对数学陈述的理解不是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够知道它实际上的真假，而是依赖于我们是否具有一种对于数学构造的识别能力，即识别该数学构造是否构成关于某个给定陈述的证明。因此，关于一个数学陈述的论断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认为该陈述为真的断言，而应该被解释为一个认为存在着关于它的证明的断言。与此相应，如果人们知道某一数学表达式对确定该表达式在其中出现的陈述的证明做出贡献，那么也就理解了这个数学表达式。按照这种思路来处理问题，我们就可以说，对任何一个数学陈述或表达式的理解都可以通过掌握数学语言的使用而充分显示出来。必须指出，直觉主义的这种理论并没有承诺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可理解的陈述都必须是实际地可判定的。事实上，理解一个陈述并不在于能够发现一个对该陈述的证明，而在于当提出一个对该陈述的证明的情况下能够辨认出这个证明。也就是说，在直觉主义看来，人们对陈

述的理解应当体现在当发现有对这些陈述的证明时是否能够辨认出这些证明的能力上。

达米特认为，对数学陈述的意义所做出的这种直觉主义解释“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广到非数学的情形。在数学中，确立一个陈述为真唯一的办法是证明，因此所要求的一般概念是证实 (verification)。”^{[4] (P110)} 达米特就此提出了他的证实论。根据证实论的观点，理解一个陈述就在于识别什么东西算是对它的证实，也就是说，在于识别能够确定其为真的那种东西。达米特强调，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办法判定陈述的真假，它仅仅意味着当它的真实性得到确立时我们能加以识别就行了。达米特说：“这种想法的优点在于，一个陈述被证实的条件（与在二值性假设下该陈述为真的条件不同）是这样的一种条件：在获得这个条件时，我们必须被认为具有有效地进行识别的能力，因此，在陈述这个条件隐含的知识是什么时没有什么困难，它可以由我们的语言实践直接显示出来。”^{[4] (P111)} 据此，达米特把真理理解为“辩明” (justification)。他认为，一个人对他所使用的语言的知识在于他隐约地知道那种语言的语句在什么条件下是可以断定的。知道一个语句在什么条件下是可以断定的，也就是知道一个语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得到辩明。说一个语句是真的，就是说它得到了辩明。达米特的这一见解赢得了一些后来者的赞同。例如从实在论者逐步转变成反实在论者的普特南 (H.Putnam) 就持与达米特相类似的观点，他把真理理解为一种理想的辩明 (idea justification)。用他的话来说，“真的东西就是在最佳条件下能得到辩明的东西，而最佳条件通过许多错综复杂的方式随特定的论断、语境和兴趣为转移”。^{[5] (P280)}

必须指出，按照达米特的观点，证实论的主张并不排斥真理概念在意义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恰恰相反，他认为真理概念依然很重要。具体地说，真理概念对恰当的意义理论有两点重要作用：第一，当我们通过间接的方法确定某一陈述为真时，我们需要用真理概念对演绎推理的保真性作出解释；第二，真理概念有助于解释语句的含义 (sense)、语力 (force) 和寓意 (point) 的区分，从而说明人们对语言中断定性语句意义的理解。

达米特的基于直觉主义的反实在论主张虽然避免了实在论的超验主义色彩，但自身也有不少困难，因此引起哲学界的批评。最根本的问题和古典唯心主义经验论差不多。如果任何事物都取决于对它的证实，那么就避免不了这样的推论：世界依赖于人们的思想，依赖于人们对它的认识。提出最尖锐质疑的是麦克道威尔 (McDowell)，他说，达米特提出的用证实来说明的意义概念“就会要求一种新奇的、反实在论的关于世界的概念：倘若真理不独立于我们对它的发现，我们就必须把世界描述为不是我们自己的造物就是随着我们的研究而涌现出的东西。因此，证实论者反对关于意义的真值条件的说明就有深远的形而上学含义。”^{[6] (P48)}

尽管如此，达米特对自己的证实论主张还是充满信心。他说：“我们应当承认，证实论的意义理论比起彻底地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是一笔更有可能打赢的赌注”。^{[4] (P137)} 从证实论的观点出发，达米特得出结论：真值条件语义学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它预设了一个享有时间特免权的超人的观察者，这一观察者“站在整个时间历程之外进行思维”，^{[7] (P373)} 提出了一种超越的真理观。这种超越的真理观忽视了人们的语言实践，把真看成是与人的认知能力和识别能力无关的东西，因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实在论” (bare realist)。对于这种实在论，“重整旗鼓的反实在论仍有希望夺回锦标”。^{[8] (P331)} 这种有望夺标的反实在论与各种传统的反实在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它不是以还原论的方式来阐述关于争论类的陈述，即它并没有设定有任何描述证明的语言使其它的数学语言可以还原为它，因此，这种反实在论就避免了冒还原论的风险。对此，达米特指出，一旦反实在论的论证脱掉还原论的外衣，要打跨它们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正是直觉主义的优越性所在。

可以看出，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在反对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实在论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策略，从而使得他们的争论出现了某些新动向，这些新动向无疑是分析哲学走向后现代的结果。与这一结果相对应，这一争论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某种后现代性特征。具体地说，其后现代性大

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早期分析哲学家大都把哲学中的各种问题看成是自然语言的不完善所造成的, 因此都试图通过数理逻辑构造“理想语言”来消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 以治疗各种哲学病。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等的工作均致力于建立这种“语义神话”。但是, 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开始, 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开始认为自然语言本身是完善的, 哲学中的问题和混乱并不是来自自然语言本身, 而是来自于哲学家对自然语言的误用。如果说在戴维森的意义理论中还多少能看到一些试图改造自然语言的痕迹, 那么在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中就见不到这种痕迹了, 因为达米特明确地表示他的目的只是合理地描述人们对自然语言的使用。

其次, 早期分析哲学家大都偏向于从语形学和语义学的角度探讨语言的意义问题, 即是说, 他们主要从语言的内部结构和语言表达式与所表达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 而对语言使用者这一因素有所忽视。然而, 从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开始, 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 意义的分析必须考虑语言使用者这一因素, 即必须结合语言的使用情况来探讨意义问题, 从而开辟了语用学研究的新思路。戴维森强调“真理”是话语的谓词, 达米特强调含义、语力和寓意的区分, 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

最后, 早期分析哲学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 极力拒斥形而上学。然而从奎因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开始, 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识到形而上学对意义分析的重要性。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实在论与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围绕着语句的真值条件是否独立于我们的意识和知识而存在这一焦点问题而展开, 这已经表明争论的双方均具有不同的形而上学立场。

总之, 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比之传统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尽管其实质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既显示了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某种规律性, 又反映了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某种革命性变革, 具有深远的认识论意义。

[参考文献]

- [1] Dummett. M.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M] . Duckworth, 1993.
- [2] Dummett. M. *The Sea of Language* [M] .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3.
- [3] Dummett. M.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M]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Dummett. M. What is a Thoery of Meaning II ?[A] . G.Evans & J. McDowell. *Truth and Meaning* [C] . 1976.
- [5] Putnam. H. *Realism and Reason*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6] McDowell. J. Truth- Conditions,Bivalence, and Verificationism [A] . G. Evans & J. McDowell. *Truth and Meaning* [C] . 1976.
- [7] Dummett. M.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M]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责任编辑: 罗 苹

论黑格尔的“感性确知”概念

◎ 罗伯中

[摘要] 感性确知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初始环节和发源地,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秘密的秘密。在对感性确知的阐释中,黑格尔阐发了感性与知识、存在与语言、存在与关系、对象与自我等关系,黑格尔的这些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始终。由于感性的认识形式的偶然性与“确知”的知识内容的必然性中存在着认识形式与认识内容的矛盾,感性最终转变为知性,并且这种矛盾也是整个哲学体系演进的基本动力。

[关键词] 感性确知 存在 知识

(中图分类号)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39-05

直至黑格尔时代,哲学一直被视为科学的科学、最高的知识。对知识的本性进行反思一直是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核心工作之一。《精神现象学》作为黑格尔心目中的《科学体系》(System der Wissenschaft)第一部分,被马克思视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1] (P159)}它的目的就是要对知识的本性及其各个环节进行研究。在这些知识的种种环节中,黑格尔认为,“感性确知”就是逻辑上本源的知识。所以他将“感性确知;这一个和意谓”作为《精神现象学》的第一章。按照《小逻辑》中的关于知识体系中只有第一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才可以表达无限真理的否定之否定的观点,这一章初步确立了其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通过这一章的研究,黑格尔阐明了感性确知把握到了存在的确定性,从而认识到了最基本规定的真理的哲学观念。^①可以说,“感性确知”理论就是《精神现象学》的秘密发源地,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秘密的秘密。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感性是否具有知识性的因素问题,长期存在着两种答案。德谟克利特是较早地将感性与知识联系起来进行反思的哲学家。他认为事物的现象随着我们的身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甜、苦、冷热、颜色等都是约定俗成的,实际上,只有原子和虚空存在(being),但只有理智才能认识原子和虚空。同样,柏拉图也认为感觉的领域是流变的领域,“由思想通过推理来认识的东西是永恒真实不变的;而通过非推理的感觉来把握的意见对象是常变不真的。”^{[2] (P25)}可见,在感性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上,柏拉图与德谟克利特都是唯理智主义者。在近现代,莱布尼茨、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早期理论都可以说是这种理智主义的延续。而与理智主义相对的哲学家都认为感性中包含知识。普罗泰戈拉认为“感觉就是知识”,这个命题是他的“人是万物尺度”命题的核心内容。亚里士多德针对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认为:“较早的自然哲学家们(自然研究者)认为若无视觉,白或黑就不存在;若无味觉,世上就没有滋味。这样的陈说,一部分是真实的,另一部分是错了:‘感觉’和‘感觉物(对象)’都是双关词,即可以引用以

作者简介 罗伯中,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湘潭大学哲学系讲师(上海,200433)。

①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黑格尔的“感性确知”思想长期存在许多误解。有的学者认为在感性确知阶段中,主体只“意识到事情存在着,至于这事物如何存在,它是什么,主体则毫无所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尚处于一种混浊不清的关系中。”(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101页)国外黑格尔专家查尔斯·泰勒在其《黑格尔》一书中也强调:“这种关于感性的观点显然与经验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缺乏筛选性,它将‘要么无意识地活着,要么是如此肤浅以致我们不会去主张它。’(查尔斯·泰勒《黑格尔》,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15-216页)这些看法都只将‘感性确知’对真理的贡献看成是消极的,没有意义的。有的学者批评黑格尔说:‘感性确知正是在变化中、在不确定中建立起来,而不是‘我单独地在那里坚持着’能建立的(哪怕只有一瞬间)。’(邓晓芒《思辨哲学的张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用这些观点去理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哲学体系的第一个开始环节,毫无疑问是不恰当的。

说明潜在事物，也可引用以说明现实事物。这样的陈述合于现实而误于潜在。^① P136)在近现代，耶柯比、海德格尔等人也坚持同样的主张。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主张与普罗泰戈拉、亚里士多德和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德谟克利特、康德等人对知识的理解都是知性的，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对世界的存在有真正的理解。但是黑格尔与普罗泰戈拉等人不同的是，他对感性知识的考察是辩证的，并且重新研究德谟克利特的理智主义传统，恰当地确定理智主义在他的知识谱系中的地位。

一、什么是“感性确知”

什么是“感性确知”？这是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国内广为采用的《精神现象学》的贺麟先生的中译本将这个词语相对应的“*Sinnliche Gewissheit*”翻译为“感性确定性”。这里只注意到了“*Gewissheit*”的一种含义，而忽视了它“确知”、“确信”、“有把握”的含义。《精神现象学》所要做的就是关于绝对精神从意识到精神的各个知识环节的描述，然而“感性确定性”的翻译会使我们将“*Sinnliche Gewissheit*”误以为这一章是要研究感性经验现象的确定性问题，这当然与《精神现象学》的主旨相矛盾。所以，“*Sinnliche Gewissheit*”的准确理解应该是“感性的确知”。^②其次是对“*Sinnlich*”的理解，它在翻译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汉语中，许多学者将它理解为感官的经验，这是片面的。因为“*Sinnlich*”还可以表示预感、鉴赏力等多方面的含义。事实上，黑格尔对“*Sinnlich*”的用法与普罗泰戈拉在“知识即感觉”命题中“*aisthesis*”（通常译为“感觉”）的古希腊语的用法是一致的，它不仅表示感官的感觉，而且表示任何直接的理解。马克思使用“感性活动”、“感性存在”等词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③

《精神现象学》第一章第一段就对“感性确知”作了一个简明的表述：“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们的对象的知识不可能是别的，而只可能是其自身就是直接的知识，即关于直接性的知识或者说关于存在者存在的知识。同样，对于这种知识，我们必须如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不加改变也不含概念地采取直接的、接纳的态度把握它。”^④ P63)在这里，黑格尔明确地阐明了感性确知是一种知识。所有知识都是对于“存在”的认识，而这种感性确知的特点就是它的直接性。

我们知道，对知识的直接性的追求可以说是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笛卡尔、莱布尼茨和耶柯比都强调“直接性”，认为不管是直接的信念、常识、健全的人类理智还是灵感、启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核心含义，即它们不是间接性，不是思维推论的结果，也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例如“白不是黑”、“圆不是三角形”等。在黑格尔看来，近代哲学家们主张的排斥间接性思维和经验的直接性只能是一种知性的独断论，这种排斥思维的直接性“立刻表明自身是一种向形而上学知性及其非此即彼的倒退，因而实际上是向外在中介性的关系的倒退，这种倒退是基于坚持有限事物，即坚持片面规定，却错误地认为自己超出了坚持有限事物的观点。”^⑤ P91)他认为，真正的直接性是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它之所以为直接性，在于它是整个知识体系的起点；而它作为一种间接性，就是整个知识的体系最终也还是要回到这个基点，论证这个基点的真理性，维护它的至上性，保证它不会陷于任何独断论。

关于直接性的具体内容，与康德一样，黑格尔认为，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提出的“白不是黑”、

①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哲学作为真正的科学（*Wissenschaft*），即带有信念的知识（*Wissen*），被区分为“感性的确知”（*sinnliche Gewissheit*）、“意识自身的确知”（*Gewissheit des Selbstbewusstseins*）和“理性的确知”（*Gewissheit der Vernunft*）三个环节。在“理性的确知”的顶峰达到绝对知识（*Das absolute Wissen*）。黑格尔就是这样通过这些词的一个共同的词根“*Wiss*”（“知”）把它们统一起来了。

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大量使用了“感性”一词。

③本文的译文在《精神现象学》贺麟译本上有一定的改动。在贺译本中，这一句话翻译的最大问题是他将*Seienden*译成了“现存的事物”，事实上它应该译为“存在者”。参见《精神现象学》（上），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63页。以下黑格尔文本是笔者在从前的各种中文译本的基础上改译的，其间的差异不再进行比较。

④本文所采用的译文主要参考了中文《小逻辑》梁治学译本，只在少数地方略有改译。读者亦可参见黑格尔《小逻辑》，梁治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圆不是三角形”和“三大于二”等命题，在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直接性。因为它们是认识范畴构造出来的。《小逻辑》的“本质论”就是研究这类命题的根据，它相当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原理分析论。但是康德只从间接性角度研究了这类命题的先天综合问题。康德虽然谈到了感性，并且深入地谈到了感性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但是，“至于何以心灵恰好具有这些形式，什么是时间和空间的本性，康德哲学却完全没有想到去追问一下。”^①（P267）康德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体系的第二个部分《自然哲学》中才解决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存在（即“是”）、非存在（“非是”）、变、质、量、度等问题才是真正的直接性知识的内容，它们比近代哲学家那些所谓的直观知识更基础，它们是“白不是黑”、“圆不是三角形”和“三大于二”或者说时空问题的前提。这就是《精神现象学》的“感性确知”部分和《逻辑学》的“存在论”部分主要解决的课题。

对于一种哲学而言，感性确知认识到的“存在”的意识只是一个开端，所以它是最抽象和最贫乏的真理。从前的学术界误解了黑格尔所指的“抽象”与“贫乏”，以为是指这种认识无关紧要。对这种抽象和贫乏，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有一个说明：“纯粹的存在构成开端；因为它既是纯粹的思想，也是没有得到规定的、简单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却决不可能是任何经过中介的和进一步规定的东西。”黑格尔还说，“只要我们单纯意识到开端的本性所带有的含义，对于科学以抽象的、空洞的存在为开端所能提出的一切怀疑和责备就会烟消云散。”^②（P106）；梁治学译本（P167）感性确知的抽象和贫乏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抽象和贫乏。这种抽象与贫乏是哲学体系开端环节的必然特征，只有这样它才成为整个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石。

二、在感性确知中的认识的基本内容或规定

感性确知就是对存在者存在的直接确知。存在就是感性确知的真相。“毋宁说只是：事情存在，而这个事情存在仅仅因为它存在。它存在，对于感性知识来说，是本质性的东西，而这个纯粹的存在或者这个单纯的直接性便构成了感性确知的真理性。”^③（P69-70）；贺麟译本（P64）所以，感性确知认识的基本内容或规定与存在的认识不可分离。关于“存在”，在“Die Sache ist;und sie ist ,nur weil sie ist”中，Sein的意义与巴门尼德等形而上学哲学家“存在”的用法是一样的，而不是分析哲学中使用的系词。它表达的是“现实地发生作用的是”。黑格尔哲学的批评者通常认为：黑格尔的感性确知的缺点是，只认识到了某物存在而不知该物为何物。这些批评者只是在Sein的系词含义上理解黑格尔的感性确知。实际上，在“发生作用的是”的意义上，即使感性确知没有认识到“某物为何物”，但它仍然是一种完善的知识。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一章中，黑格尔论述了感性确知的基本规定。他说：“于是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把感性确知的整体当作感性确知的本质，而不仅仅是构成这种确定性的一个环节。”^④（P66-67）；贺麟译本（P64）显而易见，黑格尔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认识时不要以偏概全，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整体性是本质性的，不认识这个整体就不可能在本质上认识存在和感性确知。在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知性认为是对立两方的下列存在论范畴在感性确知中得到了统一。

1. 存在与语言。我们知道，存在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巴门尼德著名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在最早的文献即辛普里丘著作中也被表达成为“被说的与被思的必须是同一的”。今天，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的命题已经人所共知了。他认为，与一般事物的研究必须从事物着眼不同，对“存在”的研究更多的是要与语言结合起来。“这个在本身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而且更加根本的意义上和这个词血肉相连，任何一个存在者都没有此情况。”“在的问题按照进行追问的情况看来始终是和这个词紧密相连的，这是独特情况。”^⑤（P87-89）存在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黑格尔感性确知中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他认为，在我们说任何一个“这一个”的存在时，我们说的存在的“这一个”与其它的“这一个”，就“这一个”本身而言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它是普遍的；但是，我们的心中并没有表象出这样一个一般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很多哲学家从坚持个体的内在意谓出发否认语言对于认识存在的意义，认为要认识存在就必须抛弃语言。与这种神秘的哲学倾向相反，黑格尔认为：与我们心灵中的表象比较起

来,“语言更具有真理性”。普遍性是感性确知的实际内容,而语言不过是表达了这个真相。^{[9] P72; 贺麟译本(P66)}黑格尔指出的这种观点非常重要。存在本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具体性,但是如果排除了语言的作用而仅仅依赖心灵的表象,那么具体存在中的普遍因素就无法被意识到,人就总是会认为他的表象是唯一的。而事实上,心灵的表象方式和对象本身都有普遍性。这样黑格尔的哲学就与主观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语言和思维,人就只能处于外在关系中,而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动物的生存境况。动物虽然有了专门的感觉器官,有了“特定的感觉”,然而动物的感觉是“在外在的关联中直接的在自己内在反映了的”。^{[9] P213}语言表达了存在的真相,而人借助语言才认识到这个真相。这样,人才拥有人的意识,才能够从自然界中走出来。

2. 存在与关系。“存在”与“关系”的问题在古代是“一”与“多”的关系,在当代是与“内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是“一”的时候,就有众多自然哲学家如德谟克利特等用“多”的理论来对抗他。感性确知只是认识到直接的存在的“一”,而对于事物的多样性,认识就只能凭借知性能力按照间接关系的原理去处理,这正是黑格尔知性学说的重点。在感性确知中,“自我和事情在这里都不是指多种多样的中介性,自我也不是指多的表象或思考,事物并不意味着质的多样性”。^{[9] P63; 贺麟译本(P63-64)}在这种确定性中,事物是指纯粹的事物,而自我指的是纯粹的自我,二者的关系是直接关系。尽管感性的内在矛盾一直在向前演进,但是在整个感性范围中,存在的同一性一直作为一条原则在坚守着。这一点对坚持知识的真理性的精神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的同一性是一种辩证的同一性。绝对不能放弃这条原则,否认“存在”(是)存在,代之以知性“关系”的“非是”的原则。这种知性的任性的怀疑论将彻底否定知识的根基。最后也将否定任何信念的合理性。这就是近代的怀疑论否认“存在”和“普遍的规定和规律”,从而也驱除了一切信仰和常识的原则,最终陷入虚无的原因。

3. 对象与自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坚持自我的纯粹内在性原则的哲学立场是哲学史上的巨大事件,是继巴门尼德的存在哲学以后哲学的重新开始。可见思维与存在或者说自我和对象的关系问题是存在与语言关系等问题之后形而上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但是,在笛卡尔和很多近代哲学家那里自我和对象都被实体化了,从而出现了自我与对象两个实体之间产生鸿沟的问题,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近代哲学。^[9]黑格尔认为,纯粹的对象和纯粹的自我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实体”,因为它们不仅都是直接的,而且也处于直接的关系之中。他强调:“这种存在的纯粹直接性的真相是它保持着自身为一种自身同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自身与对象间不作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别,一般讲来,区别也不能渗透到这种自我等同的关系里”。^{[9] P70; 贺麟译本(P68)}“自我通过他物,即事情而获得确定性,而事情同样通过一个他物即自我而具有确定性。”但是,黑格尔也不像谢林那样,认为对象与自我是绝对同一的;相反,他认为,对象与自我的差别在感性中就已经存在,强调必须“承认这种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人创造的,而是被“发现”出来的。并且在这种关系中,黑格尔强调对象的存在是先在性的,“在感性确知中自我是一种认识作用,它之所以知道对象,只是因为对象存在,而这能认识的自我则是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但对象却存在,它是真实、是本质”。^{[9] P70; 贺麟译本(P64)}这种存在的优先性是黑格尔坚持客观思想的基石。对象与自我在感性确知中直接的同一关系是它们在最终环节中实现辩证统一的基础。

三、如何理解感性的缺陷和“感性”向“知觉”的过渡

在我们看来,有的学者理解的感性确知的缺陷,事实上并不是黑格尔本人所认可的缺陷。精神追求“确知”,但是这不等于精神追求“感性确知”;感性的“确知”的内容没有缺陷并不能说明这种确知的“感性”形式没有缺陷。正是这种感性经验的认识形式与确知的知识内容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感性向“知觉”过渡。我们认为黑格尔的感性经验有以下缺陷:

1. 感性确知的内容不能始终被坚守,因为对这种知识的把握方式是偶然的,它是以偶然的方式把握

必然性。自然的感性意识的不足在这里就显示出来了，它虽然获得了正确的认识，但是很容易沉溺到非本真的生活中去，从而忘记这种认识。黑格尔说：“由此可见，感性确知的辩证发展不是别的，而是它的运动或者经验的历史；而感性确知也不是别的，而只是这个历史。基于这个原因，朴素意识总是自己达到这个结论（这是这个事实中的现实的真理），并且造成关于这个过程的经验。不过意识总是一再忘记了它的经验，总是从头开始这个全部过程。”^[1] P76；贺麟译本（P71）在“知觉”一节中，他更加清楚地说道：“对于我们来说，普遍性的原则出现了，并存在下来，我们把握知觉是什么的认识过程就不再像在感性确知中那样，仅是认识（把握）行为的一种偶然系列，而是一个逻辑的必然的过程了。”^[2] P79；贺麟译本（P74）

2. 感性确知拘泥于自然的朴素意识，不能摆脱“意谓”对“存在”把握的干扰，将意谓行为混入到“存在”的把握当中。黑格尔认为，意谓是不可能用语言表达的，所以不是知识的内容。这个思想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黑格尔认为语言在表达意谓时，在客观的意义上表达了存在的客观性。但是，与存在区别开来的“意谓”总是力图实现自身。语言不能表达它，它就使用辅助语言，就力图用手将它指出来。在这个用手进行的外在的意指活动代替语言表达的过程中，“在”就被“在者”所取代，而思维中的“这一个”（das Diese）就被知觉中的空间的“这里”（hier）所取代。黑格尔说，于是“hier”的复合体的存在（Existenz）就被当成了“发生作用的是”的“在”（Sein）。与此同时，“我接受真理就不再是接受直接的（自明的）东西，而是接受我知觉到的东西”。^[3] P78；贺麟译本（P73）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个转变促使自我对对象的认识，从对存在的认识转变为对存在者的认识。应该指出，感性经验这种缺陷并不能归因于一个“好”与“不好”的问题，它是“此在”的宿命，并且正是这个缺陷才促使思维得以进展。

那么，如何理解感性确知向知觉的过渡呢？有的学者认为，黑格尔认为意识不能停留在感性确知阶段，它必须进一步指出感性确知所知道的“这一个”究竟是什么，这样意识就发展到第二个阶段——“知觉”。在知觉阶段里，主体才知道这一个是什么，认识到客体的性质。这种理解与黑格尔的思想不符。从前面知觉代替了直接性的认识、存在者代替存在的原因的分析可知，从感性确知到知觉的过渡，准确地说起来是一种转变，而不是一种通常意义的进展。就精神方面而言，“意谓”也是精神的一个方面，所以，这种过渡有着内在必然性。但是，就知识方面而言，意谓不是知识的内容，知识需要语言来表达，感性确知到知觉的过渡不是知识自身促成的，而是由与意谓相联系的一种辅助语言即“指出”行为而实现的。因此这种存在到存在者的转变是由外部原因的作用而实现的。

在感性向知性转变的分析中，黑格尔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矛盾，即人的认识形式与认识内容的矛盾。但是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认识形式与认识内容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的，存在是向感性经验直接呈现出来的，二者处于一种直接关系中，而存在对于认识的先在性也是在感性经验中呈现出来的，存在与认识的差别也是在认识中被发现和被承认的。所以，认识形式与认识内容二者的矛盾并不是怀疑论所强调的那种对立关系。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在其体系的结尾以清晰的形式再一次展示出来。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柏拉图·蒂迈欧篇 [M]，谢文郁译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 [3]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 [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Phaenomenologie des Geistes* [M] . Hamburg,1988.
- [5]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Enzyklopaedie: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M] . Hamburg,1969.
-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7]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 [M]，熊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8] 黑格尔，哲学全书 [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 [9] 参见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J]，〈哲学译丛〉，2001，（3）.

责任编辑：罗 苹

•经济学 管理学•

替代跨国公司产品：中国企业升级的递进*

◎ 毛蕴诗 李洁明

[摘要] 本文根据战略理论，分析中国加入WTO后企业面临市场环境变化和主动跟随战略的优势，归纳中国一些优秀制造工业企业利用后发优势的经验的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可以通过运用主动跟随战略，提升竞争力的途径，作为积极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反应。中国企业从引进、模仿技术起步，逐步实现技术、产品升级；从替代外国进口的产品开始，到替代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进而在国际市场替代跨国公司的产品，实现企业的又一个升级。

[关键词] 产品替代 产品升级 后发优势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44-05

一、引言

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和市场环境变化，从模仿生产、替代外国进口产品开始的。目前，其中一些企业转而进入替代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或替代跨国公司在其本国生产的产品的替代升级发展新阶段。时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很不够，本文从战略理论出发，对中国企业从替代进口产品到替代跨国公司产品的替代升级递进作一专题探讨。

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加入WTO，对成长中的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环境的重大变动。变动最明显体现在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即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国内市场国际化与国际市场国内化）上，中国企业也因之而面临着市场全面开放的激烈竞争。竞争将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展开。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更多更强的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国潜在市场规模巨大却又远未充分开发，所以各外国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向中国输出其产品来占领中国市场，而且更愿意在中国设立独资企业，利用中国当地的资源和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将在更大程度上进入国际市场，可以争取扩大出口或对外投资。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国内市场国际化，已经现实地摆在中国企业的面前。

二、主动的跟随战略与日本企业的实践经验

跟随战略（The Strategy of the Followers）是一种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模仿跟随对象的先进之处，从而比自主创新更节约资源和时间的战略选择。根据跟随的对象不同还可以分为产品跟随战略、地区跟随战略、营销跟随战略等。

对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较弱地位的中国企业，跟随战略可以具体理解为搜寻并研究外国或外资竞争对手或非竞争对手能够获得良好市场绩效的产品与技术，通过生产从国外进口的或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从而替代这些在国外生产或外资生产的产品，达到占领国内市场，进而开拓国际市场的目的。在创业初期或实力不够雄厚的时候，模仿和跟进跨国公司的现成产品和技术，这种做法在大多数中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跨国公司在华策略与中国企业应对措施研究”（批准号70132010）的部分成果。感谢自然科学基金对本研究的支持。

作者简介 毛蕴诗，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李洁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国制造业公司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我国通讯厂商中90%就是跟随型企业。

但“跟随战略”并非长久之计，跟随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追赶、超越领先的跨国企业。中国人民大学彭建教授曾指出企业要想由跟随者变为领先者，技术发展就要实现由技术跟进向技术领先的发展模式转变，产品发展就要实现以跟进和模仿向创新和改进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引进、消化吸收替代产品所含技术、生产替代性的产品只能缩小差距，自主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才真正是竞争力的源泉。所以跟随战略之后还要采取追赶、超越战略，才不致于长期被笼罩在跟随对象的阴影下。

主动跟随战略，以超越为目标的跟随才是主动的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反应。我国的华为、宝钢、科龙、大唐、中兴、海尔一批知名企业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即使是韩国和日本的许多企业，也经历了“从跟随到赶超”的过程。

在早期的日本，企业就运用该战略来提升竞争力。企业在引进、吃透欧美先进技术后迅速进行自主研发，占领了本国市场，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再逐步走向世界市场，如日本计算机产业。

日本的计算机产业创建于1958年。最初因技术落后缺乏竞争力，国内使用的计算机主要是进口为主。为取得美国IBM公司的先进技术，日本政府允许IBM公司在日本建立一家独资公司，但作为交换条件，IBM公司必须向日本制造商出售专利。日本厂商获得IBM专利技术后，马上用于开发自有产品。当时富士通公司选择大型计算机为主导产品，而NEC和三菱公司主攻小型计算机。厂商利用从欧美引进的先进技术，开发制造满足本国市场需要的进口替代产品，同时凭借包括政府、银行界和相关大企业在内的强大的集团力量最终赢得市场。结果IBM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减少，最终其在日本大型机市场的领先地位被富士通公司取而代之；在个人机方面，仅NEC公司就夺得了40%的日本市场份额。随后日本厂商又进一步开拓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了向其它跨国巨头叫板的实力。跟随替代战略在日本还广泛地被钢铁、汽车、石化、家电、钟表、照相机、半导体及计算机等行业所采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企业也有得益于运用该战略的例子。

日本的实践说明：在实施跟随战略的过程中，积极提高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才是企业走得更长远的成长之道。政府在最初的市场保护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国内的企业虽然可以在短时的保护时间里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但市场最终会公平地向国内外竞争者开放。在市场开放后，只有拥有了领先技术、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下去并走出国门。

三、实施主动跟随战略与企业产品升级的路径

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更加具有实施主动跟随战略的可能并更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一方面因为我国具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广阔的国内市场，具有实施这一战略的良好条件。另一方面，我国许多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有较深厚的技术积累，具有实施跟随战略的可能。具体而言我国采用跟随战略有如下优点：

1. 有利于实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结合的战略。一般而言，企业上新的产品项目有很大的市场风险，而采用跟随战略有利于规避市场风险。华为公司在路由器等网络产品的市场上，依照市场规律制定了跟随主流技术体系的研发战略，技术导向是模仿和跟进跨国公司现成的产品和技术，如跟随Cisco当时所研究的IP实时操作系统以及IP终端设备，比如交换机、路由器等产品。经过企业网络市场的激烈竞争，非主流厂商技术体系的网络产品逐渐被排挤出市场，最后在一些大型项目的路由器选型上，只剩下华为和Cisco两家。可以说，华为在通信业发展中的跟随战略和策略使它成为一个大赢家，减少了市场风险，并迅速缩小与领先企业的差距，也减少了其走弯路的几率。而且华为所跟随生产的网络产品符合国际标准，不仅是国内所需的，也是国外所需的，有利于实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相结合的战略，把自己的市场拓展到海外。

2. 有利于企业形成新的业务组合，有利于产业高级化。发展、运用新的技术装备，用附加价值高的产品替代附加价值低的产品，企业在高质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产品、业务重组，形成新的业务组合，也有助于提高我国的产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在国内市场上，如家电行业中彩电业厂商紧跟外资企业的步伐，产品从传统彩电升级到技术含量稍高的纯平彩电，然后是“朝阳产品”背投、等离子电视等。国内企业不断积极升级产品，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把产品定位在高附加价值上，与跨国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针锋相对，形成激烈的竞争，获取市场份额。这些产品相对于出口加工或出口一些低价值的产品而言有着更高的附加价值，提升了产业结构。

3. 有助于中国企业在赶超发达国家企业过程中进行技术积累。研究表明，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积累与技术积累，特别是技术积累。Linsu Kim (1997) 提出的后发国家技术能力成长的一般模式是：引进成熟技术—消化吸收—产品创新，技术成长表现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不具备很强的独立研发能力，很难自立门户。然而利用后发优势，使得后发企业进入某一个相对先进、高速发展的产业时，由于后发企业引进最新的生产设备和技术，相比先发企业来说，处于相对有利的竞争地位。¹ 实施跟随战略，实质上是模仿式创新，是一个逐步学习、阶段性积累技术和经验的过程，避免了我国企业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的初级阶段走弯路，同时降低开发成本，并积累技术。

从中国一些成功的家电企业产品升级路径（如表1）可以看到：企业从较低的起点开始，在产品升级的过程中，技术升级遵循一定的路径，即引进成熟技术、消化吸收—模仿创新、合作创新—自主产品创新，有助于技术的积累，也有助于企业的升级。

有一些学者也研究得出，像中兴、华为等国内通信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能力成长道路基本如下：解构国外成熟产品—自主设计开发—引进设备、提高生产能力—软件开发—自主设计核心元器件，² 这与家电企业有着相类似的技术、产品升级路径。

表1 中国一些成功的家电企业产品升级路径

	引进、消化吸收	模仿创新、合作创新	自主创新
科龙冰箱	1991年科龙公司以400万美元从日本一家公司引进了无霜电冰箱技术	1996年，跟随外国企业生产无氟节能电冰箱，其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年，研发出划时代的“分立多循环”冰箱和“儿童成长冰箱”
海尔冰箱 ³	1984年，决定从德国Liebherr公司引进生产技术及设备，生产4星级冰箱	超节能全无氟冰箱；防噪技术；与日本人员共同设计开发出风冷冰箱等	数字变频电冰箱；网络电冰箱；语音开门电冰箱
格兰仕微波炉	1992年开始生产格兰仕品牌的微波炉，运用日本、韩国提供的生产线及设备	烧烤型微波炉；与欧美国家高分子材料科研机构联合开发特殊防微波泄露材料，推出多重防泄漏微波炉	2001年格兰仕研制出并批量生产数码光波微波炉；2005年推出数码光波“一键通”微波炉
长虹彩电 ⁴	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松下生产线，生产TA机芯的彩电	20世纪90年代初，与日本东芝合作创新，研制出NC-2和NC-3机芯的彩电	2000年长虹自主完成了数字高清电视及数字高清背投产品的开发工作

从中国一些成功的企业替代外国进口的实例可以看到：从替代外国进口的产品开始，到替代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进而在国际市场替代跨国公司的产品，即替代外国进口的产品—替代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替代国外市场上跨国公司的产品的过程。最初这些企业引入国外当期先进技术后，在中国市场上以价格优势生产产品，取代从外国进口的产品。随着跨国企业不断在中国国内投资并开设工厂，实现本土化生产，国内企业则不断通过模仿创新、合作创新来改进产品，积极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生产、替代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

以科龙公司为例，1984年开始生产冰箱和空调，现时电冰箱年产达800万台，空调年产400万台，在国内冰箱及空调市场均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冰箱市场的占有率连续十年全国第一。具体来看，科龙冰箱产品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有效替代进口冰箱。1991年科龙公司以400万美元从日本一家公司引进了无霜电冰箱生产技术，1992年公司又以195万马

克引进欧洲一家公司的另一种电冰箱生产技术，紧接着以200万美元引进了技术。凭借较高的冰箱产品生产技术，积累了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9] P450}较高水平的产品，适应了当时的市场竞争需要，有效地替代了国外进口冰箱产品，提高了产品品牌知名度，同时也使业绩上了一个新台阶。第二阶段（90年代中），模仿创新、合作设计，产品成为外资在华生产的冰箱的有力竞争产品。1996年，跟随外国企业生产无氟节能电冰箱，其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产品质量获得市场认可，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是可供国内消费者选择的替代产品，成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冰箱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自主创新设计，出口并替代国外本土冰箱。2002年，研发出划时代的“分立多循环”冰箱和“儿童成长冰箱”，这使科龙产品在技术上始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这些新产品出口到国外，并开始替代国外企业在其本土生产的高质量的冰箱。

科龙是从仿制第一台电冰箱开始的。1995年以来，科龙以自主开发为主，每年都有新开发和改型电冰箱产品30~50个，公司申请产品专利和技术专利近200项，逐步形成了3个门类，几十个系列，共600多个型号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由此可见，科龙逐步从依赖模仿、引进技术的发展模式走上了自主开发和技术创新的道路。科龙的技术能力也因之而不断积累、提高，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所以科龙从生产替代外国进口的产品开始，到替代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进而生产出口产品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生产的高技术含量产品——这一产品升级替代路径有助于国内企业从较低的起点开始，实现企业的升级。

4. 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

有资料显示，我国企业在实施跟随替代转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方面已取得成功与经验。我国许多优秀企业在开发替代进口的产品，形成规模，占有较大的国内市场之后，又向国外市场扩展，对国内市场国际化，对经济全球化作出了主动的战略反应。这样，带动了出口增长，带动了产业的形成和经济增长。像我国企业生产的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等都已发展成大规模的产业并大量出口产品，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科龙空调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上排第二位，而且出口成绩喜人。2004年上半年科龙的出口业务收入较2003年同期大幅上升约148.5%，对科龙整体营业额的贡献也从上年同期约25.6%上升至约42.8%。还有华为，其2003年销售额为317亿人民币，其中约有84亿（10.5亿美元）来自海外市场，这个数字占到了全部销售额的近1/3，完成了从完全面向国内市场到以国际市场为业务增长重点的转变。2004年，华为在海外市场突飞猛进，实现海外销售额20亿美元，其海外业务已经覆盖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已有274个运营商使用它的产品。华为NGM系统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达18%，全球排名第一，交换接入设备全球出货量连续3年居第一。

四、有关我国企业实施主动跟随战略的进一步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基本上是沿着跟随替代的思路获得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家电、IT行业基本上沿袭了跟随替代、走出去的推动发展模式。家电行业的著名品牌、著名厂家都经历了由跟随替代而成长的过程，如海尔、长虹、美的等企业。

虽然国内有部分企业依靠跟随替代取得了发展，并实现了企业实力的提升，但是国内还有其他行业、很多的企业并没有以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跟随战略，很多潜在的发展机会没有被发掘。

首先，企业可以选择跟随生产、替代进口的商品有：据统计（见表2），2003年我国进口商品中有钢铁、塑料及其制品、有机化学品、车辆及其零件、附件^①、铜及其制品5类产品进口金额都在50亿美元以上，合计金额达782.1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491.6亿元。其中塑料及其制品进口额达210.3亿美元，相当于塑料制品业产值的56.97%；化学纤维长丝、化学纤维短丝进口量之和占化学纤维制造业产值的39.34%。特别是钢铁行业，进口额达222.23亿美元，相当于所有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工业产值的18.43%，其进口额在2003年超过了塑料及其制品的进口额。国内进口需求如此之大的原因是国内的企业没有技术，无法生产一些高端的钢板。有市场分析人士通过对比国内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预测，2005年

^①但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

热轧薄板(带)、冷轧薄板、涂镀薄板、冷轧硅钢片和不锈钢材是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产品，需要增加进口才可以解决国内的供需矛盾。特别是涂镀薄板，2002年国内的消费量为898万吨，进口占消费量的比例为51%，属于国内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的产品，倘若不实施产品替代，这种大量依靠进口的状况是不可能有所改观的。^①以上数据表明跟随替代产品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的市场需求，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值得深入发掘、扩展。另外，国家统计部门也指出我国每年进口的通用机械设备、专用机械设备、机电工业用零配件和元器件、纺织面料等产品多达数千亿美元，这些产品都是国内企业无法满足的国内有效需求。

表2 2003年若干重要进口商品在国内相关行业所占比例

进口商品名称	该商品所处行业	该进口商品总额	该进口商品总额占全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	所处行业工业总产值	该商品进口总额占所处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钢铁及其制品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55.96	6.22%	10007.37	21.23%
塑料及其制品	塑料制品业	210.3	5.09%	3063.83	56.97%
有机化学品	化学原料及制品	160.06	3.88%	9244.86	14.37%
车辆及其零件、附件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17.87	2.86%	11214.05	8.72%
铜及其制品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1.66	1.74%	3564.07	16.69%
航空、航天器及零件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4.61	1.08%	11214.05	3.30%
化学纤维长丝	化学纤维制造业	36.03	0.87%	1448.4	20.65%
化学纤维短丝	化学纤维制造业	32.61	0.79%	1448.4	18.69%
合计		929.1		51205.03	15.06%

注：(1) 进口商品金额按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计算；(2) 工业所处行业工业总产值统计范围为全部国有企业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企业；(3) 进口商品总额的单位为亿美元，所处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单位为亿元人民币；(4) 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2、2003、2004年。

其次，企业可以以境外企业、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的产品作为模仿、跟随对象，如家电、通信、计算机、电子、日用化工、饮料、零售、医药、汽车（客车）及零配件等诸多产业的产品。以手机为例，赛迪顾问的数据表明，2004年，中国手机市场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预测销量总规模将达到7300万部，同比增长8%。预测2005年中国手机市场销量将达到7600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4%左右。

另外，日本电子情报技术产业协会（JEITA）指出，2005年全球手机需求将增加至5.994亿部，将比2004年增长5.8%，^①可见，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上，手机的市场需求容量大，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进一步对手机市场的需求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手机产品功能升级速度加快，产品设计、技术含量重要性提升的趋势。国内手机企业只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全面参与产品竞争，积极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未来的国际化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 [1] 毛蕴诗, 欧阳桃花, 魏国政. 中国家电企业的竞争优势——格兰仕的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4, (6) .
- [2] 杨志刚, 吴贵生. 复杂产品技术能力成长的路径依赖——以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 [J]. 科研管理, 2003, (11) .
- [3] 欧阳桃花. 中国企业的高起点经营——基于海尔的案例分析 [J]. 管理世界, 2003, (2) .
- [4] 王毅. 企业技术核心能力增长：以华北制药、长虹为例 [J]. 科研管理, 2002, (3) .
- [5] 李卫宁. 技术创新与科龙的发展 [A]. 蓝海林主编, 技术创新与广东工业技术发展的战略研究 [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1.
- [6] 《钢铁行业2004-2005年前景分析》，证券市场周刊，2003.

责任编辑：黄振荣

^①这项预测范围涵盖46个国家，约占全球手机需求的90%~95%。

比较优势与超比较优势

——论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 李 翀

[摘要]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短期和长期、静态和动态之分。从短期和静态来看,我国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但是,从长期和动态来看,我国则应该发展某些目前没有比较优势但对我国经济具有主导意义的产业,以创建新的比较优势格局。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除了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以外,在国际贸易中还存在超绝对优势和超比较优势。我国政府应该推动自主的技术创新,培育某些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

[关键词] 比较优势 超比较优势 发展战略 国际分工

(中图分类号) F0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49-06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因此,如何制定本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是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近几年,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关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争论。有的学者主张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有的学者则呼吁谨防我国落入比较优势陷阱。本文试图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提出超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一、在短期内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

绝对优势学说和比较优势学说是国际贸易的经典学说。虽然斯密 (A. Smith) 并没有专门论述绝对优势的问题,但他在初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批评限制进口国内可以生产的商品的主张时提出了绝对优势的思想。根据绝对优势学说的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是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或市场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个国家,因而它的这种商品具有绝对优势;国际贸易流向是各个国家出口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本国处于绝对劣势的商品;国际贸易利益是在各国实行专业化生产,即在专门生产本国具有绝对优势商品的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使各国可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商品。

李嘉图 (D. Ricardo) 进一步推进了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根据比较优势学说的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是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或市场价格相对地低于另一个国家,因而它的这种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的流向是各个国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国际贸易的优势是在各国实行专业化生产,即在专门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使各国可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商品。[1] P108-126)

显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比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对国际贸易的现象更具有解释力。首先,比较优势学说涵盖了绝对优势学说。尽管绝对优势的现象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仍然存在,但是一个国家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那么它在这种商品的生产上一定具有比较优势。其次,比较优势学说超越了绝对优势学说。一个国家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没有绝对优势,但是也可以具有比较优势,它仍然可以出口这种商品并且得到国际贸易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缪尔森 (P. A. Samuelson) 把比较优势学说称为:“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2] P561)

在短期内,在科学技术和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比较优势的格局为一定。世界各国只有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得到国际贸易的利益。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为例,我国在纺织品、鞋类制品、家用电器等商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喷气客机、通讯器材、化工制品等商品的生产

上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向美国出口纺织品、鞋类制品、家用电器等商品，从美国进口喷气客机、通讯器材、化工制品等商品，不论是我国还是美国都可以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如果我国不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不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不从美国进口喷气客机、通讯器材、化工制品等商品，而是自己制造这些产品；第二种选择是逆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即向美国出口喷气客机、通讯器材、化工制品等商品，从美国进口纺织品、鞋类制品、家用电器等商品。第一种选择将导致很高的生产成本，从而使经济缺乏效率；第二种选择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选择。

当然，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是不均等的。例如，我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鞋类制品、家用电器等商品，得到的贸易利益是很少的；美国向我国出口喷气客机、通讯器材、化工制品等商品，得到的贸易利益是很大的。假如我国得到的贸易利益是20%，而美国得到的贸易利益是80%，我国还有必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吗？我认为仍然有必要。如果我国不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不但失去这20%的静态利益，而且将失去更多的动态利益。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闭关自守必然导致落后。

因此，在短期和静态的条件下，比较优势的原则不可抗拒。我国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社会资源的特点，争取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争取通过国际贸易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比较优势的原则不仅适合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产和贸易，而且适合于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生产和贸易。由于在一个国家内通过政府可以实现贸易利益的再分配，也就是通过政府可以减少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可能给贸易一方带来相对不利的影响，比较优势的原则更加适合于我国内部区域之间的分工。

二、在长期里不能局限于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

比较优势学说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是要将比较优势学说应用于现实世界并且得到比较优势学说所揭示的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例如，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和平相处，并且有一定的机制进行国际贸易利益的再分配。但是，现实世界并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

从16世纪开始长达400年的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决定了宗主国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宗主国演变为现在的发达国家，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演变为现在的发展中国家。50多年来，尽管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格局仍然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国际贸易格局烙印。如果发展中国家仅仅满足于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它们将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甚至处于被欺凌的地位。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4年《国际贸易统计资料》^{[3] (P103-104, P111)} 如果扣除西欧国家内部的农产品贸易、北美国家内部的农产品贸易、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之间的农产品出口贸易、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与地处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之间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以及其他发展中地区内和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那么在2003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为865亿美元，占相互之间农产品出口总额的38%；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农产品为1378亿美元，占相互之间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2%。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的贸易格局没有变化。另外，西欧和北美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矿产品172亿美元，占相互之间矿产品出口总额的5%；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矿产品3274亿美元，占相互之间矿产品出口总额的95%。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不仅向发达国家提供农产品，而且大量提供矿产品，即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也没有改变。

在现实的国际贸易里，大多数初级产品都具备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低的特点，这意味着从趋势上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是下降的。格里利 (R. E. Grilli) 和杨 (M. C. Yang) 曾经用初级产品出口的美

元价格指数与工业制品出口的美元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研究了从1900年到1986年初级产品相对价格变化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1986年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只有1900年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的50%。相对价格明显下降的初级产品有橡胶、可可、小麦、稻谷、糖、铜、锡等。^[4 P73-83]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资料，2002年与1980年相比，发达国家贸易条件改善了5%，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了17%。^[3 P42]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即使国际贸易是公平的，由于初级产品本身的特点，作为初级产品主要出口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没有带来相应的收益的增加，它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如果说工业制品的出口与初级产品的出口相比具有更多的贸易利益，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是得到相应的利益呢？例如，在2003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品达9423亿美元，占它们相互之间制成品出口贸易总额的44%，^[3 P116]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不是改善了呢？仍然没有。在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工业制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出口。以中国为例，从1980年到2003年，中国工业制品出口总额在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例从49.70%急剧上升到92.06%。^[9 P715]但是，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所占的比重从1997年的40.98%上升到2003年的54.84%。这意味着从出口主体的收益来看，中国有超过50%的出口贸易利益是被外商投资企业所获得。这就是说，外国厂商本来可以在本国生产出口商品，但由于中国的工资和租金比较低廉，外国厂商到中国设厂生产这些出口产品，将原来是本国的出口额转变为中国的出口额，它们从中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工业制品出口中很大一部分贸易利益仍然被发达国家所得。

另外，还应该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厂商生产的出口商品，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品的增值链中仍然得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贸易利益。首先，发达国家在机器设备的生产中具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厂商在生产制成品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部分来自发达国家，这部分价值所代表的利益被发达国家所得。其次，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具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厂商在生产制成品的过程中，往往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因而需要向发达国家交纳各种专利费用，这部分价值所代表的利益也被发达国家所得。再次，发达国家在制成品的品牌上具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厂商生产工业制品往往采用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方式，它们只得到少量的加工费，大部分贸易利益被发达国家所得。

当然，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将会生产越来越多的工业制品。但是，它们所生产的工业制品也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放弃生产的工业制品。当发展中国家用这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业制品与发达国家交换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品时，又重复着过去它们用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工业制品的恶性循环。这是仅仅局限于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所难以避免的发展前景。

由此可见，即使在和平的年代里，如果发展中国家停留在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它们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越来越大。如果一旦发生国际争端，由于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不可比拟的经济实力，它们将处在强势的地位。这样，发展中国家不但是发展，而且连生存都将成为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继续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我们也不能让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不论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我国不能停留在仅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

三、我国的战略发展需要创建动态的比较优势

我国既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但又不能拘泥于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格局在短期内是一定的，但在长期里是可变的。我国在短期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必须注重自主的技术创新，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长期的比较优势格局。在投入高成本去研究我国得不到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或者去超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时，显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但是一旦我国掌握了这样的先进技术，我国将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格局，使我国可以按照新的比较

优势格局参与国际分工。这意味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短期和长期、静态和动态之分。采取积极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短期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静态的国际分工的前提下，通过局部地发展没有比较优势但具有比较优势前景的产业来创建新的动态的比较优势格局。这就是说，不断从短期的、局部的非比较优势走向长期的、动态的比较优势，就是我国应该采用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方面，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国际贸易对日本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种既考虑比较优势原则又不拘泥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发展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对主导产业的选择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事后来，日本政府对主导产业的选择主要根据下述标准：第一，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当人们收入提高时对这些产业的产品产生较大的需求。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从而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第三，产业关联性较强，使该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根据这些标准，日本政府选择并重点给予支持的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是钢铁、机械、汽车、石油化工、造船、电力，70年代是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80年代以来是能源、信息、材料、生物工程。^{[7] P117)}

在这些产业的发展初期，日本并不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以轿车产业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轿车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日本生产轿车并没有比较优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日本似乎不应该发展轿车产业。但是，轿车产业具有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劳动生产率高，产业关联度强的特点，日本政府通过优先采购、减免税收、低息贷款、提供信息等措施给予支持和培育，使日本轿车产业发展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但是，日本产业的发展又没有完全违背比较优势的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就已经走向工业化，具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日本的资本积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即使当时部分产业没有比较优势，但也具有发展成为比较优势产业的前景。另外，应该指出的是，许多对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出口产业，如20世纪50年代的缝纫机、照相机、摩托车、钢琴，60年代的电视机、录音机、数控机床等产业，它们基本上没有得到政府特别的扶持，主要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起来的。

韩国走的是一条与日本相似的道路，但由于韩国原来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的色彩或者说没有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经济的色彩更强烈于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通过产业政策来实施的。韩国的产业政策与出口导向的战略相结合，将本国的社会资源集中于对本国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能够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它不局限于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产业，而是采用资金、技术、税收、信息等手段，主动地和先行地引导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将某些比较劣势的产业扶植为比较优势的产业。

正是通过这样的产业政策，韩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重点发展轻工业、70年代重点发展重化工业、80年代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并且使这些产业成为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产业。当然，韩国的产业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政府过多地对经济进行干预，弱化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作用，对外债务负担过重、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韩国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就是多年积累的矛盾的激化所致。但不可否认，韩国的产业政策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航天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航天产业不仅没有比较优势，而且还是绝对劣势。但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政府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航天产业的建设中，使航天产业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和相当高的水平。目前，在卫星回收、一箭多星、低温燃料火箭技术、捆绑式火箭技术以及静止轨道卫星发射与测控等许多重要技术领域我国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遥感卫星研制及其应用、通信卫星研制及其应用、科学实验卫星、导航定位卫星研制与应用以及载人飞船试验等方面，我国均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运载火箭方面，我国已成功地研制

了适用于发射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12种不同类型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到2004年底共进行了82次发射，将62颗中国卫星、5艘中国飞船、30颗外国卫星送入太空，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虽然我国在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过程中受到某些发达国家的阻碍和限制，但我国的运载火箭已经以低成本和高稳定性显示了它强大的竞争力。我国的航天产业已经从一个绝对劣势的产业发展为比较优势的产业。

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从静态来看，它们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不经济的，它们本来可以花更低的成本从别的发达国家进口这些产品的产品。但是，从动态上看，它们发展当时没有比较优势但是经过培育有可能成为比较优势的产业未必是不经济的，这些产业在长期里可以带来很高的收益。即使从本产业的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发展这些产业可能是不经济的，但是如果这些产业能够带来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整个经济的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可行的。日本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存在不少问题，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但是这些产业政策强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使它们迅速步入发达国家和准发达国家的行列。

从我国航天产业的发展还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如果局限于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产业，那些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产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该国将永远处于受制约的地位。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创建动态的比较优势格局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地发展产业。由于社会资源是稀缺的，政府只能有重点地发展某些对本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导产业，而且这些主导产业是有可能成为比较优势产业的。

四、我国可实施局部的超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假定两个国家都能够生产两种商品，当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或市场价格相对低于对方国家时，它在这种商品的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现实的经济里，一个国家能够生产的某种商品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所不能生产的，这就不存在在这两个国家相对价格的高低问题，因而也就不是比较优势的问题。假定存在A、B两个国家，某种商品只有A国能够生产而B国不能生产，那么在这两个国家这种商品的贸易中A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我将这种优势称为超比较优势（super comparative advantage）。^[8]例如，目前能够生产大型客机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当这些国家与别的国家进行贸易时，他们在这些商品的贸易中就具有超比较优势。如果从成本或价格的角度分析，对于贸易双方来说，超比较优势意味着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或价格为一定，而另一个国家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或价格趋向于无穷。

超比较优势产生于社会资源的特点。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是分布极不均匀的自然资源的产品，或者是某个国家特有的特殊工艺产品，或者是高技术和高技能产品。目前最重要和最量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商品是高技术或高技能产品，即需要用最新的生产技术和最高的人的技能才能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要求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达到这种水平的国家只有某一个或某几个发达国家，大部分国家不能生产这些产品。这样，这个或这些发达国家在这些商品的贸易中具有超比较优势。在航空、航天、通讯、信息、生物、化工、制药、材料等领域里，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发达国家拥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大量存在的。由于这些产品是别的国家不能生产的，出口这些产品的国家可以获取高额的寡头垄断利润。

虽然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很早就存在，例如丝绸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有我国才能生产，但是到了当代超比较优势的现象才变得越来越普遍。当今的时代与李嘉图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李嘉图所处的时代里，社会产品的结构比较单一，许多主要的产品各国都可以生产，只是生产的方法不同。例如纺织品，别的国家只能用手工生产，英国则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这样英国生产纺织品具有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但是，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多类型的产品需要用专

门的技术才能生产。这样，掌握这种技术的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超比较优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李嘉图所处的时代里，虽然某个国家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超绝对优势，但是所采用的工艺并不太复杂，其他国家通过模仿或学习也可以掌握这些工艺。例如，当我国的丝绸传到外国以后，外国人到我国学习丝绸的生产工艺，最后外国人也可以生产丝绸。但是，在当代，许多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技术十分复杂，而且还受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模仿这些技术是比较困难的。掌握了这些技术的国家只有在研制了更新的技术以后，才将原来的技术以专利的方式出售给别的国家，这意味着技术的差距和超比较优势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超比较优势学说能够揭示当今国际贸易格局的实质。目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和主宰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和从属的地位，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家很多进口的产品是它们不能生产的，出口的却是发达国家可以生产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向于放弃的商品。因此，发达国家支配着国际贸易并在国际贸易中获取高额的寡头垄断利润。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相对成本低的商品、进口相对成本高的商品来获得国际贸易利益这样的问题了。

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不能否认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可以给贸易双方带来贸易利益。但是，最重要的贸易利益是超比较优势所带来的贸易利益。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停留在按一般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将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始终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超比较优势产生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我国要改变不利的国际贸易格局，必须要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要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可能全面超越发达国家。但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我国有可能在科学技术的某个方面取得突破，局部地建立某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

在争取突破的若干高技术产业中，生物技术是一个应该选择的产业。^[9]我国拥有13亿人口，在医疗、农业、能源、环境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要实现农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生物技术的作用。这种社会和市场的巨大需求，是推动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另外，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国内，当年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曾经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成果，近年在水稻基因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有大批科学家在从事生物技术研究。我国政府应该对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给予扶持，建立某些具有超比较优势的生物技术产业。

[参考文献]

- [1] 李嘉图. 政治阶级性及赋税原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 [2] 萨缪尔森. 经济学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3]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 [M]. WTO, 2004.
- [4] R. E. Grilli and M. C. Yang. "Primary Commodity Price, Manufactured Goods Price, and the Terms of Trad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the Long Run Show"[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1988.
- [5]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M]. UNCTAD, 2004.
- [6] 中国统计年鉴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 [7] 余曷雕. 日本经济新论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 [8] 李翀. 论国际贸易的超绝对利益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 (3).
- [9] 李翀. 生物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超绝对利益”[J]. 国际贸易, 2004, (11).

责任编辑: 黄振荣

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综合判断与测度

◎ 陈 华

[摘要] 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银行体系的稳健与否事关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与稳定。本文采用CMAxi指数法、多元Probit模型回归分析等, 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进行了量化分析, 结果发现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在1978~2000年之间有11年是不稳定的, 尤其是在1992年和1998年前后更为突出, 银行体系出现了不稳健的征兆, 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

[关键词] 银行体系脆弱性 综合判断 测度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55-07

一、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综合判断 (1978-2000年)

(一) 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初步测度

关于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测度方法众多, 归结起来可以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在早期主要使用定性分析, 如历史事件分析法和定性指标分析。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量化分析主要包括定量指标分析法和计量分析法。由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都没有发生过银行危机, 历史事件分析法不可行, 加上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 种种特殊性使得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的测度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方法。本文采用定性指标分析和定量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测度, 以期对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运用指标来测度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时, 科学的核心指标和综合指标的选择和设计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借鉴西方国家在选取指标过程中的共同经验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结合我国现实国情,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择城乡储蓄存款变化率、银行对非政府部门贷款增长率、CPI指数等3个指标作为核心指标, 并利用CMAxi指数法从银行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等两个层面来初步测度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

1. 定量指标分析——核心指标与CMAxi指数法

(1) 银行体系脆弱性识别及其测度——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测度十分复杂。首先有必要就银行体系脆弱性进行界定, 关于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界定, 至今未有定论。一般地, 当银行体系脆弱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将引发银行危机, 因此可以通过界定银行危机来识别和测度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Kaminsky and Reinhart (1999) 利用综合事件法来定义银行危机的开始, 但对其他国家效果并不理想。

表1 定性分析法识别银行危机结果一览表

国家	加拿大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挪威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美国
开始	1983	1987	1991	1994	1978	1990	1992	1987	1977	1990	1975	1984	1980
结束	1985	1992	1994	1995	1979	1995	1997	1993	1985	1993	1976	1984	1992

因为定性分析法不能有效区别银行非系统风险所导致的单个银行问题和银行系统风险。最近的研究把定性分析和有限的定量指标分析结合起来, 如Lindgren^[1](P267-277)]等 (1996), 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a)、(1998b), Glick and Hutchinson (1999)。他们认为至少当下述条件之一成立时, 可认为发生了银行危机: 一是不良资产占银行资产的比率超过10%; 二是政府救助银行的财政成本占GDP的比率大于2%; 三是银行部门问题导致银行大规模的国有化; 四是大范围的银行挤兑导致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如冻结存款等。Glick and Hutchinson (1999) 认为不可能精确地记录银行危机的发生, 因此通过历史事件法来判断银行脆弱性是困难的, 尤其是对一些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 如中国。由于银行危机往往与挤兑密切相关, 而挤兑导致银行存款减少, 这样存款变化成为衡量银行脆弱性状况的有效替代指标。此外贷款作为银行最主要的业务, 贷款的变化也是衡量银行稳健与否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指标。基于此, 在这里先采用这两个基于总的银行资产负

作者简介 陈华, 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山东 济南, 250014)。

债表的变量即城乡储蓄存款和银行对非政府部门贷款来测度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并通过下文的定性分析进行补充。同样利用CMAXt指数法来分析我国信贷市场脆弱性。具体如下：CMAXt = t时期的城乡储蓄存款变化率/过去10年的城乡储蓄存款变化率最大值。为避免丢失太多有效样本数据点，这里只选取过去10年的最大值。在这里我们定义三个引发点T0、T1、T2。由图1我们可以初步判定1987、1988、1998和1999年中国银行体系是不稳定的。同样我们利用CMAXt指数来分析银行对非政府部门贷款的变化情况并进而判断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由图2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中国银行体系在1992、1993年是比较脆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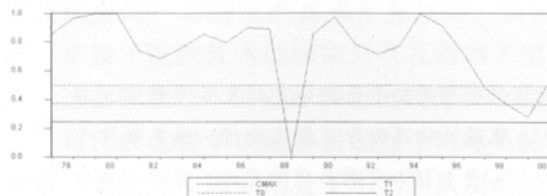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城乡储蓄变化的CMAXt指数曲线图

注：T0=平均值-1个标准差，T1=平均值-1.5个标准差，T2=平均值-2个标准差，其中平均值=0.744226，标准差=0.249325，CMAXt=Pt/过去十年的最大值，数据为1968-2000年的城乡储蓄存款变化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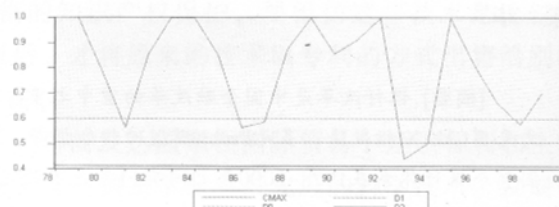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银行对非政府部门贷款增长率的CMAXt指数曲线图

注：D0=平均值-1个标准差，D1=平均值-1.5个标准差，D2=平均值-2个标准差，平均值=0.7894，标准差=0.1888，CMAXt=ΔDt/过去3年的最大值，数据为1977-2000年中国银行对非政府部门贷款增长率。（资料来源：FIS (32d)）

(2) 实体经济脆弱性状况识别及其测度——物价的大起大落对宏观经济稳健发展十分不利，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成为货币当局的最终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因此在这里笔者利用GDP冲减指数变化情况来看币值稳定程度，进而判断宏观经济状况是否稳健。由图3可以初步认定我国1981、1982、1997和1998年宏观经济状况是不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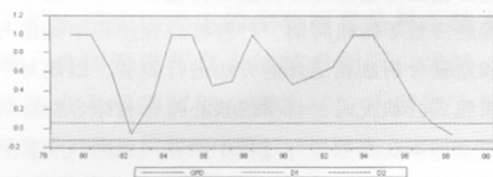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通货膨胀水平的CMAXt指数曲线图

注意：D1=平均值-1.5个标准差，D2=平均值-2个标准差，其中平均值=0.607623，标准差=0.365541。CMAXt=Pt/过去十年的最大值。数据为1969-1998年的GDP冲减指数变化率。

2. 定性指标分析之一——补充指标和综合指数

考虑到单个和多个指标定量分析的局限，通过定性分析对上述定量分析进行补充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借鉴西方国家在选取指标过程中的共同的经验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了国有银行资产收益率等20个指标进一步测度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程度。相关问题的处理主要参考了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是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

从量化处理的结果可以发现：近十年来我国银行体系整体脆弱性水平大体上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就综合指数Z1而言，十年间有七年处于脆弱性程度令人关注状态，十年脆弱性水平平均为52.24分，高出正常水平2.24个百分点。1994年为最高，达到62.24分，比1991年上升了约167%，1994年后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2000年为48.11分，比1994年下降了22.7个百分点。

就综合指数Z2而言，十年间有六年脆弱性程度超过50%，十年平均水平为52.78%，高出正常状态2.78个百分点。1994年为最高，达到64.43%，高出正常状态14.43个百分点，处于令人关注状态；1991年最小，仅为38.29%，处于正常状态。就综合指数Z3而言，十年间有四年超过50%，脆弱性水平平均为50.03%，1993年最高，为66.15%，处于令人关注状态。由表2、3和图4我们可以初步判断1992~1995年中国银行体系是比较脆弱的。[2](P120-135)

3. 定性指标分析之二——补充指标和偏离度

由于以上指标测度的只是1991年以来近十年间的银行体系脆弱性，而且这种定性指标分析主观判断成分过多，缺陷十分明显。为进一步考察1978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状况，下面我们采用10个补充指标根据CMAXt指数法类似的原理，在这里引入一个偏离度指标：T1=平均值+（-）1.5个标准差，利用这一偏离度指标来帮助判断银行体系是否稳健。如果某一年的原始数据不在依据T1指标计算出来的正常区间范围之内，则初步认为该年是不稳健的。在这里采用原始数据，没有经过处理，这样主要是考虑到样本数据十分有限。依据这一方法，按照T1标准对上述指标逐一进行考察。从经济增长率指标来看，一般认为经济增长过低，往往意味着较高的违约风险，199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历史最低，仅为3.8%，因此认为1990年是很不稳定的。1989年为4.1%，比1988年下降了7.2%，1981年为5.2%，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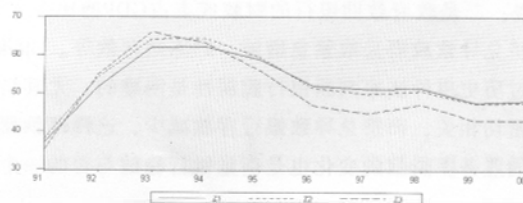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趋势图（1991-2000年）

表2 银行系统若干脆弱性指标及临界值20个指标

脆弱性程度	安全	正常	关注	危险	Z2 权重	Z1 权重
指标映射值区间	0~20	20~50	50~80	80~100		
B10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	<12	12~17	17~22	>22	0.12	0.1
B11 国有银行资本充足比率	>12	8~12	4~8	<4	0.08	0.1
B12 国有银行资产收益比率	>0.4	0.2~0.4	0~0.2	<0	0.06	0.1
B13 企业资产负债比率	<45	45~65	65~85	>85	0.06	0.1
B14 M2 增长率	5~15	15~20	20~25 或 0~5	>25 或<0	0.05	0.05
B15 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	0~4	4~7 或 0~4	7~10 或 -8~4	>10 或<-8	0.05	0.05
B16 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	5~15	15~20	20~25 或 0~5	>25 或<0	0.05	0.05
B17 GDP 增长率	6.5~9.5	5~6.5 或 9.5~11	3.5~5 或 11~12.5	<3.5 或>12.5	0.04	0.03
B1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13~19	10~13 或 19~22	7~10 或 22~25	<7 或>25	0.04	0.03
B19 通货膨胀水平 CPI	<4	4~7	7~10 或 0~2	>10 或<-2	0.04	0.03
B20 消费增长率 c	5~15	15~25	0~5 或 25~35	>35 或<0	0.05	0.04
B21 居民储蓄增长率	10~15	5~10 或 15~20	0~5 或 20~30	>30 或<0	0.05	0.04
B22 资本产出比率	>2.8	2.4~2.8	2.4~2	<2	0.04	0.04
B23 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率	-5~5	5~10 或 -5~10	10~20 或 -10~20	>2 或<-20	0.04	0.04
B24 进口增长率	5~20	20~30	30~60 或 0~5	>60 或<0	0.03	0.03
B25 M2/外汇储备	0~5	5~15	15~20	>20	0.05	0.03
B26 流动性储备/银行资产	>0.2	0.15~0.2	0.1~0.15	<0.1	0.04	0.04
B27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	10~25	25~50 或 0~10	0~10 或 50~100	<-10 或>100	0.03	0.03
B28 财政赤字/GDP	<1	1~3	3~9	>9	0.04	0.04
B29 债务依存度	<10	10~20	20~30	>30	0.04	0.03

几点说明：一是关于衡量脆弱性程度的界限值的确定，主要参考了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有个别指标是根据历史数据先计算出平均值，然后依据偏离度来确定其安全性。二是数据处理，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具体的指标数值映射为相应的分数值。举例说明如下：如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1%，所处的脆弱性程度为安全，将8.1置于该区间上限为6.5和下限为9.5之间， $(8.1-6.5)/(9.5-6.5)=53.3\%$ ，然后按照相同的比例映射到对应的脆弱性区间0~20，则指标的分数值为10.7分，其它的类似计算。三是脆弱性程度综合分数的计算，综合指数Z1和Z2通过加权平均计算而来，指标具体权重见表2；综合指数Z3以简单算术平均计算而来。四是脆弱性程度划分。指标映射分数值在0~20之间为安全，20~50之间为正常，50~80之间为关注，80~100之间为危险。五是关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原理确定，这是一种理论和专家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科学确定指标权重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这里结论的科学性有待实践来检验。六是核心指标的构成及其选择问题。这是在总结了国际上许多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选而来的，但是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使得一些重要的指标未能采用，这也可能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表3 中国银行系统脆弱性补充指标及综合指标数值

指标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
B10 国银不良贷款比率	68	68	68	95	95	95	95	98	99	93
B11 国银资本充足比率	53.3	51.1	51.1	53.5	60.1	69.7	71	66.5	68.7	66.9
B12 国银资产收益比率	7.4	10	20	36.5	36.5	48.5	65.3	62	56	62
B13 企业资产负债比率	43.3	44.8	60.1	52.6	54.4	49.6	48.4	48.1	43.3	44.3
B14 M2 增长率	82	87	92.7	90	84.9	81	47.6	19.6	19.4	14.6
B15 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	21.6	5.8	47.9	100	65.9	26.2	14.4	35.7	18.3	9.3
B16 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	15.4	70.4	100	57.8	100	55.4	65	23	2	6.6
B17 GDP 增长率	26	96	90	85	65	38	18	8	8	10
B1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85	95	100	90	25	9	68	4.5	4.5	73
B19 CPI 变动率	17	44	84	94	87	63	14	62	62	2
B20 消费增长率	22.1	38.9	54.5	73.4	51.5	31.7	7.8	3.0	4.2	9.6
B21 居民储蓄增长率	28.04	28.82	34.64	50.48	13.52	29.6	54.5	100	100	100
B22 资本产出比率	0	47	73.25	22.25	23.75	29.75	40.25	38.75	40.25	50
B23 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率	55.55	52.67	58.22	29.48	45.68	34.34	18.88	10.34	0.36	11.52
B24 进口增长率	52	50.7	54.7	100	7.87	77.6	62.6	100	17.33	55.8
B25M2/外汇储备	39.5	51.2	55.4	20.9	21.5	19.2	18	21.2	23	24.5
B26 流动性储备/银行资产	31.4	50	69.8	73.4	74.6	29.6	26	67.4	63.8	59.6
B27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	19.87	63.32	100	59.54	43.7	4.53	9.6	77.6	100	2.66
B28 财政赤字/GDP	21.5	100	77.4	23	100	74	75.2	1.8	37.1	78.7
B29 债务依存度	19.6	45.2	31.4	57.5	64.4	69.8	75.8	95	90	85
综合指数 Z1	37.26	51.61	62.13	62.24	58.94	52.00	51.21	51.28	47.66	48.11
综合指数 Z2	38.29	54.26	64.32	64.43	59.49	51.38	49.88	50.63	47.44	47.67
综合指数 Z3	35.43	54.99	66.15	63.22	56.02	46.78	44.77	47.13	42.86	42.95

上一年下降了2.6%。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走低，1999年仅7.6%。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和持续走低，不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通过对Y1指标的分析我们发现，1981、1989和1990年中国银行体系是有问题的，同样Y2指标1979、1980、1999和2000年都不在正常区间之内，依次类推，归结起来我们发现1979、1980、1988、1989、1990、1992、1993、1994、1995、1996、1998、1999和2000年中国银行体系是比较脆弱的。结合上述两种定性分析结果我们进一步判定中国银行体系在1979、1980、1987、1988、1989、1990、1992、1998和1999年是不稳定的。^[3 P332-341]

表4 中国银行脆弱性状况测度的若干补充指标 (%)

年份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1979	7.6	- 3.3	2.1	8.7	3	18.19	0.4	- 1.1	1.96	
1980	7.8	- 1.5	7	- 6.8	0.6	16.31	0.1	5.8	- 0.6	
1981	5.2	0.76	2.6	5.5	1.3	15.18	1	10.1	- 0.6	
1982	9.1	- 0.3	1.9	28	0.5	14.09	0.8	2.1	3.86	
1983	10.9	- 0.7	1.2	16.2	0.04	11.8	2.7	0.8	3.86	1.98
1984	15.2	- 0.8	1.7	28.2	0.2	12.1	4.9	9.9	3.86	2.33
1985	13.5	- 0.0067	7.6	38.8	1.1	10.5	4.6	- 0.9	- 1.6	2.94
1986	8.8	- 0.8	6.5	22.7	8.5	9.42	4.3	12.9	- 1.6	3.45
1987	11.6	- 0.5	7.3	21.5	9.6	9.3	3.6	1.5	- 1.6	3.72
1988	11.3	- 0.8	18.8	25.4	11.4	8.79	2	- 6.4	- 9.86	3.72
1989	4.1	- 0.9	18	- 7.2	10.3	7.81	3.3	20.2	- 6.46	3.77
1990	3.8	- 0.79	3.1	2.4	9	7.19	2	12.2	7.98	4.78
1991	9.2	- 1.09	3.4	23.9	12.3	7.51	1.5	3.5	4.66	5.32
1992	14.2	- 0.9	6.4	44.4	21.7	7.39	1.7	0.1	4.66	5.51
1993	13.5	- 0.8	14.7	61.8	17.1	5.56	0.5	- 3.7	- 4.02	5.76
1994	12.6	- 1.2	24.1	30.4	15.5	4.42	0.9	- 10.1	- 4.02	8.62
1995	10.5	- 0.9	17.1	17.5	15	4.34	0.8	1.1	- 3.82	8.35
1996	9.6	- 0.7	8.3	14.8				4.2	3.08	8.31
1997	8.8	- 0.7	2.8	10.1				11.2	4.87	4.2
1998	7.8	- 1.1	- 0.8					8.8	6.34	8.28
1999	7.6	- 2.1	- 1.5						6.34	8.28
2000	7.7	- 2	0.4							
平均值	10.7	- 0.7	9.99	25	10	8.16	2.5	3.1	- 0.61	4.63
标准差	3.5	0.29	7.57	17.4	6	2.49	1.5	8.4	5.2	2.06
T1	5.4~15.9	- 1.13~ - 0.26	- 1.36~21.3	- 1.1~51.1	1~19	4.42~11.8	0.2~4.7	- 9~15	- 8.41~7.19	1.54~7.72

注：其中Y1代表经济增长率，Y2代表财政赤字/GDP，Y3代表通货膨胀水平（ Δ CPI），Y4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Y5代表不良资产比率，Y6代表国有银行自有资金/资产比率，Y7代表国有银行资产利润率，Y8代表国内信贷/GDP增长率，Y9代表一年期实际储蓄存款利率，Y10代表外资流入额/GDP。

综合评估结果——通过以上定性指标分析和部分定量指标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在1978~2000年之间有11年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1992年和1998年前后更为突出，银行体系出现了不稳健的征兆，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1978年我国当时由于十年“文革”的影响积累了许多问题，因此可以推断当时银行体系是不稳健的。当然这种结论是否科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探讨，这里给出的只是笔者建立在定性分析和部分定量指标分析基础之上所得出的一种初步判断，选择不同的指标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此外，由于样本数据不够多，同样影响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这是我们在分析中国银行脆弱性状况时应该注意的，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表5 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初步评估结果（1978- 2000年）

指标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2000
银行部门										*	*		*	*	*	*					*	*	
实体经济部门					*	*														*	*	*	
定性分析 1															*	*	*	*					
定性分析 2		*	*							*	*	*	*		*						*	*	
综合 Z	1	1	0	0	1	1	0	0	0	1	1	0	1	1	1	0	0	0	0	0	1	1	0

注：其中Y=1代表银行体系脆弱，Y=0代表银行体系稳健。

二、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成因实证分析

(一) 方法和数据

方法：关于银行体系脆弱性问题量化分析的方法很多，归结起来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Kaminsky等的信号分析法；二是Frankel and Rose等人提出的概率单位模型，如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三是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提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简称STV模型；四是刘遵义的主观概率法。本文利用最小二乘法、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三种方法以Z作为因变量进行比较分析，根据我们的理论研究选择了21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宏观经济变量包括Y1~Y7等7个指标，金融变量包括Y8~Y14等8个指标，其他变量包括Y16~Y21等6个指标。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81~2000年各期。

(二) 回归估计和判别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3.1软件，对上述解释变量进行了多元Probit模型回归分析。表6列出了6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第一至第二个回归方程包括了宏观经济变量和部分金融变量，第三个回归方程包括了全部宏观经济变量，第四个回归方程包括全部其他变量，第五个回归方程包括全部金融变量，第六个回归方程对指标进行了优选，为最优指标。通过运用probit模型估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回归方程1中，宏观经济变量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宏观经济状况对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7个宏观经济变量与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在7个宏观经济变量之中，Y2财政赤字/GDP、Y3通货膨胀率以CPI指数计算、Y5进口增长率、Y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金融脆弱性之间存在弱相关性，而Y1实际经济增长率、Y4出口增长率、Y7资本产出比率与金融脆弱性相关性很低。国外的研究表明：政府过度的财政恶化导致了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但在我国，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该指标与金融脆弱性呈弱相关，似乎说明我国财政赤字对整个金融体系脆弱性并无最直接的重要影响。关于这种结论可能的解释：一是可能与样本数据过少和金融脆弱性测度比较粗糙有关；二是我国该指标比率尚不高，处于国际公认安全区间之内。资本产出比率指标不显著说明我国资本利用效率对金融体系脆弱性影响不大。按道理一个社会资本产出比率越低，金融体系运转越高效健全，而我国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总的说来，实证分析结果与传统的经济周期决定论的观点相悖，这与近年来的研究结论和现实是比较一致的，许多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宏观经济状况良好，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夕，亚洲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良好。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整个金融体系越来越独立于宏观经济，因此传统的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解释金融脆弱性问题在新形势下值得重新审视。

2. 对回归方程4分析结果说明其他变量主要是与银行有关的变量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也不显著。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大量的银行倒闭，一些学者从分析传统宏观经济层面等影响金融脆弱性的因素转而关注银行部门有关的变量，尤其是强调银行总的资产负债表中有变量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但分析结果并不理想。从方程4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不良资产

表6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变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Y1	-0.52	-0.95	-0.1	-0.49	-0.08	-0.43						
Y2	-0.214	-0.89	-0.133	-1.52	-0.897	-1.26					-2.8	0.01
Y3	-0.08	-0.27	-0.15	-1.27	-0.08	-1.53					-2.7	0.01
Y4	1.06	0.11	-0.67	-0.15	0.74	0.18						
Y5	-9.12	-1.37	-5.16	-1.37	-2.52	-0.9					-11.8	-1.77
Y6	0.09	0.97	0.03	1.07	0.03	1.07					0.05	1.28
Y7	2.52	1.10	0.29	0.52	-0.02	-0.05						
Y8	2.28	0.20	1.27	1.20					3.92	0.73		
Y9	-0.06	-0.32							0.04	0.46		
Y10									-53.3	-2.14		
Y11	-0.3	-0.63							1.03	1.79	0.7	1.61
Y12	0.03	0.10	-0.12	-0.72					0.12	0.63		
Y13			-0.34	-0.69					-0.58	-0.55	-2.2	-1.58
Y14	0.09	0.01							0.84	0.25		
Y15	21.7	0.92							-6.53	-0.42	47.0	1.76
Y16							-1.19	-0.07				
Y17							15.3	0.43				
Y18							2.38	0.38				
Y19							1.49	0.75				
Y20							-0.99	-0.72				
Y21							-0.62	-0.69				

指标说明：回归1表示综合变量；回归2表示部分综合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回归3表示宏观经济状况变量；回归4表示其他变量如与银行部门相关的变量；回归5表示金融变量；回归6表示最优变量。

比率、银行资产利润率、银行经营费用/银行资产、银行资本资产比率、银行存款/银行资产、外资流入额/GDP等指标的变动对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无显著影响。这一分析结论与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当前如果单从我国银行资产负债表来分析判断金融体系脆弱性，我们往往会得出我国金融体系异常脆弱的结论，然而事实上我国自1978年以来整个金融体系都保持了相对稳定，中国的现实也说明与银行部门相关的变量并不是决定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重要变量。单纯通过分析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方法来分析和判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3. 对回归方程5分析结果说明金融变量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状况存在一定的影响。其中贷款增长率和流动贷款利率指标对金融脆弱性有较大的显著性。贷款增长率与脆弱性程度成负相关，即贷款增长率越高，金融体系越稳定。贷款利率与金融体系脆弱性成正相关，这可以通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来解释。其他金融变量除储蓄存款增长率之外，在不同的回归方程中有些变量效果比较显著，但总体说来都没能通过检验，这说明我国金融变量相对而言对金融脆弱性存在一定影响，但是并不强。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M2/外汇储备、储蓄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1年期流动贷款利率、1年期实际储蓄存款利率、存贷款利差、汇率变化、 $\Delta V2$ 等金融变量与整个金融体系脆弱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而在我国实证分析中并没有得到显著性结论。关于这种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我国金融经济尚处于转轨阶段，金融活动尚未完全市场化，整个金融体系脆弱性状况主要并不是来自于金融当局和宏观金融变量的影响，更多可能来自于金融经济制度层面。

总的说来，六个方程的回归结果都不理想，其中只有回归方程5和回归方程6中进口增长率、贷款增长率、1年期流动贷款利率、 $\Delta V2$ 等四个变量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比较显著。计量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金融脆弱性状况与宏观经济变量和其他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受外部宏观经济冲击和与银行管理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较少，主要受制于制度等深层次因素的影响。

(三) 银行体系脆弱性决定因素分析

这里一共给出了二组回归分析结果，第一组由13个综合变量和10个综合变量组成，包括全部宏观经济变量和部分金融变量。由表7可知：除Y14外，三种分析方法中几乎所有的指标的方向都是一致的，相同的指标在所有模型中的符号方向一致，就后两个模型而言，两者系数的大小相差不大，相比较而言Probit模型效果更好。这说明我们的模型选择变量是稳定的。当剔除3个变量之后，回归结果表明显著性提高，各变量的符号在不同模型中都一致。经过变量的优化筛选之后，模型效果有所改善。在10个指标中有5个指标的统计量大于1。而最初在13个变量中只有2个变量的统计量大于1。进一步对指标进行优化调整，结果发现在9个指标中有6个变量统计量大于1，而且符号方向都一致。笔者试着进一步调整变量，结果效果不升反降，在7个指标中仅有3个变量统计量大于1，这说明指标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存在一个最优的核心指标集。在上述调整优选过程中，结果表明Y2、Y3、Y5、Y6、Y7、Y8、Y13、Y14等指标对银行脆弱性影响效果比较显著。第二组包括7个最优变量。经过不断的优化选择，笔者挑选了一组最优综合变量，包括4个宏观经济变量和3个金融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所有变量在三种模型中的符号方向都是一致的，这说明变量的选择是稳健的。同时，7个变量的统计量都大于1，说明该组变量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影响比较显著。其中财政赤字/GDP、通货膨胀率、进口增长率、存贷款

表7 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决定因素分析1

	OLS		Logit		Probit		OLS		Logit		Probit	
变量	相关系数	T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t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Y1	-0.094	-0.81	-0.887	-0.94	-0.522	-0.954	-0.02	-0.38	-0.18	-0.50	-0.1	-0.48
Y2	-37.59	-1.3	-392.5	-0.73	-213.6	-0.893	-34.7	-1.54	-221.8	-1.36	-133.	-1.52
Y3	-0.016	-0.17	-0.13	-0.27	-0.075	-0.269	-0.03	-1.03	-0.251	-1.14	-0.15	-1.26
Y4	0.845	0.39	0.285	0.01	1.06	0.112	-0.09	-0.06	-1.558	-0.20	-0.67	-0.14
Y5	-2.273	-1.4	-15.31	-1.30	-9.116	-1.371	-1.47	-1.29	-8.58	-1.30	-5.16	-1.37
Y6	0.022	0.93	0.157	0.84	0.097	0.977	0.01	0.86	0.064	1.05	0.03	1.07
Y7	0.603	1.23	4.48	1.01	2.522	1.109	0.21	1.31	0.52	0.49	0.29	0.52
Y8	0.099	0.12	5.96	0.20	2.28	0.202	0.34	1.16	2.222	1.11	1.27	1.20
Y9	-0.008	-0.23	-0.131	-0.28	-0.06	-0.319						
Y11	-0.051	-0.33	-0.545	-0.65	-0.304	-0.632						
Y12	0.027	0.25	0.043	0.06	0.036	0.109	-0.02	-0.40	-0.16	-0.52	-0.12	-0.72
Y13							-0.10	-0.59	-0.561	-0.69	-0.33	-0.69
Y14	-0.371	-0.36	1.759	0.08	0.096	0.011						
Y15	5.438	0.97	35.34	0.85	21.7	0.926						
	R*2	0.39	Obs	11	Obs	11	R*2	0.39	Obs	11	Obs	11
			with		with				with		with	
			Dep=0		Dep=0				Dep=0		Dep=0	
		2.13	Obs	8	Obs	8		2.13	Obs	8	Obs	8
	D.Wt		with		with		D.W		with		with	
			Dep=1		Dep=1				Dep=1		Dep=1	

表8 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决定因素分析2

因变量 Z	OLS		Logit		Probit	
变量	相关系数	T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相关系数	Z 统计量
Y2	- 60.21429	- 2.837182	- 675.4557	- 1.596228	- 394.2546	- 1.553116
Y3	- 0.101749	- 2.723559	- 0.944756	- 1.806184	- 0.536453	- 1.886599
Y5	- 1.549573	- 1.837045	- 21.03981	- 1.647337	- 11.78278	- 1.770074
Y6	0.009002	1.256862	0.091639	1.243213	0.050733	1.283152
Y11	0.174759	2.488096	1.276897	1.527927	0.724577	1.615231
Y13	- 0.40955	- 2.08471	- 3.882182	- 1.531789	- 2.206413	- 1.584642
Y15	6.454538	1.875143	81.22935	1.698542	47.02272	1.768861
	R*2	0.457059	Obs with	11	Obs with	11
			Dep=0		Dep=0	
	D.w	1.805925	Obs with	8	Obs with	8
			Dep=1		Dep=1	

利差等变量与银行脆弱性负相关。按照理论和西方研究结果，这些变量与银行脆弱性正相关，而我国却相反，对此种反常结果难以进行合理解释。可能的解释：一是与数据粗糙有关；二是源于中国银行体系的特殊性。现阶段，我国行政金融特征明显的金融体制使得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更多来源于制度层面而不是市场变量和银行业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层面。笔者在实证分析中国不良贷款成因的过程中，就曾注意到中国的不良贷款与自有资本/资产比率呈反向变动，与储蓄存款/资产比率成正相关，这与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都相反，关于这种中国怪现象，有人认为这与中国现有产权制度安排缺陷有关。^{[14] (P113-131)}

三、结论

银行体系稳健与否是事关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就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的测度进行了初步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并运用最小二乘法、Probit模型、Logit模型等三种方法，选用25个指标就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的成因进行了初步的量化分析，结果发现财政赤字/GDP、通货膨胀率、进口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年期流动贷款利率、存贷款利差、 $\Delta V2$ 等几个指标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变量与银行业相关的变量中，就单组的宏观经济变量和银行业变量来说，并不是影响银行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变量是导致银行体系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宏观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综合起来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更加突出和显著，这与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相符合，研究结果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可否认我们的研究局限也相当明显。由于数据和指标选择以及分析方法等多重局限使得总体分析效果不理想。加之中国现阶段处于经济金融转轨阶段，制度因素比市场因素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未能考虑产权制度等制度因素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也使得分析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科学的考察制度因素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是今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衷心感谢南开大学伍志文博士对本文的帮助，在数据的搜集、整理、指标调试做了大量工作，当然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 [1] 欧文·伊文斯等. 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宏观审慎指标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
- [2] 陈华, 伍志文. 银行体系脆弱性: 理论及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 (9).
- [3] 黄金老.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 [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
- [4] 陈华. 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 [D]. 苏州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责任编辑: 黄振荣

我国银行贷款利率的结构性分析

◎ 顾海兵 石红艳 刘玮

[摘要] 我国目前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分割的资金市场。从表面看,两个市场上的资金价格,即正规的银行利率(简称官方利率)和非正规的民间利率,差别很大。而本文通过分析得出:由于金融管制等因素的存在,企业要从银行获得贷款,需支付高昂的寻租成本与时间成本,银行贷款的完全成本和民间利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民间融资合法化的逐步实现,银行贷款的完全成本和民间利率最终会统一为真正的市场利率。

[关键词] 银行贷款 完全成本 官方利率 民间利率

(中图分类号) F8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62-04

政府的金融管制使我国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相互分割的资金市场。体制内的资金市场是指官方许可的以银行为中介和中心的信贷市场,即所谓的正规金融市场。体制外的资金市场是指草根性质的民间金融市场,由于没有得到官方法律的允许,属于非正规金融的范畴。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利率分别作为两种市场资金的价格,其差别一直以来都是显而易见的。目前,一年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为5.58%(具体操作是有浮动的),^①而民间利率(1年期,下同)一直在15%左右。^②从表面的价格看,二者差别很大,似乎表明体制内资金市场和体制外资金市场是非均衡的。但是,若进一步分析两种价格的具体构成,结果却并不尽然。

一、银行贷款的完全成本

(一) 银行贷款的显性成本——官定的银行贷款利率

银行贷款利率由存款利率和存贷差两个部分组成。

1. 存款利率,这是银行的融资成本。目前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2.25%,这是国家规定的基准利率,各商业银行可以此为上限进行自主浮动。

2. 银行的存贷差。这部分是银行作为资金市场的中介机构,为资金的需求方提供资金服务所获得的毛收入。存贷差又可以分为:(1)银行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银行工作人员的报酬、办公设施等成本的摊销、税收以及其他成本支出,这部分所占的比例大致可以通过银行年成本/年贷款数量计算出来。(2)银行的收益。这部分包括风险贴水或各种准备金(呆坏账准备金、投资风险准备金)、期望盈利等(为了理论的需要,这里没有采用会计分类方法)。

从贷款人的角度看,银行贷款利率仅仅是资金的名义价格,即企业和个人作为贷款人取得贷款所需要支付的显性成本。为了得到贷款,融资者在付出显性成本之外,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隐性成本。

(二) 银行贷款的隐性成本——贷款的寻租成本和时间成本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金始终是高度稀缺的,而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企业和个人对于资金的庞大需求。由于金融管制的存在,银行垄断了资金的配置权力。在资金供给垄断、而资金需求又远远大

作者简介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石红艳、刘玮,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博士生(北京,100872)。

① 文中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www.pbc.gov.cn。

② <http://www.533.com/Article/mrgx/200510/25452.html>。《财经》2005年第1期。

于供给的情况下，一般会导致资金价格上涨，即贷款利率上升，以增加资金供给，减少资金需求，实现银行信贷资金市场的均衡。而长期以来，银行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规制的，各商业银行只有有限的自主浮动权力。在这种金融管制情况下，作为贷款人的企业和个人为了得到银行贷款，除了付出规定的贷款利率之外，还必须通过请吃请玩、送红包、给回扣等多种方式向银行负责人和信贷人员支付所谓的寻租成本，而银行也可以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手中的资金配置设租。

根据对全国若干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调研，由于中央银行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50%，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30%，这样，一年期企业贷款和农户贷款利率基本在6%和7%的水平。再加上多种形式的寻租成本（找关系花钱等），企业和农户实际承受的利率大约在15%-16%之间。这才是正规金融市场信贷的真实价格。由此，正规金融价格和民间借贷价格接近。种种经验证据表明：两个市场之间是均衡的。另据报道，一些金融诈骗分子为了贷出“不用还”的钱，用于贿赂银行官员的钱数甚至已经达到了贷款总额的30%左右。^①

另外，从银行获取贷款所需的较长时间也是一项重要的隐性成本（包括时间推迟带来的贷款项目的机会成本与跑贷款的人工成本）。银行贷款审批程序繁杂、办事比较拖拉、操作周期长，从银行得到贷款一般最少需要1-2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是3-6个月，长的则以年为单位，不利于项目投资和资金周转。尽管融资者本身的资信状况、贷款金额、投资项目、抵押物不同以及审批权上收、贷款更加保守，贷款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也不乏部分银行人员主观上以拖延来设租的因素，送钱送物，多送就先办、快办，不送、少送就后办、缓办，导致了贷款时间成本的高企。相比之下，民间借贷办理速度快、效率高，一笔贷款一般只需1-2天，有的民间借贷只用1-3小时。

（三）对银行贷款完全成本的进一步分析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银行的实际利率由两大部分或四小部分组成，即：

$$R_y = R_1 + R_2 = R_{11} + R_{12} + R_{21} + R_{22}$$

其中， R_y —银行的实际贷款利率，即实际融资成本； R_1 —银行贷款显性成本（银行贷款利率）； R_2 —银行贷款隐性成本； R_{11} —银行的融资成本，即存款利率； R_{12} —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之差； R_{21} —从银行贷款所需花费的寻租成本； R_{22} —贷款所需的时间成本。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以上各种成本占企业实际融资的比例（以一年期为例）。 R_1 、 R_{11} 和 R_{12} 的得出是容易的，分别为5.58%、2.25%和3.33%。而 R_2 、 R_{21} 和 R_{22} 只能根据经验与新闻材料来估计，其中，寻租成本 R_{21} 应不低于7%-8%（查出与没有查出的金融系统的寻租收入或所谓各种好处费与贷款之比，这里的贷款不包括政府指令的必须贷款，是一般的贷款。7%-8%相当于工程中的回扣或提成，应该说是不高的。谢平等的调查说明，企业为获得贷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约在9%，本文为更保险地说明问题取低值）。由于办理贷款所需时间较长而增加的成本 R_{22} 应不低于0.5%-1%（按5%-6%的年平均利润率算，多花1个月就损失0.5%，多花2个月就损失1%）。这样从银行贷款要付出的隐性成本 R_2 应超过8%-8.5%。^②由此，银行贷款的实际利率也即完全成本绝非表面上的5.58%（这只是银行贷款完全成本的一部分），而应超过13%。显然，13%或更高的银行贷款（完全成本）实际利率与10%-15%的民间利率非常接近（与谢平等的调查结论相似。企业为获得贷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约在9%，与贷款利率上限相加，实际利率在15%-16%之间，与民间信贷市场相近。不过谢平等的研究似乎没有考虑时间成本 R_{22} ）。官方和民间两个资金市场虽然价格迥异，但由于金融管制和信用垄断、体制转轨等因素的存在，寻租成本与时间成本潜在地“拔高”了官方市场的资金价格，使得官方和民间两个资金市场实质上形成了均衡。

^①2005年4月15日《市场报》。

^② R_{21} 和 R_{22} 有时成负相关关系，因为一般来说所付出的寻租成本越高，银行办事人员的办事效率也会相应提高，获得贷款的时间就会缩短。

银行信贷中隐性成本 R_2 (特别是 R_{21} , 即寻租成本) 的普遍存在, 大大提高了企业融资的成本, 导致全社会效率的损失, 也使我国的金融管制失效。畸高的 R_2 危害甚巨, 对融资者来说, 它人为地制造了资金的稀缺, 提高了融资成本, 降低了投资效率, 抑制了投资增长; 对银行来说, 高的寻租成本极有可能把好的借款人挤出市场, 而造就低信用和高风险的融资者, 积累金融风险; 对整个社会而言, 它直接造成了储蓄与投资间的差距, 导致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降低了资本流动与资产形成, 最终影响全社会产出水平。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意味着政府实施金融管制的失灵。

二、民间利率

(一) 民间利率结构

相对银行利率, 民间利率的结构也由两部分组成: (1) 没有本金损失风险的情况下让渡资金使用权所能得到的报酬率——无风险资金收益率; (2) 由于让渡资金使用权而面临本金损失的风险需索要的补偿——风险补偿率。一般而言, 民间利率中的这两个部分应该高于银行利率中的相应部分。需要注意的是, 在银行利率中, 存款人得到的报酬率是极低的, 目前仅为2.25% (缴纳利息税后更低), 这主要是因为占主体地位的四大商业银行均为国有, 政府信誉和支持使得银行因呆坏账过多而倒闭的风险极小, 故而存款人本金损失的风险几乎为零, 而贷款损失的风险则由银行承担。

但在民间利率中, 本金损失的风险直接由资金所有者承担 (在这里, 收益和风险补偿是高度相关的)。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部门, 民间金融部门面临更多更大的风险, 因此民间利率结构中风险补偿率较高。根据风险形成原因的不同, 又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

(1) 制度性质的风险补偿率。在我国由于金融领域是政府管制的, 民间金融基本都处于地下, 被定义为“非法”, 既没有被纳入法律监管的范围, 更不受相关法律的保护。政府对民间的金融活动总是不放心, 视之为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的“洪水猛兽”, 总是担心老百姓之间的借贷活动会发生严重的事情, 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提起民间金融, 许多人的思维定势就是金融风险, 想到的就是治理整顿, 因此就要通过国家的权力打击民间金融, 对其加以禁止或取缔。地方政府也往往利用对管辖地国家财产权力的行使侵犯民间金融等。因此, 各种各样民间金融互助会 (如标会、抬会、摇会等) 和私人钱庄的生存就面临着巨大的制度风险, 为生存计, 只有通过向借款人索取较高的利率作为制度性质的风险补偿。在民间金融获得持久确定的产权保护之前, 这部分风险补偿率总是会稳定地存在着。

(2) 借款人的个别风险补偿率。民间借贷活动更多的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 具有某种特殊关系。民间贷款人对借款人有所了解, 但仅限于以往的交往和先验的估计, 准确程度低, 而且不能反映新的变化。一旦将资金借出去, 由于缺乏完善的信息反馈和跟踪系统, 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了解都难以做到, 贷款存在较大的损失风险。加之民间金融部门资本严重缺乏, 贷款一旦损失对贷款人将是致命的, 因而贷款人更是慎重。基于这种考虑, 贷款人会在基本收益的基础上要求个别的风险贴水。因此, 民间利率的组成部分可表示如下:

$R_m = R_1 + R_2$, 其中, R_m —民间贷款利率; R_1 —无风险收益率; R_2 —风险补偿率。又 $R_1 = R_{11} + R_{12}$, $R_2 = R_{21} + R_{22}$, 其中 R_{11} 是民间金融机构融资成本, 主要是吸引存款所付出的利息, R_{12} 是无风险的纯收益率, 是民间金融机构在正常情况下的预期利润率; R_{21} 是制度 (宏观) 风险补偿率, R_{22} 是贷款人个别 (微观) 风险补偿率。与正规金融比较, 差异主要在 R_{11} 与 R_{21} 上。

显然, $R_m = R_1 + R_2 = R_{11} + R_{12} + R_{21} + R_{22}$

(二) 民间利率结构与水平的分析

民间利率中的无风险收益率 R_1 的分析。其中民间金融机构融资成本 R_{11} 应不低于银行存款利率, 同时应不超过1倍的银行存款利率, 大体上在3%-5%或4%; 民间金融机构在正常情况下的预期利润率 R_{12} 可以是全社会或金融行业的平均利润率, 大体可以取5% (2004年全国国有企业与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成

本费用利润率为6.5%，而小企业并不低于大企业。这里取低一点是为了更保险一点)。^①

民间利率中风险补偿率 R_2 的确定比较困难。其中，制度（宏观）风险补偿率 R_{21} 会随着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因民间融资合法化的逐步进行而降低，最终可以降为0；而 R_{22} 除取决于贷款企业的经营状况、资信等级等因素外，还与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了解程度、私人关系、贷款期限、贷款急迫程度等密不可分，因此面对不同借款人， R_{22} 可能会有较大不同。据经验估计，民间金融的不良资产率比较低，估计不会高于5%，可取3%。由此估计 R_{22} 在5%左右或更低一些。由于民间贷款利率在15%左右，我们可以大体估计制度（宏观）风险补偿率 R_{21} 应该在3%左右，即 $R_{21}=R_m-R_{11}-R_{12}-R_{22}=15\%-4\%-5\%-3\%=3\%$ 。

三、未来两种利率的发展趋势

作为一种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金融管制的放开和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存在，会促进官民两种资金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必将使官方利率中的租金减少甚至消失，另一方面也使民间利率中的制度性风险补偿率消失，竞争的最终结果是资金两种价格的融合并形成真正统一、透明的、由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补偿率组成的市场化利率。这不仅减少了腐败，也直接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提高了社会效率。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目前银行贷款利率的上限已全部放开（信用社除外），从市场运行的实际结果来看，大部分银行的贷款利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上浮。这对资金价格有着积极影响，一方面，贷款利率的上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市场资金供需缺口的矛盾，使资金的价格更加体现了市场供需状况和不同贷款的风险补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使资金的部分隐性价格显性化，即贷款人原本要支付给银行中某些个人的“好处费”现在部分地变成了上浮的利率。收益部分地从银行的某些个人转移到银行这个组织中。这意味着个人寻租收入的减少，无疑是一种进步。当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银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立之际，现存的银行贷款完全成本中属于隐性成本的部分将完全消失（其中部分会转入显性成本中）。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私人产权逐步得到确认，人们开始越来越客观公正地看待和对待民间金融，而不是一味地以非法的名义对其进行打击和取缔。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首次以官方的名义对民间金融进行了正面的评价：“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对于民间金融，承认其合法地位与对经济的重要作用的第一步，意味着对民间金融“正名”已经“破冰”。随着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渐行渐近，民间利率中制度性质的风险补偿率部分将越来越小，直至消失。

总之，虽然表面看来我国现行官方利率和民间融资利率相差很大，但实际上由于金融管制等的存在，企业要从银行获得贷款，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寻租成本与时间成本，银行贷款的完全成本与民间融资利率基本持平，官方和民间两个资金市场实质上形成了均衡。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民间融资合法化的逐步实现，官方和民间两个资金市场将逐步融合，银行贷款的完全成本中隐性成本将消失，民间融资利率中制度性质的风险补偿率部分也将消失，二者最后会统一为真正的市场利率。

[参考文献]

- [1] 陈学华，杨辉耀，李纲.市场化条件下的利率决定问题 [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 [2] 邹新月，肖国安.我国信贷市场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J]. 湘潭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3）.
- [3] 谢平，陆磊.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体制、行为和机制设计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 [4] 全国工商联等. 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N]. 中华工商时报，2005-02-03.
- [5] 周培胜. 我国信贷市场寻租现状及成因分析 [J]. 金融与经济，1999，（12）.
- [6]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2005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黄振荣

^① 《中国统计摘要——2005》、《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3日。

我国银行存差问题的实证研究(1995-2004年)

——基于银行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分析

◎ 周向雯

[摘要] 自1995年以来,我国银行各项存款大大超过了各项贷款。本文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行为研究我国银行存差现象,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银行存差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经济总量与银行存差现象是高度相关的;银行存差现象虽不能直接确认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弱化,但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 存贷差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8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66-07

银行存差是我国在1979-1983年信贷资金管理制度中,作为控制银行贷款的指标提出的。存款大于贷款是存差,贷款大于存款是贷差。当时,存贷差额有“年末差额”和“年中临时差额”,^[1]其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用我国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余额直接相减得出的数额,称为余额存差或余额贷差;二是用我国银行的当年存款和贷款累计增加额相减得出的数额,称为增加额存差或增加额贷差。本文研究我国银行存差问题,实证分析运用的是第一种方法计算的数据,我国银行即是我国境内的全部银行(含外资银行),其数据来源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统计年鉴和中经网《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一、我国银行存差问题的文献回顾

当前,围绕我国银行存差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资产负债表的不同角度出发,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分析法和间接分析法。

1. 直接分析法是通过对资产负债表中有关项目数量的增减变化研究存贷差的现象,它们包括信贷萎缩论^[2]、被迫储蓄论^[3]、外汇占款假说^[4]、增长运用多元化假说。^[5]信贷萎缩论是从贷款减少角度来分析存贷差的扩大,信贷紧缩的原因是市场约束、政策约束、总需求不足等;被迫储蓄论认为,居民资产结构单一,储蓄只增不减,导致存差扩大;外汇占款假说从外汇占款角度分析存差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贸易长期顺差;资金运用多元论认为,存差是资金运用多元化所致,强调存差存在的合理性。

2. 间接分析法是分析资产负债表中项目大小变化的原因,如黄宪(1996)、周小川(2003)、江其务(2003)、孙工声(2005)等提出的金融深化假说,分析了资产负债表复杂化的国际和国内大背景;黄宪^[6](1996)认为,我国银行在1994年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前,贷款大大超过存款是由于专业银行大量向中央银行借款和外界对银行资金的依赖,以及银行自身缺乏约束所致。我国银行在1994年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以后,其中一条硬性比率、即贷款/存款必须小于或等于75%,存差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江其务^[7](2003)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存差的经济含义,已由传统金融体制下的货币回笼和银根紧缩,转变为市场体制下金融资产多元化和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存差的扩大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和表现;周小川^[8](2003)认为,今非昔比,银行业务品种发生了变化,贷款只是其业务品种之一,存款业务会通过银行体系、保险体系与非银行金融体系等资本市场的各个渠道得到配置;黄正威^[9]、胡海鸥^[10]等提出了制度转轨假说,分析了一级银行体制向二级银行体制转变,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是存差出现的制度背景和条

作者简介 周向雯,广东金融学院金融系(广东 广州,510521)。

件；也有学者提出了外部冲击假说，认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巴塞尔协议等导致信贷约束资产的强化，致使我国银行的存差不断扩大，将存差扩大归于外部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变化；张杰^[10]（2003）提出的存款和资本金共谋的银行特殊资本结构假说，认为存款的功能是将存款看成是资本金，存款是金融风险缓冲器，将存款与所有权结合进行了研究。伍志文^[12]（2004）验证了张杰（2003）提出的“存款和资本金共谋的银行特殊资本结构假说”，认为加快金融深化的进程，有助于缓解我国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趋势。孙工声^[13]（2005）解读了我国银行存差现象，认为存差和银行系统的可用资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金融体系中既有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邮政储蓄机构，也有不吸收公众存款只发放贷款的政策性银行，只有既从社会上吸收存款，又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的存差才称得上真正的存差，仅凭存差现象不能确认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弱化。

二、当前我国银行存差的现状与特征

1. 当前我国银行存差的现状。1994年以前，我国银行业资金配置的普遍状态是贷款大于存款，贷款/存款比率（以后简称存贷比）高达100%-110%。1995年，我国实行资产负债比率管理后，银行业的资金配置开始调整，出现了存款大于贷款，当年存差3324.2亿元。2000年末的各项存款余额为123804.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99371.1亿元，存贷比为80.26%，存差为24433.3亿元。2005年3月末，我国全部银行（含外资银行）本外币并表的各项存款余额为255573.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85461.3亿元，存贷比下降至72.57%，银行的存差高达70112亿元（参见表1）。

表1 我国银行存差数据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 度	存款 余额	贷款 余额	存差或 贷差	存差 增幅	存差占 存款	存贷比	存贷比 比上年	GDP	GDP 增长率
1994	40472.5	40810.1	- 337.6	-	-	100.83	-	46759.4	12.6
1995	53862.2	50538.0	3324.2	-	6.2	93.83	- 7	58478.1	9
1996	68571.2	61152.8	7418.4	123.16	10.81	89.18	- 4.65	67884.6	9.8
1997	82390.3	74914.1	7476.2	0.77	9.1	90.93	1.75	74462.6	8.6
1998	95697.9	86524.1	9173.8	22.71	9.6	90.41	- 0.52	78345.2	7.8
1999	108778.9	93734.3	15044.6	63.99	13.83	86.17	- 4.24	82067.5	7.2
2000	123804.4	99371.1	24433.3	62.41	19.74	80.26	- 5.91	89468.1	8.4
2001	143617.2	112314.7	31302.5	28.11	21.79	78.2	- 2.06	97314.8	7.2
2002	170917.4	131293.9	39623.5	26.58	23.18	76.82	- 1.38	105172.3	8.9
2003	208055.6	158996.2	49059.4	23.81	23.58	76.42	- 0.4	117251.9	10
2004	241424.3	178197.8	63226.5	28.88	26.19	73.81	- 2.61	136515	9.9
2005.3	255573.3	185461.3	70112.0	10.89	27.43	72.57	-	-	-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为贷差。注：GDP按可比价格计算，资料来源于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根据中经网数据中心整理，《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05年5月12日。

2. 当前我国银行存差的特征。(1) 经济总量扩张必然导致企业和居民收入提高，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增加；同时，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规定和满足日常现金需求，所增加的存款必然有一部分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形式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就全国经济而言，2004年末，全国存款余额为241424.3亿元，贷款余额为178197.8亿元，存差为63226.5亿元，存差增幅较上年增长29%，GDP为136515亿元，GDP较上年增长9.9%。(2) 商业银行审慎的经营理念，以及其严格的银行监管制度，必然促使我国银行更加谨慎地进行信贷项目选择，理性地控制信贷投放规模，这些现实或潜在的约束客观上使商业银行的存差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如2004年末，全国存款余额较2003年增长了33368.7亿元，较上年增长16.03%；全国贷款余额较2003年增长了190201.6亿元，较上年增长12.1%；存贷比由2003年的76.42%下降到2004年的73.81%（参见表1）。(3)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银行存差不断扩大。1994年，我国实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之后，出口顺差额开始大幅扩大，外资大流流入，企业在银

行大量结汇，银行从企业买入外汇的同时，增加了企业在银行的存款。1994年银行外汇占款为4481.8亿元，1995年银行外汇占款为6774.5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292.7亿元，1995年我国银行的存差为3324.2亿元，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今。外汇顺差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其余进入了银行资金流。银行外汇占款增多，中央银行购入外汇必须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并最终反映为存款，从而导致银行存差扩大。2004年末，全国进出口总额为95558.1亿元，进出口贸易顺差为2655.7亿元，外汇占款52592.6亿元，而银行新增存款为33368.7亿元（参见表2）。可见，我国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银行存差的扩大。

三、对1995年至2004年我国银行存差的实证分析

（一）制度变迁分析

1. 商业银行存款激励及其行为选择

存款激励是商业银行在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经营机制的激励下选择的存款行为。为了在市场中争取最大的份额，提高其与监管部门的谈判砝码，掩盖其资金头寸的不足，商业银行由“重贷轻存”逐步转为“重存轻贷”。一是存款考核激励，存款实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层层分配计划，人人落实任务与工资、奖金挂钩。年度综合考评时存款指标高于其它业务指标，设置了存款先进奖、余额净增奖、超任务奖、提前完成计划奖、季度攻关奖、业务揽存奖等名目繁多的奖项，激励职工揽存款。二是利差激励。商业银行在系统内设置高的上存利率，鼓励基层行存款上存。基层行也以上存利率较高，收益稳定，上存意愿较强，纷纷将吸收的存款大量通过二级准备金形式集中到其分行和总行。

2. 商业银行贷款约束及其行为选择

贷款约束是商业银行在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经营机制的约束下选择的贷款行为。商业银行为压降不良资产，“慎贷”成为最优行为选择。一是贷款经营策略约束，由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向大中城市、大中型企业、优势地区、优势行业、优势企业集中，限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对于非国家重点项目、行业、地区投入资金较少；二是贷款审批约束，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体制，资金实行全国统一调动，上收经营管理权，并普遍建立以贷款风险评估和控制力为核心内容的信贷风险管理及操作人员行为控制等制度，贷款要经信贷调查员、支行、二级分行、一级分行信贷部门及审贷委员会等层层审批，时滞过长；三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约束，贷款责任制有助于减少不合理贷款的发放，但商业银行普遍实行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信贷资产零风险等一系列约束制度，常见的追究形式有撤职、降级、以资（工资）抵贷、停职收贷等，把员工的切身利益与资产风险挂钩，在防止了不合理贷款的同时，也产生了“慎贷”行为，挫伤了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得他们缺乏对市场开发与创新的热情，从而使得相当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和高技术企业被拒之门外，从而导致信贷的紧缩。

（二）银行行为的实证分析

1. 对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行为分析

（1）我国商业银行行为与存差的相关分析。根据表1，作者运用SPSS11.5统计软件，对我国银行1995年以来的各项存款与存差的相关系数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我国银行存差与各项存款的相关系数高达0.993（相关分析在0.01水平上通过双尾检验，Sig.=0），说明我国银行存差不断扩大与存款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而通过计算我国银行1995年以来的各项贷款与存差的相关系数，我国银行存差与各项贷款的相关系数为0.985（相关分析在0.01水平上通过双尾检验，Sig.=0），说明我国银行存差不断扩大与存款的相关性高于与贷款的相关性；通过计算我国银行存差与各项存贷款的相关度，验证了我国银行存差的存在原因是，信贷紧缩导致市场约束、政策约束、总需求不足等而引起银行的存差；居民被迫储蓄导致居民资产结构单一，储蓄只增不减，从而不断扩大银行存差；存款和资本金共谋，将存款看成是资本金，存款

作为金融风险缓冲器。

表2 我国货币供应量与银行资金运用情况数据表

单位: 亿元

年 份	货币和准 货币(M ₂)	货币 (M ₁)	流通中 现金(M ₀)	进出口 总额	出口 总额	进口 总额	进出口 差额	外汇 占款	有价证券 及投资	金银 占款
1995	60750.5	23987.1	7885.3	23499.9	12451.8	11048.1	1403.7	6774.5	3166.9	12.0
1996	76094.9	28514.8	8802	24133.8	12576.4	11557.4	1019	9578.7	4104.2	12.0
1997	90995.3	34826.3	10177.6	26967.2	15160.7	11806.5	3354.2	13467.2	3671.7	12.0
1998	104498.5	38953.7	11204.2	26849.7	15223.6	11626.1	3597.5	13728.3	8112.2	12.0
1999	119897.9	45837.3	13455.5	29896.2	16159.8	13736.4	2423.4	14792.4	12505.8	12.0
2000	134610.4	53147.2	14652.7	39273.2	20634.4	18638.8	1995.6	14291.1	19651.1	12.0
2001	158301.9	59871.6	15688.8	42183.6	22024.4	20159.2	1865.2	17856.4	23112.7	256
2002	185007	70881.8	17278	51378.2	26947.9	24430.3	2517.6	23223.3	26789.7	337.2
2003	221222.8	84118.6	19746	70483.5	36287.9	34195.6	2092.3	34846.9	30259.5	337.2
2004	253000	96000	21000	95558.1	49106.9	46451.2	2655.7	52592.6	30931.0	608.3

注: 同比增长率是按可比口径计算的。因1992年以前口径与现在不一致, 1993年未计算增长率。1997年初, 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调整, 因此自1997年起的数与历史数据不完全可比。2001年6月起, 已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货币供应量 (M₂), 含在其他存款项内。数据来源: 《中国金融年鉴》与2005年2月5日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 我国中央银行行为与存差的相关关系。根据表2, 作者计算我国1995年以来的货币供应量M₀、M₁、M₂与银行存差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73、0.992、0.991 (相关分析在0.01水平上通过双尾检验, Sig.=0), 说明我国银行存差与货币供应量高度相关。2005年3月末, 我国银行存差已达70112亿元, 存款增量大于贷款增量 (参见表1), 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银行信贷资金不能充分有效地运用, 但从国际经验看,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迅速发展, 会给社会和公众带来财富的增长, 自然产生巨额的资金剩余, 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多为资本输出国的成因所在。而我国目前虽不属发达国家, 但在发展中国家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生产过剩和社会财富也有较大的累积增长, 开始出现了资金剩余的趋势。尤其我国银行在按照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体制下, 加强风险管理、分割融资渠道, 更使银行存差状况扩大。在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发展性的增长过程中, 存贷双增的银行存差的增长模式, 的确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3) 我国银行存差与资金运用的相关关系。根据表2, 作者计算我国银行1995年以来的存差与有价证券及投资、外汇占款、金银占款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3、0.961、0.961 (相关分析在0.01水平上通过双尾检验, Sig.=0), 验证了我国银行存差的外汇占款假说论, 银行存差不断增长, 主要原因是我国贸易长期顺差。

2. 银行存差与我国经济总量的实证分析

(1) 我国经济总量与银行存差的相关分析。根据表1, 作者计算了1995-2004年我国银行存差与全国GDP的相关系数, 结果表明, 我国银行存差与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78 (相关分析在0.01水平上通过双尾检验, Sig.=0), 说明我国银行存差不断扩大与我国的经济总量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见, 经济总量扩张必然导致企业和居民收入提高, 从而带来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增加, 进而影响我国银行存差持续发展。

(2) 我国银行存差与全国不同地区经济总量的相关分析 (有关数据详见附表)。就区域银行而言, 对我国银行存差的分析, 还考虑到地区特点和有别于全国性存差一般分析的特殊情况。作者运用SPSS11.5统计软件, 计算了我国银行1995-2003年存差与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GDP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 银行存差与全国不同地区GDP的高度相关是在2000年以后, 分别为0.596、0.630、0.640、0.613 (参见表3, 相关分析在0.01水平上通过双尾检验)。可见, 我国银行存差占存款余额自2000年突破了20%后, 是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为了进一步考察银行存差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 我对全国各地的存差与当地的GDP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3 全国不同地区1995- 2003年GDP与存差的相关系数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相关系数	0.350	0.479	0.497	0.437	0.414	0.596	0.630	0.640	0.613
Sig值. (双尾检验)	0.058	0.006	0.004	0.014	0.021	0.000	0.000	0.000	0.000

(3) 全国各地的银行存差与当地经济总量的回归分析。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银行存差与GDP的相关分析表明, 各地的相关性检验的显著性强。为此, 作者对1995- 2003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存贷差情况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 进一步证实: 1995年以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存差均有显著的正影响 (参见表4)。

一元回归方程: $\text{存差} = \alpha + \beta \text{GDP}$

回归分析说明: A. F值全部能通过检验, R^2 普遍较大。尽管常数项不能通过 T 检验, 然而GDP的系数均比较显著 (1995年除外)。因此, 作者认为, 1995- 200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 (经济发展水平) 对银行存差有着重要影响, 能较好地解释我国银行存差存在的原因, 就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B. GDP 的系数随时间推移而呈现扩大的趋势, 其显著程度也逐渐升高。同时, R^2 在1995- 2003年间也随时间增长。从以上两点作者认为, GDP对银行存差的解释力度越来越大。C. 回归结果表明, 区域经济总量越大, 其银行存差越大; 相反, 区域经济总量越小, 其银行存差越小。究其原因是: 第一, 银行的存款会因货物交易和资金调拨在地区间流动, 导致资金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 第二, 全国性的银行从各地分支机构统筹资金使用, 实现了资金使用的规模效应; 第三, 资本市场活跃的地区依靠地利实现多元化融资, 分流了部分贷款需求。

表4 1995- 2003年全国各地存差与当地经济总量回归分析计算表

年份	R^2	F值	常数项		系数	
			α	T 检验	β	T 检验
1995	0.123	3.917	- 148.241	- 1.185	0.103	1.979
1996	0.229	8.624	- 225.922	- 1.401	0.172	2.937
1997	0.247	9.505	- 561.726	- 1.537	0.362	3.083
1998	0.191	6.864	- 214.936	- 0.937	0.179	2.620
1999	0.172	6.004	- 190.003	- 0.746	0.175	2.450
2000	0.355	15.975	- 150.314	- 0.768	0.196	3.997
2001	0.397	19.108	- 202.140	- 0.884	0.228	4.371
2002	0.409	20.095	- 188.848	- 0.707	0.247	4.483
2003	0.375	17.418	- 10.9703	- 0.350	0.233	4.174

四、研究结论

1. 银行存差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我国银行巨额存差, 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在扩大内需、保持货币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末, 银行的有价证券投资 and 外汇占款的资金分别为30391.0亿元和52592.6亿元, 存差资金为63226.5亿元, 银行存差资金提供了72.12%的支持, 有效地减少了中央银行的货币 (M_0) 发行,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维护了我国币值稳定。毕竟, 我国银行的资金来源是各项存款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 (M_0)。存差一旦减少, 就要增加货币发行, 前面研究表明, 我国银行存差与 M_0 的相关系数为0.973。可见, 如果没有63226.5亿元的巨额存差资金,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收购外汇储备的资金, 就只有依靠中央银行货币 (M_0) 发行, 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无论是缩减外汇储备还是压缩国债发行规模, 都将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我国银行存差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

2. 银行存差现象不能直接确认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弱化。银行存差不断扩大, 并不代表银行贷款

不积极。真正决定银行贷款能力的不是存差，而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即使商业银行有存差，但如果没有超额存款准备金，一样无法发放贷款。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超过法定准备金以外的储备，表现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存款和库存现金。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要在满足日常结算和维持流动性的情况下，才能贷款，增加存款的供给。通过计算，我国银行存差与经济总量高度相关，验证了我国银行存差的存在原因，回归分析进一步说明了银行存差与经济总量的显著关系。

3. 经济总量与银行存差现象是高度相关的，并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银行存差不断扩大与我国的经济总量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0.978)，经济总量扩张必然导致企业和居民收入提高，从而带来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增加，进而影响我国银行存差持续发展。目前，我国虽不属于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开始出现了资金剩余的趋势。尤其在我国的金融业按照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体制下，加强风险管理、分割融资渠道，更使银行存差状况扩展。在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复杂性的增长过程中，存贷双增的银行存差的增长模式的确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所出现的大额顺差，导致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货币供给和货币投放，这些现象也是中央银行不易控制的。

五、政策建议

尽管决定我国银行存差的主要因素是客观的，但也决不能忽视金融支持经济的主观能动性。就中央银行与地方政府而言，要坚持不懈地探索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扩大有效信贷投放，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推进信用建设，倡导银企合作。

1. 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引导银行扩大有效信贷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并要着力改进金融服务。一要增加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三农”、再就业、助学、消费信贷等领域的信贷投放；二要做好资金结算服务工作，为经济金融发展提供畅通的资金往来通道；三要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完善银行授信信息的共享机制，降低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成本；四要加强货币市场的属地监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避免银行资金过多流入货币市场造成信贷供给能力不足的情况发生。

2. 积极创新和推广信贷产品，拓宽银行增加有效信贷投入的途径。一要建立和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理念，开发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信贷产品，有效适应客户全方位的融资和金融服务需求；二要促进银行建立符合实际的贷款审批、授权制度，完善信贷经营管理机制；三要做好信贷审批制度调整的利弊分析，收权要考虑到可能的效率损失，放权要考虑到可能的风险暴露，力争达到风险控制与效率提高之间的平衡。

3. 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调节既要加强协调和信息交流功能，还要考虑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外汇管理体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一要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二要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对人民币流出入量、洗黑钱、资本外逃等因素作为人民币供应量的一个重要变数而纳入货币供应调节的范畴；三要与银监、证监、保监部门保持政策的协调。中央银行虽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位置有所提高和超脱，但需要有关监管和政府部门协调、沟通、配合和支持。若中央银行把自己定位于局外人或“独臂人”的角色，必然会使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量调控效应大打折扣。

4. 积极推进信用建设，塑造信用社会，为银行放贷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一是银行与地方政府联手共进，共享信息资源，强化公民的诚实守信观念，增强企业与政府信用意识。二是尽快建立当地个人征信系统，建立个人信用信息档案，实现社会信息资源共享互用，杜绝企业、个人多头开户、多头抵押贷款的渠道，防范信贷风险。三是降低银行评估成本，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大力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维护银行合法权益。

5. 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倡导银企合作。通过大力倡导银企合作，降低企业的经营资金成本，确保银行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尚福林. 中国货币信贷政策与制度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5.
- [2] 钱小安. 信贷紧缩、银行重组与金融发展 [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
- [3] 武士国. 对当前金融监管存差问题的几点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 1995, (9).
- [4] 张新泽. 存差误解和贷款增长[J]. 经济研究, 1999, (11).
- [5] 韩军. 我国银行存差现状及其原因分析[J]. 统计研究, 2002, (11).
- [6] 黄宪. 中国国有银行业资金配置分析研究报告[J]. 国际金融研究, 1996, (5).
- [7] 江其务. 关于中国金融系统“存差”的金融分析[J]. 财贸经济, 2003, (3).
- [8] 周小川. 详解金融难题: 高额储蓄如何消化[J]. 国际金融报, 2003-03-27.
- [9] 黄正威. 理性认识银行存差现象[J]. 江苏经济, 2003, (3).
- [10] 胡海鹰. 存差概念应当淡出我国金融理论和实践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2, (7).
- [11] 张杰. 国有银行的存差: 逻辑与性质[J]. 金融研究, 2003, (6).
- [12] 伍志文等. 我国银行存差扩大成因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 2004, (4).
- [13] 孙工声. 关于银行存差现象的分析报告[J]. 中国金融, 2005, (14).

责任编辑: 黄振荣

附表 1995—2003 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存贷差基本情况

单位: 亿元

地区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北京市	1493.53	1972.19	2559.19	3243.02	3726.69	2929.47	3165.45	4002.72	4570.65
天津市	-85.98	-76.15	80.64	178.1	100.95	259.99	174.5	258.25	212.18
河北省	116.44	264.71	218.96	234.91	473.69	847.04	954.83	1055.21	1418.62
山西省	-27.66	32.1	148.07	199.84	336.27	309.2	460.42	546.17	736.79
内蒙古	-274.55	-328.48	-372.88	-378.34	-103.57	-98.18	-12.68	29.74	69.35
辽宁省	-386.13	-237.73	-438.74	-354.64	-67.59	245.54	332.87	511.3	582.27
吉林省	-511.61	-571.01	-706.79	-773.27	-837.05	-558.38	-557.42	-461.29	-300.2
黑龙江	-300.5	-176.5	-167.2	-208.5	-368.9	15.64	75.84	236.54	401.52
上海市	669.43	1018.32	1838.35	1335.72	818.26	848.65	764.29	1088.79	1793.5
江苏省	414.73	558.66	629.79	866.68	1291.49	1744.45	1948.81	2359	2615.86
浙江省	313.53	548.47	652.63	916.26	1097.61	1308.68	1348.23	1551.81	1419.72
安徽省	-260.4	-226.66	-323.1	-297.71	-317.56	-99.97	13.79	189.53	456.89
福建省	275.05	433.92	544.99	614.52	474.75	482.13	611.65	828.52	973.44
江西省	-169.66	-181.41	-209.99	-129.94	-36.45	86.99	217.24	349.45	434.66
山东省	295.48	613.6	470.91	648.69	354.23	684.02	765.06	958.35	1217.09
河南省	-185.06	-169.65	-339.33	84.39	-330.71	62.63	206.27	359.62	549.37
湖北省	-424.81	-526.4	-710.7	-843.14	-626.81	-201.18	12.6	215.93	398.15
湖南省	-113.47	-91.48	-135.81	-120.37	-95.34	221.43	228.36	292.68	393.57
广东省	1142.17	2137.27	6991.44	2640.96	3048.87	3198.2	4524.98	5350.78	6296.56
广西区	96.65	157.76	145.35	275.61	286.46	576.6	618.68	682.34	217.12
海南省	-34.8	-32	-61.38	-30.15	-4.9	118.4	132.8	162	882.19
四川省	-316.21	-287.92	-211.83	175.88	-238.58	226.77	462.22	570.02	67.36
贵州省	-35.2	24.25	-49.08	-25.2	2.61	-1.53	50.38	73.05	488.87
云南省	152.28	221.1	241.84	266.49	256.09	294.61	376.74	460.88	173.4
西藏	19.38	26.07	21.91	31.29	51.29	60.49	111.87	158.04	692.58
陕西省	-128.63	-36.79	-30.64	-7.8	3.2	263.55	394.73	540.48	276.41
甘肃省	-83.3	-62.06	-111.43	-116.89	125.28	181.49	263.12	242.3	-33.79
青海省	-92.34	-116.87	-69.18	-67.97	-48.78	-68.43	-47.65	-23.83	24.81
宁夏	-27.19	-20.34	-15.68	-22.29	-9.68	-1.49	8.98	26.76	362.04
新疆	-52.42	-47.31	-56.39	-29.42	140.84	315.14	263.82	278.39	362.04
重庆市	—	-149.53	-166.53	-179.21	-73.12	164.2	200.03	302.85	391.66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我国银行存差问题的分析和对策》,《金融研究报告》2004年第40期(总第787期)。

•政治学•

“政治与行政二分”命题的组织整合理论解析*

——兼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国化与科学化的途径

◎ 李习彬

[摘要] “政治与行政二分”是公共行政学科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但学界对它一直存有争议,甚至有完全否定的主张。本文首先运用组织整合理论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命题进行剖析,给出更为完整的表述,指出这一命题不仅不是虚幻的,而且是所有民主政治共有的本质属性,并进一步揭示这一命题对促进我国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通过剖析这一命题,本文展示了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国化与科学化的途径,最后提出了运用组织整合理论促进公共管理学科中国化与科学化的总体思路。

[关键词] 政治与行政二分 组织整合理论 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国化与科学化 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73-06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与行政二分”,首先由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提出,随后由弗兰克·J. 古德诺 (Frank J. Goodnow) 进行了充分阐述。^{[1] [P10-11]} “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提出使得公共行政(学科)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建立了独立的学科,因此,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成为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2] 然而,现实世界中行政部门不仅具有政策执行功能,而且还有非常广泛的政策制定功能,因此,对这一基本命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甚至存在完全否定的主张,认为“政治与行政二分”是“虚幻和值得怀疑的”,^[3] “政治与行政二分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4]

在我国,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命题的争论情况与国外(西方发达国家)大致相同,这与我国目前公共行政学科——或者更一般地称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状况是一致的。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还处于引进、消化和吸收阶段”,^[5] 争论的基本命题从国外搬来,争论的内容也同国外大同小异,而未顾及我国与国外公共行政所面临问题的重大、甚至根本性不同,这说明了公共管理学科的中国化远未完成。

“公共管理是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宗旨的应用学科,因此,其内容与曾经历或正面对的公共问题密切相关。发端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公共管理,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清晰地带着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演变的痕迹。”^[6] 国外关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的争议,虽然由于学科理论根基的缺陷而存在命题表述的科学性、准确性不够充分等问题,但由于这种争议与实践中的问题密切相连,因此在实践层面基本上有益无害,且能够推动学科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由于与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所面临问题存在着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差异,争论的基本命题、特别是争论的内容和视角也从国外搬来,那么这种争论不但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无益,甚至可能有害。

那么,如何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化?我们知道,“管理总是要通过组织,而管理的本质是通过组织整合以求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之功效’”,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对社会系统组织整合规律认识的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70573026)。

作者简介 李习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组织整合理论，是整个管理学（包括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9]基于此，本文首先运用组织整合理论的两个分支理论（三层设计理论与三元整合理论）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命题进行剖析，给出这一命题更完整、更准确的表述，揭示其对促进中国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另一目的，是以“政治与行政二分”命题的剖析为例，展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中国化与科学化的途径。在文章最后还提出了运用组织整合理论来促进公共管理中国化、科学化的总体思路。

二、“政治与行政二分”的三层设计理论解析

威尔逊等在基于改进政府管理的实际需要而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时，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前提：西方国家早已实现了国家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相分离以及由此而来的机构分设。后人在争论“政治与行政二分”时忽略了这个大前提，故而陷入了莫衷一是的争论。只有将“政治与行政二分”与国家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相分离、进而机构分设放在一起讨论，才能把握“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要义。这种将一个问题（对象系统）与其大环境关联起来考察的方法，就是现代系统方法论——管理组织三层设计理论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层设计理论将组织整合状态分为三个层次：决定管理职能和总体权力格局的管理体制，为实现管理职能提供组织保证的机构设置，为管理职能落到实处提供操作规则的运行机制。^[7]从三层设计理论的角度审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完整内容实际上也包含三个层次：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职能分离，机构分设属于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层次，而以行政的价值中立（value-free）^[8]为核心内容的狭义“政治与行政二分”，则属于运行机制层次。价值中立的原则，强调的是行政机构应原原本本地执行政治系统制定的法律政策，而不应该像“政党分肥制”那样再掺杂执政党或某一利益集团的私利。这与其后韦伯科层制所强调的行政机构应该以法理权威为基础、一切遵照非人格化的规程办事，以及我们现在强调的依法行政，都是同一个意思。

由于威尔逊和古德诺在提出和阐述“政治与行政二分”时，政治与行政职能分离、机构分设是作为大前提给定的，故他们仅强调了价值中立的运行层面。实际上，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职能分离、机构分设较行政系统运作的价值中立、依法行政更为基础、更为根本，没有职能分离、机构分设的基础，价值中立、依法行政的运行机制就不可能完善和真正实现。

国家的政治职能（核心是立法职能）与行政职能相分离、机构分设，进而行政机构依法行政，是现代民主体制的根本特征和共性，这也是由民主体制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和运作的信念基础是“君权神授”，最高统治者权力是一切公共权力的本源，既是法律制定者，又是最高行政长官，政治与行政不分——政治与行政职能不分、机构不分，所谓法律只不过是统治的辅助工具，整个国家机器基本上都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官位由最高统治者赏赐并绝对服从其个人的意志和指令，因此必然是人治。民主体制的信念基础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建立了明确地表达民情民意、制定法律政策、选择行政官员、由公民（这是一切社会权力的本源）向公共机构授权的政治系统，将原来与行政混为一体的政治从最高统治者那里剥离出来，还权于民众。人民要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必然建立由自己或其代表决定国家大事（重大决策）的政治系统，而政治系统决策的执行（行政）只能通过代理人来完成，这就决定了民主国家必然实行政治与行政职能分离以及机构的分设。而要约束代理人，使其忠实地执行代表了大多数公民意志和利益的政治决策，必然演变出要求行政系统原原本本地执行法律而不是为某一利益集团或政党谋私利的“价值中立”原则，这与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提出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在本质上完全相同。国家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相分离、机构分设，进而行政机构依法行政，这是一切民主政治体制的共性。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复杂，市场失灵的出现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得资本主义初期确立的政府仅仅作为“守夜人”的角色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政府需要承担更为积极

的角色。政府主动干预社会与经济决策必然带有政治色彩，这就是一些人否定“政治与行政二分”合理性与真实性的原因。但是，从三层设计理论角度分析，政府对社会与经济决策的主动干预，并没有动摇国家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相分离和机构分设的根本基础，也没有改变政府必须依法行政的运行规则。因此，“政治与行政二分”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而且是民主体制的本质属性。

政治与行政二分绝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行政脱离政治，从其三个层面的完整含义和实践效果来看，恰恰相反，它所强调的并在实践中实现的是政治牢牢地主导着行政，行政权力受到了政治系统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并因此也才使国家运行逐步走上法治的轨道。不同公共权力的职能分离、机构分设、独立运行，并在宪法理性基础上合理、有效地整合，从而实现了“1+1>2”的整体功能，在专制体制不可比拟的层次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三、“政治与行政二分”的三元整合理论解析

上面运用三层设计理论，从管理体制、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三个层次上揭示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性区别，展现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刻的涵义。这里运用三元整合理论，^[7] 从社会系统组织整合途径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所表征的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的区别，做出另外的分析与描述。

三元整合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任何社会系统都是通过集中控制行为、规范行为与子系统自主行为这三种基本（元）整合方式（或称元整合行为）及其组合进行组织整合。这里的“控制”作广义理解，任何有目的的试图影响对象系统状态变化的主动作用，都称为控制。所谓集中控制行为，是指系统的管理者做出决策并组织实施的行为。这里的规范也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笔者将它作为社会系统科学的一个基础概念。一定的社会系统（组织、群体）中，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受其约束的行为准则或规定均为规范。子系统自主行为，是子系统之间自主做出的以相互配合实现协调（整合）为目的的行为，是子系统根据自身及其环境的具体情况作出决策并组织实施的行为，或是依照自身的规范而发生的行为。

三元整合理论以三种元整合行为作为基本变量来描述社会系统的组织整合状态，认为任何社会系统中三种元整合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不同体制中三者的具体内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所谓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三种元整合方式的内容调整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重新设计。

运用三元整合理论可以看出，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所表征的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在国家的行政权力来源与结构、基础整合行为、三元行为之间的派生与制约关系等组织整合的基本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区别，如表1所示。

表1 三元整合理论框架下的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对比

视角	对比项	专制体制	民主体制
整合总体特征及三元行为特征	权力来源	“君权神授”，社会上的一切权力为君权恩赐	“天赋人权”，公民权利（私权）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政府公共权力由私权转让授予而来
	权力结构	单一的自上而下授权的行政系统	公民向政府授权的政治系统和自上而下授权的行政系统首尾相接，形成闭合的权力系统
	法律规范的产生与作用	法律规范由集中控制行为产生 法律规范作为政府统治社会的集中控制的一种辅助手段	法律规范由公民自主行为整合产生，为全社会提供行为准则，特别注重约束政府的集中控制行为
	基础整合行为（治理特征）	集中控制行为（人治，即基于政府集中控制的治理结构）	规范行为（法治，即基于法律规范的治理结构）
三元行为的相互关系	集中控制和规范的关系 权与法的关系	集中控制为主、规范为辅 权>法	集中控制以法律规范为依据（基于规范的集中控制，即依法行政） 法>权
	公民自主行为和法律规范的关系	公民自主行为受法制规范约束	规范由公民自主行为整合产生 公民自主行为受法治规范保护和约束
	公民自主行为和政府集中控制的关系	政府权力无限，可以对公民任意役使，而公民只能在政府集中控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政府集中控制为公民提供服务

从三元整合理论视角看，不同体制中三元行为的具体内容和它们之间关系的不同，决定了社会系统在不同体制下具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稳定性和发展特性。比如，民主体制下，根据法定规则和程序周期性进行的公民（自主行为）向政府（集中控制行为）的授权，即公共权力岗位和关键行政岗位的任期制和竞选制，不仅打断了专制体制下任职者长期执政中难以避免的腐败累积，而且使每一次换届选举都成为一次全民性的现有公共政策检验评估和公共政策创新与再选择的机会。民主体制的这种公共政策创新机制，使社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避免了专制体制下难以避免的公共政策僵化、社会矛盾积累和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与大破坏（历史周期律）。如果用我国当前流行的术语来表述，民主体制是建设真正的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的必要前提。

四、“政治与行政二分”的中国化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宪法的规定看，其基本特征无疑也是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职能分离、机构分设，再加上“依法治国”基本运行机制的规定，与运用三层设计理论广义理解和解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架构下的民主政治体制完全相同。从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相应级别的重大决策事宜、包括选举国家机关的领导人这些基本规定看，与运用三元整合理论解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架构下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整合特征（治理结构）完全相同。这就是说，无论是从三层设计理论视角还是从三元整合理论视角分析，我国由宪法表述的政体，都与“政治与行政二分”架构下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完全相同。

从三层设计理论角度看，“政治与行政二分”的三个层次之中，首先是国家的政治与行政职能分离，即政治职能应该由公民或其代表履行，否则国家政治与行政机构的分设只能是形式，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也决不可能真正落实。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使人民代表大会能够真正地履行其宪法规定的职能。

从三元整合理论角度看，我国现实政治与行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由公民自主行为产生法律政策规范这一基础整合中，公民民主参与的普遍性、广泛性、真实性和深度远远不够，基于法律规范的治理结构、即法律大于权力的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建立；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或其代表（自主行为）选择行政权力执掌者（集中控制）并向其授权的国家权力结构，也未能充分实现。

“政治与行政二分”描述了社会总体治理中存在着两个系统：一个是由公民直接或通过其代表进行民主决策并向政府授权的政治系统，一个是执行上述民主决策的上级指挥下级、自上而下授权的行政系统；公民既是政治系统向政府授权的始端（权力之源），同时又是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最终对象（行政系统的末端），两个系统首尾相接，形成闭合的权力系统。运用三元整合理论，可以对这两个系统的功能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每个系统运作内容和基本规则，进行系统化的完整描述。

运用三元整合理论剖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最初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无疑是一种完全形态的现代民主制度。^[9]“政治与行政二分”和民主集中制都是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概括，只不过两者提取的特征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其中存在着明确划分、独立运作的两个系统——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而后者所关注的则是这两个系统最基础的运行机制——政治系统的民主机制和行政系统的集中机制。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整体框架为基础，执政党和国家公共权力机构都由明确划分、独立运作的两个系统——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组成，都实行民主集中制——政治系统以民主制为基础，行政系统以集中制为基础，这种双重“政治与行政二分”、双重民主集中制架构，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建设成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政治文明的体制基础。

五、公共管理学科中国化科学化的基本途径和目标

公共管理是应用学科，中国的公共管理如果不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就根本谈不上科学性。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中国化，是其科学化的必要前提，中国化与科学化密不可分。

公共管理学科中国化科学化的一种基本途径，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公共问题和学科中争论的基本问题，运用组织整合理论进行系统地剖析，使之得到理性升华，并逐渐体系化。运用系统概念描述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形态和演化规律，在当代已被普遍接受，这就是现代系统观和系统方法论。从古代朴素的整体论的形成，到近代形而上学的还原论，到现代的整体论，再到刚刚提出的总体论，^[7]系统观和系统方法论经历了四个里程碑。古代朴素的整体论，认识到了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但不知其细节，人们形象地谓之“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近代还原论，以分析方法为基础，深入到了事物之间的具体联系，但又失去了对整体特征的把握，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代整体论，既能深入系统内部了解其细节，又能把握整体特征，达到了“既见树木，也见森林”的境界。而总体论，则在发现社会系统的任何一种组织整合都存在局限性、亦即非完全整合存在的基础上，揭示出多元整合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也就是不仅看到了树木，看到了森林，而且看到了多样化森林共存的生态。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许多研究的科学化水平还停留在朴素的整体论阶段。因此，从系统方法论演化的视角看，公共管理科学化研究中需要实现如下的三个递进层次的转变（或超越）。

（1）开发分析方法，超越朴素的整体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科学性不足的首要表现，是对许多公共问题的研究，泛泛的规范性描述多，深入的解释性研究少，即只讲应该如何如何（应然），而较少剖析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所以然）。不能从问题的现状、形成的原因、难以解决的症结，到问题解决的对策及其实践可能出现的后果，形成既有事实根据、也有理论依据的严密逻辑体系。只要浏览一下各个时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文章，或是认真分析一下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就不难证实上述判断。这种状况使得学科建设难以深入，许多命题含混模糊，或者似是而非，缺乏操作性，不能有效地指导实际问题的解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研究，即是典型的一例。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的基本组织制度，几十年来研究的文章（还有专著）难以计数，但大多是在未理清民主与集中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忽视民主的本质含义情况下，笼统地谈论民主与集中之间的所谓辩证关系，难以深入。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更基础的一般性理论指导，缺乏将问题引向深入的分析方法。运用三元整合理论，通过分别对政治系统和行政系统的整合机制的具体分析，就可以将研究引向深入。^[9]

组织整合理论将社会系统的管理机构区分为政治与行政两个系统，对社会系统的组织整合划分为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并用集中控制行为、规范行为和子系统自主行为三种基本整合方式描述社会系统的整合状态，这种细划分无疑适应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为社会公共问题的研究从原始的整体性思辨深入到科学的系统分析，提供了理论与方法。

（2）注重组织整合整体特征的提取，超越形而上学的还原论。社会问题往往千头万绪、极其复杂，组织整合理论既提供了通过问题分解将分析引向深入的途径，也提供了绕过具体纷争而直接抓住问题整体特征（要害）的思路。比如关于在许多情况下系统的组织整合状态（组元之间的关联）比组元（素质）自身对系统整体功能的影响更大，系统可能具有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和属性（整体性态涌现）的理论。正如前文指出，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存在的质疑，显然是只关注到行政系统运作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制定具体政策或决策），而忽视了这种灵活处理必须在依法行政的运行机制约束之下，更没有看到民主体制下行政系统运作的大前提是国家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分离、机构分设。不能从整体上把握问题而只关注细节，问题纷争就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甚至常常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3）正视非完全整合的必然存在，超越现代整体论。高度集权的政治与行政体制，以及单一公有制

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产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极端化解读,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由政府组织管理的社会系统整体,只要能够对其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充分地整合,通过“1+1>2”的机制,就能够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并能够最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践证伪了上述理想化的假定。实际上,人类社会,由于人的需求的广泛性、无限性和动态变化,而任何一种系统的整体功能总是有限的,加之组织设计与运行管理中的有限理性,因此可以断定,不可能通过任何单一的组织整合——包括政府管理——满足所有组织成员的所有需求。这样,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整合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对这种关于多元化社会整合必然性与必要性的认识,我们称其为总体论。

运用总体论,可以对现实体制的许多缺陷以及政府决策与政策制定中的一些重大偏差给出新的合理解释,也为政府职能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进而为元政策调整,提供新的思路。

公共管理学科中国化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新的内容体系,它以中国现实所面对的公共问题为研究对象,笔者所构建的具有8个层次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体系¹⁰,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体系;公共管理学科科学化的目标,则是逐步形成一个准公理化的体系。从最近几年研究的情况看,以组织整合理论为基础,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步实现。

[参考文献]

- [1] Frank J. Goodnow.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M]. New York: Macmillan, 1900.
- [2] 陈振明主编. *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3] 转引自黄小勇: 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的新认识. 学习时报网页 (<http://www.studytimes.com.cn/>), 2004-3-25.
- [4] 中国行政管理论坛网页 (<http://www.cpasonline.org.cn/cpasbbs/index.asp>), 2005-5-14 18:36:05 “大河之舞”的帖子.
- [5] 薄贵利. *中国行政学: 问题、挑战与对策* [J]. *中国行政管理*, 1998, (12).
- [6] 李习彬. *公共管理学科建设: 中国化与科学化* [J]. *中国行政管理*, 2002, (10).
- [7] 李习彬, 李亚. *政府管理创新与系统思维*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8] (美) 尼古拉斯·亨利.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第8版) [M]. 张昕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9] 李习彬. 民主集中制的三元整合理论解析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6).
- [10] 李习彬等. *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与系统思维*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雨 童

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背景

◎ 包雅钧

[摘要] 文章在探讨了罗伯特·达尔展开民主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后,说明这种背景导致的方法论变化,并重点分析了达尔本人是如何运用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方法展开研究的,从而向人们展示出达尔民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概貌。

[关键词] 达尔 多元民主 权力 平等 自由 政治科学 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79-06

罗伯特·达尔是当代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多元民主理论在整个20世纪被誉为是组织和解释公共政治生活的唯一正确方法,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1] (P314)]本文主要探讨达尔对民主问题进行思考时展现的方法论特色。重点是考察达尔如何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这两类基本方法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并简要指出对其它方法的运用。当然这得首先了解达尔民主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

一、达尔民主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

达尔学术生涯是从二战结束后开始的。达尔对民主理论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这一时代又是西方历史上,尤其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时代。当时美国正在经历二战所带来的经济繁荣,美国GNP以每年6.9%的速度增长,平均失业率仅为4.6%,最高年份不过6.8%。^[2]但是在其它社会领域,情况并不是一派大好。用亨廷顿的话说是“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民主精神复兴运动”,“抗议的精神、平等的精神、揭露与制止不平等的激情充满着整个大地。”^[3] (P54)]二战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产业结构和阶级状况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改变了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过去他们是上流社会的后备军,现在却可能面临失业,这使他们不得不对现实社会有所思考,对所谓的民主有所思考。而达尔所做的理论基础工作正是这一民主浪潮的缩微。他在思考,什么才是民主?怎样才能实现民主?必须给出一个新的解释。

那个时代正是政治科学尤其是行为主义兴盛并随之发展到后行为主义的时代,达尔对民主理论进行研究,在方法论上鲜明体现了这种时代特色。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是政治哲学的思辨,人们一般认为它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政治哲学特别强调的是价值取向,致力于对历史上的或现实中的或理想的政治体制原则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一个好的政体,引起了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历代思想家的层层思考。这无形中就使人们思虑的重心集中到政体的设计上。为什么有些政治体制是好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优劣何在?这样的问题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色彩。但是基于二战以及战前的经济动乱,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接受了三个方面的革命性因素:一批如韦伯等欧洲有影响的学者来到美国,战争让不同学科的学者共事协作,一些具体的研究项目需要经验资料和专门技术来处理,从而产生了行为主义革命。^[4] (P7)]它的兴起正是对政治学研究传统的抨击。行为主义方法的出现与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有关,政治学者也希望政治学能成为科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对未来进行某种预测。行为主义关注政治生活的现实,关注诸多社会力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它几乎成为政治科学的代名词。

行为主义重视实证分析,一大批理论家以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仅有此并不能完好地解释现实政治生活,尤其是对于政治应该是什么的反思,行为主义科学并不能做出回答。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前面提到的各种现实问题也进行一种价值层面的思考,“反行为主义”也日渐明显。在政治研究中不

作者简介 包雅钧,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32)。

可能排斥价值中立，政治总是和道德伦理交织在一起的，研究政治必须介入政治生活，政治哲学式的思辨依然对学者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人们面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对自由与民主、善与恶的反思，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再者，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式也限制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人们不再去关注希腊民主、自由理想，而只集中在技术手段可行的选民行为、投票、拨款等领域，这是许多政治学者不能接受的。民主问题的研究需要哲学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政治哲学方法也复兴起来，受到学者的重视。而达尔的大量论述之所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把行为主义等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哲学式的思辨结合起来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科学方法

达尔所运用的行为主义科学方法具体是一种什么方法呢？行为主义方法包含了多种流派，如系统论、决策论、沟通论、精英论、权力精英论等等，^{[9] P153-156)} 笔者以为权力分析方法是达尔行为主义方法运用的一个主要体现。

(一) 权力分析方法的理论。权力方法首先体现为一种权力理论。

1. 权力分析方法的简单回顾。权力是政治学古老的核心概念，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现象，而围绕这个核心去分析、了解、把握政治现象则构成了政治学的权力分析方法。^{[9] P204)} 权力分析法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存在二种不同的取向，即抽象的思辨与经验调查之分。以思辨为特征实际上还是一种政治哲学方法，而以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为代表则形成的是一种权力的经验观察与实证分析方法。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生活就是对权力的角逐，这是《君主论》的核心观念之一。而这种方法在近现代则因德国学术大师韦伯而更进一步提升。韦伯主要是引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权力，他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将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权力十分一般的意义即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行为的可能性。^{[7] P264)} 同马基雅维利一样，他把权力看作政治生活的中心，“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总是力图取得权力。”^{[9] P13)} 这种方法给后来美国芝加哥学派带来重大影响，他们试图去阐明权力的背景与实现过程。而达尔的权力分析方法与理论则是在芝加哥学派影响美国政治学、行为主义兴盛时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

2. 达尔的权力概念。达尔的权力分析法是把权力、权威、影响力和控制等名词统称为“影响力术语”来研究的。^{[9] P31)} 他认为，影响力术语是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一方对另一方有影响，导致了对方改变了行动或趋向。他曾写有权力的概念的专门文章，把权力表达为，“A对B拥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能让B去做否则他就不会做的事情。”^{[10] P96)} 他把权力看作是事物变化的一个原因，有明示的和暗含的权力的区别，同时也分析了影响力的形式，如说服、诱导、权力、强制等。并且权力也不是一个硬块，不同的人能拥有不同的权力。这样对权力概念的解释有独到的优点，即扩大了权力持有者量的范围，不同于以往把权力归结为统治者享有的片面模式。那么权力从何而来？根据丹尼斯·朗的研究，权力的基础在于资源，^[11] 达尔列出的权力资源有：个人自己的时间、金钱、信用和对财富的享用权；对信息的控制；尊敬或社会地位；拥有的魅力、声望、合法性、守法性；适合担任公职的权利及团结。^{[11] P148)} 如此看来，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拥有某种权力资源，都拥有某种权力，这就为人际关系定了一个基调，同时也为权力间的制约奠定了基础。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权力分析论上，达尔扩大了政治体系包括的范围，把它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久模式。”^{[9] P18-19)} 这样，像私人俱乐部、商行、工会、宗教组织、公民团体、原始部落、宗族、家庭都被纳入政治体系之中，它们本身成为一个更大政治体系中的子系统。而这些组织又通常是被我们视为社会组织的。因而，在达尔眼中的一些政治系统的权力运作模式即成为我们分析中的社会组织的权力运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权力不仅是政治生活的核心，也是进行政治分析首先要把握的概念。

3. 权力差异的测量。人们总是可以凭借经验观察发现，不同的人其所持有的权力或影响力是不同的，其原因达尔认为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二是个人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与效率，三是个人使用政治资源的动机。^{[9] P47-48)} 但是权力的这种差异是否可以衡量？如何衡量？达尔意识到

这个问题可能是当时的行为主义背景促使的。可是,要衡量就要有衡量的标准、范围与方法。尽管许多学者包括达尔自己也有过尝试,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难以解决。^{[12] P82)}虽然以达尔为首的一些人也提出一种计算权力大小的方法,那就是计算政治实体在议事过程中政治行为者同多数一起投票的次数,谁在投票中经常站在多数一边,谁就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它如何区别立法领袖与一般支持者?这是一个重要的批评。^{[12] P83)}达尔在权力的概念中提出一个公式,用M表示A对a拥有权力,用X表示反应,用W表示手段,则有 $M(A/a=W,X) = P(a,X/A \cdot W) - P(a \cdot X/A \cdot W) = P_1 - P_2$,试图来衡量权力。^{[13] P856)}但是正如罗德里克·马丁所认为的,“不能期望建立一门像经济理论所特有的准确与严密一样的权力关系理论,或者积累内容丰富的统计或文件资料。”^{[14] P78)}

4. 划分政治体制的权力标准。达尔以权力的不同表现方式作为划分政治体制类型的标准。他把权力的行使分为说服、控制、诱导等多种手段,在分析了不同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与差异后认为,不同政治体系分享和行使权力的体制是不同的。^{[9] P103-104)}而公民是否对国家管理施加了权力影响,与是否容忍竞争——让公民所拥有的权力自由地发挥影响,这二者构成了达尔建构多元政治类型的二个主要衡量标准。这是一个新的划分政治体系的标准。大众政制与霸权政制,在影响力形式上的差别就体现在自主与控制、说服与强制、相互控制与单边控制上。^{[9] P107-110)}在多元政治的国家,公民与个人相对于霸权体制下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自主地影响政治生活,这不仅是说他们对于当政者,也是说在他们自己之间的政治生活中。

5. 权力分析与政治人。政治理论离不开对人的关注。人天生是一个政治动物,但是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基础不一。亚里士多德的最初意思是说,人离不开城邦。而在达尔这里,因为权力关系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有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政治,那人当然是政治动物了。人是离不开权力的。可是怎样解释现实中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不一?对于不愿参与政治的无政治阶层的冷漠,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可是与政治阶层积极参与政治相比,这可能归结为六个要素。^{[9] P138)}至于为什么政治阶层中人们权力不对等,那主要是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三个方面的原因。

(二) 权力分析方法的运用。如果说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中提出了一种分析方法后,他自己却没有具体地分析运用,那将是荒谬的。考虑到具体阐述的繁杂性,在这里笔者只能简略地说明,达尔在他的各种著作中大致是如何运用的。《国会与外交政策》^[9]是达尔最早的政治理论作品,在这本书中他首先关注的就是议员们所拥有的三重权力特征,当然这是结合议员们的信念、想法及议会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来谈论的。然后他分析了影响议员决策、发挥权力的种种因素,如交流、获取信息、公众的态度、投票规则及派系等等。接下来他分析的是政党与利益集团及国会与行政机关领导人的影响力。并以此为基础说明议会在对外决策过程中面临既要有效地应对各种问题,又要对选民负起责任以不脱离民主的控制这一困境,最后达尔对一些建议作了评论。这时达尔或许没有形成对权力的一个清楚认识,但他却是以权力为中心进行此项研究的。在他与林德布洛姆合著的《政治、经济与福利》^[9]一书中,则提出理性计算与控制为二种基本的社会过程,然后分析价格体系、官僚体系、多元政治体系与讨价还价体系四种具体技术对这二种社会过程的影响,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这四种技巧,只是运用程度上的差异。对这四种技巧的运用,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更有利于实现人类的目标:经济增长与自由的实现。人类应该逐步完善这四类技术而不应该停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思维上。笔者体会到,这种理性的计算与控制,尤其是控制也是权力的体现方式。人类完善这四种技巧也就是在完善权力的组合、实现方式。人类的福利实质上取决于权力如何使用。因而,权力分析法是这本书暗含的分析方法。在《多元政治》^[12]一书中更是运用了以权力标准来划分政治体制的思想。而在《民主及其批评家》^[18]、《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19]、《民主理论的前言》中,权力也是一个内在的核心分析概念。其主导思想是要阐明人民及组织是否拥有对政治生活最终的控制与决策权,以及如何实现这种权力,最后构建了一种多元权力模型。在关于政治反对派的论述中,达尔关注的也是政治反对派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问题。从这一系列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权力在他整个理论体系中都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眼中,民主首先就是一种权力体系,

是要体现公民影响力的体系，是通过各种国家制度与社会机制来使权力得到合理配置发挥的政治体系。但是正如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的事实是，这种对权力的关注不仅仅是经验层面的，也有哲学上的思辨。这个问题我们在论述政治哲学方法时再来谈。

总体上看，达尔权力分析方法深化了对权力概念的认识，注重经验与实证性的研究，有助于推动权力关系研究。^{[9] P209-216}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注意到，达尔是把权力在政治学中的地位、权力的概念与表现方式、权力关系的结构都作了全面的分析，把权力的经验实证方法与哲学方法统合起来，这确是政治学理论方法的一个进步。达尔的这种权力分析模式最终形成的是多元权力结构模型，这与精英主义的金字塔模式是相对的。达尔的这种分析与伊斯顿等人的系统分析之区别的核心，笔者以为达尔是抓住了政治生活的一个中心，而且有较强的解释力与应用能力，对现实政治有一个指导作用；但是伊斯顿的系统分析虽然也给政治生活一个角度的理解，其指导作用则不太明显。当然达尔所说的权力似乎有内在矛盾之处，如辛阿指出，^{[20] P138}达尔的权力概念没有考虑到，若B是一个弱者也能对A产生影响，因此权力是相互的。而且权力如何衡量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即使能衡量，它在现实中的实际运用程度也是很低的。

三、政治哲学方法

按艾萨克的想法，政治哲学是关注“应然”。^{[21] P4}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达尔早期和晚期都无法驱除价值判断，只不过在晚期表现得更为浓烈。达尔为什么要用上政治哲学的思辨方法？他的哲学思辨大致是如何进行的？他的哲学思辨与先前政治哲人的思辨之关系如何？对于政治哲学方法与政治科学方法他又是如何结合使用的？

（一）哲学的回归。对于政治哲学在20世纪复兴的一般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人们仍然需要有价值追问，科学并不能排斥它，它的存在符合多元性的事物规律。可是达尔在前期作品中主要是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展开研究的。对于政治哲学方法的回归，笔者以为一方面他是受到了当时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学术环境的研究环境的感染，另一方面是他自己完善理论的需要。先前他以科学的方法驳斥了不合时宜的民主理论，并通过经验观察建立了新的民主理论——多元政治与多元主义，可是却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将来的走向如何？人们会问道，现有的民主是否就是最好的？若是，那么如何理解民主下的种种问题？若不是，它就要改进，就要先指明改进的方向，说明民主应该是怎样的。在我看来，正是对为什么我们要民主以及民主应该是如何的思考，使得达尔必须进行逻辑上的思辨。这再次说明了是问题决定方法。

（二）平等的思辨逻辑。达尔主要的价值取向是对平等的倾心。对平等的关注源于他对民主概念的考察。自由平等的口号曾是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主要标志，然而由于二者之间特有的张力，其现实的实现有一个轻重缓急之分。我们无法判断它们价值的高低，但从程序上讲，自由应当先于平等而实现。“自由首先到来，是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如果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22] P403}人们通常认为，在西方历史中，自由基本上是通过一系列古典宪政制度取得了保障。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平等的强烈关怀。而且，“自由的境况一旦刺激了要求平等的欲望，自由的理想便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平等的吸引力则证明更为强大。”^{[23] P404}现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也是针对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受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的威胁而大发感慨的。他关注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社会主要制度即经济结构和主要的经济社会安排来分配基本权利义务，决定利益划分的方式。^{[23] P5}从社会经济安排来讨论不平等问题成为新的切入点。

达尔对平等的关注事实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型。早期他更多地从政治领域来分析，后期则从社会经济领域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论民主》中他对此作了总结。达尔首先从解答一个问题入手，“为什么公民在参与统治时应当被当作平等的个体？第一个原因是，平等的价值无法用理性推导加以证明。”^{[24] P73}“人人生而平等”根本不是对现实的描绘而是一种道德判断，这句话就是说，此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比彼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内在地既不优越也不低劣，因而我们对待每一个人

都应当把他们当作在生命、自由、幸福和其它的一些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拥有同等要求的人来看待。达尔称此为内在平等原则。^[24 P72]这种原则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在伦理和宗教上符合多数人的信念和原则。西方的宗教传统就认为大家都是上帝平等的子民。任何其它的原则都不能取代内在平等原则。内在优越总会导致武力。内在平等可以带来审慎的考虑，政府不会优先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从统治国家的实际操作来看，监护统治面临重重困难，只有让那些自己是遵守法律的人来统治自己。但是为了防止滥用权力，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司法程序。^[24 P82]民主首先要解决的是确保政治上的平等。

那么民主在西方的实现是否就算满足了政治平等呢？“当且仅当对政府决策的操作是这样的为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即每当人们觉察到存在着不同的备选方案而每个成员的偏好在施政方案的敲定之中均被赋予同等的分量时，政治平等的条件才得到满足。”^[25 P50]达尔通过一系列分析后认为平民主义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同样的，麦迪逊式民主在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利之间未找到正确的平衡点，而多数人的统治又是以政治平等为指导思想的。于是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说明政治平等如何得到满足，这就是他程序民主论的产生。然而紧接下来的问题是政治平等与一般平等的关系，人们发现主要是由于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公民实际上的政治不平等。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向往在政治平等上再迈进一步，主要是要在机会与程序上为平等创造条件，这需要在经济社会结构上做出一些改进；二是实质上的政治不平等及一般性不平等可能是永恒的，对此人类似乎还没有办法解决。对于改进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以更进一步地促进平等发展民主，是后期达尔思考的重点。他认为市场经济同民主的结合让双方尝到甜头，但市场经济亦让民主付出了代价。市场经济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妨碍了公民充分的政治平等的实现。^[24 P66]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民社会也有类似的消极后果。在对达尔经济民主理论及多元民主困境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三）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前面第二点已经涉及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基本的自由权利已经得到了落实后，人们才更多地关注平等。人们一般从托克维尔的结论出发，认为平等的扩大会危害自由，即多数的暴政。^[26 P287]我们现在关注平等、希望扩大平等，是否会危及自由？达尔认为，他对平等的关注实际上同先前哲人们关注自由是一脉相承的，他致力于扩大平等并不是对自由漠不关心，而是希望扩大平等时能让自由也扩大一点，至少也不会比今天的自由少。^[19 P4]他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自由理论，是以自由为中心的，“尽管我表面上关心的是政治平等，然而我内在真正关心的还是自由、人的发展、人的价值。”^[18 P323]而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就要求考察平等与自由的关系，说明平等并不一定危害自由。以这样的逻辑，达尔分析了现实中民主国家失败的原因。以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来说，它并不是出于大众民主的原因。^[19 P37]若言民主的扩张、平等的扩大会带来暴政，那么与经验事实也不符。许多民主国家在平等扩大时并没有退回到专制。而从民主退回到专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强烈的不平等的存在。他认为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是农业社会，人人相对在经济地位与实力上比起今天的美国社会要平等一些。达尔得出的结论是，民主下的人们会破坏自由是因为不平等的缘故，不是因为平等太多而破坏自由，恰恰相反，是平等太少了。^[19 P44]托克维尔所担心的民主受损的根本条件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存在的。相反，在美国今天的社会，人们更应该担心民主会受到不平等的损害。当然，托克维尔也认识到，平等与自由是可以调和的，平等自然使人爱好自由制度。^[26 P838]这样，达尔顺利地解决了一个难题，平等的扩大有助于维护自由。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在美国不平等的发展正是自由的结果，我们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减少自由对平等造成的损伤。对于无自由下的不平等，若要解决，那只能是设法先取得自由。对于有自由下的不平等，若要解决，在达尔看来，则需要对社会经济结构作一个改进。它不仅关系到人的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向更平等的目标迈进，还有助于福利的增加。如何改进它理所当然的成为达尔后期思考的重点。

（四）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对于平等的哲学关注与运用权力对现实政治的分析之结合最后形成了著名的达尔多元民主理论。这种结合并不是说达尔在论述每一个问题时都既运用哲学方法也运用科学方法，而是说在不同的问题探索阶段他运用不同的方法。如前所述，运用哲学方法，他解决的是为

什么要有这种民主以及应该如何改进,运用科学方法说明的是现在的民主是什么样的。这样,现实的民主就既满足了价值需求也为进一步的改进提供了空间,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这也是达尔理论受人推崇的原因。事实上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二种不同的分析活动在大多数的研究者那里都不同程度地交叉在一起,兼而有之,其界限不可能绝然地划分清楚。就以前面的权力分析方法来说,达尔内在隐含的意思是对于民主,每一个人都要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同等的权力与影响力,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民主的。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上的价值判断。当然这种交叉并用并不说明二者之间的分量是同等的,就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而言,笔者以为他更多的体现了政治科学分析的色彩。

[参考文献]

- [1] 俞可平. 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 http://gdf.sznews.com/big5/content/2002-04/28/content_841006.htm.
- [3] [法] 米歇尔·克罗齐, [日] 绵贯让治, [美] 亨廷顿. 民主的危机 [M]. 马殿军, 黄素娟, 邓梅译.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9.
- [4] [美] 贝蒂·H·齐斯克. 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 [M]. 北京: 沈阳明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5] 俞可平. 政治与政治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6] 张铭, 严强. 政治学方法论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
- [7] [德] 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下) [M]. 林荣远.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8] [美] 希尔斯曼. 美国是如何治理的 [M]. 曹大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9] [美] 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 [M]. 王沪宁, 陈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10] Leonard Tivey and Anthony Wright, ed..Political Thought Since 1945:Philosophy,Science,Ideology [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2.
- [11] [美] 丹尼斯·郎. 权力论 [M]. 陆震纶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2] [美] 西奥多·A·哥伦比斯, 杰姆斯·H·沃尔夫. 权力与正义 [M]. 白希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 [13] Robert A Dahl. Toward Democracy: A Journey, Reflection:1940- 1997 [M]. Berkeley: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Pr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
- [14] [美] 罗德里克·马丁. 权力社会学 [M]. 陈金岚, 陶远华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 [15] Robert A Dahl.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 [M].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50.
- [16] Robert A Dahl and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Economics And Welfare [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 [17] [美] 道尔 (Robert A Dahl). 多元政治: 参与和反对 [M]. 张明贵译. 台北: 唐山出版社, 1987.
- [18]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 [19]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M].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
- [20] 转引自 [德] 柏伊姆. 当代政治理论 [M]. 李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21] [美] 艾萨克. 政治学——范围与方法 [M]. 郑永年等译.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22] [美] 萨托利. 民主新论 [M]. 冯克利, 阎克文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 [23] [美] 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24] [美] 达尔. 论民主. 李柏光, 林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5] [美] 达尔. 民主理论的前言 [M]. 顾昕, 朱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 [26] [美]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上) [M]. 董果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责任编辑: 雨 童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

◎ 张应祥 蔡 禾

[摘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危机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城市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该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一种全新解读,它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发展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为丰富和发展城市社会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关键词] 新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 城市社会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85-05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马克思等人虽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乡对立及城市阶级斗争进行了论述和总结,但城市问题并不占据中心地位,在他们看来,城市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条件而不是动因。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危机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城市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一、资本主义城市危机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产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一场城市社会危机,这场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中心区的衰败。二战后的四、五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对繁荣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地区普遍经历了扩张和蔓延,郊区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伴随着人口郊区化,工业和许多服务业也随之迁出城市中心区,结果就使得大城市中心区雇佣就业机会减少,税收减少,零售商业和社会服务减少,公共设施和服务下降,这一切均对大城市中心区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城市重构与城市财政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城市的发展日益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影响,工业资本大量从老的工业城市流向新兴的城市化地区,使城市的发展从老工业城市转向了那些过去只经历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兴城市地区。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不仅使老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这些城市的工厂厂房和其它固定资本贬值,城市税收减少,不少城市甚至出现财政危机。可以说,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反之就会一片萧条。许多城市为了争取资本不得不向商业利益屈服,特别是向跨国公司屈服。

第三,城市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不断。作为城市社会危机的具体表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骚乱不断,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反抗运动如火如荼。在欧美城市中,各种社会阶级、社会团体为争夺城市资源和维护各自利益而发生的竞争和冲突,各种罢工和抗议,各种邻里组织的反抗活动等层出不穷。这一切使得城市里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社会冲

作者简介 张应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突和社会运动倍受人们的关注。

面对城市社会里发生的这些变化、冲突和危机，一些学者开始纷纷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试图对城市问题做出新的理论回答，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列菲弗尔 (Henri Lefebvre)、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哈威 (David Harvey) 等。

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主要观点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1. 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与城市空间生产

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城市理论把城市空间当作一种客观、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1] (P339-352)}即城市空间并不是客观、独立的，而是一种社会产物。

那么，作为社会产物的城市空间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资本作用的产物。哈威指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 (build environment)，是包含许多不同空间元素的复杂混合商品，是一系列的物质结构，它包括道路、码头、沟渠、港口、工厂、货栈仓库、下水道、住房、学校教育机构、文化娱乐机构、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公园、停车场等。^{[2] (P15-16)}城市空间组织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建构环境要素混合构成的一种人文物质景观，是人为建构的“第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哈威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为资本的第一循环 (primary circuit)，而资本第一循环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资本过度积累所形成的危机。哈威认为，马克思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存在的这种矛盾和危机，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了应付这种内在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资本主义的应付办法就是当由工业生产中的第一循环产生的危机逼近时，投资转向“第二循环 (secondary circuit)”，即资本投资于城市这个建构环境。总之，城市建构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工业资本利润无情驱动和支配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3] (P178)}

由于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一种在空间背景中生产商品的系统发展到空间本身成为一种商品而被生产的系统，这样一来，城市空间的组织和变化就与资本主义体系有机联系起来。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关心城市空间组织是如何去反映、表达并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在他们看来，城市空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容器”，空间和社会并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社会组织 and 空间过程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为城市空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当资本主义被再生产时，城市空间形式也被再生产；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调整以面对危机作出反应时，其城市空间也将被重构调整。不过，现有的城市空间安排也会约束和塑造资本主义再生产或重构调整的方式，因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或“冻结”在那些已经表达了以前经济活动模式的形式中去了。故当资本主义变化时如果城市空间也发生变化，那么它就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资本主义在一种已有的城市空间布局景观中变化，而这种已有的空间布局是不能简单由一种行动意志所重塑的。索嘉 (Soja, E.) 将其概括为“社会空间辩证法” (social-spatial dialec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是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这种关系同时是社会的又是空间的。’^{[4] (P177)}这种观点认为在划分为统治和剥削阶级的社会结构与划分为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结构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由相同原因引起 (资本主义)，表达了相同的事情，同

时又相互塑造。这种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核心就是“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是社会的物质构成的”。^{[9] P208}在这种观点看来,表现在空间中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必然表达,这种矛盾会受到现有空间安排的调节,并因当前空间模式的惰性与新经济势力之间的紧张而加剧。

2. 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单位与集体消费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日益集中到城市地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也日益集中于此。城市在资本主义系统中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单位。“城市对我而言更直接意味着与劳动力有关的过程,而不是它直接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城市单位因而看起来是伴随生产过程的再生产过程。”^{[9] P236-237}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必需消费品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劳动力再生产是在日常基础(通过现存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代际基础(通过新一代工人取代已有工人的生产)上来完成的。它包括了简单再生产(消费的劳动力再创造)以及扩大再生产(发展新的劳动能力)。这些再生产的实现手段是消费方式——住房和医疗,社会服务和学校,休闲设施及文化娱乐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需要与资本利润最大化需要却存在着矛盾。尽管资本主义体制要求要有充分的劳动力再生产作为其持续生产和积累的先决条件,但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却发现,投资于那些对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的生产越来越无利可图。卡斯特尔以法国住房建筑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在法国,资本发现投资建造低成本的工人阶级住宅毫无利润可图,因此尽管有巨大的需求却很少有企业去投资。^{[9] P149-169}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供给潜在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这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性决定的。因为消费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关注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和交换价值,而劳动力要求的是需要和使用价值,这二者之间很难一致。这就导致了那些对劳动力再生产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巨大消费空白空间,而这些空白的消费品生产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必要的,^{[7] P18}并由此造成了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危机。卡斯特尔对“集体消费”的定义是“问题的特点和规模使得消费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人。”^{[9] P75}集体消费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问题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为住房供给短缺、医疗健康保护不够、社会设施缺乏等方面。城市集体消费危机造成了整个城市社会新的政治紧张并带来新的矛盾和斗争,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被迫干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以试图填补消费空白,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必要消费由国家来负责提供。卡斯特尔认为,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本质上是服务于私人资本的。^{[9] P197}

3. 城市社会的阶级斗争与社会运动

在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伴随着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以及集体消费的出现,城市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也表现出新形式,主要表现为围绕城市建构环境的阶级斗争和集体消费危机引发的城市社会运动。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阶级斗争的焦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工厂车间”斗争,当代的阶级斗争已经超出了工作场所,对城市空间的使用成为城市阶级斗争的重要部分。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使得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负载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矛盾,即为了资本积累、为了剥削劳动力而生产,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就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利润和需要之间的矛盾,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政治表现就是阶级斗争。对资本而言,城市空间的开发意味着红利、租金、利息以及资本的获得;但另一方面,工人是城市空间的消费者。由于资本总想试图使利润最大化,因此工人从资本那里获得的东西就代表了一种“利润的损失”,这样双方在城市空间的使用上就会出现冲突和斗争。由城市空间使用引发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内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阶级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关于生活、居住等生存条件和成本的斗争。围绕着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使用,劳动力、土地资本及租金占有者,以及那些通过生产

这些商品来寻求利润的建筑商三方展开了斗争。〔10〕 P11-12〕

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导致了集体消费问题的政治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政府支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而私人资本获取了这些劳动力创造的利润。换句话说，城市政府为再生产劳动力支付了越来越多的成本，而私人资本却将这些劳动力创造的利润保留在自己手中。其结果是，城市政府在集体消费领域承担的责任越多，增加社会供给越多，政府本身的财政收支就越不平衡，最终导致城市的财政危机。面对财政危机，城市政府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税收，但这种办法是不可行的，因为对资本家征税会削弱私人部门的利润，而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这种征税会使资本逃离，选择其它国家的城市或地区；而对个人征收所得税作用又十分有限，且从长远看会抑制消费而起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在维持重要但又毫无利润可图的公共服务中，其干预的代价就是通货膨胀和日益增长的公共债务。面临着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以及日益加剧的经济衰退，政府的反应就是削减社会开支水平和重新安排资源，从支持劳工转向支持资本。这就导致了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于是就出现了住房短缺、医疗保健极差、学校不够、交通设施很差、文化娱乐设施不够等问题，结果就会出现各种城市反抗运动，于是政府干预消费过程又再现。但这次不同的是，整个消费领域现在已经政治化，国家承担供给社会资源的责任越多，结果日常生活就越政治化。如果说日益增长的集体供给水平的一个功能是满足下层阶级的要求，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供给水平下降所带来的对政府本身的一股更强和更政治化组织的下层阶级的反抗。

卡斯特尔将城市集体消费问题引发的城市社会反抗和斗争称为城市社会运动，在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城市运动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人们的社会利益与其所在社区紧密相联，城市社会运动带有很强的社区性。有关社区公共设施资源的争夺，如住房、学校、医疗保健、交通、环境保护等经常成为城市社会运动的核心内容。例如，卡斯特尔分析了巴黎的住房政策与城市社会运动。在巴黎，政府为了对民众的住房需求做出反应，制定了一个复杂的住房生产和分配体系，住房由此被社会化，成为一种公共服务，这些公房集中在一起成为新的城市组成部分。由于这些住宅区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条件，因而更容易使这里的居民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性，面对城市问题，他们更容易产生共同的保护意识并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社区的利益。在巴黎人们就组织起了租房者工会。卡斯特尔把这种现象称为“集体消费的工联主义”。〔11〕 P94〕卡斯特尔通过对城市社会运动的分析，认为社会运动是对社会统治的反抗，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了主要的影响”。〔11〕 P212-329〕

三、简评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反映了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社会变化的现实，代表了对城市社会的一种全新看法，为理解和分析城市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其突出贡献和特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领域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阶级斗争领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分析的重点是工业领域的生产，并没有关于空间生产及其矛盾的理论，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则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新形势，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及其矛盾进行了开创性分析，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空间分析的空白。在消费方面，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集体消费问题的分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开拓。另外，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城市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矛盾的分析也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

第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丰富和发展城市社会学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受城市社会学主流理论范式——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支配和影响，城市社会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其变迁是一个功能分化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是寻求人口、社会组织、环境以及技术之间的均衡发展过程。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则提出了看待城市问题的全新视角，它认为现代城市屈从于一个更大系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体系包含着内在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些基

本矛盾影响和决定着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城市的发展连接、反映并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城市的变迁是与资本积累、资本循环以及集体消费等资本主义运作过程相联系的，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第三，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现实持批判分析的态度，注重对城市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的考察。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城市是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集中的场所，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城市充满着相互对立的关系和力量，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争夺各种城市资源的斗争场所。他们关注在城市发展和变迁中，谁是受益者，谁的利益被侵害了，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为谁服务等问题。

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其结构决定论。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城市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完全是资本主义“深层次社会力量作用的表现”，完全忽视了人的行动和反应对城市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作用，忽视了每个城市地方独特变量对城市发展和变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后，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又出现了一个转向，即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新城市社会学理论以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为背景和出发点，在此前提下，着重分析城市社会地方变量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以及这些差异性和独特性对城市社会发展和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强调人的行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权力精英或一般市民共同体在影响地方未来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关注。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对于我们看待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启发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很大变化，随着政府经营城市理念的引入，以及城市土地开始实行市场化交易和拍卖，城市建设由原先政府单一投资向多元化主体投资转变，尤其是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进行，房地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资本力量在城市空间的生产及塑造城市建构环境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本造城现象十分明显，伴随着这些进程，城市发展和变迁中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例如围绕商品房这一建构环境的业主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斗争就在很多商品房楼盘中不断出现，围绕着房屋拆迁或征地过程中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对于这些城市社会发展和变迁现象的理解和认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给了我们很好的分析视角，值得国内城市社会学研究者借鉴。

[参考文献]

- [1] Lefebvre, Henri. "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M]. in R. Peet (ed.)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M].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7.
- [2] 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M]. Basil Blackwell, 1985.
- [3] 蔡禾主编，张应祥副主编.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 [4] Soja, E.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0, (70).
- [5] Soja, E. "Regions in Context: Spatiality, Periodicity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Regional Question" [J]. *Society and Space*, 1985, (3).
- [6]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M]. Edward Arnold, 1977.
- [7] Castells, M. *City, Class and Power* [M]. Macmillan, 1978.
- [8] Castells, M. "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 [A]. in C. Pickvance (eds).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M]. London: Tavistock, 1976.
- [9] Saunders, P.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M]. London: Hutchinson, 1986.
- [10] Harvey, D. "Labor, Capital and Class Struggle arou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A]. in Kevin Cox (ed). *Urbanization and Conflict in Market Societies* [M]. Methuen & Co Ltd, 1978.
- [11] Castells, M.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M]. Edward Arnold, 1983.

责任编辑：雨 童

•历史学•

传教士与明清实学思潮

◎ 汪春泓

[摘要] 由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所带入中国的科学理念,深刻影响到明末清初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思维方式,乾嘉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中就包含着这种科学精神的元素,这为推进中国知识界的近代化功不可没。

[关键词] 乾嘉学术 利玛窦 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90-06

读徐宗泽先生1940年编纂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以下简称《译著提要》)一书(中华书局1949年初版,1989年再版),深感利玛窦等传教士1582年从澳门登陆,抵达中国,并通过艰苦的努力,从南北上,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官员交往,应被看作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对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已有精辟的阐述。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明代思想界如何产生冲击和影响,据徐氏此书可以获得多侧面的认识。而该书中探讨历法问题的文章,关乎中国独立的科学精神的建立,也可以看作晚清张之洞“中体西用”观的先声,今天读来仍令人感触良多。

一

学界比较明清学术,“汉宋之争”是老话题,明代承袭宋学,被指责为学风空疏之尤。但是就学术而言,明、清两个朝代即使存在着分水岭,然而就如汉学与宋学一样,总有其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的部分。明清学术在发展过程中有其内在的连续性,譬如就实学而论,明代学者对于清人就有发轫之功(此点胡适早有论及),这主要体现在学术向“汉学”回归和西方科学的输入两个方面。至晚从明中期开始,士人关于性理之学落实于个体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社会虽以圣人为榜样,而实际上超凡入圣可望而不可及,人在实际生活经验里,道德的化身或偶像常常是虚妄的,世人未免陷于信仰危机之中。吴敬梓生于清代康乾之世,但是其《儒林外史》却真实地反映出明代人性观的信任危机(此种危机感是贯通明清两代的),举凡行走于社会者,不管是“怪人门生”,还是“侠客”、“隐士”,各色人等都暴露出严重的人性人格缺陷。在正邪义利之间,人很容易失去方向感,学术之于人性,正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稍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士人都会反省质疑主流学术,于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盛行,但发展至泰州学派以及李贽等人,尤其到其末流,大都走向了王学改良社会人心的反面,狂扫一切的思潮助长了人性的膨胀。既然赞赏人性解放,推崇自我作古,人欲横流便成为社会趋势,学术同样可以六经注我、任意点窜,故招致后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讥评。激于如此学风,士人本希望在学问中安顿身心,心学却使人无所依归,因此反心学的思潮亦随之产生,譬如明末学界巨擘钱谦益,就提倡以正宗的汉代经学来扭转俗学(主要是心学)的流弊。然而他们所标榜的实学不出中国圣贤的范围,其学术路向是进一步返归传统,由唐宋经学上溯至汉儒训诂,此可视为学术丧失规范情况下的内部整肃。钱氏《明士张君文峙墓志铭》赞许张氏“穿穴六经,访求掌故,务为根柢有用之学。”^①其《明都察院左都

作者简介 汪春泓,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御史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李公神道碑》称颂李公：“讲实学，峙实用，办实心，干实事。”⁷¹（卷34）同时代的吴梅村《白东谷诗集序》说白氏“攷实学，修笃行”，⁷²（卷27）而钱氏所谓“根柢有用之学”，大致上意味着转向“汉学”，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在此时已揭开序幕。然而钱谦益辈乞灵于“实学”，却也未能挽救明朝的覆灭。这说明在学术层面上，无论是讲心性，或是直抵孔圣微言大义，无论是复古保守，还是创新立异，对于救亡而言，其成效同样微乎其微。如此“实学”就根本不能满足明亡之后士人的心理需求。这为清代实学有别于明代，埋伏了契机。

二

沈德符《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卷20《历学》中说：“中国历法，本不及外国之精密……自利玛窦入都，号精象数，而士人李之藻等皆受其业。”同书同卷《日食讹谬》记载万历年间日食预报出现误差，时徐光启、李之藻“俱究心历理”，“以及大西洋归化陪臣庞迪我、熊三拔等，俱携有彼国历法诸书”，此辈是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士。徐光启《跋二十五言》说利玛窦进京后“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⁷³徐、李等提议朝廷参照洪武年间译修《西域历法》（“回回历”）事例，译出当时西人所带来的历法等方面的书籍，可惜未得到朝廷的重视。沈氏因此感叹“似此讹舛，不急改订，历律不知所终矣”！认为历法之学我不及西人，这在当时一定范围内达成了共识，譬如明清之际的经学家张尔岐也说：“利玛窦，欧罗巴国人……要之，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⁷⁴

李之藻（1565-1630年），字振之，浙江杭州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他广泛接触西学，曾参与翻译了传教士所携来的天文、数学及哲学书籍，是徐光启事业上的同志。对于西学的态度，徐光启比较含蓄，譬如《译著提要》卷6徐光启撰《刻几何原本序》，虽赞美利玛窦所介绍的几何学极精，然而为了维护本国文化的尊严，他故意说此种学术在我国先秦时期早已有之，不过是遭秦火毁灭，至利氏西来，使国人复睹“三代而上”之学。相形之下，李之藻表达仰慕西学之情则较为直接。《译著提要》卷6《历算类》刊载了徐光启与西洋人汤若望等崇祯年间翻译西洋天文历算等书籍的目录，所涉既深且广，尤其本卷保存了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全文，对于了解当时士大夫如何看待西方科技文明，提供了难得的文献。李氏上疏指出近年主管历法的台监在推算日食、月食时常常出现差错，究其原因，一则是朝廷不重视此方面的人才，另则读书人也不太钻研这方面的学问，历法虽经屡屡改正，但最终还是出现差错。于是李氏推荐大西洋国家“归顺王化”的客卿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数人，他们勤于读书并讲论道理，都凭藉出众的天资，透彻地掌握历法计算的学问，并且带来了大量的他们国家的书籍。此辈浸淫于中国的人文教化，已熟练地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京城官员、读书人与他们探讨学问，此辈所谈论的天文历数，许多属于中国以往贤哲虽曾涉猎却有所不及的知识。

李氏记录了庞氏等人所阐释的天文历学共14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地圆呈三百六十度，地球表面分南北，地表各点则有纬度差异，以此可辨别各地寒暑节气、昼夜长短；认为日月五星各有自己运行的轨道，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运行的自然状态中各有掉头逆行一阵的现象，这称为“小轮”；认为每一年所差时间的分秒多少，古与今是不同的；认为“七政”各自为天的中心，各与地心距离不等，春分到秋分多九天，秋分到春分则少九天，这是由于太阳的天心与地心之间的距离是变化的缘故，人从地面看太阳，觉得太阳也有盈缩（实际上是距离远近）的差异，而太阳本身的运行其实并没有盈缩的变化；并且重点阐述了日食、月食的道理。这些内容大致涉及了西方天文学的基础知识。

对此，李氏上疏毫不讳言，指出以上见解在中国以前的天文历志各种书籍都未曾论及，或者仅有比较模糊的猜测之辞。其看法或许稍稍与西人接近而已，但是总归缺乏不刊之定见。而这些来自远方的客

卿却能够论述详尽，并且还能讲清其所以然的原理。

李氏赞叹西人所制造的观天观日仪器精美绝伦，认为元代郭守敬等我国天文学家均远远不及。李氏呼吁，当本国历法出现严重差谬的时候，正应该充分地翻译西人文献以备广泛的学习和借鉴，以求提升我国历法的精确程度。如今这些外国的饱学之士，不请自来，会聚于京师，朝廷怎么可以坐失良机呢？李氏惋惜当年利玛窦博览群书，感悟敏捷，最受称道，然而其学问未曾尽传就去世了。现在庞迪我等人也年老体衰，西学书籍价值巨大，但是中西语言隔阂，假使这几位外国学者也纷纷谢世，我们依靠谁来传译呢？李氏进言皇上藉此良机翻译外来书籍，以开阔本国文化教育的视野。当完成此事之后，继续扩展到其余各种书籍，凡是属于有益社会之用者，逐渐广泛地译出，希望能为宣传盛世升平，提升社会的文明和教化，产生有益的作用。

李氏足不出国门，其识见能够如此开明，若置于今日，亦丝毫不逊色于鲁迅的“拿来主义”，堪称一代通人，其言论值得今人再三玩味。首先，李氏同样不失天朝大国精神文明的自尊，但是他并不自恃文化先进就居高临下地藐视外来文化。他善于平心静气地比较中外科技之学的优劣，已经开始深入地思考中国是否存在有利于科学研究和发展的制度和环境诸问题，^①其眼光十分客观公允，亦颇具卓见。尤其是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西方一旦走出中世纪，科技日益昌明，此乃拜其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之所赐，所以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而我国自先秦两汉以来，天文历法等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习惯于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御一切，虽也曾有微弱的声音要还历法以独立的地位，但是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可能具备纯粹的品格。在西人历法之学如此先进的参照和刺激之下，李氏已经感悟到历律之学原本与《五行志》一类灾异祥瑞等毫不相干，它理应拥有独立成科的地位。其次，李氏指出，这些外国客卿的学问品格“今诸陪臣真修实学”，总结其学术为“实学”，而这样的“实学”与本国土大夫之“实学”相去甚远。《译著提要》卷7杨廷筠撰《刻西学凡序》称赞利玛窦“独能洞会道原，实修实证，言必称昭事”，然则与钱牧斋等人所偏重于人文学术的所谓“实学”不可等量齐观，此应该视作明清“实学”思潮的另一个重要内涵。而正因为侧重乎科学实证的外来“实学”的影响，才使明末以传统经学为“实学”之一路，获得了升华的可能性，导致清代“汉学”注入了新的质素。李氏上疏还介绍了西人所带来的关于水利、代数、测量、测绘、地图、医学、乐器、格物以及几何，等等书籍。这些知识都超出了我国固有文献、学养之范围。西人关于学科的分类，譬如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以及道科等概念已传入中国，它们都不从属于国家政治，是完全独立的。李氏评价西学“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深惟学问无穷，圣化无外”，直言外国亦有圣贤，西方创立了与我国不同的学问体系，其知识对于我国“实学”建设是有帮助和借鉴意义的。学问无穷无尽，言下之意，中国学者也需汲取一切有益的知识，知识和文明并无国界、种族之别，且中外不分轩輊。从其言论中可以充分体察到，清末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实肇端于明代像李氏这样的有识之士。

三

然而学术的发展往往是循序渐进的，对于传教士所带来的新思想，作为学界一代大家的钱牧斋虽不甚留意，其门人瞿式耜却是一位热心于西学的人物。像钱氏由明入清，清初的学术自然还衔接着明代的学风，倘若要彻底改变明代学术，亦不可能立竿见影，此须待入清承平之后，利玛窦等人的影响才会充分地展现出来。然而这一切由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之先驱，若认为他们为清代乾嘉学术奠定了基础，亦不为过，他们对于清代学术实在功不可没。

而其影响一则反映在近代学术概念之确立，就以利玛窦等人的历算之学而论，明代学者对此十分服膺。清人纪昀与钱大昕是同年进士，在《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子部》之《天文演算法类一》的《序

^①对此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3《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言》中，他总结中国此一领域的学问曰：“……洛下閤以后，利玛窦以前，变化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户构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证，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利玛窦的历算之学至清初逐渐征服了中国学者。而且历算之学在明末也适逢机缘，像徐光启、李之藻等也看到了借助西洋历算之学以改良本国窘状的迫切性，所以历算之学遂成为一个突破口，对于国人重新认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改变中国学术已往从属于政治的局面，确立学术的自觉独立性，培植科学意识，均端赖历算之学为契机，然后再扩大到其他学科领域。《译著提要》卷7《科学类》之《叙》说：“中国为亚洲大国，开化最早，文明最古；环吾国而居者，皆文化低下之民族；自古以来，所以我国自豪学问为吾所独有。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吾国，以欧洲之学问灌输吾国，徐光启、李之藻等与之游，得其学之精华，而我国人始知有欧洲科学，而科学在吾国行其奠基之礼。”^①徐氏的判断是颇有根据的。另则科学意识，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深入人心，它成为乾嘉学术思想的核心，此对于提高清代学术的水准，尤其与明代实学划一界线，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否则，清人以复兴汉代朴学为口号，而汉代学术讲究师法或家法，假如清人不具备科学意识所包含的怀疑精神，则不可能突破或超越汉儒的成就，充其量也不过是汉学的翻版，也就不会形成乾嘉学术的繁荣局面，亦难以为我国传统学术作出如此格局宏大手眼细密的董理，形成传统学术的一个高峰。清代学术若要取得长足的进步，必须依靠新学的冲击，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而传教士所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恰好提供了这种难得的机缘。因此，从明末学术大势来看，西学的输入其实改造了传统学术，虽然仅以星星之火，然而凭藉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刻悟性，亦必然在学界渐成燎原之势，故此学术发展的趋势，已远不是钱谦益所擘画的回到汉代经学，因此其意义十分重大。

清洪亮吉《邵学士家传》说乾隆皇帝“崇奖实学”，这受时代学术的推轂。他表扬邵晋涵“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本求原，实事求是。盖自元明以来，儒者务为空疏无益之学，六书训诂，屏斥不谈，于是儒术日晦，而游谈益兴。虽间有能读书如杨升庵、朱郁仪者，非果于自用，即安于作伪，立论往往不足依据。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辈始出，顾处士炎武、阎征君若璩首为之倡，然奥突未尽辟也。乾隆之初，海宇义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②这段话简略地叙述了元代以降，明代学术与清代乾嘉学术的本质区别，而清代学术发生转型，则以清人批判心学为转折点，而清人不满元明儒学之空疏游谈，此相当程度上是以西学为参照的。明代博学之士如杨升庵、朱郁仪、徐兴公等人亦涉猎考据之学，但是其水准却难以与清儒比肩，关键在于学术思想和方法上，明人未能达到清儒的既博且精。而清儒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人学术彻底性的启发，所以其考据学的成就自然要高于明人，为明人所难以企及。《译著提要》之《绪言》谈到利氏西学的传入“其所以致此者，盖当时儒士所谈者，仅一种空疏之论，而于实用之学，盲然未知；今西士忽输进利国利民之实学，士大夫之思想，能不为之更新”？

《译著提要》卷6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说：“失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物理渺隐，人才顽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吾西陲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故审究物理之书极繁富也。彼士立论宗旨，惟尚理之所据，弗取人之所意。盖曰理之审，乃令我知，若夫人之意，又令我意耳：知之谓，谓无疑焉，而意犹兼疑也。然虚理隐理之论，虽据有真指，而释疑不尽者，尚可以他理驳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信其无或非也。独实理

^①余英时《窃以智晚节考》之脚注说：“唐君毅师云：至于专以格物致知为格自然物，致吾人对于自然物之知之说，则未知始于何时……惟于清末，改革学制后，清廷尝以中小学之物理、化学等，合为格致一科，此盖以格物致知为格自然物，而致吾人对自然之知之始。”（《中国哲学原论》，第335页，人生出版社1966年版）今按解格致为自然科学，其事至清末始流行，盖无可疑。然论观念之原始，则必当上溯至明清之交。船山《搔首问》于上引格物致知说之下有注曰：按近传泰西物理、化学，正是此理。《搔首问》有民国三年（1914年）浏阳刘人熙序。此注疑即出刘氏之手。可证清末民初之学者已知格致之解为自然科学，始于密之父子及船山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者明理者，剖散心疑，能强人不得不是之，不复有理以疵之，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家者矣。”作为来自另一文化类型者，利氏比较分析了中国人与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利氏多处谈到中国人独重伦理学的学问特点，如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按《大学》的叙述，大抵是建立在伦理学基础上的，是从观念到观念，不超越人的主观范畴；其无论尊崇还是反对的“理”，是从主观到主观，最终仍将存之于滑疑。而西人所谓的“理”，尤其是几何学上的“理”属于“公理”，以此为基准，不掺杂主观的成分，所推导出来的“理”，方能颠扑不破。这对于中国的学术传统，真不啻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士人以往所讲论的“理”，顿失神圣的光环，“宋学”的高头讲章正属于“意必固我”的典型，他们谈性论理，俱不出各逞臆见的范围，已往士人习焉不察，至此时却顿然遭到质疑，清代汉学与宋学的严重对立，甚至势不两立，盖与学者这种观念转变有直接的关系，士人怀疑理学陈说，而怀疑的滋生，恰恰是真学术成长的萌芽；虽然对于利氏所谓的“实学”，非知之难，难在于实践，但是这种意识的培植却会改变学术的性质和面貌。按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故于先生之实学，诠列如左。而理义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①凌氏认为学问有两种境界，一为不刊之论，而另者则停留于或是或非之间，所论关涉到真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学人可贵者在于能够贡献出前一种创见，而作为后一种理义之学也必须以前者为根基，否则纯属无根游谈，毫无意义，凌氏所谓的“实事求是”已经融入了外来科学精神的因素，他比较准确地道出了戴震的学术思想。而这种学术思想在清代逐渐形成了共识，引导学者重视实证之学，强调无证不信，一时成为学界口号。从此番议论中，可以看出它与利玛窦上述言论的渊源关系，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利氏已引起中国学人的深刻共鸣。虽然中国依然不能根本改变人文学术势大、科学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传教士关于科学的知识概念还是渗透到了中国人文学界；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观测天文的仪器，如清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说：“天球地球同一圆，风刚气紧成盘旋……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观作盈圆。广寒玉兔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吾思此亦地球耳。”^②《西集诗》卷11）大致明白了日月天地的相互关系；而传教士所携来的万国图志之书，备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初步使中国士人放弃了世界中心的自大，对于调整虚妄的心态，开拓视野，树立探求科学真理的信念，培养学者人生观，来重新探寻未知的世界与道理，从而完成从读书人到准知识分子的转型，更发挥了正面的影响。^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章《戴东原》分析徽学学派的兴起，其中注意到自明末欧洲历算学输入，迄于清初，宣城梅氏兄弟“以历学震烁一时”，“是当时徽、宣之间，好治天算格致之学，其来已旧”；“亭林为《音学五书》，大意在据唐以正宋，据古经以正唐，即以复古者为反宋，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这都激发了音韵、训诂、历算以及舆地等学的勃兴，形成了清代学术重实证的格局。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卷3《钱大昕》说钱氏在京师经常与人论“西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诸家之术”，钱大昕不遗余力地排斥“俗学”，可见乾嘉学术的翘楚如戴震、钱大昕等无不受到明代来华传教士的沾溉，士人互相切磋，“实学”蔚为风气，即使再反观传统学术，研究者也必然会带有一副全新的眼光，其显然与元明儒者迥然不同。

这就牵涉到一个所谓清代知识分子，由于政治高压，惧怕文字狱之类的迫害，因此不问政治之事实的问题。观察清代乾嘉时期，许多一流的学者，都曾从政治名利场上激流勇退，一旦当他具备从事学术

^①参考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作者指出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出现在明代人眼前时，使读书人理解到“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也不是文明唯一的中心”。刊于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6，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研究的物质条件之后，他们便选择了学术，因为他们感悟到学术更能够令其人生有归属感和成就感，而这种归属感和成就感的形成，恰恰与当时“实学”的性质有直接的关系。明人空疏的学问，即使如名声大噪的李卓吾亦不值得令人效仿。而新起的“实学”，却能够解决学术史上具体的悬案和疑惑，即所谓发千古之覆，如此凝志不分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释疑解惑，生命似乎从中找到了实在的依靠，其成就感和愉悦感亦油然而生，所以此应视作“实学”所带来的魅力和诱惑力，得以造就了大批比较纯粹的学者，若夸大政治压力感一个因素来解释清代学术的辉煌成就，无疑与历史事实凿枘不合。

譬如音韵之学是历史悠久的学科，但是直至清代才迎来其鼎盛期，罗常培撰有《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①总结了耶稣会士对于我国音韵学的推进。这些所谓“实学”其实偏于自然科学一边，但是乾嘉学术不尽是自然科学性质的内容，传统四部之学仍然吸引着士人作孜孜不倦的钻研，然而对于近乎自然科学的“实学”的崇拜，使得整体学术出现了新的面貌，厚汉薄宋成为学界新风尚，人文之学为之焕然一新。纪昀《四库提要》卷首云：“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标榜“实学”，鄙夷只讲义理之宋学，扬汉抑宋，正如阮元《纪文达公集序》说：“盖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非公不能。”^②《集》卷5在学界，汉、宋有别，俨然划出了一道界线，即使文学创作也毫不例外地受其风气之波及。

在1934年1月《大公报》上，胡适发表在辅仁大学题为“考证学方法的来历”的讲演稿，指出中国近300年来思想学问趋于精密细致。他从顾炎武、阎若璩的著作以及清代学术各层面的进步加以考察，认为他们无不受到了西洋耶稣会教士来华的影响。胡适的话是有见地的，然而还比较感性，要清算利玛窦等来华意义的这一段公案，由此来认识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建立，尚需做进一步细密深入的研究。总之，若要追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16世纪西方传教士东来意义重大，他们的到来撰写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一章，而澳门正是启航中国现代化征程的一个重要起点。

[参考文献]

- [1] 牧斋有学集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 吴梅村. 吴梅村全集（文集五） [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3] 增订徐文定公集 [C]，台北：中华书局，1962.
- [4] 张尔岐. 蒿庵集·蒿庵集摺逸·蒿庵闲话 [A]，济南：齐鲁书社，1991.
- [5] 洪亮吉. 洪亮吉集 [C]，北京：中华书局，2001.
- [6] 凌廷堪. 校礼堂文集 [C]，北京：中华书局，1998.
- [7] 阮元. 擘经室集 [C]，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北京发表于1930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3分册。罗常培还发表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2号。

1930年代乡村建设派别之间的自发互动*

◎ 曹天忠

[摘要] 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发现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乡村建设主要派别不仅远比已知的为多,而且自发进行互动与联系。其中平教派和国民基础教育派表现尤为突出。这种互动与联系有助于各派之间打破区域局限,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实是当时社会思想资源由分散走向统一整合的表现,并可为今天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乡村建设派 平教派 国民基础教育派 自发互动

(中图分类号) K264.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096-07

一、问题的提出

1930年代,教育界和学术界将盛极一时,通过以教育为方法,进行乡村社会改造的各种思想称为乡村建设思潮;从事这一推动工作的各种团体和力量,则被目作“乡村建设派”或“乡村教育派”。已有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各主要派别代表人物思想研究及乡建运动全面情况的考察上。^①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应忽略:第一,主要各派的数目,远不止通常所举的陶行知的晓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的邹平村治、黄炎培和江问渔的徐公桥职业教育以及高阳、俞庆棠的无锡民众教育三大或五大派别。其实这仅是乡建初潮时的划分,远不足以反映盛时主要派数的实际。1935年11月,按教育名家姜琦等人的划法,除上述各派之外,同时并列的尚有孙中山、沈玄庐的“国民党的农民运动”、汪精卫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冯和法等“中国的社会主义”(依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雷沛鸿的“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普通大学教授”(庄泽宣、崔载阳、古棣、子钵、千家驹、杨开道)和邵爽秋的“念二社派”等11派。^②第二,乡建作为一种思潮的形成,十分重要的是星散异地的派别之间,如何在事实上互动、联系和彼此烘托,实现“自小而大”目标^③——据所处的区域实际出发,从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某一方面入手,最终则是为了全国的复兴探索一套整体的办法,殊途而归同。按其联系的方式,可分为各派自发进行与有组织的互动联络两大渠道。^④通过对前者的考察,不仅能够补充已有相关研究的缺失,而且可为时下学术史的研究,由宏观的、侧重逻辑联系的思潮流派层次,深入到细化的、着重事实上联系派别的层次,乃至今日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参考。

二、各派积极联系,平教派成为重点

乡建各派多处于自发状态,区域有别,入手处各异;加上领导人的学识、理论和所需的人材、经费等的不同,往往各成一家。^⑤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深感互通声气、取长补短的重要,于是便藉参观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部分成果(编号:030200602 JAZJD77000)。

作者简介 曹天忠,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①专著主要有董宝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吴湘相《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马勇《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宋恩荣、熊贤君《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等。单篇论文,代表性的有徐秀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其他尚多,不一而足。

②章元善、许仕廉《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经过》,见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1、2集,第17页,民国丛书第四编,15,上海书店影印。

③有组织的联系,即藉教育学术社团为纽带的方式进行联系,限于篇幅,当另文探讨。

调查、研究讲学、为文介绍、批评讨论、登载情报、人员流动等途径,进行频繁往来联系。平教会、村治、民众教育、大学教授、农村复兴委员会、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社、国民基础教育等诸派之间互动积极。其中,前期平教派成为重点,^①稍晚则雷沛鸿(宾南)领导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派异军突起。

较早进行联系的是平教派与其有传承关系的民众教育派。1930年,民众教育派甘豫源、秦柳方等北上参观,作有长篇的《参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北试验区报告》。其中的“观后感”指陈定县教育的优缺点,且认为南北民众教育的内容主张“颇有接近的趋势”。^②1931年2月,晏阳初南下协助筹备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并分别在南京、无锡、苏州等地演讲平教理论。^{[3] P375}平教派与村治也有联系。1932年11月,晏阳初致电梁漱溟:“初拟下月微日趋前承教”,走访邹平。^{[4] P334}民众教育派不仅重视和平教派保持联系,而且也注意与邹平的来往。1932年8月初,高阳莅临邹平,并作讲演,提出办理民众教育的六种内容和三个注意事项。前者包括文字、生计、公民、健康、家事、娱乐教育,后者是指要有目的、有计划和分区——办事要切实。^{[5] 1933年5月,梁漱溟在无锡作《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的讲演。^{[6] P103}}

进入1934年,乡建呈现由分散到合作的趋势,各派交往的程度和密度、渠道、区域及领域均有所扩展,乡建的重心平教派与村治派的联系进一步紧密。1934年,定县差遣医生帮助菏泽组建一个公共卫生站,后者则从平教会“订购了价值超过二千元资料、图表、书籍和收音机”;两家还就编印教材和普通印刷品方面达成协议。^{[7] P447}各方关于乡建的研究报告、特别是参观考察报告频繁见诸报刊。以当时教育界最有影响力之一、由民众教育派主办的《教育与民众》为例,仅1934年2月出版的第5卷第6期上,就有姚石庵的《县单位的农村经济建设论》、张世文(平教派)的《由于定县的经验说到民众生活调查之困难及技术》、徐锡龄的《鄞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印象记》和赵冕、王儒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印象记》四篇文章,涉及定县者有三,其见刊频率之高,可见一斑。

为加强各地的信息交流,各派机关刊物多特辟“乡运情报”专栏。乡建刊物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维系各派之间联系的主要媒介和捷径。^{[7] 1934年6月,因交通不便和为了节省时间,梁漱溟径在《民间》杂志发出公开信,就乡村建设运动的动力,究竟是政府、某一社团还是民众自己这一“极严重的问题”,向各派领导人江问渔、雷沛鸿、晏阳初、高阳、庄泽宣、孟宪承等公开征询意见,进行商讨。^{[8] 而乡建刊物开辟专栏,“专刊各地农村运动实况及消息,以沟通各地农村运动消息,而为研究农村问题之参考。”^{[9] 乡建刊物的专栏,主要有平教派的《民间·农运情报》、村治派的《乡村建设·乡运通讯》、民众教育派的《教育与民众·民教情报》、国民基础教育派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消息一束》等。平教派的《民间·农运情报》栏目,既发表己方的消息,也收集他人的情报。其中一期公布平教派负责人的行踪,另一期则刊布并简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组织大纲》:“恰义教民教于一炉,更将军、政、经、文打成一片,事实创始,曾无例可援。”^{[10]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在忠实地记录研究院的各种活动,通报省内有关国民基础教育情况的同时,对“省外各地的教育研究、教育改造运动的消息的传达,也不排除。”^{[11] 需要指出的是,从乡建讯息交流的情况看,北方处于强势,南方则显得较弱。1934年7月,《民间》编者发出感慨:“我们终是盼望江南一带的农村运动家,民众教育界,多给我们发表一些宝贵的稿件。”^[12]}}}}}

各派交往的深入,还表现在突破了原来主要在定县、邹平和无锡三大乡村建设主要派别之间联系的局限,分别与政府派的农村复兴委员会、江宁、兰溪实验县以及燕京、南开、中山等高校联系,合作培养人才或进行学术交流。

①吴湘相已论及定县实验在国内外的反应与影响,但仅是单向度的考虑。前揭氏著第234—255页。这里着重考察平教派与各派,以及各派之间的双向互动。

②《教育与民众》2卷1—4、6期连载,1930年9月等。

③雷沛鸿:《日刊之任务》,《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378号,1936年3月1日。以下简称《日刊》。

加强与政府方面的联系，旨在取长补短，互相发明。1934年9月，农村复兴委员会吴敬敷在邹平赞扬村治派的工作，是一种经过深思冥想，有透彻深刻理论做根据的，和“普通一般看见中国的病态，看不见中国的病原，凭着一腔‘是役于人’的热气，而贸然跟着人家揭起‘到民间去’的旗帜，是根本不同的”。^[12]这显然在比较邹平与定县的深浅区别，扬前抑后。10月，江宁、兰溪实验县县长梅思平、胡次威莅临邹平。11月，梅思平发表了《中国五个实验县的比较》一文，将各实验县分类比较，判别异同。^[13]1935年10月，晏阳初参观兰溪，对那里的生活简朴和军事化管理，印象深刻，并从兰溪带了许多印刷物回来，很有参考价值”；胡次威极愿和平教会合作，^[14]（PP380-381）并函购其刊物，“以备参考”。^[15]（P499）平教派为借助高校的师资培养乡建人才，积极与燕京、南开等高校联合。一方面，派骨干兼任两校教授，并为燕京作了系列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讲演，每两周一次，内容为平民文学（孙伏园）、艺术教育和戏剧（郑褒棠、熊佛西）、社会调查（李景汉）、生计（姚石庵）、卫生（陈志潜）、农民教育（瞿菊农、黎季纯）、县政建设（陈筑山）、农村建设概况（瞿菊农）。^[16]另一方面，与南开、燕京、清华、协和等校联络，组成华北农村建设协会，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①村治派、平教派与中山大学教育所的学术交往，表明自发联系的区域扩大到南部文化中心广州。1935年1月，梁漱溟南下广西讲学，途经广州，应邀在中山大学作报告。30日上午他在该校大礼堂讲《邹平工作概谈》；下午到教育研究所，对乡建中面临的三个关键问题：（一）工业与农业那个先（二）政治与教育那个有效（三）总与分那个力量大”，提出自己的看法，历时4小时。^②同年12月，晏阳初应崔载阳等人的邀请，在中大作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演进》的报告，论及平教会发展的简史，呼吁学生走出书斋，到农村去教育民众，救亡图存。^[17]

平教派无论在与各派直接联系，还是间接参与多方循环来往方面，都居于重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其历史长，影响大，辐射广。在乡村建设各流派中，平教会最早在中国从事平民教育事业（1920年）和乡村建设（1929年）。民众教育派、村治派、职业教育社，以及其他各处的民众教育或农村改进机关人员，直接、间接都受过它的影响。^[18]（P237）加上经验成型较早，政策灵活，及时与政府推行实验县的方略挂钩，各方面多走在各派的前头，故大家都乐于与之接近，前往取经，仅1933年，各地到定县参观的就不下3000人次。^[19]（P283）第二，重视宣传、接待和推广工作。为了向国内外宣传自己，博得同情理解，争取经费，平教会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他们组织大众宣传部，对以往取得的成绩，编写各种中英文表格、小册子、书信和报告等材料，“对外发表”；精心组织接待，设“招待参观委员会”专司其职。^[20]（PP290-291）平教会小处工作扎实，大处胸怀全国，制订推广战略。在做好定县大本营工作之余，通过训练老职员，招募新手，将推广项目分为“广泛型”和“深入型”。前者是指派人去支援，维持友好关系，如广西、江西、江苏等省；后者以一个重要项目为中心，派员建立分支机构，争取产生具有战略性的影响，如湖北等地。^[21]（PP452-453）

三、交互的又一中心，国民基础教育派跃起

在自发联系过程中，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平教派是重心的话，那末进入中前期，雷沛鸿为首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派则异军突起。关于30年代乡村建设及乡村建设的研究，明显存在着全国的研究与广西脱节的现象。原因之一，是新桂系与蒋介石长期交恶，与外界交往受到影响；加之晚起和低调，省外对于了解广西教育和乡村建设情况并与之联络，不若他派便捷和充分。即便如此，时人孔雪雄已对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有相当高的评价：“不但标本兼顾无零杂褊狭之弊，而且有整个的政治经济力量为其前驱后援，亦比较易致功效。和其他地方的局部建设实验工作一相比论，颇使我们引起有如步枪战法和铁甲车战法的不同之感”。^[21]（PP408-409）1933年9月，从雷沛鸿就任广西教育厅长，实施国民基础教育起，至次年5

①详情可参吴湘相《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有关章节。

②梁漱溟先生讲，伍华、李渊庭笔记《邹平工作概谈》；周葆儒《漱溟先生的三个答案》，均见《教育研究》57期，1935年2月号。

月止,在此之前,该派为“力求充实内容,向鲜对外宣传”,^[29]与各派联络甚少,同行知之不多。之后,由于雷沛鸿的虚心求教和新桂系当局的礼贤下士,广西教育界积极开展对外联系,使落后的南疆桂省,一时成为乡建的关注点。

重视研究、借鉴全国各地乡建的经验。1935年9月,雷沛鸿看到陶行之编的《普及教育续编》一书后,特地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朝会上要求同仁研读,并认为全书所收材料,内容丰富,很有价值,极堪注意。还规定该院从此“应有一专人负责搜集全国各地之有关于普及教育运动之各种理论,办法,章则,印刷品,汇集起来,供大家研究,这是一件很需要的工作。”^[29]这表明后起并处在相对闭塞广西的雷沛鸿派,渴望了解和融入全国乡建大潮的愿望。在此背景下,研究院成为乡建各派各地人员往来的汇集之所。据追随过雷沛鸿的严少先回忆,该院乡建各派人员云集,计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北晓庄师范,中华职业教育社,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河北定县平民教育社,贵州达德师范及广东暨南大学的各地学者”,如徐旭、武宝琛、秦柳方等45人,人才济济。各地的特约导师、乡村建设的领军人物,亦纷纷前来讲学报告,“交流研讨,切磋琢磨的学术空气很浓,蔚然成风。”^[29]就员工籍贯而言,该院计有桂、粤、闽、川、滇、筑、豫、冀、湘、鄂、浙、苏、皖、鲁、沪、平等16个省、特别市。人数以流域而言,“长江流域居多数”,省份则以江苏为最。^①

国民基础教育派与各派各家的思想产生交融和论争。

民众教育派。雷沛鸿曾在该派所依托的无锡江苏教育学院当教授5年(1928-1933年),并一度兼任研究实验部主任,成为学院的领导核心之一。省外最早及时对雷氏颁布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试办规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等重要法案作出反应及转载者,即是《教育与民众》。^[29]在互邀讲学方面,两派也进行得较早。1934年3-5月,雷沛鸿到江苏教育学院作了《最近的广西教育》,重点讲解了自己担任桂省教育厅厅长9个月来,推行国民基础教育的概况。^[29]在此期间,雷还邀请苏教院教务部主任陈礼江来南宁讲学三周。后者分别作了题为《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之任务》、《国民基础学校之任务》的学术讲演,并考察和评价了民团及其与国民基础教育的关系。^[29]就人员交流而论,苏教院的毕业生先后到研究院工作,且成为骨干的有雷荣甲、秦柳方、胡耐秋、沈子英、范昱、叶蕴、黄旭朗、马勤如(清和)等十多人。

村治派。邹平与南宁虽相距遥远,但因梁漱溟原籍广西,名震教育界,雷沛鸿格外关注该派的动态。双方交往最主要的表现当推梁漱溟南下广西讲学。1935年2月,经雷的叠次邀请,梁漱溟终于回到广西,在研究院进行了半个多月的交流活动。他首先作了《乡村与都市问题》、《中国教育的改造》的专题演讲,宣传其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改造方案。^[29]雷沛鸿点评道:“我们很高兴听到这样有意义的演讲。我们主张的国民基础教育的论据,恰与梁漱溟先生的根本见地相符合,更希望以后漱溟先生对我们续有深刻的启发我们思想的演讲。”^[29]其次,主持学术讨论,回答听者疑问。所回答的问题计有新技术引进与伦理团体组织的关系、中国伦理本位思想的前途等近20个。^[30]再次,比较邹平与雷沛鸿派的异同。逗留南宁的梁漱溟特作《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一文,认为二者在教育的乡村民众化、以学校为社会改造的中心、儿童与成人教育合并、政教合一等方面相近,但在是否让农民自动,以及教育动力依靠政治,还是社会力量为主上迥异。^[30]最后,梁氏也有所批评和建议,在充分赞扬雷沛鸿的敬业与执着,肯定广西当局励精图治的同时,亦批评广西教育实施中政治力量介入太大,文化力不够。鉴于生产教育不易做到,建议研究院应与省政府的施政计划相结合。^[30]梁漱溟此行对国民基础教育派产生颇大的影响。除成立“梁漱溟先生学说研究会”外,最主要的莫过于在看待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这一根本问题上,研究院抛弃了晏阳初的观点,采纳了梁漱溟的主张。由范昱起草的研究院院歌的歌词中,原有这么一句:“内忧外患,肇共晚清,惟贫与弱是主因。”这是受晏阳初关于中国的落后因为贫、弱、愚、乱观

①参见《旬刊》第198、64、404号,1935年8月20日、4月5日、1936年3月28日。

点的影响。但梁认为,“中西文明不合辙,才是我国积弱不振的主因”。经过讨论,雷沛鸿接受这一观点,遂用“文明抵触其主因”代替了“唯贫与弱是主因”这句歌词。^[24]这不仅是邹平与平教两派深层矛盾的又一次暴露,而且说明在雷沛鸿认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上,前派的影响超过了后派。^[33 P123]

平教派很早就重视展开与广西的联系,并分两条线进行:一是与桂省当局,^①一是和雷沛鸿的国民基础教育派。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这种主辅分明的联系方式,对两派在广西的教育事业发展影响极大。

1932年4月29日,晏阳初在复李宗仁的代表陈光甫的信中提到,愿意派汤茂如与李氏商讨平民教育计划,“十分高兴帮助广西成为第一个推行全省规模的平民教育运动的省份。”^[34 PP262-263]此后,平教派一直有将广西作为推广教育的理想基地的设想,于是有汤茂如赴广西宾阳,举办实验县之举。不幸的是,1935年5月,汤因涉嫌杀司机,遭到广西文化名流白鹏飞等人的控告而入狱,^[35]平教派在广西的计划顿遭大挫。此事起因表面上似乎是如晏阳初所说的,因白氏曾与汤氏在江苏教育学院有隙而趁机报复,^[4 P370]事实上恐怕是反映了桂省文化教育界对平教派观点有所保留并试图抵制后者染指广西教育。^②但广西官方并不因此放弃与平教会的合作。同年6月5日,省主席黄旭初电告晏阳初,急派干员继续汤的工作。对此,尽管晏阳初颇为犹疑,没有立即答应,但显然心存感念,希望继续与广西高层保持较密切的联系,遂派出重要干部及工作人员南下,并顺道访问同年9月回桂担任教育厅长的雷沛鸿及其掌控的研究院。

1934年4月20日,平教会副会长陈筑生来研究院作“国民基础教育应具的精神”的学术演讲。^[24]实际上,他此行主要是为了探听当局在汤茂如事件后的诚意,以及在广西开办平教会促进会分支机构的可行性。^[4 P371, PP448-449]陈北返后,践与雷沛鸿之约,“寄来大批平民读物”,供该院参考。^[34 P215]1935年5月,平教会受伍廷飏之请,派罗靖华、叶世瑞前往柳州帮助训练师资,“以三月为限”。在工作之余,罗等人抽暇到南宁考察,比较了定县与国民基础教育的异同,认识相当到位。1936年4月,平教会因得广西当局“迭嘱前往效力”,决定在桂设办事处,地点在南宁中山公园,公推陈筑山主持一切。该会对能够插足广西,以实现梦寐以求的大规模推广教育计划,十分重视,“并经陆续选遣此间负责重要职责之同志,如(朱)有光、佛西、石庵诸兄南下襄助”。^[4 P509]平教派与广西的联系以当局为主,以雷沛鸿派为辅,反映其与后者关系的疏离,甚至矛盾。雷沛鸿在广泛加强与乡建各派联系的同时,似乎对平教派积极介入广西保持着戒备,甚至采取弱化、减低其在广西影响的措施。前述研究院歌词的修改,“弃晏从梁”,即为显例。此举不仅说明雷沛鸿对平教派观点的保留,而且挑战了有“广西宪法之称”的《广西建设纲领》有关近代中国落后的贫、愚、弱、乱病态及病因的说法,后者显然是受晏阳初的影响。^[37]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否定了晏阳初的看法,无异于反对广西建设纲领。此举刺激了与平教派关系十分密切的广西省政府,致使双方联手抵制和排斥雷沛鸿,这很有可能是造成迄今为止为学界所忽略的雷沛鸿被免职,以及研究院遭关停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省府秘书长邱昌渭对研究院工作吹毛求疵,故意刁难外,更重要的是,广西当局早有让平教派取代雷沛鸿接掌教育厅和研究院的预谋。根据平教会档案,早在1936年3月,“广西当局要使本会能彻底推行其工作起见,极诚恳地要求陈(筑山—笔者)先生担任教育厅长职务”;“同时并请朱有光先生担任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38 P460]此事后因“两广事变”爆发,以及雷沛鸿不合作而作罢。因此,平教派与广西主次分明,双线进行的联系,由于没有得到桂省教育界的应有配合,非但没有达到在广西推广其事业的预期目的,反而促使生机勃勃的雷沛鸿派提前退出乡村建设的历史舞台,言之太息。

国民基础教育派在保持与乡村建设最具代表性的民众教育、乡村建设和平教会三派来往的同时,还

^①吴湘相也注意到平教派与广西省政府的联系(《晏阳初传》第280—281页),但忽略了与雷沛鸿派的来往。

^②1933年5月31日,尚在江苏教育学院任教的雷沛鸿就批评定县“只知研究,不知实施;它又只知实验,不知普及;其尤甚者,它日惟以研究实验自娱,而忘却全国颠连无告的劳苦群众。”《雷沛鸿文集》上册,第61—62页。

与生活教育、金陵农大、职业教育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诸派之间，发生关联。

生活教育派：陶行之对雷沛鸿依靠政治推行教育的做法，由始初反对，转而理解和支持，直至亲赴南宁讲学；派出方与严、董渭川、潘一尘、杭苇、孙铭勋等得力干部到研究院工作；积极帮助推行小先生制，以缓解国民基础教育实施过程中庞大的师资缺口的燃眉之急。^①1935年7月，属于教会系统的金陵农业大学的教授，乡村建设代表之一的章之汶，应雷沛鸿之邀到研究院讲学。他进行了生产教育设计，举办生产教育人才训练班；^{[39] PP97-99)}作《我国乡村建设之鸟瞰》讲演，带领研究院员工雷荣甲、潘一尘起草《乡村建设初步计划草案》；^[40]调整设计研究院实验农场。中华职业教育社：1935年4月，由该社李涛、姚惠滋等五人组成的农村考察团入住研究院月余，与该院员工共同生活，实地考察，称赞广西教育优点之余，也委婉提出基础教育成功实现量的扩张的同时，应注意质的问题。

研究院与广西师专学生的争论，背后反映了国民基础教育派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派之间的分歧。1934年12月，广西师专学生一行96人，进研究院实习。师专学生虽然肯定国民基础教育的主旨和意义，但对它的内容、教学方法、学制、轻视理论等方面，几乎都作了否定，从而与研究院师生发生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农村破产，救死不遑，人民不可能来接受基础教育”；后者针锋相对：“正因为当前国势日危，农村破产，基础教育才有爱国教育、生产教育的提倡”；“接受基础教育的男女老幼的踊跃热烈的事实，充分说明人民大众是需要这种教育的。”^[41]特别是对“以爱国教育为灵魂，生产教育为骨干”两大内容，师专学生坚持认为由爱乡土、爱家庭以培养爱国思想，非但不可能，相反容易造成狭隘的地方意识，两大内容的最终解决，“都落在反资本主义反封建残余等等的任务上去。”^{[42] PP17-19)}学生如此有组织 and 坚定的看法，绝非偶然，应是受老师的影响。师专校长杨东莼，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学者，他通过由中共掌握的“农研会”负责人陈翰笙的推荐，请来了薛暮桥等人担任教师，开设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课程。学生思想进步很快，自称是‘小莫斯科’”。^{[43] PP41-46)}师专学生与雷沛鸿派的争论，实际上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派与整个乡村建设派对垒的一个缩影。因为前者在批判后者时，认为乡建各派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以承认现有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44]

四、结语

乡村建设派别众多，纷繁复杂，贯串其发展的主线之一，无疑是“自小而大”。完成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其中的关键，是星散的各派之间如何有效地实现联系。各派藉自发交往的渠道，各有所好，各取所需，积极参与，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和分层面的联络。其中，平教派、国民基础教育派表现尤为活跃。它有助于千差万别，各有特点的各派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共同提高。在联系过程之中，尽管由于观念（主要）、立场和权益等原因，存在分歧甚至争论的现象，但在日本侵占东北，压境华北的刺激下，联系、合作、求大同存小异，成为主流，从而为促使乡建的范围由区域到全国，趋势由北而南，内容由单一到综合，规模和结局从小到大，直至被国民政府吸纳、整合成以国民教育为中心，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内容的新县制，打下良好的民间思想基础。各派从分散到聚集，由分歧到合作，既是乡建发展的内在逻辑演进，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由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的折射。

[参考文献]

- [1] 姜琦. 乡村建设的动向 [J]. 教育杂志 (25卷11号), 1935- 11.
- [2] 孙伏园. 全国各地的实验运动 [J]. 民间 (1卷1期), 1934- 05.

①详参吴桂就《陶行之与雷沛鸿教育实践的相互关系》，广西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二），第188—193页。

- [3] 晏阳初、(美) 赛珍珠著, 宋恩荣编, 告语人民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4] 宋恩荣主编, 晏阳初全集 (第3卷·书信)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 [5] 薛铭猷记,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高院长讲演词 [J], 乡村建设 (2卷2期), 1932- 08.
- [6] 李渊庭、阎秉华编著, 梁漱溟先生年谱 [Z],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7] 林宗礼, 一年来民教定期刊物之检阅 [J], 教育与民众 (4卷9- 10期合刊), 1933- 06.
- [8] 一封公开信——致江雷晏高庄孟六先生 [J], 民间 (1卷3期), 1934- 06.
- [9] 农运情报 [J], 民间 (1卷2期), 1934- 05.
- [10] 农运情报·南宁通讯: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公布组织大纲 [J], 民间 (1卷9期), 1934- 09.
- [11] 民间 (1卷5期), 1934- 07.
- [12] 吴敬敷, 邹平见闻录 [J], 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 (2卷4号), 1934- 09.
- [13] 乡村建设 (4卷9、12期), 1934- 10、1934- 11
- [14] 晏阳初, 关于出席乡村建设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的报告 [Z], 晏阳初全集 (第1卷) [M],
- [15] 晏阳初, 复胡次威 [Z], 晏阳初全集 (第3卷)[M],
- [16] 民间 (1卷21期), 1935- 03.
- [17] 教育研究 (第64期), 1935- 12.
- [18] 吴湘相, 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 [19] 晏阳初, 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 [Z], 晏阳初全集 (第1卷)[M],
- [20] 晏阳初, 在二十三学年第二次行政会议上的讲话 [Z], 晏阳初全集 (第1卷)[M],
- [21] 孔雪雄, 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 [M], 上海: 中山文化教育馆, 1935.
- [22] 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最近一月来消息一束 [J], 教育周刊 (7- 8期合刊), 1934- 05.
- [23] 本院新闻 [J],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报 (第213号), 1935- 09- 04.
- [24] 严少先, 立志向, 做世界——纪念沛鸿师长诞辰百年 [Z], 雷沛鸿纪念文集 [C],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26辑),
- [25] 教育与民众 (5卷2期), 1933- 10.
- [26] 雷宾南, 最近的广西教育——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九日在江苏教育学院讲演 [J], 教育周报 (3卷6期), 1934- 05.
- [27] 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最近一月来消息一束 [J], 教育周刊 (7- 8期合刊), 1934- 05- 15.
- [28] 梁漱溟演讲, 勤如等记, 中国教育的改造 [J],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报 (29- 32号), 1935- 03.
- [29]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报 (19号),
- [30] 马勤如, 倪焕周记, 梁漱溟先生主理学术讨论会纪录 [J],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报 (27- 29号),
- [31] 国民基础教育丛讯 (创刊号), 1935- 03.
- [32] 漱溟先生临别赠言 [J],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报 (34号),
- [33] 雷沛鸿, 何谓国民基础教育 [Z], 韦善美, 马清和主编, 雷沛鸿文集 (下册) [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0.
- [34] 晏阳初, 致陈光甫 [Z], 晏阳初全集 (第3卷)[M],
- [35] 凌天洪, 广西通信 [J], 社会与教育 (5卷24期), 1933- 05.
- [36] 武宝琛, 采取设计方法进行的两年来之本院课本编辑工作 [Z], 该院总报告编辑委员会编,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三年来工作总报告 [R], 南宁: 南宁集成书局, 1936.
- [37] 武宝琛, 国民基础学校课程编制纲要及说明 [J], 广西教育旬刊 (1卷7- 8期合刊),
- [38] 晏阳初, 对在定县工作同志的讲话 [Z], 晏阳初全集 (第1卷)[M],
- [39] 雷坚编著, 雷沛鸿传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
- [40]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报 (第157、170号), 1935- 07.
- [41] 马伟, 我知道的宾南先生 [Z], 雷沛鸿纪念文集 [C],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26辑),
- [42] 广西师专训导训练班全体学生报告, 参加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工作报告书 [R], 1935- 01.
- [43] 薛暮桥, 薛暮桥回忆录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 [44] 孙治方, 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工作 [J], 中国农村 (2卷5期), 1936- 05.

责任编辑: 郭秀文

世俗与属灵之间: 丁韪良与《尚贤堂月报》

◎ 王文兵

[摘要] 本文拟介绍《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的创办背景以及该报“新学”、“道学”并举以“救时”的内容和特点, 试图填补丁韪良19世纪90年代生平研究中的一段空白, 并揭示他这一时期在传教思想上由“世俗”向“世俗”与“属灵”之间的过渡, 同时兼论丁韪良对维新运动的影响。

[关键词] 丁韪良 《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 传教方式 维新运动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103-06

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年)是晚清在华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美国新教长老会传教士之一。他早年在宁波、上海以及北京等地传教, 后脱离长老会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完全转向世俗活动。在同文馆任上丁韪良以译介西方“实学”(或“世俗科学”)如公法、富国策、格致以及创办《中西闻见录》而闻名于世。1894年5月他因病返美并于次年正式辞同文馆总教习职。1897年1月丁韪良重返中国并于1898年8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众所周知, 1897年1月到1898年8月是康、梁发动的维新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展开并达到高潮之时。当时一些知名的在华外国传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佳白(Gilbert Reid)等都积极参与了“救时”的变法游说活动, 而作为在华传教士头面人物的丁韪良似乎没有一点作为, 这显然不合情理。遗憾的是, 限于资料, 学术界对于丁韪良在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以及活动情况的研究一直付之阙如。^①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丁韪良这一时期主持的《尚贤堂月报》(后改名《新学月报》, 1897年6月至1898年5月)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丁韪良从同文馆离职后的活动情况以及传教思想的变化, 从而填补他生平中的一段空白。

一、从“由格物而推及造物”到“格物以造物为宗”——丁韪良与《尚贤堂月报》的创办

1897年6月, 丁韪良正式在北京宣武门内绒线胡同后小六部口西的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筹办处创办《尚贤堂月报》, 这是继19世纪70年代《中西闻见录》后丁韪良创办的又一份刊物。

作者简介 王文兵, 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天津, 300222)。

①关于丁韪良研究的重要成果, 有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 《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孙邦华《简论丁韪良》, 《史林》1999年第4期; 王文兵《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汉学研究》第8卷, 中华书局, 2004年, 第503-548页; 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 南开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2005年; Ralph Covell: “W.A.P. Martin: the Pioneer of Progress of China”,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8年。其中Ralph Covell作的丁韪良传记尤其值得一提, 该书从丁韪良与中国近代的变革这一视角描述了丁韪良的一生, 据丁韪良传记词条编撰者Ernst Schwintzer的观点, 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深入论述了同文馆时期丁韪良身份向世俗的转变及其原因。参见J. Garraty和M. C. Carnes编辑: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Vol. 14, Oxford, 1999, 第613页。这些文章或专著对丁韪良早期在同文馆的活动、传教思想以及创办《中西闻见录》等有深入的研究。相形之下, 学术界对于丁韪良维新时期活动则几乎未曾涉及, 对于《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亦无人知晓。

②所谓的尚贤堂是一种类似于学校的机构, 系李佳白为力行其“救时”方略, “实事求是, 以期培养人才, 裨益全局”而设。按照李佳白的设想, 尚贤堂内设有中西上等人士会晤公所, 以联情谊和消除民教隔阂; 另设藏书楼、学馆、洋文学馆、格致书院并刊刻时贤所著新策和做抚危济困等善事。其章程宗旨有四: 一是所作所为“专求有益中国, 有利革民”; 二是“广设善法, 调剂于彼此之间, 务令中外民教底于和洽”; 三是“期于恢拓学士之志量, 研炼儒者之才能, 俾上行下效, 使中人以上之人智能日增, 即资之以变化庸众”; 四是“往来交接”, “总以劝善为本, 无论砥砺德行, 讲求道艺, 期乎扩充旧识, 启迪新知”。参见李佳白《尚贤堂文录: 京师拟设尚贤堂章程序》, 《万国公报》卷102,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又见《京师拟创尚贤堂小记附章程 删改(申报)译文》, 林乐知等译, 《万国公报》卷101,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设立尚贤堂的大体计划在1895年6月就已经有了, 此时李佳白虽然没有提到尚贤堂的名称, 但是已经提到了建立综合性学院、藏书楼和演讲厅, 参见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95年6月22日。1897年3月(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设立尚贤堂的计划正式得到总署批准, 见李佳白《尚贤堂文录: 京师拟设尚贤堂章程序》, 《万国公报》卷102,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另见1897年4月10日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报道。

关于《尚贤堂月报》创立的背景和经过，丁韪良在创刊号“告白”中有明确交待：

按《华北月报》，本华北书会所出，词意浅近，宜于教中子弟长进道德。至去岁转托本堂（即尚贤堂）启东李佳白先生督理之，忽见改弦易辙，局面视前顿异，奚止哈之化为雀而飞腾也。既论学问之虚实，又观时政之得失，其笔力颇为士大夫所首肯。惜启东问计，不得已而回国。适值余旋华，书会即请接办。余视为善举而勉从之。不料复据书会致意，请将《华北月报》复其本来面目，俾教中善男信女，咸得受益。余熟思之，窃谓与其复旧，不如出新，遂将《华北月报》交回书会。拟自来月起，刊印《尚贤堂月报》，分送以代之。至新报与旧报，其异同之处，姑不赘言，俟报送到，一览自明。夫消遣之策，莫妙于造报。余既辞官守，又无教差，惟有一心注于《尚贤堂月报》，遂不觉老忧俱忘。^{[1] 1, P1}

由此不难看出，此时“既辞官守，又无教差”的丁韪良原本是要督理李佳白转托的华北书会（The North China Tract Society）的《华北月报》，只因不满华北书会改变李佳白督理《华北月报》时所秉持的世俗化编辑方针，才在尚贤堂筹备处创办了《尚贤堂月报》。李佳白（启东）系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迄今研究戊戌变法的专著一般都将李佳白视为与李提摩太以及伊藤博文齐名并对戊戌变法影响最大的三位外国人之一。^[2]这一时期，李佳白正在迎合中国上层的维新思潮，以“救时”为己任，活跃于上流社会，积极筹办尚贤堂和为变法出谋划策。由李佳白委托丁韪良办理《华北月报》，足见丁韪良这一时期的活动与李佳白有关。一些零星资料也证实丁韪良在这一时期除继续挂名美以美会汇文书院（Peking University）的董事外，^{[3] 1897-04-03}主要活动是帮李佳白筹办尚贤堂。

丁韪良不满华北书会的保守态度，辞去《华北月报》的编辑工作，转而创办《尚贤堂月报》，表明他仍在坚持同文馆时期试图单靠宣传西方世俗科学而令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由格物而推及造物”的世俗化立场。但又不仅仅止于此，实际上我们发现丁韪良这一时期对自己完全世俗化的思想也有所修正和调整，由过去的“由格物而推及造物”单靠“实学”皈依中国的世俗派做法转到主张“科学如矢之翼，而基督教则如矢之的”（“格物以造物为宗”）的世俗与属灵并重的中间立场。丁韪良在1897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面对教会内部世俗与属灵两派之争时，表达了明确的折中态度。他一方面强调福音是目的、手段和力量，另一方面又主张“为了给基督赢得世界，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辅助影响与福音同行”。在西方世俗科学与福音的关系上，他着重强调了“西方科学是传播福音的辅助手段”，“科学如矢之翼，而基督教则如矢之的”。^①丁韪良的这种调整和转变本质上是从消极的单靠普及和推广西方实用的世俗知识转到积极强调基督教教义的根本地位，除了是迫于教会内部属灵派的压力与属灵派妥协外，也是出于对他同文馆时期完全世俗派做法的反思并应对这一时期中国流行的对抗基督教的“中体西用论”。^②丁韪良创办的《尚贤堂月报》，其内容也明显反映了他这一时期传教思想的变化，即“格物以造物为宗”，“新学”要以“道学”为本。

二、《尚贤堂月报》的内容：“新学”、“道学”并举以“救时”

《尚贤堂月报》大致每月20日前出版，篇幅约11页，全年12期。从第三本（1897年8月）起改名《新学月报》。尽管丁韪良对《尚贤堂月报》这一基督教文学事业十分看重，一度谢绝了盛宣怀要他担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的邀请，^{[3] 1897-09-25}但《尚贤堂月报》却只出了12期就停刊了，其中主要原因可能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手少，三是稿源不足。丁韪良主办《尚贤堂月报》，只有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后任京师大学堂算学教习的山东高密人綦策鳌一人襄助。丁韪良自称“督理”，称綦策鳌为“副理”。《尚贤堂月

①丁韪良：“Western Science as Auxiliary to the Spread of Gospel”，The Chinese Recorder, XXVIII (Mar., 1897), PP111-116。中国学者过去多笼统地将此文中的观点仅仅理解为丁韪良重视利用世俗科学传教并反过来解释丁韪良之前在同文馆时期的世俗活动，这种理解似是而非，模糊了丁韪良一生前后期在传教思想上的变化。参见王维俭《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孙邦华《简论丁韪良》，《史林》1999年第4期。

②丁韪良1877年提交给上海首次新教传教士大会的“论世俗文学”一文在会上受到批评。这篇文章虽收入丁韪良《翰林集》第一编（1880年），但丁韪良后来出版的文集却未再收入该文；90年代甚至有中国人向他提出“敬神之道，今之格物家，非皆置之度外乎”的问题，中国受众的反应显然令丁韪良反思了他以前的做法。

报》的作者不多，除丁韪良、綦策鳌外，署名者尚有潞河书院院长谢子容 (M.E.Sheffield)、宛平郭家声、怀定牧师 (J.Whiting)、大兴李道衡、潞河书院教习丁立瑞以及梁启超。除梁启超外，其他撰稿者多为传教士和教徒。

按照丁韪良在创刊号上“告白”的说法，《尚贤堂月报》的内容可粗略分为时论类（或政论类）、新学（格致或实学）类、新闻类，其主题可以归结为“新学”、“道学”并举以“救时”。

（一）时论：以兴利除害为宗旨”。

《尚贤堂月报》最突出的是政论部分，这在《中西闻见录》中是不多见的。政论多这一特点既与丁韪良这一时期力图影响中国上层，进而推动中国的基督化有关，也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甲午之后热衷于议政有关。政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变革以“救时”，变革的最根本手段是以基督教来振兴中国，其他的变革则都是次枝末节。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之谈时务者，均以自强为急务，以西法之当行，而“独于泰西之教则谓为利国而宜行者罕见，谓为病国而宜禁者多”。丁韪良指出这是由于他们见识不广之故，他明确指出西方的富强，其本在于“泰西之教”，“新学、新法以及新政，莫不由之”，“彼採西法而欲遣西教者，何异栽树而拔其本乎？”^{[1] 11 7, P9)}

从法、德、俄、英、美五大国的历史经验看，丁韪良认为，西方新政可供中国维新之借鉴者有“修律法、兴学校、创机器”三大端。泰西新政“以更正律例为团结人心之第一要义”，“以振兴学校为化导人心之绝大关键”，至于“创新机”则“便”于士、农、工、商，甚至于“御侮捍国”。“律例、学校者，新政之体也，创造机器者，新政之用也；体用兼营，国势巩固，行新政者之所为，措天下于磐石之安也。”^{[1] 11 2, P2)}振兴学校具体到中国如何做，丁韪良坚持他在同文馆时提出的“科学渗入科举”（“稍用西术于科场”）主张，“非新学不取士”，达到“旧学不废，新学自兴”的目的。这是他数十年前主持同文馆时与总理衙门成员宝筠、沈桂芬讨论后所得出的一个“旧瓶装新酒”的妥协方案，即利用原有的科举制形式而增加西方新的科学内容。

对于西方之政体以及政党制度，丁韪良认为各国政体有民主、君主以及君民共主之分，而政党也相应地有“守旧”、“维新”之分，但“维新者，并非蔑视旧章，乃真有见于弊之当除；守旧者，亦非固执，乃恐骤变而激乱，不如缓图之为妥”，二者之异同在于“维新者欲兴利除弊，守旧者恐其涉于鲁莽，如谷之未熟先割而多方阻挠，此其异者也。迨至利己兴，弊已除，则两党悉无违言，此其同者也。”“二党之爱国，所见只分迟速，别无悬殊也”。两党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以及方法不同，并非有本质的区别。但另一方面，丁韪良又强调实行民主制度的益处。他指出西方允许在野党自由发表言论可以判别官吏之贤否，可以彰显“政治之得失”，可以“开聪明而启智慧”。

至于中国是否应该学习西方的政党民主制度，丁韪良分别以土耳其和日本学习欧美民主制度的失败以及成功经验，提出应谨慎从事，“是举之有关于其国之教化民情者，亦不得不详为审察矣”。^{[1] 11 12, PP9-10)}时值中国维新派与顽固派激烈斗争之际，丁韪良表面上似乎持一种中立立场，但他强调允许言论自由、维护民主制度，主张立党为公，这无疑又是对维新派的支持。

在外交方面，丁韪良强调中国当权者要守之以信，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公法、条约以维持邦交，再加有“文法以会通之”，“邦交之道，可谓无憾”，“所可惜者，限界未豁，则猜忌易生，猜忌一生，则到处棘手耳。苟能大张文教，广兴实学，遐迩一体，中外囡福。俾尔我臣民，悉泯诈虞，则大同之象，无间东西矣”。^{[1] 11 3, P2)}

军事改革方面，丁韪良附和孙家鼐提出的“奏请变通武场考试以及技勇旧制”两折，就改革武举制度提出了“非学（专门）不取，非新（武器）不用”的“变通武场说”，特别以长平之战、法德之战等古今中外之例从反面强调武政变革的重要性。^{[1] 11 2, P2)}丁韪良不赞同甲午后中国国内重建海军的呼吁，而主张重点应放在建设整顿陆军，鼓励学习科技，“如其添制兵舰，不如鼓舞实学，整顿陆师，二者立则本固”。^{[1] 11 9, P7)}

在经济方面,丁韪良发挥中国古代的“三宝论”,提出了农、工、商并举发展,从而“广其土地,和辑其人民,整饬其政事”的“新三宝论”。^{[1][5,P1]}丁韪良还呼吁举办邮政、电报以及铁路等近代化事业,^{[1][2,P11]}主张中国应该不顾其他国家的阻力,修筑卢汉铁路以及排除“隐忧”,修筑经东三省的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借俄而御俄”。^{[1][11,P11,P3]}此外,清政府要学习西方,奖励新发明,施行、保护专利法,鼓励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性。^{[1][2,P2]}

(二) 新学(实学):阐明各国新学,为补旧学之不足”。

与《中西闻见录》相比,丁韪良在编辑《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时,新学是“阐发格致各理”以“启蒙愚蒙,增益智慧”^[9]的手段,目标是克服中国人的迷信,并以皈依基督教为归宿,即“格物以造物为宗”。

新学的内容主要以格致、富国策(政治经济学)以及基督教心理学为主,格致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摘引了一篇发表在《万国公报》上探讨格致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文章,该文探讨了基督教国家富强的原因,强调基督教国家今日“文明丕焕”,“要皆在于格致端其本也”。格致首先能让人驱除迷信而笃信基督教,其次能给人类带来富强而进入文明社会。该文最后指出:“今之论教化者,窃见泰西诸国,文明日盛,富强日著,权力日充,以为我中国所不能及,岂知彼之所以能致此者,亦不过专精格致,务求真实,广行仁爱,使人自立,如是而已,非有他道。夫物有本末,格致其本也,教化其末也;事有始终,格致始事也,教化终事也。世有以整顿教化为己任者,尚其知所先后而于格物致知之学,一加之意乎?”^{[1][6,P10]}

在格致中,天文学说是重点介绍的学科,“窃谓实学各种,天文为冠,特因其道高远,其理深妙,解者无几,好者尤鲜”。实际上中国人因秉持天人感应的观念,从皇帝到一般老百姓对天文都极为重视。而其中的迷信成分恰恰构成对基督教文明传播的最大障碍,因此从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到晚清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无不着意于介绍西方的天文学说,丁韪良对介绍西方天文学的热衷,其目的亦在此。从第2本起一直到第10本,丁韪良连续9期登载了他自己撰写的《天文新说》。《天文新说》以留洋归来的陈先生(代表西学、新学)与北京的李先生(代表中学、旧学)二人问答的形式分别介绍了地球、月球、太阳、恒星、行星等天体和星系的一般知识以及西方的天文学说如开普勒定律(刻白尔三纲)、力热转化定律等,意在消除中国人的迷信观念。丁韪良还直言不讳地对“风水”学说提出批评。^{[1][7,P5]}

新学中,富国策仍旧是丁韪良十分关注的重点。富国策即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丁韪良自己曾翻译了法思德著的《富国策》,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当时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在《尚贤堂月报》中,丁韪良虽自己没有撰文,但却连载了谢卫楼(D.Z. Sheffield)撰写的《富国策摘要》,表明他仍旧重视这门学问。

基督教心理学是丁韪良新学传播的一个主要部分,他后期发表的基督教心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性学举隅》,即先以《性学发轫》为题在《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连载。《性学发轫》(《性学举隅》)实际上是《妖道溯原》中论述“心才”和“德才”部分的扩充。

(三) 新闻:“旁稽六洲时政,借鉴事务之因革”。

新闻报道也是《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在给中国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提供时务资讯。与《中西闻见录》相比,《尚贤堂月报》的新闻来源较为广泛,既有译自西文报纸(含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也有摘自中国本土出版的教会中文报纸的。但与《中西闻见录》不同的是,新闻涉及的国家较少,多集中于西方大国,此外海外华侨受迫害的报道也没有了,国际外交方面的新闻报道也往往只有一句话或寥寥数语。

新闻中,介绍格致或新学在各国的进展情况的仍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也有一些新发明和新发明的推广方面的新闻,如马可尼的发明无线电报,^{[1][1,P7]}无线电报在日本的试验等等。一些格致新闻则意在破除中国人的迷信。丁韪良在新闻中对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如日食、地陷、下泥雨等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以

消除国人的疑虑。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有日食发生，这在中国人中引起骚动，以为祸之将至。丁韪良以西方天文学说和康乾盛世的同样例子予以释疑，指出日食系自然现象，与吉凶无关。^{[1] 8, P12)} 另一些格致新闻则鼓励中国人接受新事物，如富尔顿发明轮船载客的故事等。^{[1] 2, P10)}

各国的改革、进步、工商业情况也是丁韪良新闻报道关注的一个方面。在新闻报道中，暹罗、日本、俄国已经替代《中西闻见录》中的波斯、巴西以及古巴等成为中国学习的典范。丁韪良赞扬了暹罗王赴英国参加英国女皇庆典的做法，称此举“诚也、明也，非谄也。况暹廷更拟由英至美，采风取法，以强其国，操心危，虑患深，实具卓识，又安可以仰息他人希图苟安者例之乎？”^{[1] 1, P9)} 他还介绍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进行的“大一统”、“正刑律”、“设议院”、“息教案”等政治改革，并特别赞扬伊藤博文接受基督教的立场。^{[1] 10, PP6-7)} 俄国“更正狱吏”、“振兴农务”、“大核户口”、“龙江开田”的革新做法也值得中国仿效，丁韪良在报道时特别赞赏“俄人之勇于前进也”。^{[1] 3, P9)}

文化教育、学术活动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方面。文化报道仍然以办报为中心，特别强调办报要不拘于本国挑选人才，“求新诸国以新报之有益也，不惟任本国人为之，且任他国人代为之”，如美国的一份新报的馆主为英国人，日本亦有外人办报。丁韪良从旁观者清的角度出发，认为外人办报对国家有好处，犹如“借助他山”，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國也应该“借助他山”，让外人来办报。^{[1] 1, P9)}

一如在《中西闻见录》中所做的那样，丁韪良继续关注西人对中国以及东方的研究活动，企图以此激励中国人对西方的学术兴趣。他以各国都设立东学会以及朝廷、总统都予以重视为由，指出“方当实学宜兴之际，试问中华学士亦如此力求西学否，中华政府亦如此重视西学否？”丁韪良甚至建议中国驻外国使节在各国都城设立西学会，每五年则邀集会员在北京开会，政府隆礼以遇之。^{[1] 7, P10; 10, P11)} 北京东方学会的活动是学术报道的另一个中心。他还将自己在北京东方学会上宣读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发明以及发现的论文观点以“新学新术多原于中华论”为题摘要发表在《新学月报》上。

教会新闻很多，这是《中西闻见录》所没有的。李佳白的尚贤堂、传教士在各地举办的学堂、医院等教会事业是报道的重点。在这些涉及基督教的新闻中，丁韪良也总是借题发挥，不忘记为基督教辩护或阐释基督教教义。在一篇报道天津望海楼教堂重建的新闻末尾，丁韪良评论火烧望海楼教堂是因为“不解格物化学”之故，以致惹出事端。^{[1] 2, P10)} 在报道1897年4月的天津善会火灾时，丁韪良评论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报施不爽”，“天地为一大机器耳，机之运行有定理”，“不能以眼前祸福定善恶”，关键在于来生的报应。^{[1] 2, P4)}

各国时事也是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置于《尚贤堂月报》之末尾，内容有各国政要的行踪、各国国内新闻等。外交方面则有各国元首的对外访问，派驻公使，交涉、通商以及殖民地事务等。与《中西闻见录》中尽量避免评论中国与西方冲突事件的做法不同，这一时期丁韪良不再保持中立，而是从传教士的立场出发，在涉及传教士的中外冲突事件中明确进行表态。在《新学月报》中，他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对1897年11月22日德国占领胶州湾的事件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系因其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害，有合理的借口。他指出今后中国避免“兵端”的惟一办法是“认真保护（传教士）而已”。^{[1] 7, P12)}

三、《尚贤堂月报》之评价

《尚贤堂月报》以“新学”、“道学”并举以“救时”，与丁韪良以前主办的《中西闻见录》相比，反映出丁韪良在19世纪90年代活动的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尚贤堂月报》在许多方面可以看成是《中西闻见录》的延续，如在宣传西方的“新学”（“实学”）、介绍各国进步等方面，有些内容甚至就是《中西闻见录》的深化或翻版，从《尚贤堂月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闻见录》的影子。

第二，《尚贤堂月报》也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从而体现了丁韪良在90年代的思想特征。从《尚贤

堂月报》的内容上看，包含格致以及其他西方物质文明在内的“新学”仍是丁韪良所追求的，但同时丁韪良没有忘记大力宣传基督教教义，注重将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强调西方的格致或其他的物质文明只是整个基督教文明中的一个次要部分，也即格致只是手段，只是“用”和“末”，而基督教才是目的，才是“体”，才是“本”。丁韪良借用了这一时期中国士大夫中盛行的体用、本末说，显然是对他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潮作出的反应。在中国士大夫心里，“西学”所指的仅仅是西方的科学。将西方的科学与基督教割裂开来，这是丁韪良所不愿意看到的。重视世俗知识与灵性的皈依的结合是丁韪良这一阶段传教的特点，与他在同文馆时期的纯传授世俗知识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他传教手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此外，丁韪良明显加大了政论的力度。但丁韪良在改革上仍然追求过渡论、渐进论，这与他在同文馆的教育改革上的做法是一致的，也与他同洋务派的密切交往有关。

第四，在《尚贤堂月报》中，丁韪良不再像在《中西闻见录》中所做的那样，公开在中文中批评“西学中源论”或“西学东来说”，反而大张旗鼓地撰文承认西方确有一部分知识源于中国古代文明，试图利用中国各阶层普遍接受的观点作为一个历史依据，在甲午战后鼓励中国人向西方学习。

第五，丁韪良在《尚贤堂月报》上的观点对维新运动有一定的影响。限于资料，在现有的论文和书籍如汤志钧先生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王树槐先生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以及美国学者Ralph Covell的丁韪良传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丁韪良在维新运动中的作为。实际上，公认的对维新运动影响颇大的李提摩太、李佳白当时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并不长，相反丁韪良则从1897年初就一直呆在北京。虽然我们看不到丁韪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直接的交往，但通过《尚贤堂月报》的内容，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丁韪良透过该杂志对维新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而并非是一个旁观者。《尚贤堂月报》在戊戌变法前发表的许多鼓吹改革的观点直接附和赞同维新派，有些观点无疑对维新派有所启示；康有为以日本、俄国改革为例的“仿洋改制”思想，很难说未曾受到这份杂志的影响。而且《尚贤堂月报》地处戊戌变法的所在地北京，这无疑较设在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有地域优势。丁韪良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反证出他对戊戌变法的影响。

当然，与《中西闻见录》刊行的19世纪7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中国人接受西方知识的渠道要多得多了，中国人自己就办了许多有影响的报纸如《时务报》等，《尚贤堂月报》不再是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惟一渠道，甚至《尚贤堂月报》有时还转引一些省报的报道。《尚贤堂月报》的相对地位要较《中西闻见录》低，而且由于其将科学与基督教直接绑在一起，无疑也会激起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的反感，从而削弱其在传播西方科学、推进维新上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丁韪良主编. 尚贤堂月报 (新学月报), 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 [2] 汤志钧.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增订本), 1961; 王树槐. 外人与戊戌变法 [M]. 台北, 1965.
- [3]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京津泰晤士报), 天津图书馆藏.
- [4] 尚贤堂文录: 京师拟设尚贤堂章程序 [N]. 万国公报 (卷102).
- [5] The Chinese Times (中国泰晤士报), 天津图书馆藏.
- [6] 书京都尚贤堂 (新学月报) 后 [N]. 万国公报 (卷106).

责任编辑: 郭秀文

《生活》周刊(1925-1933年)与青年文化

◎ 赵 文

[摘要] 1925年10月创刊于上海的《生活》周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刊物,就其内容和读者而言,它是一份主要面向城市青年大众的杂志。《生活》周刊在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坚持热情为青年大众服务的宗旨,通过年轻编撰者与青年受众之间长期的良好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众间的平衡与互换,并在此基础上营造出一种求实、向上的青年文化。

[关键词] 《生活》周刊 青年文化 青年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109-07

青年文化是青年作为一个特定年龄层次在文化上的特殊标志,是青年本质的体现。它是在青年群体中经过互动整合而诞生,并以青年群体为载体,获得群体成员认同的非完型的意义系统。其实质是青年能动适应和改造环境样式,即青年创造的以独特价值观为核心所构成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青年文化是与社会主体文化既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一种亚文化形态。^{[1] (P6)}

在青年文化的营造、生成中,青年报刊的功用不可忽视。青年报刊作为文化产品本身就是青年文化活动的产物,是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惟如此,它还承载着青年文化创造选择、重组再造、传播流布的重要作用,在青年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确立,社会人格、行为方式的养成,以及由此推动社会现代变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学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青年文化萌发的标志。^{[2] (P7)}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新文化本质上就是五四青年新文化。因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年轻一代开始觉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主角和斗士的身份通过一场反传统反权威的社会文化运动,把自己的新价值、新观念展示于世人面前。而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正肇始于《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首揭“民主”、“科学”大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启蒙及思想解放运动。当时的“新青年”们非常重视报刊在思想文化启蒙宣传方面的作用,他们联系师友,团结同志,创办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这些以“除旧布新”为价值趋向的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宣传传播五四新文化,施加影响于社会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青年们由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社会改造的探索,中国社会前途问题成为他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开展了各色各样的社会改造尝试。各地也竞相出版发行面向青年宣传新思潮,谋求社会改造的报刊。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业的中心,在这方面自然走在全国的前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青年类报刊不下数十种,其中较著名的有《独立青年》、《甌产青年》等。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生活》周刊创刊了。

本文主要从《生活》周刊传播者、受众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剖析《生活》周刊作为大众传媒在都市青年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对以其为中心营造生成的青年文化内容等作一评析。

《生活》周刊1925年10月由黄炎培创办于上海,后由邹韬奋接任主编。在其自始迄今的8年里,刊物

作者简介 赵文,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与时俱进，热诚为读者服务，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记录（一期年发行量15万份）。就其内容与社会影响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份主要面向城市职业青年及部分大中学生的刊物。

《生活》周刊早期的编撰者（传播者）人数很少，力量十分薄弱。当时整个《生活》周刊的工作人员只有邹韬奋、徐伯昕和孙梦旦三人。邹韬奋追忆这段经历时说：“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几等于零，职业教育社同人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脚戏。”^[73 P70]为此，他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常把“某类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写作了大量人物传记、青年人生修养等方面的文章。由于邹韬奋及其同人的认真努力，也由于刊物内容的不断革新和为读者服务的热忱，《生活》周刊有了迅猛发展。邹韬奋接编刊物不到3年，《生活》周刊每期销数便由2000余份增至4万份。随着《生活》周刊在青年中的声誉日隆，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其编撰者队伍也渐渐壮大起来，逐步告别了“唱独角戏”的时代。在编辑部内，它有了几个得力的编辑。在编辑部外，则团结了一批很有才华的青年朋友，他们经常为刊物撰写各种类型的稿件，成了《生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

《生活》周刊主要编撰者情况一览表

姓名	出生时间	籍贯	学历	职业经历	姓名	出生时间	籍贯	学历	职业经历
穆藕初	1876	上海浦东	留美硕士	工商企业家, 经济官员	苏雪林	1900	安徽太平	留法学生	作家, 教授
黄炎培	1877	江苏川沙		教育家	(女)				
伍连德	1879	广东台山	留美博士	医学教授	吴景超	1901	安徽徽州	留美博士	社会学教授
马寅初	1882	浙江嵊县	留美博士	经济学教授	黄方刚	1901	辽宁	留德博士	哲学教授
顾荫亭	1885	江苏嘉定	留美学生	中华职业学校校长	李公朴	1902	江苏常州	留美学生	
张竹平	1886	江苏太仓	大学毕业	《时事新报》总经理	巴金	1904	四川成都	留法学生	作家, 编辑
朱经农	1887	江苏宝山	留美硕士	教育学教授, 教育行政官员	查良监	1905	浙江海宁	留美博士	法官
王云五	1888	广东香山		四角号码发明人, 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	艾寒松	1905	江西高安	大学毕业	《生活》周刊编辑
程时奎	1890	江西新建	留美硕士	大学教授, 教育行政官员	张明养	1906	浙江海宁	大学毕业	大学教授, 商务馆编辑
戈公振	1890	江苏南通		记者, 大学教授	袁道中	1907	福建上杭	留法学生	大学教授
陶行知	1891	安徽歙县	留美硕士	教育家	靳以	1909	天津	大学毕业	作家
毕云程	1891	浙江海盐	大学毕业	经济学家, 出版家	陈选善		浙江余姚	留美博士	大学教授, 首任上海教育局局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
王光祈	1892	四川温江	留德博士	音乐家, “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之一	凌其翰		上海	留比博士	法学教授, 《申报》月刊编辑
廖世承	1893	江苏嘉定	留美博士	大学教授	徐玉文		江苏江阴	留日学生	
张耀翔	1893	湖北湖口	留美硕士	心理学教授	(女)				
潘序伦	1893	江苏宜兴	留美博士	经济学教授, 立信会计事务所创始人	殷木强			留日博士	医学专家
傅东华	1893	浙江金华	南洋公学毕业	编辑	邹恩泳			留美学生	市政工程师
杨贤江	1895	浙江余姚	师范毕业	编辑	丁而汉			留德学生	
潘公弼	1895	江苏嘉定	大学毕业	《时事新报》主编	费福熊			留英学生	
邹韬奋	1895	江西余江	大学毕业	《生活》周刊主编	卢章			留美学生	
刘湛恩	1895	湖北阳新	留美博士	大学教授	蔡文星			大学毕业	中学教师
王志莘	1896	上海	留美硕士	上海工商银行高级职员, 曾任《生活》周刊主编	(女)				
胡愈之	1896	浙江上虞		编辑	周仕醒			留德学生	
茅盾	1896	浙江桐乡	北大预科毕业	作家, 编辑	黄公安			留德学生	
章乃器	1897	浙江青田	商校毕业	银行家	公望			留美学生	
陈彬和	1897	江苏吴县	留日学生	《申报》社长	仲雨			留美学生	
吴颂皋	1898	江苏吴县	留法学生	大学教授	钟道赞			留欧博士	
杜重远	1899	辽宁开原	留日学生	企业家	张近芳			留德学生	
潘光旦	1899	江苏宝山	留美硕士	大学教授, 杂志主编	(女)				
蒋湘青	1899	江苏宜兴	大学毕业	体育专家	程沧波			留英学生	编辑, 记者
					陈令仪			留法学生	
					夏蜀槐			留比学生	
					章微言			留法学生	
					章若渊			留德学生	

（本表制作时参考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5月第1版）

从表中所列简历可考的40余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年轻人占多数，以《生活》周刊创刊的1925年为时间基准，40人中小于30岁的占了24位；其二，撰稿者绝大多数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不少人都曾留学东西洋，归国后立足于社会各界，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其职业经历以任职于工商、文教、新闻出版部门为主；其三，籍贯以江浙沪三地居多，所占比例约60%。显然，他们大多数是科举废除后，接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五四一代的新型知识分子及社会精英。

《生活》周刊的读者（受众）早期主要是知书识字的城市职业青年，如学徒、小学教员、工商职员等。以后随着刊物的发展，读者层面又扩展至部分大中学生，但上述的受众情况总体没有改变。1926年1月《生活》周刊发行部报告的刊物订阅者“大都为商店工厂中之学徒，与中小学校之学生。”^{[74] P11}而据《生活》周刊1932年4月7日《生活日报》招股统计表所反映的读者情况亦大致相同。

《生活》读者概况表^①

性 别		住 址		年 龄		职 业	
男	857	江苏	664	20岁以下	163	商	489
		浙江	97			学	210
		湖北	43				
		山东	32	21- 30岁	528	政	117
		广东	28				
		河北	27				
女	67	安徽	24	31- 40岁	200	工	68
		河南	22			军	23
		福建	22				
		湖南	17	41- 50岁	45	农	4
		山西	9				
		陕西	2				
不明	76	四川	2	50岁以上	21	其他	89
		江西	2				
		日本	2				
		云南	1	不明者	43		
		南洋	1				
		不明者	5				
1000		1000		1000		总 额	1000人

（本表根据《生活》周刊第7卷第18期第268页《生活日报》千户股东统计表制作）

分析表中读者（受众）情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青年人占绝大多数，1000户订户中，年龄在30岁以下者近70%；第二，所从事职业中，以商业最多，约占总数的50%；第三，地域分布广泛，除东北三省及个别边远地区外，全国各省都有订户。其中以江浙为多，所占比例近8成。从上表我们可以推测《生活》周刊绝大多数的受众是年龄在30岁以下，生活在江浙沪等地，从事商业工作的城市职业青年。商界学徒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商界学徒年龄多在20岁左右，其中不少人程度不同地接受过新式教育，受过些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其中既有小学毕业生，也不乏中学毕业生。他们几乎都有因天灾人祸的侵袭而家道中落、不得不因此辍学从商的背景和经历。这些远离家乡来到都市谋生的青年“平日在都市环境中耳闻目睹的大多是新式恋爱婚姻的故事，而心目中所抱持的仍不脱乡间旧礼教的束缚，虽然喜尚大城市里的西化的风尚，但是摆不开旧观念、旧习惯，……。”^{[75] P314}作为都市的边缘人，他们跨处商、学之间无人地带，身处城乡之间，依违于新旧文化价值，备受新式潮流的冲击。

《生活》周刊以五四新青年文化精神为价值导向，试图通过周刊贴近青年，排解商界学徒等都市边缘人孤寂、迷茫、紧张、焦虑、痛苦、无奈等不良心理和情绪，并希望通过构建与读者（受众）积极良好的关系，来帮助引导职场青年，促使其奋发进步。

二

从对《生活》周刊的传播者和读者（受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同构”关系，这就为消除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隔绝和分离，采取二者间平衡/互换这一大众传播良性模式，取得最佳传播及反馈效果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说来，《生活》周刊的传播者和受众大多为江浙沪一

①本表中的“商”主要是指商店、小工厂中的学徒等，“学”是指学校的学生，“政”是指公务部门的职员。

带的青年，都受过五四新青年文化的熏陶，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双方都面临着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型的困惑与抉择。这是《生活》周刊能为广大青年选择和接受的心理与观念基础，也是《生活》周刊大众传播能顺利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当然，要真正实现《生活》周刊传播者与受众间的平衡与互换，并在此基础上营造、生成出青年文化，还需要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真正形成人性化、平等、自由开放的良好互动关系。在这方面《生活》周刊无疑是成功的。它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实现了传播者与受众间的良性互动，并最终营造出了一种雅俗共赏、求实向上、与时俱进的都市青年文化。

（一）编者与核心读者（成为编撰者的读者）。如前所述，早期《生活》周刊的编撰者人数很少，后来随着刊物的发展，才逐渐有了自己的作者群。作者群中的一些人原先实际上就是《生活》周刊的读者。之所以能传者与受者合一，这要归功于邹韬奋等刊物的领袖人物坚持为青年大众服务，满腔热忱对待青年读者的办刊方针。以《生活》周刊的几个海外通讯员为例，法国的陈令仪、日本的徐玉文、美国的李公朴、德国的丁而汉等等，他们起初都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后来有机会赴海外留学，邹韬奋向他们约稿，他们于是成了《生活》周刊的海外通讯员。在其留学海外时，邹韬奋及《生活》的编辑人员经常与他们通信联系，讨论各种问题，并为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及时给予帮助与支持。李公朴、王光祈在国外时经济情况非常窘迫，他们的投稿寄来后，还未刊出，只要可用，《生活》就会先将稿费汇出；陈令仪女士的夫君在法国去世后，邹韬奋及时去信安慰；丁而汉不幸遇难以后，《生活》专门登文哀悼；徐玉文女士由日本回国，邹韬奋等亲赴码头迎接……这样相濡与沫，肝胆相照，亲密无间的传者与受者关系令年轻的留学生们感动不已。因此，面对《生活》，他们都能畅所欲言，竭心尽力，愿把最精彩的材料和思想拿出来。与《生活》的编者、其他读者和所有关心爱护《生活》的青年朋友们交流、共享。如此，每一期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一群年青人之间思想、感情之流相互交汇、激荡的结晶。

（二）编者与一般读者。这两者间的良好互动主要是通过“读者信箱”实现的。《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始设于第2卷第1期（第5卷第45期后改为“信箱”），直至第8卷第50期被迫宣布停刊止，除了少数几期外，从未中断。设立“读者信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读者加强联系，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信箱”开设的7年间，阅读、答复读者来信，帮助读者解决各种问题，耗费了邹韬奋及其他编者无数的心血和时间。但他们总是满腔热诚，废寝忘食地工作。他们认为：“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9] P392}“（我们）夜以继日，汗流浹背，……以能为读者有所尽力，在实际上做到‘好朋友’，视为至乐。”^{[9] P397}正是这种对读者竭尽全力，真诚热情服务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广大青年读者，使《生活》周刊在读者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赢得了数百万青年大众的爱戴与信仰。当时许多青年男女不但把邹韬奋和他主编的报刊看成“良师益友”，对于他们的教育、意见和建议，也言听计从，有些人甚至把《生活》的每一个职员都看作“圣人”。^{[9] P348}高度的社会信誉极大增强了《生活》周刊的传播效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青年读者们也并非只是简单的受众，他们以投稿、参加“信箱”讨论等多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反馈着信息。正如张仲实在回忆邹韬奋的文章中所说：“（韬奋）先生给广大读者做了老师，给他们解决问题，代他们服务；但广大读者也给先生做了老师，他们在无数万封通信中，使先生了解各种具体问题，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黑暗面。……（这当中）先生的思想也有了巨大的进步，即逐渐自觉地跳出狭隘的个人主义的圈子而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9] P76}

就这样，编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精神上的连合”的“无形团体”，真正达到了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众平衡/互换模式的最佳境界。“有时作者是读者，读者是作者。我们这个无形的团结，重精神的交通，而不重形式的联络，有的贡献他的学识经验，是在指导别人，同时他读了别人在本刊发表的好著作，受了益处；或者发问提出讨论，或者有问题提出解决，又是受指导的人了。……凡是我们这个‘团体’里面的同志，都应当披肝沥胆，互助互励，极力脱离苦闷失败而趋向愉

三

《生活》周刊的编(作)者和读者共同营造的青年文化,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小资产阶级青年在人生过渡成长过程中思想观念、价值行为方式等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折射出他们在求学、就业、婚恋家庭、个人与社会关系等社会化重大问题上的困惑与追求。所有这些都具体地体现在《生活》周刊的相关内容上。

第一,求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沿海大中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各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受过良好学校教育与专业培训者,在择业竞争中具有相对优势,有着较好的前途和出路。在此情形下,谋求升学深造,为日后跻身社会打下基础,就成了当时一般城市青年的普遍愿望和想法。然而,社会的畸形发展,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却使不少有志青年,因为家庭贫困、经济拮据,不得不过早辍学就业,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他们匆匆步入职业社会,从事学徒之类与中高级职位无缘的卑微职业,由此痛感就学无望,前途暗淡,常觉苦闷烦恼。一位叫林志章的青年投书给《生活》周刊,不无悲伤地说:“我是高级中学读了半年的一位苦青年,我是生长于一个很穷苦的家庭。学费是我一位舅父帮忙的。不幸这位舅父于两月前逝世了,于是我便没有了救星,其势不能不辍学。……这是我十分痛心的事,我自量我终身便从此亡了!”㉟ P6) 林氏青年的境况在学徒等职业青年中很有代表性。对此类吐露苦衷、寻求帮助的来信,《生活》周刊均予以耐心细致的答复,针对具体困难,尽力提供详细的解决办法。尤其注重启发鼓励辍学失学青年,重视真才实学,不要迷信文凭,勇敢地走自修工读,自学成才之路。《生活》周刊指出,“现在有些青年往往以求学为贵,做事为可鄙,好像一个人一生一世只要求学,不做事便得。这是大大的误会。”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无论受教育至何高度,总以其所学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彼不务应用而专读书,无有是处。”㉟ P77-8) 对于一些共性问题,《生活》周刊还专门组织失辍学青年、教育当局和社会有关方面参与讨论,以唤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并且主张应实行“中国化、平民化、普及化、工读化”的教育革命,以便根本解决青年的求学问题。

第二,就业。就业问题是当时城市青年在求学之外,深感苦闷烦恼的又一大问题。20世纪初,沿海城市工商业在艰难中虽有所发展,但长期不振,并日形衰败,广大青年因此常常谋生无路,求业无门。而农村经济的破产,导致大批破产农民沦为游民,他们纷纷涌向城市,寻求生机,这更使城市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在号称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城市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据上海职业指导所统计,即使经济状况较好的1934、1935年两年内,中学毕业、肄业生求职者的得业率也仅为6%、6.2%,小学学历求职者的得业率更低至4.8%。㉟ P77) 就业难的结果,使莘莘学子视步入社会为畏途。一位复旦大学行将毕业的学生投书《生活》信箱,吐诉苦恼称,“我是个青年,我是一个快将毕业的大学生。在普通一般人看来,大学快将毕业了,从此至少可以被称为某某大学的学士,正好衣锦荣归,光耀乡里了,这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不过我自从得知今年可以毕业后,心里一点也不快乐,……我愿一辈子终老于大学,永远做个不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我一无凭藉,既没有大人先生们的靠背,又没有生成那么一付钻营的本领……现在我们中国哪一个地方没有土匪?又哪一个地方没有饥荒?……战争、饥荒、失业和无业的人,一天一天增加……最可怜的就是现在无饭可抢,抢来抢去,仍就是个空碗。……说得好听点,我们是大学生,洋翰林;说得不好听点,社会上又多了一批高等游民。”㉟ P11) 事实也确是如此。大中学生“毕业即失业”在当时是个普遍现象。而职场中到处盛行的“任人惟亲”,“重关系轻实学才干”的恶劣腐败风气,更使求业的青年望着社会“实如铜墙铁壁”,无从入门,难觅生路,往往因此被迫走上歧路绝途。对此,《生活》周刊经常予以曝光揭露。作为青年们的良师益友,《生活》周刊对青年就业中的苦痛烦恼,极表

同情。在鼓励青年积极“进德修业”，给予青年谋职求业技能的具体指导外，它还吁请社会，敦促政府当局采取积极救济办法，解决青年失业就业难题，以便为青年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12] P2)}

第三，婚恋家庭。婚恋家庭问题与青年切身相关，是青年阶段人生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广大青年以《生活》周刊为论坛，围绕男女社交公开、自由恋爱、恋爱与贞操、结婚的前提与条件、家庭制度改造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探讨，由此形成了对婚恋家庭问题的新认识、新观念。

在男女交往、恋爱问题上，主张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与此同时，反对男女社交、恋爱绝对自由，赞成社会师长予以科学理性的指导。因为“社会是男女共同组织的，当然应该由男女共同参加的，所以男女社交公开，是文明社会里面应有的一种现象，并非专为男女求婚的作用”，^{[13] P7)}但是“在此新旧过渡的时代，旧礼教不足以范围人心，新的正确信念又未培成，致有一般坏蛋藉一知半解的新皮毛做幌子以逐其私，实在是危机四伏。”^{[14] P7)}所以，“社交虽然公开，择偶虽然自由，而严正的社会和贤明的父母们经心的小心翼翼的卫护经验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女子，这并不是什么压制，实是爱护他们。我们要知道，防害群之马，即所以保障良善男女双方的名誉和幸福……可以由此减少一些新旧过渡时代因误会而造成的无谓的牺牲。”^{[15] P9)}

在婚姻家庭问题上，青年们认为，幸福婚姻成立的前提和条件有二：首先，经济必须能够独立。“真正恋爱虽不应当重视金钱，但是要能维持愉快的小家庭，必须有相当的经济能力，否则就是有了小家庭，同过牛衣对泣的生活，不但不能享受家庭之乐，反累人以自累，远不如独身的轻松自由。”^{[16] P10)}其次，婚姻应当自主。“婚姻这件事，只关于恋爱两个人的事，不要有第三者干预，才见真正的价值。”^{[17] P6)}自主婚姻的最大要素是“自己选”，“亲友可以介绍两方做朋友，家长可以指导，或帮同商榷，但是选择之权应完全属两方本人；由心爱而想到缔婚，要完全由两方本人心坎中出发。”^{[18] P3-4)}唯有如此，男女青年双方才具有“共同的兴趣”，“相互的同情、鼓励”，彼此欣赏对方的人格和事业，结成完满无憾的美满姻缘。

在此基础上，青年们赞同实行以夫妇二人为主体的小家庭制，反对传统封建的大家庭制度。他们认为，小家庭内部关系简单、清爽，夫妻平等，人格独立，各司其职，经济自立，易成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而家族制度是不平等制度的根源，是强权政治、专制主义的根源。所以，要“坚决主张小家庭主义，打破大家族主义”，不能让“万恶的大家族制度，束缚个人的自由，摧残个人的幸福，替社会造成许多不健全的苦恼分子。”^{[19] P8)}并提出“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倡导实行“彻底的小家庭制度”。

第四，娱乐休闲。娱乐休闲是青年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年文化时尚、特色的展示。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娱乐休闲观念与余暇生活方式便开始传入上海等沿海通商大邑，并逐步流行传布开来。到了20世纪初叶，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市民群体的形成壮大，各式各样的娱乐休闲活动，便成为一般市民紧张忙碌工作之余的普遍追求，通过娱乐休闲消费，他们获得了情感的宣泄和精神的放松。都市青年思想灵活，心灵开放，反应敏捷，自然走在现代娱乐休闲生活的前列。吃大菜（西餐）、观影戏（电影）、看跑马、逛商场、溜冰……这些追逐时尚，崇尚摩登的娱乐休闲反映了当时不少都市青年的文化心理需求。不过十里洋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种娱乐休闲中难免有“拆烂污”，如打麻雀（赌博）、抽大烟（吸毒）、嫖妓等。这些“非惟无益与身心，并且会变成罪恶，阻碍社会生活进步”的娱乐休闲活动常常腐蚀、毒害青年，使其步入歧途。

对此，《生活》周刊认为，一面要极力禁止低级趣味有害青年的娱乐方式，一面要积极提倡正当有益的娱乐休闲生活。1927年10月《生活》周刊推出的百期特刊“娱乐”专号，向青年们介绍推荐了近百种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的娱乐休闲活动，如读书、绘画、写作、演奏、跳舞、旅行、影戏、聚餐等等。

第五，人生社会理想。如前所述，《生活》周刊的读者主要是商界学徒、店员、小学教员及部分大中

学生等。作为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天性是彷徨徘徊、摇摆不定、敏感、柔弱，好以自我为中心的，最关注的是与自己有切身利益关系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个人奋斗，借助个人的好运与机遇，获得良好的职业地位，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至于社会的进步，国家民族的前途，尽管也不时为其关注，但在他们的理想观中显然不占据主要位置。“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理想是他们实际的追求。但是残酷黑暗的现实，使他们的这些人生理想常常化成了泡影。理想的破灭使许多青年消沉绝望，有的甚至走上了绝路。所有这些都迫使青年们对其理想及实现之路重新做出思考。正如邹韬奋在《经历》一书中忆及《生活》周刊的转变时所说的，“《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绝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转到集体的出发了。”^[73 P75]同样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平民阶层青年的理想观在对社会黑暗制度，对残酷现实愤懑不满的基础上，开始了立足于集体主义的立场，从彻底的社会改造着手的转变。他们通过切身经历与实践，逐步认识到，“依客观的研讨，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73 P12]“中华民族有出路，我们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没有出路，我们也就没有出路可言。”^[73 P19]九一八事变后，在《生活》周刊的影响下，许多青年把个人的发愤进取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纷纷走上了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以《生活》周刊为中心营造生成的青年文化继承延续了五四青年新文化科学、民主、爱国、进步的传统，它立足民族爱国的立场，坚持民主科学的精神，坚定面向青年大众的方向，赢得了都市青年的广泛赞誉和强烈共鸣。它使异地谋生、身处城乡、依违新旧之间的青年们找到了群体认同、心灵的慰藉和归属。它所倡导的独立自强、奋发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陶冶塑造了青年们的现代人格，进而促成了他们的政治觉醒，造成了一股谋求、参与社会变革的巨大潜在力量，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与进步。

[参考文献]

- [1] 董志敏. 接受与超越：青年文化论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 [2] 王寒松. 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 [3] 邹韬奋. 经历 [M]. 北京：三联书店，1958.
- [4] 记者. 三年学徒生活 [J]. 生活（第1卷第16期），1926-01-24.
- [5] 叶文心. 从《生活》周刊看三十年代的海小市民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 [6] 俞月亭. 韬奋论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 [7] 邹嘉丽编. 忆韬奋 [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 [8] 读者信箱. 精神的连合 [J]. 生活（第2卷第5期），1926-11-21.
- [9] 读者通讯. 求学做事讨老婆怎样才好呢？[J]. 生活（第2卷第19期），1927-01-16.
- [10] 张仲礼主编.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11] 读者信箱. 愿一辈子不毕业 [J]. 生活（第5卷第24期），1930-05-29.
- [12] 小言论. 考试以后如何？[J]. 生活（第6卷第7期），1931-02-07.
- [13] 编者. 一个总答复 [J]. 生活（第3卷第49期），1928-10-21.
- [14] 编者. 介绍费女士的几篇文章（上）[J]. 生活（第4卷第13期），1929-02-24.
- [15] 编者. 介绍费女士的几篇文章（下）[J]. 生活（第4卷第14期），1929-03-03.
- [16] 读者信箱. 单恋 [J]. 生活（第4卷第7期），1928-12-30.
- [17] 王恒智. 根据实际调查研究结婚问题 [J]. 生活（第2卷第15期），1927-02-13.
- [18] 编者. 我的两位好朋友恋爱成功纪 [J]. 生活（第3卷第44期），1928-09-16.
- [19] 邹恩润译述. 有趣味的纪事——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 [J]. 生活（第2卷第44期），1927-09-04.
- [20] 韬奋. 我们最近的趋向 [J]. 生活（第7卷第26期），1932-07-02.
- [21] 信箱. 需要一条出路 [J]. 生活（第7卷第46期），1932-11-19.

责任编辑：郭秀文

•“消费时代文化批评现状的反思”笔谈(主持人:蒋述卓)•

编者按:当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之后,当90年代审美文化日益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时,“文化批评”和“消费时代”话语便先后在文学评论界悄然流行开来,学界已就有关问题讨论了一段时间,但至今它们还是两个有纷议的概念,值得深究和澄清。为此,借2005年广东省文学理论研究会和比较文学研究会年会之机,本刊与学会有关组织者便酝酿相关论题展开讨论,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因而有这组笔谈呈献给读者。

中图分类号) I 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116-14

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

◎ 蒋述卓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消费时代来临,文学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读者的趣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学如何贴近文学发展的实际,贴近社会生活,贴近读者大众的阅读与欣赏实际,作出相应的反应,是发展文艺学的关键。为此,文艺学自身需要进行调整,放宽视野,与时俱进,作一番新的建构。

首先,应澄清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媒体与信息扩张的今天,文学的发展确实遇到了问题,比如什么是文学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存在方式,如何看待亚文学现象等等,都直接与“当今文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当今的文学文本呈现出多样形态,它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纸质媒体,它可以存在于网络、影视、摄影、广告、歌曲之中,文学性开始向日常生活弥散与播洒。一些亚文学的东西浮升上来,如手机短信就介乎日常生活的沟通与制造文学意味之间。但是,尽管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异,构成文学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改变,只是部分产生了变异。比如,(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二)文学是情感的、能打动人引起人共鸣的产物;(三)文学是深刻思想完美表达的艺术;(四)文学是可引起人快感、美感并达到娱乐的艺术。只要文学这四项基本特质还存在,它不管以什么方式、载体出现,它都构成文学,并具有文学性。比如崔健的摇滚曲《一无所有》,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它能在感情上抓住你,打动你,那它就是文学。难怪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大教授谢冕要将崔健的《一无所有》选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诗歌类中去。有人说:“大多数传媒文学是不可能经典的”。^[1]我以为这话既对但又不全对。宋词当时在酒楼坊肆流行的时候,又有谁想到它也能成为日后的文学经典呢?今天看,宋词当时的传播方式也相当于今天通俗歌曲的流行方式。许多优秀的唐诗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就被人广泛传唱,流行于社会之中而得以奉为经典的。流传甚广的“旗亭赌胜”故事反映出唐代优秀诗人的佳作在当时社会流行与被消费的盛况。流行的未必就是坏诗,不流行的未必就是好诗。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以及他的其他诗作在当时社会广泛流行,正说明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得到读者的喜爱。其实,唐诗上万首,经典选本也只选数百首,许多诗被历史淹没了。所以,严格说起来,历史上大多数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成为经典,而不仅仅是传媒文学而已。就如今天的长篇小说,一年一千部,又有多少能成为经典呢?经典是相对于后世来说的,是后世人对前世人创作的认可。当社会有需要出一千部小说,且有市场,它就有出现的理由,这总比“文革”时期只有八部样板戏要进步得多。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传媒文学都成为经典,但也不要想到只有传统的纸质媒体文学才可创造经典。其实,从逻辑上说,传媒文学这个词也是有问题的,难道纸质媒体就不属于传媒之一种了?报纸也是传媒,难道报纸上发表的小说、诗歌不能成为经典,而只有传统的文学月刊杂志比如《十月》、《收获》、《花城》等发表的小说、

诗歌、散文才可能成为经典？经典不经典，跟传媒没关系，关键在它提供的信息是否构成文学，并能否具备日后成为经典的元素。

其次，应弄清文类的变化。当今时代，基础文类已发生新变化。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小说已受到大众的重视，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故小说被梁启超视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这种叙事文类已代替诗赋抒情文类成为文学的主流。而如今，虽然叙事文类仍是主流，但内部却产生了分化与变化。如影视借文学为蓝本插翅飞入大众百姓家成为核心媒体，而杂志、戏剧等沦为边缘媒体或文类。不同的媒体形式反过来又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方式，包括叙事的方式。比如流行歌曲，我们长期视其为“快餐文化”而不研究它们的文学构成、思想文化内涵及其表征。当今流行歌曲在叙事文类的影响下也靠近叙述，而减少了抒情。我们的文艺学不能无视文类内部的变化。不去研究并及时总结这些变化的现象，理论就会滞后，而且新的原创性的文艺学也无法构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纳曾指出，一种原创性诗学的形成必然是与它所基于的基础文类相关的，像早期欧洲的“摹仿诗学”建立在再现文类戏剧的基础上，中国古典“情感—表现”诗学则是在抒情文类抒情诗基础上产生的。^{[2] P32-33}从20世纪初以来，经过100余年，中国的叙事文类已成熟，且与国际上的叙事文类理论相通。但中国当前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诗学并没有多少原创性，是追随西方而行的。如果我们掌握好当今文类的变化，研究其美学构成规律，尤其是研究中国叙事文类的独特性，对构建有原创性的文艺学是有帮助的。比如现在有学者提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写意小说”的问题，将它们的出现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诗画乐的艺术传统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就有助于揭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特有规律。

再次，要尊重中国经验。外国的理论进入到中国是要产生变异并带上中国人的理解和再创造的。如20世纪早期从西方传入的“现实主义”理论，在茅盾等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有自己的理解，到了50年代-60年代则更有邵荃麟、秦兆阳等理论家的自我创造。80年代-90年代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是变了种的了，难怪起初还有人指认他们是“伪后现代”。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它带上了中国学者的理解和阐释。理论流通与交流虽无国界，但理论的产生与再创造却有国别，这就凸显出中国经验之重要了。中国面临的消费时代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消费时代有差别，作家的感受不一样，所产生的文学艺术也不同，这便是中国文学的中国经验。同样是大众文化，但在中国和西方面临的命运也可能不一样。比如西方的现代舞，邓肯当年创立时是为了使舞蹈从古典舞中解放出来，使舞蹈从宫廷、贵族豪宅走向平民，并走向自然，但现代舞传入中国，却成了精英式的东西，它想要成为大众化也难。当前文化产业界也想引进一些在西方国家属于大众文化的戏如《猫》、《大河之舞》之类，但到中国后由于票价的问题，一般大众是难以问津的，它们反而成了“小众文化”。这就是中国经验之不同。文艺学只有很好地尊重中国文学的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的真实问题，才能更好地诠释中国文学，创建新时代要求的文艺学。

又次，调整观察视角。文艺学关注当代文艺现象，也应与时俱进地调整观察问题的视角。如从生产的视点观察文艺现象，对文学作品的产生、消费与流通过程进行把握，充分了解其中的形象是根据何种需要生产出来的，其生产方式有何特点，为何需要按照那种方式去生产。从生产视点观察问题是文化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文艺研究吸取其优势，能够更好地补充自身的不足。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观很早就提倡从生产与消费对象的关系研究文艺，后来的接受美学也具有类似的视角。只不过，过去文艺学对文艺生产的问题未加以特别重视而已。又比如文学当中的虚拟真实问题，也必须从当今数字时代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去加以理解。“虚拟”问题如今也成了哲学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生活中的人往往也错将电脑中的虚拟世界当作真实。何为生活真实？虚拟真实是否也构成了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不少奇妙的故事就产生于“虚拟”的真实生活之中。

最后，坚持文学的批判、拯救与超越功能。在消费社会，文学并非一味追随市场，迎合大众口味和趣味，它应该坚守文学的理想，坚持文学的批判、拯救与超越功能。千百年来，文学有歌颂盛世、粉饰

太平的功能，文学在为帝王宫廷服务的时候的确有这种功能，这也是文学功利的一面。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还可表现在批判性上，如白居易主张的“新乐府运动”，虽提倡文学对现实的讽喻，但也是具备功利性质的。白居易针对中唐社会现实，根据文学发展的需要，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诗歌要多关注世事民生，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文学功利性是不可能被完全排除的。关键是文学还有“无用为大用”的一面，也还有大关怀大拯救的一面。伟大的文学家往往都有一腔悲天悯人的大胸怀。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批判，有时往往是功利性色彩淡得很的。他们往往从人类生存困境与出路的探寻入手，在人类的绝望处指出希望，实现将批判与拯救结合起来的文学超越，从而带给人类以信心、勇气与希望。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文学正是在揭示人类生存困境之中透露出批判与拯救，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鲁迅也是如此，他在犀利地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创作中寄寓了他对中国民众、社会的拯救与希望，他的“救救孩子”的呐喊不是对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的警醒和拯救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怕的就是民众、社会对他的不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中能怀有鲁迅那样阔大胸怀和远大关怀者罕有。消费时代的文艺学应该坚持文学的价值与理想，鼓励与引导文学创作的批判性、拯救性与超越性，在消费社会中为人类社会提供强烈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 曹万生. 消费时代文学人文性变异之思考 [J]. 中外文化与文论 (第11辑).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 [2] 厄尔·迈纳. 比较诗学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88.

文化热、文化批评与消费时代

◎ 林岗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作为热点的讨论题目，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还没有文化批评这样的说法，更没有进入所谓的“消费时代”。当时一般的说法是文化热。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批评界和学术界的文化热自然有其不够深入的地方，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有流于表面化的毛病。当初文化之所以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大概是因为希望突破钳制思想多年的带有教条色彩的框框，希望别开生面的同时能够承继五四的启蒙精神再次启蒙。创新与启蒙的冲动实际上是80年代文化热的动机。这时候的文化热和西方对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批评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至少在文学批评领域，它的具体操作现在看来还是很传统的。文化热中的大部分批评还是关注文本的，文本始终是讨论的重心，只不过切入文本的视点不是阶级、社会或政治，而是文化。文化与传统联系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进一步深入和发挥的契机。

文化热在80年代末就落下了帷幕。到了90年代，学术界经过短期的沉寂，兴起了文化批评。学界有人以为这两者是先后相继，表明文化问题持续升温。表面上是这样，细看则不然。我以为它们产生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情景。文化热的时候，尽管这个社会已经处在现代的进行时之中，但“现代”还拥有耀眼的光芒，就像一个遥远的理想吸引着你不停地追逐，无论你多么努力追逐，你不可能赶得上。进入90年代，社会的情形似乎变得不同了。至少在大城市，在知识精英的生活身边，物质层面的世俗生活急剧变化，真是一日千里。从前纵使千呼万呼也难得一睹真容的市场，不但来到了身边，而且它已经无孔不入。哪怕你想从市场逃走，也发现无路可逃了。90年代这壮观的“现代登场”，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知识精英再启蒙的期望，因为他们至少感觉上触摸到例如市场、现代这种在十多年前还像神灵一样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一旦直接碰面，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油然而生。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现代”不但没有从前想象中那么可人，连“市场”也是凶相毕露。

最直接的伤害可能是市场夺走了知识精英想象中的听众，这种抢夺的另一个学术的说法就是消费。启蒙时期像众星拱月般托着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的大众，如今调头不顾，遗弃了启蒙的呼声，向着市场大步走去，拥抱消费。这种伤害是致命的，因为缺乏听众就意味着边缘化。曾几何时，对启蒙的热衷和执着，换来了知识精英在社会版图中边缘化的位置。对自身利益的伤害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生活市场化引起的秩序重组出现了弊端，例如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公共资源不能平等共享，利益集团多方把持等等，令知识精英从市场、现代、消费中猛醒过来。他们要反击了。

90年代初学术界有一场不小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应该被看作是知识精英的第一次反击。作俑者希望在市场逼近的威胁中高扬人文精神，设想自然是值得嘉许的，但从讨论的匆匆退潮中可以看到曲高和寡的悲哀。首次的反击看来成效不大。接下来的故事就像近现代思想史上任何思潮发端的模式一样了：首先是借助传入的“西法”，然后让它回应本土产生的问题。算起来，广义的文化批评在西方也有了不短的岁月了。不早不晚，偏在90年代的中国文化批评大行其道，这说明尽管社会变迁不平衡，广大的内陆地区还存在着“内部第三世界”，有的地区甚至还处在“前现代”的状态，但是不得不承认，至少在沿海的大都市，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消费时代。

如果不是单纯从技术的角度理解西方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则可以把它看成是对现代性反思的思潮和理论。它们和那些建构性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理论有着太不相同的理论趣味，我们不难从中把它们区别开来。在这一长串的名单之中，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应该榜上有名，他们是后来的批评理论的健将福科、德里达等人的前辈宗师。他们确实看到了现代性的弊端，并且给予深刻的揭示。在西方，批评理论戳破了启蒙时代以来社会不断进步直至建成世俗天堂的肥皂泡，就像启蒙思想家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天国终将降临的信仰幻觉。总而言之，文化批评或者批评理论，顾名思义，它们在西方整个思想体系之中，是扮演批评者角色的。

经历了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也终于要服下文化批评这服药了。这当然是因为现代性本身出了问题，先不说如何补救，首先得让人们认清现代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得让人们从现代的幻觉中醒悟，不再沉迷。我想这正是文化批评和批评理论的价值所在。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有很强烈的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思想比较，似乎有点“作对”的色彩。不过这种强烈的批判性，正是文化批评的生命力所在。如果缺乏批判精神，文化批评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批判的角色和建构的角色，好像相互对立，立场南辕北辙，但从全面的眼光看，这是一种抽象意义的社会分工，看似誓不两立，其实相互补充。

将这样的理念落实到观察文化批评在中国近年来的进展时，我们发现情形并不令人满意，最堪忧虑的是它似乎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名号是有了，西方的批评理论也译介进来了，舆论也造起来了，可是真正的批评在哪里呢？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并不难发现，既然是消费时代，那么文化批评也就有可能演变成文化消费，供大众消费，供圈子消费。这是消费时代特有的现象，而圈中之人对此似乎缺乏应有的觉悟。文化批评是消费时代反思性的产物，因此它也有被消费湮没的危险。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正是它走上被湮没命运的信号。

现代性的弊端也和以往那些政治性、制度性的弊端不同，人们找不到具体责备的对象。如果一定要找一样东西来责备，那就只好责备人性。原因在于市场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让它形成，而是无数人的自发活动形成的。市场的扩张也是如此，说它好也罢，说它坏也罢，它就是那样以不可阻挡的姿态一点一点蚕食了原来非市场的领地，把我们的生活卷进了它的洪流里。文化批评也不例外，尽管它要反思现代这种市场的蚕食，好像是站在市场和消费的对立面，可是市场同样不会放过它，市场和消费是没有爱和恨的。爱也罢，恨也罢，只要能够产生有效需求，市场就会前来亲近，消费就会前来凑热闹。就其姿态来说，文化批评针对的正是市场和消费，可是市场和消费却是没有立场的，它们不分敌友。而文化

批评的隆重登场，以其时髦、新颖的面貌出现，这正是市场和消费求之不得的地方。于是大众传媒就会介入进来，商业运作就会自然而然产生，批评成了热点，理论成了时兴，消费效应于是就顺势而起。本意也许是严肃的反思，结果却是消费的“共谋”，文化批评遭遇了尴尬。这种情形近年我们看得不少了。

对文化批评来说，重要的不是看它揭起了反思现代性的大旗，不是看它字里行间表明的对市场和消费的批判性姿态，而是看它是不是以消费的方式出现。文化批评在中国要有所建树，要不流于表面文章，一定要坚持真正的批评精神，同时也要对市场和消费有真正的觉悟。

当代审美文化的消费本质与时代特征

◎ 高小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审美文化”在当今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充满歧义和矛盾的概念。广义的审美文化可以包含与“审美”这个概念有关的一切，实际上把传统意义上的审美经验和观念问题统统包含了进去；狭义的审美文化则指涉传统审美活动之外的扩展了的审美经验问题，这个涵义往往和另一个概念“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联系在一起。同时关于这个概念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评价的矛盾：一种是从席勒美学观念衍生出来的肯定性评价，即认为审美文化是人性整合的完美文化形态；相对立的则是批判性评价，认为审美文化是文化工业通过审美乌托邦的幻象操控个人精神的反人性形态。关于审美文化问题的讨论常常表现为这些概念上的歧义和评价矛盾。

如果要使审美文化问题真正具有学术意义，重要的是确定这个问题的客观性或对象性，在肯定或否定之前进行具有学术性的分析研究。那么，这个概念的对象性如何确定呢？抛开词源考证和词义阐释方面的争论，首先应当明确这是个从中国近年来的文化现象中激发出来的文化和学术思考问题，“审美文化”的核心就是当代审美文化。而这个当代问题产生的语境则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变化。许多学者注意到，中国社会生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规模城市建设和改造的基本趋势是美化环境——现代化、舒适化、娱乐化、绿化、亮化等等；城市中个人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方式也从物质需要的满足越来越转向符号性、形象性、娱乐性需要的追求——休闲、旅游、美容、健身、娱乐等等。“审美文化”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因此而成为现实经验提出的新的理论命题。

这个问题并非纯粹是基于中国经验产生的。从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学术视野的阿多诺、本雅明、鲍德里亚到近年来为人们所知的费瑟斯通、韦尔施、菲斯克等人的论著都已对这个话题谈论了很多，这个问题其实首先是从西方文化批判中引进的话题，而后才对号入座地找到了当今中国文化经验提供的对象。这个对象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和西方文化批判对象相似性而产生的。在80年代，审美文化这个概念还没有被使用。审美活动从狭义的艺术活动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方面，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文明和人性的进步。显然，这是一种席勒式的乐观主义美学。这种对审美文化的乐观主义评价源自对“审美”这种经验所作的超越性解释，即从康德的无利害观念延伸到席勒的自由完美人性观念，审美被理解为人类精神需要发展的顶峰。

到了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社会生活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审美向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渗透，进入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阶段。然而这种审美文化的“审美”内涵却不再是席勒式的超越性经验，而变成了以感性愉悦和符号性交往为特征的世俗经验。审美并没有使人变得更自由、更完美（如同席勒想象的那样），倒好像越来越变成了盲目、被动的审美产品的消费者（如同阿多诺所批判的那样）。审美文化因此而越来越成为批判的对象。按照阿多诺的思路，具有社会批判性质的艺术和审美经验才具有积极价值，只要是令人愉悦、满足或与社会认同的审美经验——无论是鄙俗的还是高雅的——就都会因为服从、迎合社会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后来激进的文化批判者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文化环境中，审美经验的愉悦性或社会交流性质都会成为商业提供的消费品，从而使得这种精神性的满足变成由商人

的意图引导的文化消费行为。用这些观点来对照90年代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态势，很容易发现这种批判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的确充满了为满足感官愉悦和情绪体验而制作出来的审美形象。不仅各种艺术和游戏娱乐越来越多地进入日常生活环境，以往不具有审美意义的活动如居住、出行、购物、交往、工作等行为也被五光十色的图像和幻觉所包围。而这一切不断膨胀着的审美氛围背后则是商业动机——这些审美活动或者本身是提供给消费者的商品，或者是为吸引消费者而制作的幻觉陷阱。就连看上去是公益或行政行为的城市景观建设和文化活动，也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而进行的。审美文化似乎不过是商人设下的消费陷阱。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是以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高度不平衡为代价的。巨大的贫富差异形成了审美消费中的身份差异，审美变成了强势群体的符号交往和等级化的身份认同方式：别墅、高尔夫、豪华汽车或西洋歌剧、古典美术等生活方式和趣味所构造的形象中隐含着对身份等级的划分，否定着当代文化的民主性和平民性，因此产生了审美文化消费的公平性问题。难怪有学者义愤填膺地质问：“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究竟是指谁的日常生活在审美化？

但是这种文化批判的激烈态度却遮蔽了一些深层的文化问题。当我们用消费文化和商业动机来解释当今的审美文化现象时，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所有的审美文化现象都有可能是商业行为的结果，却并不等于这就是商业动机的实现，尤其不等于某种假想中统一的、实体化了的商业动机（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首先，并不存在统一的实体化的商业。尽管所有的商业可能都要遵循某些普遍的市场运作规则，但各自之间不仅在利益方面可能是互相冲突的，而且在意图、手段乃至理念和道德方面可能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商业意图并不等于商业效果。商业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产品从理念上讲，可能性是无限的——供农民工消费的廉价盒饭、二手自行车和手机，为大老板和金领阶层制作的豪宅、会员制俱乐部，“小资”们中意的情调酒吧、古典音乐会，分别为布什政府和萨达姆政府生产的坦克、战斗机，甚至还有提供给恐怖分子用的爆炸物和生化武器……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一切，其实还有更多的（据伯明翰学派说是95%）的商业意图胎死腹中，没有形成社会消费。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淘汰、选择这些商业意图并形成了具有普遍影响的消费文化呢？说到底，其实是消费者。把消费文化描述成资本对盲从的大众进行操控的结果，这可能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不可思议的文化推理结论之一。无论我们怎样批判当今的审美文化或消费文化，都不能忽视这种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内在可能与人性发展的普遍需要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商业操控了消费者，毋宁说是消费者选择和鼓励了商业。消费文化的实质就是在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不断地增加符号的、表象的、幻象的产品，从而推动着文化活动从生存、繁衍和安全向交往、体验和幻想扩张。德国学者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也是注意到人类文明向符号化、幻象化需要发展的趋势。现代商业只是在前所未有的效率和普遍化激活和扩张着这种趋势。

有的文化批评者特别注意到当代审美文化的虚幻性质，认为这是一个用“仿像”或幻象替代真实的时代。当我们看到人们的精神需要和生活理想如何越来越被虚拟图像所充斥，现实中的危机、痛苦、不公正如何被美化、亮化的奢华图像所遮蔽，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然而承认事实和研究这个事实的意义之间还有很多路要走。就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繁荣程度最高的珠三角地区来说，都市文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典型的消费文化形态：鳞次栉比的酒店和餐馆、华灯璀璨的街道和广场、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还有几十个电视频道提供的无数偶像和梦想……在这一切审美化了的都市生活图景的另一面，则是无数加班加点工作着的打工仔、踟蹰在闹市区的流浪汉、马路上伺机抢劫的飞车党等等非审美的真实的生活图景。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当代审美文化图景的幻象性质。

进一步分析这种文化矛盾就会发现一种悖谬：以奢华的消费为核心而凝聚起来的审美文化图景同背后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是社会现实的两面。从贫穷山区和西部涌到南方来的人们当中，大多数并非仅仅为了生存，而是被这里的消费文化所展现的幸福想象或幻象所吸引而来的。幻象吸引着追逐梦想者，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日益脱离了传统的现实秩序。幻象没有替代现实，而是贬低了现实，使得符号、想象和体验超越于物质需要。结果是人们可能越来越缺少了满足和幸福感，越来越增长着期待、焦虑和失落。这是时代的痼疾，也恰恰是时代的活力所在。

知识分子批评与文化批评

◎ 金 岱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时期近30年的中国文学批评有巨大进步,其进步之处主要在于:一,突破了极端政治功利性的桎梏,初步形成了批评的多元格局,特别是形成了与政向批评(政向批评从宏观、中观、微观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意识形态向度批评;二为政治战略走向批评;三为政策动向批评)分立的学科批评(建制化的,对象化的,科学主义性质的学术研究)与市场(媒体)批评这样两种生机勃勃的批评形态,尽管这两种批评形态还需要更独立和成熟。二,出现了与政向批评有点分立的知识分子批评的声音,尽管这种批评至今不成独立形态,声音微弱,甚至越来越微弱。

显然,中国文学批评正在日益走向多元和繁荣,但是道路仍然曲折,问题仍然严峻。近30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作为过去唯一强势批评话语的政向批评,今天变得暧昧不明,它飞沫般地散见于学科批评和市场(媒体)批评,乃至见于一些似乎是知识分子批评的批评里,一方面,丧失了本应作为多元批评中一元的、自身独立的批评形态;另一方面,这种暧昧和隐而不显,又影响和障碍了其它批评形态的真正分立,影响和障碍了批评的真正多元和更加繁荣;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则是,知识分子批评始终未能形成较确切的形态,声音越来越微弱。较多地具有知识分子批评意味的,承接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在80年代也曾活跃一时的启蒙话语(现代化与现代性吁求)路径,在90年代经济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却一直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包括学科、市场、传统文化、西方后现代话语、“新左派”等等的压抑,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对于正在进行文明转型的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多元的,各自分立且相对清晰的批评形态,政向的、学科的、市场(媒体)的,都不可少,知识分子批评亦不可少,在今天的语境下,甚至最不可少。知识分子批评不像政向批评那样具有当下规定性,却更具超越性;它不像市场(媒体)批评那样具有当下效益性,却更具批判性和建设性;它不像学科批评那样有明确固定的对象性、专业性和较稳定普泛的操作性,却更具思想性和创造性。

知识分子批评首先是一种公民批评,既不是子民批评(不管是驯服的,还是反抗的子民批评),也不是权力话语批评。知识分子批评作为公民批评,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则中,从每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发出尽可能不受言说者自身阶层和利益局限的声音。

独立性是知识分子批评的本质之一。它不依从任何权威,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意味着独立,知识分子必须、也只能独立特行。法国学者朱立安·班达是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是独立特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接了当地责难的)。”^[1]

知识分子批评是知识分子场域内的具有纯粹的思想文化或精神文化传播,它既不属于大众文化传播,也不属于学术教育传播。^[2]知识分子场域是中国的现代化亟需建设的一个场域。现实的权力场、经济场和边界清晰的学科学术场,都已走向成熟,然而缺乏了具有超越性、敏感性和预言性的知识分子场域的制衡功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将不是一件妙事。

知识分子批评面对问题。它不像政向批评那样面对现实境遇,也不像市场(媒体)批评那样面对现实的市场需求,它面对具有超越性的、已然出现或可能导致严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暂时不被广泛的人群关注,却可能是对社会或人类未来走向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学科批评面对的是学科对象,这对象可能包含许多问题,却以对象为焦点处理问题。知识分子批评却以问题为焦点,这一问题焦点可能涉及多方面对象。

知识分子批评的形态与晚近涌现的国际性的思想潮流当代文化批评至为相合。当代文化批评的根本

特征，正是问题性和当代性，或当代问题性。不像传统科学主义性质的学科研究那样以对象为焦点，而是以问题为焦点，例如现代性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后殖民主义问题、女权主义问题、大众文化问题等等。当代文化批评的跨学科特征，不是以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为对象，而是几乎完全打破学科界线，以问题为焦点综合面对多方面对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任意切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具体的对象性研究。例如，面对制度文化问题，就不像90年代某些论述那样以人文话语的方式直接切入制度运作、制度创设的具体研究，文化批评讨论的是制度文化，而不是制度本身。同理，讨论器物文化也不像自然科学似的讨论器物本身。此外文化批评之所谓面对问题，是面对一个一个的问题，一如科学之面对一个一个的对象一样，而不是面对自然社会人生抽象具体形上形下无所不包的问题。

当代文化批评的再一个特征是书写样式不定，或曰跨文体，超文本写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写作，社会评论性写作，文学创作性的思想随笔方式的写作，甚至叙事性写作，如某种历史写作，某种寓言或某种小说方式的写作，等等样式，都可以是文化批评的写作样式。当代文化批评本质上就是非科学主义的批评，当代文化批评的写作也是非科学主义的写作。

作为当前国际性思潮的当代文化批评，也许本质上正是一种知识分子批评。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它直面问题，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以独特的风格、思路，提供独特而系统的思想，即独特风格的百家之说，作为知识分子间，以及全社会多样言说主体间的思想交流。

问题、立场、独立、超越、批判、思想、跨学科、跨文体、超文本、风格等等，乃是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的关键词。因此，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当然可以将当代大众文化作为问题（而不是作为对象如时下我国相当一部分文化批评所做的那样）来进行研究，而且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立场，以独立和批判的目光予以审视。这里并不是说，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只能用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的态度和思路来对待大众文化，但不管怎么说，毫无距离，完全认同，将大众文化作为对象，进行客观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的研究，则肯定不是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当然也仍将面对文学文本，但它关注的是问题域中的文学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的文化意味，文化问题，而不是像传统文学批评那样，以文学文本为焦点关注的只是文学文本之内所涉及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所面对的文本不仅是文学和艺术以及大众文化的文本，而可能是更为多样的文本，社会文本、心理文本、精神文本等等，但都不是作为对象的文本，而是问题域中的文本。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所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多样的。就处于文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民族身份自我认同（传统文化）问题、女性主义问题等当然是重要的问题，但也许更为重大却并没有被当代文化批评纳入其项而首肯为文化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在90年代一直被压抑、被遮蔽的问题，还是沿着启蒙话语的思想路径（包括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也包括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意见），在拥抱现代化（性）的前提下批判和完善现代化（性）的后期现代性研究，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文明转型的伟大历史时期中，重寻价值，重寻生活方式和精神规则，重建生活世界尤其是我们的生存本体（或可归结为生存本体）问题！

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现代文明，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话语所开启的科学技术、工业产业、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法制国家、民主政治、人道主义（以个人主义与人类主义之统一为理念核心，自由、人权、博爱为主要内容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否已然过时？现代性的负面和根源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通过审美现代性制衡现代性的负面？如何才能从中国和东方的文化传统中提炼出能贡献给人类现代化（性）的营养或财富？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能够和平与和谐地沟通共处的人类多元文化、多元信仰、多源流、多样态、多风格的生存本体建构？如何才能走向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现代性文化——后期现代性文化，并从而走向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现代社会——后期现代社会？

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至少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向度，应该面对和尽力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并在这回答中，走向建设性的后期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塞义德. 知识分子论 [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2] 金岱. 论文学的知识分子间性 [J]. 学术研究，2005, (4) .

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迷惑

◎ 徐肖楠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消费时代并没有在中国全面、真正地发生,但正越来越近地走向我们。消费主义与现代性、市场化、小农意识、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混淆在一起,其现代价值已经模糊,并越来越深入中国社会而形成一种生活方式,继续不断地成为新的社会变化和生存形式的理由。于是,具有消费主义精神的文学表现日趋增多,消费与文学的话题也越来越引起文学批评的注意。

人们不得不探讨文学批评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意义。这样的思考试图把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系从经典观念中延伸出来,并与消费社会的文学艺术实践密切相联。在寻找这种意义和关系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消费主义是一个对文学批评极有魅力和影响力的现实生存情景,它带来了与市场和生产相关的唯美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一系列真实而又容易造成错觉的艺术问题。这样一些文学艺术的批评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它们与现实问题一体化而同时构成人们的现实生存和艺术生存,这带来了文学批评的困惑性和复杂性。

面临消费时代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时,首先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1.什么是消费时代?2.文学在消费时代是什么?即文学还是一种诗性的精神现象吗?消费时代,意味着消费不仅仅是消费本身,而且构成了人们的生活。那么,被消费所改变的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再次分裂出两方面的问题:1.消费时代作为一种现实而改变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什么?2.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与消费不同的生活改变了消费的什么?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现实的一种形式也被消费时代包含其中,同时也作为一种诗性生存形式要超越消费时代。

消费的发生带有审美化趋势,对物进行消费,同时激发自我想象和生理、精神的愉悦,使人们更有消费的理由,这往往弱化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强调其象征意义,因而也激发了文学批评进入消费领域的可能。在消费社会中个体的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掩盖,其审美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地保留在快感阶段,而消费所强调的是社会中事物的瞬间性价值。显然,这样一种注重瞬间性价值的消费观念在影响着文学批评。消费主义文学的不断蔓延及其不断衍生的新品种,例如短信文学现象,正在用瞬间性价值解释文学批评与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消费主义的文学批评同时在现实和象征的意义上介入消费社会,让更多人发生改变,而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命题本身的含混,由于文学批评隐含的广阔的想象空间和阐释空间,对消费主义的文学批评借助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对消费主义的任何修补、调校、追问、拆解、批判、张扬都成为可能,这种文学批评行为本身就包蕴了消费意识形态。但与具体的消费生存相对应的文学批评,也只是少数文学批评,虽然大多数文学批评也可能包含消费主义意识。

在谈论文学批评与消费时代的关系时,需要顾及几个方面,以便构成更谨慎提问的可能。1.弄清消费的基本含义,看到消费主义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2.消费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产生了文学批评与消费的非单一精神化关系。3.文学批评必然要面对消费性现实,文学批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本质,就是文学批评要关怀人类的现实生存。4.不能将消费生活等同于一般生活,不能忽视消费主义的现实特性和文学特性。5.文学批评要肯定文学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是独立的诗性存在,并不消融于任何日常生活审美和精神消费之中。6.弄清日常审美与精神消费的关系,特别注意两者并不等同,也并不相互构成存

在的理由。7.避免将消费化等同于市场化,避免文学批评用对市场化的态度对待消费化。8.避免文学批评对消费主义采取单一的抗拒或支持态度。9.注意消费主义发生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国式消费与西方发生的消费情景并不同。中国的小农因素一直延续到现代性和市场化中,修改了消费在中国发生的含义。

消费时代是一种现实,文学批评是融于现实之中而不是游离于现实的。文学批评根本无视和对抗消费生活的做法,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文学批评被包含在现实中。文学批评面临的消费主义文学是一种生活表现,这种生活表现不能被文学批评所否认,它也不能排斥文学批评的存在。文学批评并不单方面地构成消费生活的对立面,也不情愿与消费生活建立一致的攻守同盟。文学批评与消费时代的关系是既在消费生活之中,又超越于消费生活。文学批评与消费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消费是一种现实,文学批评是一种诗性活动,诗性若不能超越现实,便不成为诗性活动。诗性若等同于现实,也不成为诗性。文学批评在消费生活之中而又超越消费生活的这一特点,要求文学批评自身具有不被消费生活所瓦解的品质,否则,它将成为消费生活的被动依附,无法保持文学批评与现实的正常关系。

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文学批评怎样在消费生活之中?如何成为消费生活的一部分而又如何超越消费生活?文学批评既要反映消费所代表的物质性现实,又要从消费的精神或主体层面进入物质性消费生活。最终将两方面诗意地融为一体。文学批评在消费情境中的可能三个层次。

第一,文学批评有可能是消费时代的对应表现,它像镜子一样映射消费生活,直接进入消费时代的文学情景和价值,这包括消费生活内容也包括消费生存态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批评已经发生;另一方面,这也同时产生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批评如何建构的问题。简单地说,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发生由不得我们的意志,但它的发展却可以在一定程度加以控制。

第二,文学批评深入消费时代的生活和文学表现而展开自身的意义。这首先取决于不将消费生活看作唯一的和绝对的生活,也不将它看作代替和控制历史的方式,同时也不将消费主义文学表现看作唯一的和绝对的文学,也不将它看作代替和控制文学的方式。如果将消费时代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仅仅看成亲昵一致或抵制对立的关系,其关系没有因这种单方面的立场而简单化。其实,文学批评要跟上现实变化这样的立场我们已经有过,在文学批评面对市场化兴起时,我们就采取了简单的让文学批评支持或反对市场化的做法,并正在把它延续到消费时代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中。实际上,文学批评不是一个东西,由不得我们让它融入或不融入消费时代。

第三,文学批评融入消费主义所改变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得改变生活的意义。消费精神本身包含着许多悖论,消费本身同时包含着物质与精神,消费本身既是对精神或主体的促进,又是破坏。精神生存会随着消费生活而改变,反过来又改变消费生活,消费品质会随着精神品质的改变而改变。如果在精神状态中包含对美和诗意的追求,它必然会改变生活,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美和诗意的生活体现,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被包含在消费生活中并介入和改变消费生活的。这时候,文学批评才真正融入了消费生活。

文学批评不能紧紧追随消费、依附消费、赞美消费,又不能拒绝消费、旁观消费。困难的是,在承认消费性现实的同时,必须保存和追求文学固有的审美精神和诗性生存。如果单方面地将消费时代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紧跟生活的表现,将消费作为一种新的批评主题或者批评的进步来欢呼,就可能迷惑了自己。其实,在消费时代中,文学批评也可以不以消费时代为内容和主题而写出新的批评个性和审美风格。消费性现实是现实的一种,不承认它就是不完全承认现实,这违反了文学批评忠诚于现实,与现实一体化的本质;但对消费性现实的承认,却又容易迷失和瓦解诗性,因为消费具有摧毁一切的含义。

文学新形态与文学博客群

◎ 刘海涛 (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消费时代的文学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文学的存在形态和呈现方式出现了转型。传统文学作为正宗的语言艺术主要作用于人们的视觉,通过一个个方块汉字来激活文学欣赏者的审美想像。今天的文学借助的媒介不完全是语言了,现代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使文学有了音、声、画、文的综合包装,文学由单一的语言艺术向综合艺术靠拢,文学欣赏从过去由视觉到想像的单一路径变成了调动人的多种感官的全方位审美体验。经典文学书籍开始了图文并茂的时代;儿童文学全被动漫书挤压;网络文学的作者竟可以像电影导演那样,将文学、声音、图像、动画、数码、视频等信息剪辑、综合成为一种新形态文学;那种曾以纯文学方式存在的散文诗,配上精美的数码照片后,成了街头大厦旁的大幅艺术广告。陈平原曾这样归纳文学的变化趋势:多媒体演绎的文学“导致了图文并茂、动静相宜的知识传播与接受图景,极有可能催生新的学术意识与知识框架。”(《数码时代的写作和阅读》,《南方周末》2000年7月7日)

其次,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节奏被缩短了。日益繁忙的商业社会生活使文学欣赏者很难创造一种从容、闲适的心境,用几个月的时间去阅读一部分上、中、下几大卷的文学巨著。那种有着快餐式的精短文学悄然开拓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消费群体。一部长度只有10分钟、拍摄成本仅400英镑的小电影《当男人遇到自己》居然入围2005年法国戛纳电影节。网络小电影在网上流行并走俏,普通民众用DV拍摄的电视小品进入市场。演出时间仅10分钟左右的戏剧小品成了每年中央电视台“春晚”的重头戏。《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以月发行70万份的成绩让所有的纯文学刊物的主编惊慕。《读者》文体、《家庭》文体、《知音》文体(实际上是当代一种新形态精短散文)的研究招来了众多文体家的关注。如果说,农耕时代的文学经典是以长篇小说为主,工业时代的文学经典换为长篇影视的话;那么,以消费为特征的信息时代(或者说后现代社会)的文学的主角位置是否开始被这种精短文学抢占了?

再次,文学的某部分本质和功能出现回归和强化。人类理想中的生存方式是“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文学的产生、发展的根源是人类想通过生命文学化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消费时代,文学的这种本质和功能并没有弱化或消失,相反,它通过另一种形式和途径反而对回归和强化有了响应。风靡全球的《哈里·波特》昭示着文学开进了“奇幻文学”的快车道,强化了文学的想像功能、实现了文学在商业社会中仍然能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的部分本质。从文学创作者队伍的演变角度来观察,网络写手的出现、自由撰稿人职业的产生,使文学创作主体队伍中涌现了和文学“国家队”(专业作家)、文学生力军(兼职的省和国家的作协会员)、文学后备军(校园文学作者)并列的“文学博客群”。文学创作队伍的这种变化,深刻地改变了消费时代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格局。文学博客群的生存和发展使文学的平民化、个性化本质得到真正的实现,文学写作从过去高雅的贵族化神坛进入了普通大众之家,“文学博客群”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开始扑入“学院派”的研究视野。可以说,消费时代的文学写作队伍和文学写作方式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文学欣赏新现象和文学研究新课题。

今天人们生活、工作、精神的转型,导致了文学的定义和功能发生改变,文学的文本形态和审美形态出现变异,从事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的人有了热闹的论争——童庆炳说在今天的消费时代文学要回到经典,而陶东风说文学要回到日常生活;金岱在各种场合都高举着文学精英化的旗帜,蒋述卓则认为文学的商业化虽然对文学的独创性提出了挑战,但消费时代并不是文学的克星,它为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多

种可能性；胡经之则坦言在今后的文学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活的知识 and 活的信息……从文学文本角度看文学新形态，从文学主体角度看“文学博客群”，这就是新现象，就是新的多种可能性。

“文学博客群”是一批在网络上生存、并采用新的文学表现方式、拥有自己独特的网络文学消费群体的新的文学生产者。他们创作的是新形态文学的一种样式——文学“博客文体”。临屏书写与网上粘贴是他们主要的文学写作和文学发表方式。他们面对电脑显示屏，用各种多媒体技术，自由地、即时地写下自己的心情文字；然后采用一稿N次投的“群发”方式，在各种文学网站的BBS或论坛上发表；他们建有自己随时更新的“博客专栏”和“文学专题网页”；他们中的部分人同时进出传统媒体，力争让自己的新形态文学文体贴近传统文学的审美规范，力争得到传统文学的认同和支持。像安妮宝贝等从一个普通的网上文学博客成长为传统媒体上的畅销作家，像方刚等用自己在传统媒体的成果（专栏文章）去经营一个自己的专题网站……一批优秀的文学博客几乎是游刃有余地在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上自由行走。若干年后，这一批栖居传统和现代两大领地上的文学博客将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学生产者。

文学创作理论和文体写作理论应该客观地正视“博客文体”的产生和繁荣。博客文体是网络写作环境下孵出的新文种，从形式上说，它给人们一种简洁化、系列化、立体化的突出感觉；从内容上说，它是人们个性化思想、个性化情绪、个性化生活表达的有效文体。“博客”(Blog)的英文涵义就是“网络日记”。它可以随时写、随时发，怎么高兴就怎么写，怎么高兴就怎么“贴”。它实际上是当代新散文文种在网络上的延伸发展。当代散文的自由、家常、随意的真正本性在博客文体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正因为它太自由、太家常、太随意了，文学博客群中一部分文化素养不高、审美能力低下的网络写手，在网上倾吐了大量的文学垃圾，一些毫无审美价值的个人隐私堵塞了网络，甚至于那些“下半身写作”的东西也在网上展览。博客文体首先应该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审美的底线。文学博客绝不能为了那些点击率而卖掉自己的美丽和圣洁，沾污自己的生活和美德。新时代的文学研究者和教学者有责任研究博客文体，规范博客文体、引导博客文体。博客文体中隐藏的闪光的“金子”应该得到挖掘；博客文体中的污水应该毫不留情泼掉。

真正优秀的文学博客需要扶持和培育。一些经得起历史淘洗的文学经典养料应是他们心灵的创作资源。可以为他们提供传统的出版、发表的园地和机会，可以通过对文学网站的有效管理和资助，创建一些文学博客群的真正的精神家园。新世纪的文学评论应该面向他们，给予一定的位置，高等院校的文学课堂可以引进他们的优秀作品作为教学案例。“榕树下”文学网站的征文与评奖；《芑草》改刊为《网络文学选刊》，正是传统文学主动出击的成功范例。各大小文学刊物象《萌芽》杂志那样，介入“文学博客群”，用“新概念作文”项目来引领校园文学博客的成长。可以像中南大学创建“网络文学研究所”那样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置科研机构，开展对新形态文学和文学博客群的集体科研攻关；像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网络文学研究”立项那样，各级科研机构可以为这种新形态文学研究提供研究资助；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通过《网络文学本体研究》的博士论文（欧阳友权）那样，可以让一些硕士生、博士生将新形态文学研究内容确定为学位论文的课题……如果这些都能基本到位，那么21世纪的新形态文学会走上一条健康成长的道路，文学博客群会在今天转型社会里真正树立自己的形象，真正激活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批评的多重指涉

◎ 李凤亮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由“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问题讨论而兴起的关于文艺学学科边界的争鸣,构成了当代批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论争的起因,不只源于不同年龄、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文学理论现状、出路的不同探求,还关涉到学界对文化批评理解的混杂。这种理解的混杂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简化了文化批评的概念,造成了自说自话的尴尬情境。

词语(包括术语、概念)的流传具有扩张性,一个简单的词汇,通过不同语境的嫁接,能够演变为具有多重指涉的术语。在当代学科跨越、综合的语境中,文化批评一词至少有以下三重不同的指涉。文化批评的第一重含义是“泛文化批评”,具体指突破文学学科界限的跨学科批评,以及突破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壁垒的跨艺术门类批评。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批评很有代表性,它是学科尚未充分细化时的批评形态,文学、历史、哲学等相邻的人文知识呈现出很大的同构性、互融性。而在跨艺术门类批评方面,中国古人将书论、画论、乐论与文论互为打通、综合诠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足可鉴取的先例。在中国现代批评的建构中,上述跨学科、跨门类批评的传统并未在西方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全然消解,它们不仅以一种精神方式进入到现代批评的中西对话之中,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着力承传中国传统批评智慧的现代美学家、批评家。王国维、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王元化等人的文化批评实践,正是在一种中西对话、古今汇通、文史哲交融、不同艺术门类互照互证的精神追求中催生的。经过一个世纪对西方文学批评方式的学习和借鉴,今天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重视向西方的鉴取,与重视从传统批评中获得有效资源,二者其实并不截然对立。事实上,中国传统跨学科、跨门类批评的整体论倾向,本身生长于一个学科界限模糊、思维方式综合的精神传统中,这种精神传统对于疗救因学科壁垒而产生的种种现代学术病可能有很强的疗效。在当下文学自身的跨学科、跨门类倾向日益突出(如跨文体写作、网络文学、电子文艺等的兴起)的情势下,上述方法有助于我们突破对文学的封闭理解,为过于细化的文学学科寻找更开阔的学术视野。

与泛文化批评反向,文化诗学批评着意于发掘文学文本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蕴含,这构成了文化批评的第二重含义。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曾作为新历史主义的别称。新历史主义者尝试在文学本文与文化系统(语境)的互动中实践形式主义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结合,他们“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与社会相互推动的过程”。其发起者斯蒂芬·葛林伯雷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明确使用了文化诗学一词,以倡导大胆跨越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界线的“跨学科研究”。^[1]显然,新历史主义者这种文化诗学的跨学科研究,比中国传统批评的跨学科研究走得更远。其所追求的,已不仅仅是文学理解,更有一种政治阐释。这种“意识形态修辞”,转移了文学研究的审美趣味,突出了历史颠覆意味与思辨品格,包含了一种浓重的“形式/文化学批评”(a formal/culturological approach)旨趣。文学文本这一开放结构所承载的丰富文化信息,以及凭借文学隐喻性获得的巨大言述空间,诱使文化学者们对文学文本抱有特殊的兴趣。文学成了他们从事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术建构的神秘入口。这一旨趣,在俄苏文艺学家巴赫金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巴赫金自称首先不是一个文学理论家,而是一个哲学家。他从文学作品的语言意义分析入手,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的形式研究,提出了“狂欢化”、“复调小说”等文化诗学批评概念,并最终形成了对话性的思想文化立场。在巴赫金看来,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文化不是两分的,而是一体的。文学文本可能正是某种文化、哲学观念的藏身之所。“文化诗学”批评的操作者们,看重的往往不是“文学是什么”,而是“文学可为我们提供什么”。

当代文化研究比文化诗学走得更远。它不仅改变了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而且在视野、方法、理论目标的设定上有了巨大变化。文化研究是在当代科际整合语境中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甚至突破学科界线的研究潮流,是多种流派、思潮、理论、方法的拼盘。它自20世纪中叶发端于西欧各国,90年代初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其范围涉及到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等。文化研究与泛文化批评及文化诗学批评最大的不同,一是研究对象已从单一的文学艺术文本扩展到一般的社会日常生活领域,这并不是说文化研究者已完全失去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事实上文化研究者们早期大多是文学批评家,他们的一些文学艺术分析相当经典,如詹姆逊对梵高《农民的鞋》、蒙克《呼喊》的分析),而是说一方面其主要分析对象已转移至影像、广告、超级市场、摩天大楼、精神病人、社会运动等事象,艺术的经典化被置换为日常化;另一方面即使他们面对文学艺术,其注意点也与传统的经典分析方法殊异其趣。另一个不同在于文化研究的方法呈现出混杂性、多样性、综合性,其批评指向更具现实性。统计学、传播学、消费理论、政治阐释学等各种新兴社会学方法通行无碍地进入到文化研究领域,传统的文学性、审美、形象、结构等术语在其分析中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消费、复制、文化大众、日常生活、阶级、政治修辞等语汇。文学批评家的敏感性为其顺利过渡成文化研究者作了很好的铺垫。“实践性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1] [2] [3]}使文化研究各流派在领域和对象的变动之外,增加了在研究思维、操作方法、价值立场方面的相似性。

从泛文化批评到文化诗学,再到文化研究,广义文化批评的上述三重指涉异中有同,各有侧重。对文学存在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加以考察,将静止的文本同活动着的世界结合起来诠释,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而尝试多种互阐互证……诸如此类,都在表明一个事实,即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多元时代已来临。它们挑明了令人瞩目的问题,即学科内爆的合法性。如果说接受美学的提出尚在方法论层面挑起“范式转换”的话,那么当代文化批评的兴起,无疑昭示了一种从研究视野到理论方法、学术取向的整体转换。当代学术生长于一个交流日益迅速而且广泛的世界中,因着学术与现实之间疆界的打破,并由于媒体迅速发达而引起生活方式、学术方式的变化,学人的社会关怀、现实介入欲望空前高涨。这种学术原驱力的变化,使文学研究与批评呈现出与传统迥然相异的面貌。社会的变化及生活方式的演变,为学科内爆提供了合法性,也为当代文化批评的兴起寻找到了方法跨越与现实指涉的多种可能性。

当然,这种合法性和可能性并不必然带来文化批评的现实完美性。学科的内爆有一定的限度,文化批评在操作上也有其值得警醒的地方。上述文化批评类型便值得我们仔细区分,否则不仅引起概念、立场上的混淆,更容易引发像“文艺学学科边界何在?”“文学研究是否已穷途末路?”等看似严肃、实质荒唐的问题。而文化批评类型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操作者具体的学术指向。如果只是想为文学文本寻找一个合理解释的宽广视野,那么泛文化批评足可担当;如果跨入文化诗学批评的领地,你所关注的,可能已不是文学文本,而是文学的身外之物;而文化研究更远远走出了文学的疆域,走进了更繁杂的世象空间。这带来了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即传统文学批评者知识的限度。显然,社会学视野与政治批判品格不是传统文学批评的“自在之物”,跨学科研究在既往单纯的文学教育中也属新鲜事物。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 文化研究(第1辑)[Z],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本栏责任编辑:陶原珂

补 正

本刊今年第2期第10页作者张保生的单位应为“中国政法大学”;同期第15页末行应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学 语言学•

宋元文章学的作家修养论

◎ 祝尚书

[摘要] 宋元时期的文章学,特别是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的作家修养论,涉及养元气、养心立志、养题气、养力(读书、历世)等诸多重大问题,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合乎时代思潮的创新,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

[关键词] 宋元时期 文章学 科举 修养论 陈绎曾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130-06

重视作家修养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我们比较熟悉古文家的修养论,而对以研究文法、文章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宋元文章学的修养论,却相当陌生。此盖因为宋元文章学著作多为科举而作,而科举时文又长期为人诟病,故这类课题便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实,宋元文章学的修养论虽主要针对的是举子,但其意义和影响都远在科举之外,仍然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

由于现存宋人文章学著作中论修养的较少,而以元代陈绎曾最为集中,故本文以陈氏著作为研究中心。陈绎曾的文章学著作,清钱大昕《朴元史艺文志》著录四种,除《科举天阶》失传外,其余三种流传至今。它们是:1.《文说》一卷。已收入《四库全书》,《提要》谓“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分养气、抱题、明体、分门、立意、用事、造语、下字凡八门。2.《文荃》。或著录为八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抄本不分卷,包括《古文谱》(四六附说)、《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古文矜式》,又附录其友人石柏所作《诗谱》。3.《文式》二卷。上卷为陈绎曾撰,下卷乃辑录宋元人论著,有李性学(涂)《古今文章精义》、吕祖谦《古文关键》的“看文章法”、苏伯衡《述文法》等。《文荃》、《文式》两书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陈氏盖生于宋元之际,其著作多引录宋人论著,可视为宋元时期文章学的总结。

一、养元气以充其本

宋末学者李涂在《文章精义》中写道:“做大文字,须放胸襟如太虚始得。太虚何心哉,轻清之气旋转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荣华,禽兽昆虫之飞跃,游乎重浊渣滓之中,而莫觉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与太虚相似,则一旦把笔为文,凡世之治乱,人之善恶,事之是非,某字合当如何书,某句合当如何下,某段当先,某段当后,如妍丑之在鉴,如低昂之在衡,决不致颠倒错乱,虽进而至之圣经之文可也。”所谓太虚指气或元气,是理学家的宇宙本体。作家的胸襟如何才能廓大到足以做出“大文字”来?文论家认为需充之以气。气的含义既丰富又复杂,前人所论,除自然之气外,大致有两种:一是《孟子·公孙丑》篇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韩愈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即孟子之意,指的是人的精神、气势。宋孝宗赞苏轼文“气高天下”,其气也是指此,故陆游说:“窃谓天下之事,气为主,(苏)轼特用之于文尔。……盖气胜事则事举,气胜敌则敌服。”^[1]文论之气多取此义。气的另一意义是哲学范畴,指宇宙本体或由本体生成的混沌状态,此不论。

宋元文章学家也极重养气,但他们的气和养气法,却与前人不尽相同。

作者简介 祝尚书,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 成都,610064)。

陈绎曾《文章矜式》有“养元气以充其本”条，曰：“嗜欲淡则神气清，色德节而血气盛，饮食不过则昏气少，天理常存则志气明。心欲平，平则无刻凿之过；气欲易，易则无艰苦之失。须平日动静食息养之有素，则元气自然充盛，不可临文强为也。”嗜欲淡、色德节、饮食不过，是卫生之法，做到这些就可使神气清、血气盛、昏气少，则所谓气主要是生理的。陈氏显然不是把气看作纯精神的东西，而是试图从人体自身去解释：气就是神气、血气，也包括需要除去的昏气，都是人体自具，客观存在于人的体内，不需外求，故养元气也主要靠内修。只有第四种气即志气是精神层面的，需“天理常存”才可致。这无疑源于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说，故陈氏在《文筌·古文谱一》之“养气法”其四“精识”中，首先就标出天理。陈氏认为，只要心平气和，就可以“无刻凿之过”、“无艰苦之失”；而修养法是“须平日动静食息养之有素，则元气自然充盛，不可临文强为也”。陈氏将前人气论中的气分解为生理的、精神的两类，于是消除了气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在他那里，气的概念和修养变得既明白又简单，除志气需靠学养外，大多数气只需控制欲、色、食即可。如此论气，可谓前所未有，当是受南宋、元代道教重内丹即精气修炼的影响，而纵欲贪色，往往是年青举子的毛病，故养元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陈绎曾养气论的第二点是澄神。《文筌·古文谱一》之“养气法”论澄神道：

屏欲、弃染、息虑、澄神。静定莹彻此心，光明普遍如青天白日，上也；虚明圆莹如澄秋皎月，次也；清冷渊静如万顷寒潭，又其次也。如清池，如明镜，则可小用而已。以此照物，何物不烛；以此照理，何理不明；以此役神，何神不妙；以此属辞，何辞不精。上智君子，敬之敬之。

何谓“欲”、“染”、“虑”、“神”？作者解释道：“欲，如要好、求胜、求工、求丽、干名、效谄之类皆是。染，如习韩、习柳、习欧、习苏，执一偏而不圆通皆是。虑，身事、家事、国事不可拨置，则勿作文，作文便当拨置。神，妙万物而主吾心，须先识此，须令属我，须令我与之为一，须令不复有我，而我即神，第一功夫也。”欲作出好文章，既不能有过于功利的欲，也不要太多门户之见的习，同时要拨置所谓虑。前三者是手段，第四者澄神方是目的，即作家除去了所有杂念，即臻于神我合一的精神状态，达到“光明普遍如青天白日”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第一功夫”。神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心即是神，澄神即澄心。

陈氏又在《文筌·古文谱一》“养气法”其四“精识”中标出神理，也是说澄神，曰：“自家先澄吾神，明明白白见此主宰妙理，则其他天神地祇人鬼怪物，有者无之，是者非之，可得而照矣。自家不识自神，而欲妄意窥测，政恐魑魅罔两辈窃笑耳。识自家神以照彼神一也，方是真识。”这同样是我即是神，是自家神。澄神与陆机《文赋》所谓“收视反听”才能聚精会神进行创作不同，陈氏是说只要认识了自家神，就可以照天神地祇等外神，可以照物、照理、役神，更不必说创作了：“以此属辞，何辞不精”？初看起来，澄神似乎与养气没有多大关系，但要明白，需要澄的是吾神、自家神，等于澄心，而澄心之法是屏欲、弃染、息虑，注重的也是内修，自然与节欲节食的养气法相通了。

总之，陈绎曾反对欲，不赞同习，认为这些可能导致“执一偏”；而对虑的要求稍宽，只是暂时拨置。做到这些，方可使心境“静定莹彻”，神我为一。如果说陈氏为存天理以养志气开出的书单子是程朱理学一派的常谈的话，那么澄神则与陆九渊心学中的本心论极为接近。陆氏提出“心即理”，而陈氏认为“我即神”，都是主张主观的心（或我）是世界的主宰。因此，养元气既汲取了道教的内修法，又综合了程朱义理派和陆氏心学派的思想，这与元代学者多融汇各家、思想驳杂是一致的。

二、养心定志以牢立脚跟

陈绎曾《古文矜式》论培养法，开首即养心，分“地步高则局段高”、“见识高则意度高”、“气量高则骨格高”三项。所谓“地步高则局段高”，是说“六经之文，诸子不及者，圣人也；诸子之文，史不及

者，贤人也”。而六经中也有高下：“六经中《周书》不及《商》，《商书》不及《夏》，《夏书》不及《虞》，世降也；《风》不及《小雅》，《小雅》不及《大雅》，《大雅》不及《颂》，位殊也。”这当然是尊经复古和文章代降的老调，并无新意。作者却借此伸论：“由是言之，在我所立地步不高，而欲文章高，犹坐井而窥天，无是理也。欲地步高何法而可？曰：立伊尹之志，为颜子之学，立脚峻绝，操心诚至，自然高出千载。舍是则伪而已，何益！”原来他所说的养心，与理学家的修养心性不同，其实说的是立志：无论是从政还是治学，都要站得高，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在这里，养心之心是心胸、胸怀的意思，有别于前面的澄心之心。立志举伊尹，为学举颜回，他们是先秦儒家学派标举的志高和好学的典范。

至于“见识高则意度高”，陈氏写道：“文者言之精也。天下精妙之言，非识见高者能之乎？乡社之士不可与语城廓，城廓之士不可与语都邑，都邑之士不可与语朝廷：见识卑下，虽欲为高上，无是理也。”这与地步高所谓年代愈远愈高的思维方式相同，似乎地位愈上见识愈高，乃封建文人的偏见，当然是荒谬的。他接着说：“欲识见高何法而可？曰：此心之灵，与神明通。默而识之，游于造化之祖，天机出入，陟降左右，则妙与神明通矣。神虑周密，照物精切，纤毫曲折必尽其情，则与神明通矣。清圆妙用，与造化者为一，然而识见不高者，吾未之见也。”简言之，只要心灵与神明通，就可以见识高。又可分为两途：一是就形而上论，需心灵“游于造化之祖”，达到对世界本体的认知；二是就形而下论，则需“神虑周密，照物精切”，对万物观察入微。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见识的极至，也就与神明相通了。到此境界然后为文，自然豁然大度，气象非凡。这是指人的精神活动，描述的是充分调动作家认识的能动性，并将它提升到洞察幽明、彻底了悟的高度，应当说有可取之点。

陈氏又提出“气量高则骨格高”。谓：“文章与人品同。自古大圣大贤，非有英雄气量者不能到也。英雄之量，担负天地，包含古今。担负天地之至重，包含古今而有馀，气量如立天下之道德、成天下之事业无不可，况区区古文，而有不高者乎！欲气量高何法而可？曰：熟读《孟子》以昌吾气，细看《尧典》以恢吾量，参以《史记》诸纪、世家、列传，以博其趣。大要只是要有英雄担负天下之气，要有英雄包含古今之量。”“文章与人品同”，固是不易之论，只是如何才能培养出英雄气量和高尚的情趣，他开的药方是熟读《孟子》，细看《尧典》，再参以史传；但欲“担负天地，包含古今”而只是读圣贤书，这药方的效力显然十分有限。不过，陈氏在《文筌·古文谱一》“养气法”其四“清识”中有“物理”一条，对此作了补充，他说：“眼前物理须一一就眼前穷究，不可专倚书籍。眼前所无物理，则须博采古今书以考诸言，将求图谱以详其形，方为真识。”这种求物理的方法，颇近于理学家常说的格物致知功夫，但他要追寻的不是天理，而是清识或真识。至于所谓“担负天地”云云，倒是与理学家标榜的治国平天下一致，只是他更强调能担负天下之重的英雄气概，而不是作皓首穷经的道学先生。

最后，陈氏认为：

右三者（指“地步高”、“见识高”、“气量高”）须朴实用功夫，自得于心，而实践于身，生乎由是，死乎由是，雷霆震于上而不为之动，山岳压于前而不为之变，牢立脚跟，净洗眼睛，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者，不可以声音笑貌为之也。

由此看来，陈绎曾的养心实为做人，是要求作家牢立脚跟，固守精神家园，具有坚定不移、生死不渝的信念和志向，高尚的人格和情操，成为敢于担当的栋梁之材。陈氏还在《文筌·古文谱一》“养气法”之五“定志”中对立志作了全面归纳，内容更广，他说：“心性必欲通神明，量度必欲包宇宙，聪明必欲察毫厘，裁处必欲合圣贤，识趣必欲度先秦，变化必欲备百家，体制必欲像韩柳，格力必欲造屈马。”同时要求“志于其上”，百折不挠，做第一等人：“志于其上犹恐不及其中，志于其中终亦下而已矣。须是自心断定不回，不顾世俗之毁誉，不惮心力之劳悴，勇往直前，不让第一等与他人，方可与言文矣。”若能臻乎此，有诸内而形诸外，自能作出光耀千古的好文章、大文章。

三、养题气以极其变

不同体裁的文章有不同的风格，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中就已论及，如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是也；风格不同与作家的地位和际遇相关，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人们久已认知的道理。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曰：“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所谓草野气、馆阁气，是指文章形式与内容所透露出的气味、气息，近于常说的风格，前者是“枯槁憔悴”，作者必定是政治上不得志，只能著书立言以垂世；而后者“温润丰缛”，与前者正好相反。陈绎曾把这种气称为“题气”，他的看法与前人不同，认为任何文体的气都可以养出来，作家并不一定身处其地。《文章矜式》有“养题气以极其变”一目，曰：

凡养气，先将题中合说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推究，枝枝节节不可脱漏，须令眼中明不如见，胸中朗然与之神会，悲欢离合之情了然如身履目击其间，更加详察而研究之而鼓舞之，须更（疑当为“噢”）题中本然之气油然而生于吾胸中矣。此气既生，择其精而不僻、新而不尖者淘之汰之，滤之漉之，而吾文得之矣。

题目自身存在本然之气，那就是题中合说（应该写）何景、何事、何情、何意，是客观的，乃题目自身所具，只要作者仔细推究，并与之神会，达到有如身履目击的境界，本然之气就可以“油然而生于吾胸中”了。若照此说，则有草野气的文章不必出于野老之手，而有富贵气的也未必一定在演纶视草之位。作家根据需要，凭生活经验即可养出此气来。

《文荃·古文谱一》详论了八种题气：“肃：朝廷题、圣贤题；壮：河岳题、武功题；清：山林题、仙隐题；和：宴乐题、通人题；奇：怪神题、豪侠题；丽：园榭题、美人题；古：上古题、雅胜题；远：登眺题、功业题。”作者分析说：

澄神矣，将此题中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由根生干，由干生节，由节生枝、生叶、生花，枝枝叶叶，无则不可强生，有则不可脱漏。一一将此题、此景、此事、此情如青天白日照烛纤悉，明白净尽。却将此景、此事、此情、此意都扫除，无纤毫存于心目之间，只有此题、此气，肃者凛然，壮者巍然，清者冷然，和者温然，奇者屹然，丽者烂然，古者淡然，远者廓然，一片真境存于胸中，而此景、此事、此情、此意融化于中，变态丛生，取其精者、切者、要者、妙者而用之。须是自然存于胸中，不可著想，著想之则入客气，徒劳终日，无所用之。

做到澄神之后，要使所作合乎题气，须按如下三步进行。一是由题中之景、事、情、意一一生出根、干、枝叶，“照烛纤悉，明白净尽”，也就是穷尽式地搜索与此题有关的一切景、事、情、意，完全了然于心。二是将这些景、事、情、意彻底扫除，“无纤毫存于心目之间”，剩下的就只有此题、此气，是“一片真境”了。三是对合乎此题、此气的景、事、情、意进行择优，取其中最为精（原注：是理之至者）、切（原注：是辞之切题者）、要（原注：是事之要领者）、妙（原注：是意之高妙者）者用之，题气就具备了。他进一步指出，这些景、事、情、意必须是“自然存于胸中”，也就是虽非自己的经历，但是亲有所见、所感，不能凭空杜撰，否则是要失败的。上述意思，陈氏又曾在《文说》之“养气法”中论列，并谓只要澄心静虑，“以此景此事此人此物默存于胸中，使之融化与吾心为一，则此气油然而生，当有乐处，文思自然流动充满而不可遏矣。不可作气，气不能养而作之，则昏而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辞客气，非文也。气之变化无方，当以此类推之”。总之，题气是只可养而不可“作”或“著想”的，否则会使文章流于华而不实（“客气”）。

养题气的提出，无疑也与科举有关，因为场屋的题目是由别人（考官）所拟，如元代所考诏、诰、章表之类，举子当然不可能先有代天子立言的经历，而后才进考场。这些代言体文章所需要的富贵气，靠外养是不可能的，只能开发题目的本然之气，以求“胸中朗然与之神会”，故曰“养题气以极其变”，即以题气的不变应题目的万变。照此理论，任何题目都可以靠养题气作出。但陈氏又并非主张因文造情，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虽题气可养，但该题之景、事、情、意是胸中所固有，是平日的积累，是间接

生活经验，而不是“强生”的。养题气说不仅为举子，也为各类文章特别是充满悲欢离合情节的戏剧、小说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四、养力以开辟文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来是作家修养的精髓。陈绎曾在《文章矜式》卷上提出读书、历事两点，以养学力、材力，他统称之为“养力”。

关于读书，《古文矜式》标为“读书多则学力富”。这点古来从无异议，但读什么书，怎样读，意见却不一致。《文荃·古文谱一》“立本”将所读之书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当专精，共5目：经书、子书、性理书、礼书、乐书。第二类当博习，共12目：政术书、兵书、法律书、天文书、地理书、姓氏书、小学书、名物书、图籍书、史书、道书、传记书。第三类当旁通，共7目：草木虫鱼书、医书、卜筮书、阴阳书、古纬书、器物书、百工书。第四类当泛览，共3目：杂艺书、异端百家书、小说杂书。第五类当钩玄，共2目：总集、别集。以上凡29目，十分庞杂，实际上涵盖了四部书中古往今来的所有著作，包括儒学家、理学家所反对的异端在内。这不仅扩张了古文家文统的范围，更大大地改变了理学家“明义理、切世用”^[2]的文章价值观。元代科举分论、经义、词赋三科，汉人、南人考经义、古赋、诏、诰、章表及策。这较南宋科举考经义、诗赋、策论有很大变化，故作文必须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当然，陈绎曾不可能违背当时朝廷的文教政策，故在《文说》之“下字法”中，特别强调读《四书》“当谨守《章句》、《集注》”，读诸经皆应以朱子传注或通解为主，读古赋当熟读朱子《楚辞集注》中的《九章》、《离骚》、《远游》、《九歌》等篇。“宋玉以下未可轻读”等等。

至于怎样读，陈氏在上引《文荃·古文谱一》“立本”中认为：“诸书须皆以先秦为根本，其百家又各自有源流，精于其源，而无泥于其流可也。其法先立题目贴壁间，求其精力好学朋友数人分题立限，相与一一勾销之。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精；不精则已，精则必归于正。……”这显然又是为应举的学子开的药方，即自拟时文题目预作，宋人称为功课。真德秀曾在《劝学文》中，劝学子系统地学习理学，周、张、二程、朱熹等人的著作，以及《四书》，都在必读之列，“上、中二旬当课之日，则于所习之书摘为问目，俾之援引诸儒之说，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则仍以时文为课”。^[3]陈氏又在《文式》卷上第十“总论文”中专论读书之法，引韩氏（当是南宋以后人，待考）曰：

读文章，宜于《孟子》中取其长赡者二十馀章，韩文四五十篇，苏文亦然，合成百篇。……看终集后，再转求之，虽百转可也。写成百篇后，读书之暇，每日随意多少反复之，或默看，或批点，随喜处观之。先要粗看过，却去分大段，又去分小节，节段既明，观其首尾、中间相发处，相变处，擎掉处，提掇处，转折处，宽心细目徐观之。……如此久久，日当有得。大概只要扯拽作性，渐通行，毋将迎，毋凝滞。读经以融贯义理，读史以该洽事实，取胡氏《读史管见》隐然作一敌国，自立说与之相辩难，久久，义理、事实入于经史，议论生于《管见》，作性扯拽，渐开于孟、韩、苏文之路（“孟、韩”原作“韩、孟”，据《文说·下字法》校改），辐辏笔下，滔滔不能禁也。

其下又引陈氏（其人不详）语，认为“读集义理，先观体制，次分间架，次看发意，次观造语，……能识破四者，便能作文矣”。《文式》卷下引苏伯衡《述文法》道：“欲作文字，且未可下笔，先取古人文章熟读详味，再三讽咏，使心有所感触，思有所发动，方可运意。”前引《古文矜式》谓“读书多则学力富”，然后说：“欲读书多，何法而可？曰：读经以明圣人之用，读子以择百家之善，读史以博古今之变，读集以究文章之体。读其实，无读其虚。三才、万物之体用，谓之实；言论、文章之末流，谓之虚。今人读书，多忽其实而取其虚，是倒置也。夫议论、文辞，末也，苟得其实，则变化在我，何必资于彼哉！资于彼，是乃蹈袭而已，韩子‘唯陈言之务去’，此之谓也。”总之，在陈绎曾看来，读书愈多愈好，但也要有重点，要善读书。最好是采取渐进法，由少到多，由粗到精，特别要注意文章的文法和结构，同时要多作多练，如此就可以“渐开于孟（轲）、韩（愈）、苏（轼）文之路”了。

关于历世，《古文矜式》称“历世深则材力健”，并论之曰：

文所以记事也。自家涉历事故不深，则于人情事理不谙练，发之笔下则浅近陈腐，不足以警世动物。文人杰作，往往出于幽忧患难之余。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屈原之《楚辞》，司马迁之《史记》，皆是历练艰难、深造事情，所以高出万古。世不曾深涉世故，而欲为古文，有是理乎？欲涉世深，何法而可？曰：毋偷安一室，而有经营天下之心，毋闭户读书，而有担簦万里之益；毋老为蠹鱼，而实为家国通济之用。茹荼如飴，履险若平，久久心解，自当见之。

苏辙曾将历世也看作养气，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引述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后，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畅，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其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1]元倪士毅《作义要诀》引南宋人曹泾论立说大要，以为“须看他人立意，及自知历练，则胸中自然开广”。陈绎曾也主此论，他在《文筌·古文谱一》“养气法”其四“情识”之“事理”条中说：“今事须于自家自心历练处体验，人情事理十分切实老成，即以此心去度量他家事理，虽不中，不远矣。古事只要看来踪去迹、言行著实处体验他古人议论，休据古人字样，怀洗千古冤抑，照百代奸欺之心以临之，自家的见识定，然后看古人议论以商确之可也。如此则为真识。”他又具体论述了真识的内容：“真识之目四：一曰其然（原注：目可见、耳可闻之实理），二曰当然（原注：心可知、身可行之正理），三曰所以然（原注：口不可言、心不可思、而理势自然之所必至），四曰不然（原注：正理之外所当防戒百种邪僻者是也）。每题中景、意、事、理，皆当分四目推研之，庶几可以见理矣。”无论古事今事，作家只有经历过人生艰难的磨练，深入了解社会，谙熟人情事理，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正确判断是非，写出有益于社会的作品来。

综上所述，宋元时期特别是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的作家修养论，涉及养气、养心（立志）、养题气、养力（读书、历世）等诸多重大问题，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合乎应试举子实际和时代思潮的创新。如此集中地、多角度地谈论作家修养，此前还极为少见，可谓别开生面。这些修养论虽针对的主要是举子，但所讨论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意义，无论是对作家品格的提高，还是对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然，立论驳杂，理学观念的局限（如要求治学谨守朱子之类），也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 [1] 陆游. 上殿札子 [A]. 渭南文集(卷4)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 真德秀. 文章正宗序 [A]. 文章正宗（卷首）[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Z].
- [3] 真德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M]. 四部丛刊初编本 [Z].
- [4] 苏辙. 栞城集（卷22）[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王法敏

《焦仲卿妻》旁证

——汉诗中所见之汉代妇女生活和家庭人伦关系

◎ 徐国荣 薛 艳

[摘要] 《焦仲卿妻》是否作于“汉末建安中”，学界尚无最后定论。本文从汉代诗歌中所见的妇女婚姻生活和家庭人伦关系入手，结合汉代的相关风俗，考见汉诗的话语方式与风格形成，说明《焦仲卿妻》与汉代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汉末建安说”作一旁证。

[关键词] 汉末建安说 汉代妇女生活 人伦关系 汉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136-03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简称《焦仲卿妻》，亦称《孔雀东南飞》)，最早见载于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诗前小序称作于“汉末建安中”，但后世对此颇有争议，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持较为稳妥的“汉末建安说”。本文从汉代诗歌(以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为主)中所见之汉代妇女婚姻生活与家庭人伦关系入手，结合汉代的相关礼仪制度和社会风俗，寻找《焦仲卿妻》与汉诗的内在联系，为“汉末建安说”作一旁证。

《焦仲卿妻》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在被焦母遣归后，立即有数家求婚，而刘兰芝在拒而不得的情形下，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贞节，这种情况，涉及到当时妇女的婚姻状况和贞节观念。所以，有必要先来看看汉代对于离婚再嫁和从一而终的贞节问题的认识和有关史实。

汉乐府《上山采蘼芜》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如何？’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此诗中双方的离绝原因当然不得而知，但在意外相逢后，引起新旧对比，最后的结论是“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以劳动成绩作为比较的一个标准。尽管这样的标准可能只是诗歌表述方式之所致，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汉代诗歌中有不少篇什往往喜欢突出妇女的生产劳动能力，以作为赞美妇女的一种手段。如《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中都写道：“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强调几个媳妇的技艺。《羽林郎》中写“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陌上桑》中写“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陇西行》中甚至赞美一个“健妇”说：“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王逸《机妇赋》中描写道：“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解鸣佩，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乘轻杼，揽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由机妇的劳动之美进而赞叹其形神之美。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焦仲卿妻》中刘兰芝要叙述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并且发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幽怨。同时也可看出，这种通过描写劳动技艺和修养来赞颂女子之贤德与美丽的的手法，与汉诗是一脉相承的。汉诗中每每于妇人四行(德言容工)只言一二而及其他，清人沈德潜曰：“汉人《羽林郎》篇：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一环五百万，两环千万余。’《陌上桑》篇：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于赋美人也！而其原出于《硕人》之美庄姜。古人重其行，兼

作者简介 徐国荣，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薛艳，暨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632)。

及其容，妇容不与德、言、工并列耶？^①（P554）可谓道破其机关矣。《后汉书·列女传》载班昭作《女诫》七篇，其第四为“妇行”，即德言容工（或作“功”）四行，对于“容”与“功”，她解释说：“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斋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尽管这只能是汉代女性的某一种理解，但与汉诗中通过妇女之“容”、“功”而赞其“德”与“美”是异曲同工的。

离婚再嫁当然就涉及到从一而终的贞节问题。尽管《礼记》、董仲舒《春秋繁露》、刘向《列女传》、班固《白虎通义》和班昭《女诫》等在理论上均支持和提倡从一而终，而且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当然也倾向于褒赞，如汉宣帝神爵四年褒扬“贞妇顺女”，东汉时期，安帝元初元年、元初六年、延光元年，顺帝建元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各颁诏“赐贞妇帛”，但人们始终不曾形成固定的观念，刘向等提倡贞节的实际效果在社会上并不明显。在两汉的现实生活中，离婚再嫁始终被视作平常之事，从皇室到士人和平民，再嫁之风非常普遍，汉景帝王皇后、平阳公主、汉武帝女鄂邑长公主、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汉明帝马皇后、张耳之妻、陈平之妻等等都是再嫁之妇，相关史料言之凿凿，社会舆论并不曾给予什么歧视，礼仪制度上对此也没有什么明确规定。当然，两汉四百年中贞节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根据史料得出结论说：“从动态演进看，在关于妇女的‘贞节’和再嫁、改嫁的问题上，两汉四百年呈现出缓慢变化的态势。如果用最粗的线条加以勾勒，西汉前期（从高祖至宣帝时），较之西汉后期（从宣帝至王莽时），更加忽略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而东汉时期则比西汉时期重视对女子的‘贞节’要求。”^②（P203）考诸史实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再嫁和改嫁现象虽然仍旧普遍，但女子自愿守贞的情形也明显增多，且往往伴以异乎寻常的行为。兹举几例。

沛刘长卿妻者，同郡桓鸾之女也。……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妻防远嫌疑，不肯归宁。几年十五，晚又夭歿。妻虑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妇相与慰之，共谓曰：“若家殊无它意；假令有之，犹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诚，何贵义轻身之甚哉！”对曰：“昔我先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五更以来，历代不替，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诗》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后汉书·列女传》）

南阳阴瑜妻者，颍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聪敏有才艺。年十七，适阴氏。十九产一女，而瑜卒。采时尚丰少，常虑为家所逼，自防御甚固。后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因诈称病笃，召采。既不得已而归，怀刃自誓。爽令傅婢执夺其刃，扶抱载之，犹忧致愤激，敕卫甚严。女既到郭氏，乃伪为欢悦之色，谓左右曰：“我本立志与阴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灯，盛装饰，请奕入相见，共谈，言辞不辍。奕敬惮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办浴。既入室而掩户，权令侍人避之，以粉书扉上曰：“尸还阴。”“阴”字未及成，惧有来者，遂以衣带自缢。左右玩之不为意，比视，已绝，时人伤焉。（《后汉书·列女传》）

犍为杨凤珪妻者，蜀郡临邛陈氏女也，名姬。珪早亡，时姬产子，适生六月，躬丧事，育幼孤。三年，丧讫，兄弟宗亲哀其子少年壮，谋议更配，以许蜀中豪姓。姬闻，仰天叹息，引刀割咽，几死。于是九族惊愕，遂敬从其节。（《太平御览》卷四四一引陈寿《益部耆旧传》）

纪配，广汉殷氏女，廖伯妻也。年十六，适伯。伯早亡，以己有美色，虑人求己，作诗三章自誓心，而求者犹众。父母将许，乃断指明情，养子猛终义。（《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

这种从一而终的贞节观逐渐强化的原因，恐难一言以蔽之，但从以上几例中也可看出这样几种现象：一是社会上对寡妇并不歧视，往往求婚者甚多；二是女家父母或兄弟大都希望其再嫁（或以讽劝，或以强力）；三是贞女在遭逼迫后，皆以刚烈态度反抗，或毁形，或自杀。将这几类现象与《焦仲卿妻》相比较，可以发现，刘兰芝的遭际和行为正好与此相合，这也至少旁证了此诗与汉代的密切关系。

《焦仲卿妻》中没有出现刘兰芝父亲的形象，刘母则较温厚慈爱，逼迫刘兰芝再嫁的是刘兄。20世

纪50年代以来,在讨论此诗的思想性时,往往将刘兄作为封建家长的一个代表。其实,就《焦仲卿妻》的文本而言,刘兄形象比较模糊,逼迫行为似乎没有过分之处,即便有逼嫁之举,结合以上几例来看,其动机如何姑且不论,而其现象当是正常的。与刘兄形象相较而言,在后世被谴责更多的是焦母。从诗中看,她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地讨厌刘兰芝而最终逼得焦仲卿将其遣归,只要她不喜欢,刘兰芝就不得不被遣归。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汉代并不少见。如:“(鲍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鲍永传》)“(姜)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谴之。”(《后汉书·列女传》)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汉人亦多孝行,对于父母之命丝毫不敢违背,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刘兰芝之被遣归当是不得不然的了。再来看看班昭《女诫》七篇中的第六“曲从”：“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班昭生活在《焦仲卿妻》产生时代之前,其中所谓“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云云,把这样的语句同刘兰芝的行为对照,不难看出刘兰芝悲剧产生的原因。

《女诫》七篇中的最后一篇是“和叔妹”：“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在班昭看来,叔妹之誉己对于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印象(特别是在舅姑心目中的印象)至关重要。再来看看《焦仲卿妻》中刘兰芝对于小姑的态度与叮咛,便颇耐人寻味了。像“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这类温厚之语,每每令后世评论者为之嗟叹称道,而后世评论汉诗之“温厚”、“蕴藉”等等,又正可体现在这类亲情的人伦关系之上。因此,若将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对待男女情感的方式和态度分析一下,以与汉诗中的相关方面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无论是语言的表述方式,还是内在的情感联系,都是血肉相连的。亦可由此而看出,汉诗风格之形成自有其他时代无法替代的原因。

《焦仲卿妻》中,焦仲卿与刘兰芝感情深厚,其相誓之语曰:“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当仲卿误会兰芝之接受太守家求婚时,作者对此有段精采描写:“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这类表达情感的话语方式在汉诗中经常出现,如:“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秦嘉《赠妇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饮马长城窟行》)此等朴实之语,尤可见汉人温厚之处,决非后世所能拟代者。《礼记·经解》有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说法,而最能体现这种温柔敦厚之诗教文本者非汉诗莫属。清人贺贻孙辨析《止山采蘼芜》中“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之语曰:“大率东汉敦尚气节,得气之先,莫如诗人,不独《焦仲卿妻》、《陌上桑》诸篇凛然难犯,有《汉广》、《柏舟》遗风,即如此等诗,字字温厚,尤得好色不淫之意。若魏、晋以后,浸淫于桑、濮之间矣。谁谓诗文无升降乎?”^[1]斯言极是,于此汉诗血脉中,可得《焦仲卿妻》之本矣。

[参考文献]

[1] 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M].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3] 贺贻孙.诗筏[M].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王法敏

•学术动态•

关于我国货币一体化的研究综述*

◎ 彭小发 刘纪显 (广东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陈志英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广东 广州 510040)

[摘要] 货币一体化是目前国际金融方面的一个逐渐升温的话题。中国两岸四地的货币一体化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且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基础。本文综合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 试图勾画出这一问题研究发展的轨迹和轮廓, 以期对我国货币一体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线索。最后, 本文对国内有关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货币一体化 可行性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139-04

随着欧元区的成立和不断完善, 货币一体化逐渐成了热门话题, 有不少学者都在探讨这一问题。目前, 在中国境内使用的货币有人民币、港币、澳门元和新台币四种。“一国四币”现象的存在, 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如降低了货币交易的效率、增加了汇率风险等。随着中华经济圈的不断发展, 两岸的经贸往来不断地拓宽和加深, 将四种货币一体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 可将货币一体化的含义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指区域货币合作, 即有关国家在货币问题上实行的协商、协调以至共同行动, 它在合作形式、时间和内容等方面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二是区域货币同盟, 这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深入发展, 指通过法律文件 (共同遵守的国际协议) 就货币金融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的合作。三是最优货币区, 它是货币一体化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 其特征是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名义比价相互固定; 具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作为各国货币汇率的共同基础; 主导货币与成员国货币相互间可充分自由兑换; 存在一个协调和管理机构; 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主权受到削弱 (姜波克, 2001)。

一、货币一体化的规范研究

货币一体化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最优货币区 (optimum currency area, OCA) 理论。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早, 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这一理论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日益完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不同的标准, 这些标准也随着整个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

1. 单一标准

罗伯特·蒙代尔 (Mundell, 1961) 提出以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认为如果两个地区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性高, 就能够无须通过汇率而通过要素的流动来消除经济冲击, 这样两个地区就适宜组成一个货币区实行单一货币; 反之, 若两个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性低, 就不能实行单一货币, 须运用两地之间的货币汇率来消除经济冲击。麦金农 (McKinnon, 1963) 在蒙代尔的论文基础上, 通过分析汇率浮动对小国开放型经济体和大国经济体的不同影响, 认为经济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 越适宜建立相对封闭的通货区。凯南 (Kenen, 1969) 提出以产品多样化程度作为形成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 一个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出口产品也是多样化的, 在固定汇率制下, 少数出口产品需求的下降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太大影响; 一个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出口产品也比较单一, 如果某种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 就需要汇率作较大幅度的变动, 才能维持原有就业水平。根据凯南的分析, 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应实行浮动汇率, 成为独立的货币区; 而几个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间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 组成货币区。英格拉姆 (Ingram,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项目资助 (5003980); 中国博士后基金应用经济学科项目 (2005037159)。

1969) 提出金融一体化的标准。他指出,为了解决货币区的最优化,就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的一切不利变化,从而避免了汇率的不必要波动。同时指出,如果金融一体化不充分,在长期项目上国家间利率结构比存在显著的差别。此外,还有哈勃勒 (G. Haberler, 1970) 和弗莱明 (J. M. Fleming, 1971) 提出的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为标准;托尔 (Tower, 1976) 和威莱特 (Willett, 1976) 提出的政策一体化标准。

2. 复合标准

汉森 (J. D. Hansen) 和尼尔森 (J. U. M. Nielson) 认为货币联盟的实现取决于外部冲击的频率和特征,成员国内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流动性。雷曼 (S. S. Rehman, 1997) 归纳了五个方面的标准: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价格工资的灵活性,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财政一体化。

3. 成本—收益分析

20世纪70年代后,最优货币区理论关注的焦点则从最优货币区的衡量标准逐步转到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效应分析上来,统称为现代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的分析,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可归纳如下:(1)降低交易成本;(2)促进经济政策的一体化;(3)降低高通胀率。而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1)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权;(2)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权会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限制;(3)有可能加剧失业;(4)有可能恶化本已存在的地区失衡。

二、货币一体化的模型与实证研究

货币区是否最优取决于它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和价格弹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和消费的多样性、通货膨胀相似性、财政一体化程度、政治一体化程度以及冲击对称性,具备上述特征可以减轻经济冲击对货币区各成员产生的不对称影响,或者有助于内外均衡的恢复,从而降低经济体对名义变量调整(包括货币供给和汇率)的依赖。经济冲击指造成经济运行偏离其均衡状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包括需求冲击、供给冲击、货币冲击等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经济冲击对称性方面,经济冲击的性质成为判断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的最重要标准。Cohen and Wyplosz (1989) 率先利用产出 (GDP) 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冲击的对称性问题。之后Poloz (1990) 等学者通过考察实际汇率变动、股票价格变动 (Eichengreen, 1990) 等相对价格变化,或者劳动力流动性 (Degrauwe和Vangaver beke, 1991)、财政转移支付 (Sachs和Salai Martin, 1991) 等判断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但是上述方法都无法从变量的变动中区分哪些是经济冲击造成的,哪些是要素调整造成的。Blanchard和Quah (1989) 提出将经济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Structural Vector Auto Regression, SVAR) 方法,从而为研究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提供了更有力方法。Bayoumi和Eichengreen (1992, 1994和1996) 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 (Vector Auto Regression, VAR) 方法,从根本上克服了上述几种方法的缺陷,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在自回归模型 (AR)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适合于对两个或更多个存在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做分析。靳超、冷燕华 (2004) 构造的VAR模型为:

$$\Delta X_t = B_1 \Delta X_{t-1} + B_2 \Delta X_{t-2} + \dots + B_n \Delta X_{t-n} + e_t$$

其中 $\Delta X_t = (\Delta P_t, \Delta y_t, \Delta i_t)^T$, 误差项 $e_t = (e_{pt}, e_{yt}, e_{it})^T$, ΔP_t 、 Δy_t 、 Δi_t 分别表示价格的变化率、收入变化率和利率的变化率,并且这些变化率均采用对数差分的形式获得来剔除短期影响,考察相对长期的变量变化。其中价格、收入和利率分别用CPI指数、名义GDP和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

然后,作者通过1979年到2003年的数据,对内地和香港实现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名义经济指标相关性和经济冲击相关性的研究,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两地的供给冲击弱相关,但是大于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的相关度,所以可以说两地在实际经济变量上呈现相对更强的相关性或对称性。(2)需求冲击呈现的负相关证明在短期名义波动上两地有相当程度的不对称性,反映了两地的经济结构、规模的差异性。(3)在市场化程度方面,内地要远落后于香港,这会对货币一体化形成一定的阻碍。

另外,李心丹、刘瑛、刘铁军 (2003) 也曾通过VAR模型对内地和香港能否构成最优货币区进行了类似的实证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供给冲击具有一定的对称性。(2)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具有不对称性。

三、我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分析

(一) 可行性分析

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此问题:一是从基本理论出发,列出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充分条件,并将我国的现实情况用数据加以量化,逐一验证;二是对于货币一体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列出得失,衡量轻重,再加以选择。

1. 基于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货币一体化的经典理论,要实现货币一体化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说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蒙代尔、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一系列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有:要素流动程度、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通货膨胀率 and 政策一体化程度等。

朱孟楠和陈硕(2004)从经济层面的相似度和货币层面的融合度以及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出发,选取了GDP、产业结构比率、经济开放度、失业率、汇率、财政赤字、消费物价指数等指标逐一分析比较。何问陶、黄莹(2005)从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度、宏观经济趋同性、财政状况的趋同性四个标准进行论述,每个标准再分别选取不同的指标展开分析。曾庆宾和刘明勋(2004)则对经济开放型、产品多样性、要素流动性、金融一体化、经济趋同标准等进行了研究。

2. 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也是研究构建单一货币区的可行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直观上来说,如果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本大于收益,那就不可行;反之,则可行。当然,大部分收益和成本都是很难量化的,甚至连粗略估计都是难以做到的,比如说经济影响力提高带来的收益,制度差异引起的成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研究问题。

黄燕君、赵生仙(2003)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他们列举的收益如下:(1)降低交易成本,消除汇率风险;(2)节约外汇储备,降低储备成本;(3)增加市场透明度,提高福利收益;(4)获取动态效率收益;(5)提升中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成本如下:(1)货币转型成本和组织成本;(2)货币主权的丧失和铸币税收益的“损失”;(3)经济稳定的效率损失。何问陶、黄莹(2005)则从节省交易成本、促进区内贸易和市场的一体化、提高人民币的影响力来论述收益,从微观个体转换的成本和过渡期的准备费用和适应性困难来论述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二) 实现货币一体化的途径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我国实现一体化应该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先实现香港和澳门的货币一体化,然后再把内地和港澳的货币统一起来,最后在合适的时候,把台湾也加入进来。如朱孟楠和陈硕(2004)、沈国兵和王元颖(2003)、梁彩红和杜秋莹(2005)。另外有些学者进行了更细致的预测,黄燕君和赵生仙(2003)认为,区域货币一体化往往处于一个逐步深化的序列中,并建议如下:1.建立大陆与香港自由贸易区;2.建立和完善大陆与香港的劳动力流动市场;3.在扩大香港、澳门和广东地区货币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货币联盟;4.建立统一资本市场,推出单一货币。

(三) 两地共同货币的选择模式

在两岸实现货币一体化之后该选用何种货币作为共同货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目前争论也很多。一般来说,共同货币的选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强势货币吞并弱势货币,由于台湾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新台币暂时不予考虑。那么在两岸四地中,澳门元相对较弱,只有人民币和港元相对较强。是用人民币还是用港元作为共同货币目前还存在争论。另一种是加入货币区的各成员放弃各自的货币,共同创建一种新的货币作为共同货币。这两种模式各有支持者。黄燕君和赵生仙(2003)认为,如果采用港币作为共同货币,则大陆将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而人民币由于目前仍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而且名称带有浓厚的历史烙印与政治色彩,也难以担当共同货币的重任。因此,建议采用第二种模式,即创立一种全新货币。孙景兵(2000)认为发行一种新的货币作为统一货币,从成本费用的角度看,其代价是难以估量的,况且从发行至被居民普遍接受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比较可行且低廉高效的做法是加大人民币改革力度,使之成为统一货币。陈章喜(2004)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港币的发行以百分之百的美元储备为保证,若港币取代人民币,意味着需要巨额的外汇储备,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以人民币作为货币区的共同货币,是内地经济发展的必然。

四、对我国货币一体化研究现状的看法

总的来说,我国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毕竟现在进行一体化的时机还很不成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通过以上综述,我们不妨简单地来评述一下这些研究,看看我们在理论上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1. 我国学者对我国货币一体化进行的可行性分析,主要都是基于OCA理论以及由其发展的各项标准。然而大部分学者在进行分析时,只是先将各个标准罗列出来,然后再分别用各个标准对我国两岸四地的情况进行衡量。这样的分析与货币一体化这个复杂难以测度的问题相比,显得过于简单和机械。他们缺乏对最优货币区诸标准间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关系的深入考虑。而且这些学者往往都忽视了OCA理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祝丹涛(2005)在对OCA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中指出了OCA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1)OCA理论内部存在着某些弱点,不同OCA判别标准之间存在种种复杂关系;(2)OCA标

准有内生性,货币同盟形成需要的“事前”条件,一定程度上可在同盟形成后得到“事后”满足;(3)OCA理论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特征,带有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

2. 欧元区形成和发展对我国的货币一体化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经验教训。然而国内学者对此的相关研究非常少,仅有孙景兵(2000)等少数学者作过一些论述。其实,这方面可研究的地方还非常多。比如,自欧元流通以来,尽管欧元由弱变强,但货币一体化对欧元区产生了诸如通胀效应、竞争力削弱等不利影响,致使欧元区经济一直没有较大起色。这些不利影响与货币一体化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又该如何应对等。

3. 大部分学者在进行货币一体化研究时,主要还停留在定性的基础上,有一些实证分析但基本上都是对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缺少数学模型的支撑,难以进入到定量的研究中。

4. 我国进行货币一体化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综合考虑。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理论分析、可行性研究和共同货币选择等几个方面,缺少更加系统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Mundell Robert.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1961) :657- 665.
- [2] Mckinnon Ronald. Optimum Currency Area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 (1963) :717- 725.
- [3] Kenen Peter.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 Eclectic View [A]. R.Mundell and A. Swoboda eds. 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41- 69.
- [4] Tower Edward, Thomas Willett.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J]. Speci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 (1976) .
- [5] Rose Andrew, Engel Charles. Currency Un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C]. NBER Working Paper 2002.7872.
- [6] Paul De Grauwe. The Economics of Monetary Integr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7] Michael D. Bordo, Lars Jonung. The Future of EMU: What Does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Unions Tell Us? [C]. NBER Working Paper,1999,7365.
- [8] Ingram J. C. Regional Payments Mechanisms: The Case of Puerto Rico [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2.
- [9] Fleming J. On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 [J]. The Economic Journal 81 (1997): 467- 488.
- [10] Rose, Andrew K. One Money, One Market: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ommon Currencies on Trade [J]. Economic Policy 30 (2000): 9- 45.
- [11] 沈国兵, 王元颖.论“中元”共同货币区的构想与实现路径 [J]. 财经研究, 2003, (6).
- [12] 祝丹涛. 最优货币区批判性评析 [J]. 世界经济, 2005, (1).
- [13] 李心丹, 刘瑛, 刘铁军. 中国内地和香港能否构成最优货币区研究——来自实证结果的分析 [J]. 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5).
- [14] 柯冬梅. 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借鉴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1, (1).
- [15] 曾庆宾, 刘明勋. 中华经济圈实行“中元”的可行性分析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4, (3).
- [16] 朱孟楠, 陈硕. “中元区”的构建: 现实可行性及前景展望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
- [17] 姜波克, 罗得志. 最优货币区理论综述兼述欧元、亚元问题 [J]. 世界经济文汇, 2002, (1).
- [18] 梁彩红, 杜秋莹. 中华经济区货币一体化的探讨 [J]. 统计与决策, 2005, (5).
- [19] 黄燕君, 赵生仙. 港币—人民币一体化: 顺序、模式和努力途径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3, (3).
- [20] 严谷军. 两岸四地货币一体化前瞻 [J]. 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2).
- [21] 何问陶, 黄莹. 人民币与港澳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 [J]. 开放导报, 2005, (3).
- [22] 陈卓淳, 汪小勤. 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1).
- [23] 熊琼, 刘玉玉. 创建中元探析 [J]. 金融问题研究, 2004, (11).
- [24] 陈章喜. 关于建立内地与香港最适度货币区问题的研究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4).

责任编辑: 黄振荣

·学海酌蠡·

(中图分类号) H1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143-01

《汉语大字典》通假漏释辨读七则

◎ (香港)单周尧

文字有本义、引申义、通假义。《汉语大字典》^①于通假义多云“通某。”这对读者探本穷源很方便。但也有未明言“通某”者,读者欠提示,往往未能钩沉索隐,焕然冰释,这是一种缺陷。下文举出一些例子,希望将来修订时能补苴罅漏。

《汉语大字典》“和”字第15个义项说:古代军队的营门。《周礼·夏官·大司马》:“以旌为左右和之门。”郑玄注:“军门曰和,今谓之垒门,立两旌以为之。”《文选·潘岳·西征赋》:“距华盖于垒和,案乘舆之尊轡。”李善注:“和,军营之正门也。”

尧案,《说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可见“和”之本义与“古代军队营门”无关。然则“和”何以有“军门”义?《汉语大字典》没有加以解释。案,军门之本字当为桓,《说文解字》六篇上木部:“桓,亭邮表也。”徐锴(920-974)《说文系传》:“亭邮立木为表,交木于其端则谓之华表,言若华也。古者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邮,过也,所以止过客也。表双立为桓,《周礼》云:‘执桓圭。’郑玄以为若宫室象,则谓若双立之柱也。”^②戴侗《六书故》云:“柱之植立者曰桓,双植以为门者谓之桓门,亦谓和门,亦谓华表,桓、和、华一声也。”^③案,“和”上古匣纽歌部,“桓”上古匣纽元部,二字声纽相同,韵部则歌元对转,故得假和为桓。《书·禹贡》:“和夷底绩。”郑《注》:“和,读若桓。”是“和”、“桓”音近之证。《汉书·酷吏列传》如淳《注》曰:“恒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表和。”^④是军门之和本字当为桓。根据《汉语大字典》的体例,“和”字第15义项开端当云:“通‘桓’。”

《汉语大字典》“温”字第5义项说:柔和,宽厚。《广雅·释诂一》:“温,善也。”《玉篇·水部》:“温,颜色和也。”《广韵·魂韵》:“温,和也,善也,良也,柔也。”《书·尧典下》:“直而温,宽而栗。”按:《史记·五帝本纪》同文裴骃集解引马融曰:“直而色温和,宽大而谨敬战栗也。”

尧案,《说文》:“温,水,出犍为涪,南入黔水。”可见“温”之本义与“柔和宽厚”无关。然则“温”何以有“柔和宽厚”义?《汉语大字典》没有解释。段玉裁(1765-1815)及朱骏声(1788-1858)《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温”训温和、温柔、温良者,盖假借为“𩚑”。^⑤《说文·皿部》:“𩚑,仁也。从皿,以食因也。”《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温仁”连言,谓温厚仁爱也。温厚仁爱,引申则有温和、温柔、温良诸义。“温”、“𩚑”(𩚑)“同音,故得通假。根据《汉语大字典》的体例,“温”字第5义项开端当云:“通‘𩚑’。《说文·皿部》:‘𩚑,仁也。从皿,以食因也。’温厚仁爱,引申有温和、温柔、温良诸义。”然后才引《广雅》云云。

《汉语大字典》“𩚑”字第5义项说:瓠中的子。《集韵·齐韵》:“𩚑,瓠中。”《字汇·牛部》:“𩚑,瓠犀,瓠中之子。”《诗·卫风·硕人》:“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毛传:“瓠犀,瓠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一》:“瓠瓠子曰𩚑。”

尧案,《说文》:“𩚑,南徼外牛。”可见“𩚑”之本义与“瓠中之子”无关。然则“𩚑”何以有“瓠中子”之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𩚑,假借为栖,《诗·硕人》:‘齿如瓠犀。’按瓠瓣,栖于瓠中者也。”^⑥其说是也。《尔雅·释草》:“瓠栖,瓣。”正用本字。郭璞《注》云:“瓠中瓣也。《诗》云:‘齿如瓠栖。’”可见三家《诗》有从本字作瓠栖者。“𩚑”、“栖”同音,上古皆心纽脂部,故可通假。根据《汉语大字典》的体例,“𩚑”字第5义项开端当云:“通‘栖’。瓠中的子。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犀,假借为栖,《诗·硕人》:‘齿如瓠犀。’按瓠瓣,栖于瓠中者也。’”然后才引《集韵》云云。

又《汉语大字典》“栖”字下当补一义项曰:“瓠中的子。《尔雅·释草》:‘瓠栖,瓣。’郭璞注:‘瓠中瓣也。《诗》云:‘齿如瓠栖。’按今《诗·卫风·硕人》作‘瓠犀’。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犀,假借为栖,《诗·硕人》:‘齿如瓠犀。’按瓠瓣,栖于瓠中者也。’”

《汉语大字典》“祝”字第8个义项说:断;断绝。《广雅·释诂一》:“祝,断也。”《正字通·示部》:“祝,断绝。”《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注:“祝,断也。”《列子·汤问》:“南国之人,祝发而裸。”张湛注引孔安国《尚书传》云:“祝者,断截其发也。”

尧案,《说文》:“祝,祭主赞词者。”可见“祝”之本义与“断”无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祝”训“断”者,盖假借为“𣎵”。^⑦《说文》之“𣎵”。《说文》释“𣎵”曰:“𣎵,断也。”“𣎵”字从斤,斤斧之属,所以断物也,故有断义。“𣎵”与“祝”皆端纽屋部,故可通假。根据《汉语大字典》的体例,“祝”字第8义项开端当云:“通‘𣎵’。”

《汉语大字典》“郛”字第5义项说:分。《玉篇·邑部》:“郛,分判也。”《集韵·姥韵》:“郛,分也。”《荀子·王霸》:“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杨倞注:“郛当为剖,谓开发也。”

尧案,《说文》:“郛,天水狄部。”可见“郛”之本义与“分”无关。然则“郛”何以有“分”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

作者简介 单周尧,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声》认为“郃”训“分”者，盖假借为“割”。^{[1] (P2813)}《说文·刀部》：“割，判也。”“判，分也。”“郃”、“割”皆从音声，古韵同属之部，声母发音部位亦同（“郃”并纽，“割”滂纽），音近故得通假。故《汉语大字典》“郃”字第5义项开端当云：“通割”。

《汉语大字典》“违”字第10义项说：邪行；不正。《左传·桓公二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孔颖达疏：“塞违，谓闭塞违邪。……德与之违，义不并立。”《太玄·礼》：“怀其违，折其匕，过丧锡九矢。”范望注：“违，不正也。”

尧案，《说文》：“违，离也。”清代学者多认为“违”训“邪”者，盖假借为“窳”。《说文》：“窳，衺也。从交，韦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窳，衺也”下曰：“衣部衺下曰：‘窳也。’二篆为转注。”^{[2] (P4581)}段玉裁所说的“转注”，意思是互训。徐灏（1810-1879）《说文解字注笺》曰：“窳盖交领，故从交，而训为衺也。”^{[3] (P4581)}尧案，《说文·交部》：“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交之本义为交胫。引申之凡相并、相合、相错、相接皆曰交。”^{[4] (P4580)}徐氏谓窳为交领，与衺从衣相应。邵瑛（1739-?）《说文解字群经正字》“窳”下曰：“此为窳衺字，今经典作‘违邪’。”^{[5] (P4581)}根据《汉语大字典》的体例，“违”字第10义项开端当云：“通‘窳’。”

《汉语大字典》“鲜”字xian音下第1义项说：少；尽。《尔雅·释诂》：“鲜，寡也。”郭璞注：“谓少。”

尧案，《说文》：“鲜，鱼名，出貉国。”可见“鲜”之本义与“少”无关。然则，案《说文解字》二篇下是部：“𩚑，是少也。𩚑俱存也。从是少，贾侍中说。”“𩚑”、“鲜”同音，上古立心纽元部，故可通假。今经典𩚑字统作“鲜”，而《经典释文》尚有“𩚑”字。《易·乾文言·注》：“鲜克有终。”《系辞下传》：“鲜不及矣。”陆氏本立作“𩚑”，云：“今亦作鲜，同，仙善反，少也。”又《系辞上传》：“故君子之道鲜矣。”《释文》云：“鲜，郑作𩚑；马、郑、王肃云：少也。”是“鲜”为“𩚑”之假借字。《汉语大字典》“鲜”字xian音下第1义项开端当云：“通‘𩚑’。”

（中图分类号）H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3-0144-01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辨误二则

◎ 王允亮

明朝张溥编辑汉魏六朝作家诗文集时曾于每集下撰题辞做简要的评点，大致涉及到作家的为人、生平及文学成就，殷孟伦把这些题辞进行注释并集成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为名予以出版。因此书涉及史料纷杂，头绪繁多，故注解中不乏疏漏之处。谨发二则如下。

（一）《董胶西集》：“三策三对，君臣喜起”。殷注：“三策，谓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载本传。三对，《高庙园灾对》，载《汉书·五行志》；《雨雹对》，载《古文苑》；《郊祀对》，载《春秋繁露》十五。《书·益稷》：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第7-8页）按：殷注有误。此处“三策”并非董仲舒的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而应指汉武帝的三道策文。“策”是古代由皇帝发布的一种下行文体，可要求下臣回答，如《文选》卷三十六所收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明贺复征曾以《武帝问贤良策》为名把武帝的这三篇策文编入《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十六。“三对”则是董仲舒回答这三道策书的三篇文章，即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而不是《高庙园灾对》、《雨雹对》、《郊祀对》。二人的策、对为相互呼应的六篇文章，并载《汉书·董仲舒传》。这样判断的理由是，《汉书·董仲舒传》载与《高庙园灾对》相关的事件为：“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这个差点送命的事件和后面的“君臣喜起”句明显相矛盾。且张溥接着也说“高庙燔灾，闲居拟对，私家书也。主父挟奏，吕生妄讥，下吏当死”。可知张是把《高庙园灾对》作为另一事件来论述的。因为武帝三篇策文和董仲舒三篇对文相互生发，不断深入，所以前言“三策三对”，“三策”属武帝，“三对”指董仲舒，后言“君臣喜起”，君指武帝，臣指董仲舒，前后对应十分严密。这里的策和对属于两种公文文体，一下行，一上行，而如殷所说则六篇全属于上行公文“对”，这个判断显然有误。

（二）《何记室集》：“今所传者，隐候读诗，一日三复，文集入洛，诸贤并赞”。殷注“文集入洛，诸贤并赞”为：“久洛，谓晋太康中，陆机与弟云俱入洛，张华诸公为延声誉也。见《晋书·陆机传》。”（第254~255页）按：殷注有误。殷所谓“陆机与弟云俱入洛，张华诸公为延声誉也”应指《晋书·陆机传》：“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张华荐之诸公”，但此处及陆机本传并无文集入洛的记载，以之释张题何逊之“文集入洛，诸贤并赞”有误。张此句所用事实出自《北齐书·元文遥传》：“文遥敏慧夙成，济阴王晖业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邵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余岁。济阴王曰：我国千里驹，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来未有。”（按：元文遥，字德远，河南洛阳人，北魏昭成皇帝什翼犍六世孙。）据此可知，何逊的诗文集在北魏时已经传入洛阳，并得到北方士人的赞赏。故张文所谓“文集入洛，诸贤并赞”应指本段文字中“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所述之事。

本栏责任编辑：陶原珂

作者简介 王允亮，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书评·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3-0145-02

《宋代史》的学术价值

◎ 肖建新 (安徽师范大学编审、教授, 安徽 芜湖, 241000)

宋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复杂、多变的时期, 也是我国古代社会后期重要转变的起始。自元代脱脱为300年宋代总纂《宋史》之后, 历代皆有续修之举、续修之作。至20世纪宋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尤其是80年代以后众多著作先后问世。而在新世纪之初, 我们又有幸读到张其凡教授撰写的80万字的《宋代史》(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 2004年7月初版)。该书既是对以往宋史研究的总结, 又是新世纪宋史研究的开篇, 在体系建构、成果吸纳、学术致用上都有匠心独运之处, 惊人之笔时现, 称之为宋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也是可以的。

一、建构断代宋史的新体系

《宋代史》在前人宋史研究的基础上, 扬长避短, 重构宋史, 铸成现代宋史编纂的新范本。该书由导论和7章组成。导论介绍和评论宋朝及西夏、喀喇汗王朝的基本史料, 1至7章分别叙述和分析宋朝的政治发展、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科学文化、社会与社会生活、周边民族与民族关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这八部分, 从结构上看与古代传统的纪传体例有天壤之别, 也与近代以来的历史著作, 包括通史的宋史部分及断代宋史有很大的差异, 全景式地展现了宋代300年的恢宏图卷, 具有宋代全史的性质, 是迄今为止一部最为全面系统的宋代历史著作。

这种全景式展示宋代历史的重构有三个特点: 一是以现代的研究范式整合传统史学, 以叙事为基本形式, 以章节为表达方式, 把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主要内容囊括其中。《宋代史》针对以往史著多重政治史而忽视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内容的不足和缺憾, 不仅重构了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的内容, 而且建构和充实了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的内容, 特别注意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科学文化等的内容”, “加入吐蕃、西夏、大理、喀喇汗王朝等方面的内容”, 这不只是内容的扩充, 更是体例的建构。二是这种建构具体实在, 不仅是外延的, 而且是内涵的。《宋代史》在章节上作了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结构和框架性的扩充或增加, 并与此结构整合相呼应, 对每一章节的内容深入建构, 使之内容实在, 富有系统性和创造性。如以往史书中的文化部分都会编写史学成就, 尽管不能代替史科学和史学史著述的作用, 但又具有某种史科学和史学史的功能, 关于这一点, 在现代史学著述中, 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五代辽宋金夏卷似乎特别注意了, 而《宋代史》开篇导论的史料介绍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把宋代史料分为概况、主要、一般几个层次加以叙述, 非常具体实在, 基本满足了研究入门者的需要; 又如第1章把宋代的政治状况分为北宋前期、后期和南宋三个时期, 每个时期又以大事连接起来, 展现宋代历史的发展轨迹, 内容饱满充实。这种建构的实在性, 贯穿全书始终。三是以近现代史学理念提纲挈领。《宋代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撰写的, 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研究内容的内在结合;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作者还以近现代的史学理念来更新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如该书结构性重构, 既是变革历史著作的体例, 也是更新治史的理念和方法思想, 以新的理论和观念来解剖、诠释历史, 这种建构与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家, 如克罗齐、柯林武德、汤因比主张的历史观念、文化生态史观有某种契合之处, 从而体现出理念和观念地构造历史的特征, 当然, 这与他们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做法又有本质区别的。此外, 作者还以先进和现代的专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来撰述宋史, 如以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有关理论, 尤其从体制和机制角度叙述宋代的政治制度, 以经济学有关理论分析经济体制、区域经济, 以文化学的理念分析学术思想和流派, 以社会学的理论论析基层社会和生活, 以民族学和民族史理论描述主要民族及其政权。因此, 《宋代史》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是一种全面的更新, 这是整合和重构的活力所在, 也是现代史学革命和新生的关键, 已经超越了宋史撰述创新本身的意义了。

二、有机地吸纳以往研究成果

张其凡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青年宋史专家, 著述丰富, 涉猎广泛, 对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研究, 对宋代学术史有清晰的把握。他在编繁体例、结构和方法上, 对既往通史、宋史研究著述进行了综合性的批判吸取, 并进而创

新，自成一统。《宋代史》每一章节都体现出对史学成果的广泛吸收和融合。如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上，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谓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第6卷宋代部分主要由朱瑞熙先生承担，而其中的军事部分则由张其凡教授编撰。张先生参加了整书体例、方法的研讨，故而他在《宋代史》中对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职官叙述和勾画的基础上，从决策体制、运行机制、管理实体、权力制约等崭新的角度作了深入的剖析，其研究成果处在迄今有关宋代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领先地位。社会史是近年来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成果日益丰富和充实，如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张邦炜的《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张文的《宋朝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对宋代社会诸多层面各有侧重地展开论述，而《宋代史》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家庭、宗族、城乡生态，以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礼俗、节假娱乐等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和展现，可以说把社会生活史较为全面地纳入断代宋史的撰述之中。宋代民族史研究近年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果，如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增订版）、白滨的《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李蔚的《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魏良弢的《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段玉明的《大理国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等，作者在对宋代周边民族全面介绍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吸收最新的成果，扩充吐蕃部族和政权的内容，充实大理政权的历史，并对党项西夏和喀喇汗王朝作了详尽的补充，颇有拾遗补缺之意。

当然，这种吸收不是简单的数量累积，而是一种有机的建构，把已有的成果熔铸到历史著述之中，形成浑然一体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成果吸收的系统性、广泛性和科学性。

三、在平实著述中突出学术致用

《宋代史》以平实见长，在平实中显现出文采，语言优美流畅，生动准确，既无干瘪枯燥之厌，也无矫揉淫丽之嫌，反映出作者很深的语言修炼和功力。在史料介绍中，以史料学的语言勾勒史料的来龙去脉，评述优劣，提供参考；在政治发展和制度部分，以政治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语言，表述政治事件、体制、机制；在经济部分，用数据语言，以对比的方式分析宋代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局限，从而使沉闷枯燥的数据赋予生机和魅力；在科学文化部分，以严谨的语言介绍科学成就，以睿智的语言叙述哲学和学术，以玄妙的语言记录宗教，以飘逸的语言、饱满的激情，富有诗意地畅谈文学，把宋代的数学、理学、诗词等成就如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此外，还以社会学、民族学、外交学、文化学的语言，把宋代的社会生活实况、民族繁衍、中外关系、文化交流，平实而流畅地著述出来。这种以平实的学科语言来表述相应的历史内容，实质上是对传统史学“文质相称”著述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为此，该书在史学语言的规范和发展上，乃至纯洁史学语言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功能，以往更多的是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的，而对其学术效用关注不够。也许有人认为学术作品本身就是推进学术研究，当然应有学术功效，此言不谬！但在历史研究中，真正有目的地去落实这一点，在著述中显在地或潜在地表述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反观既往的历史研究和作品，不得不承认，成功的不多，重视得也不够，需要有意识的反思和认知。《宋代史》的开篇介绍宋朝及西夏、喀喇汗王朝的基本史料，为近年史学著作的新创举，符合学术国际接轨和规范化的潮流。《宋代史》的史料介绍，揭示概况，阐明特点，详述版本，便于人们掌握全貌，深得要领，按图索骥。这与一般史科学、史学史的内容介绍和理论分析有很大区别，其特色是注重学术的实用，起到了良好的学科互补作用。在社会经济部分，大量运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对不同阶段，或不同区域，甚至前后朝代的数据进行比较，以说明宋代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这种比较，无论是数据，还是方法，对宋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该书是一部系统而有所侧重地吸收现有宋史研究成果的专著，注重整合和评述，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实用的学术参照坐标。如政治发展状况部分，对熙丰时期的变法和改制作了全面客观的评述，指出积极意义、负面作用，以及失败的结局。在分析宋代经济政策时，指出“摊丁入亩趋势的启动及其表现”，这是对现有成果的发展，也是一种评价性引用。作者这种评价性引用，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是有帮助和非常有用的。

通过上面的评述，笔者认为，今后编修宋代史乃至其它断代史，有三方面重要工作值得去做：一是更好地构建宋代史以及断代史的结构体系，不只是外延的，更为重要的是内涵的；二是更好更多地有机内在地吸收和融通以往的研究成果，强化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三是继承传统质朴直叙的叙事纪实的风格，挖掘断代史学术、社会的实用功能，并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责任编辑：杨向艳

Main Abstracts

On the Idea of 'Gradational Deviation' Applied in Academic Evaluation

Xiong Yan 10

The gradational result of evaluating periodicals should not be directly used as a criterion of evaluat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also could not be used simply as a criterion to determine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findings. That i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idea of "gradational deviation" in analyzing academic difficulty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of different finding forms, so that academic evaluation could be carried on more fairly, just and scientific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counting the scholar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their papers issued on periodicals, so as to get corresponding marks and weights for a more subtle and reasonable quantified evaluation.

A Program of 'Tracing Back Sources to Justify the Foundation' for Approaching Marx's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Zhao Dunhua 14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s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 China, and raises thereby some issues. To solve the issues, the author proposes a program of "tracing back sources to justify the foundation". The said foundation of Marx's philosophy refers to Marx's new materialism, humanism and theory of freedom and emancipation, while the sources suggests the varieties of ideas in the philosophy history from Aristotle to the contemporaries of Marx.

Some Questions of How Marxist Philosophy Be Melted in China

Ma Junfeng 23

The process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melts in China is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spreads over China and China utilizes and develops it. Its melting in China and Chinese absorbing it is a bilateral process. Today, we have absorbed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onstructe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ese style with a Chinese form for almost a century, should actively utilize Marxist basic standpoints and methods to research the present main issues of mankind practices, combined with our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isdom. We need to be profited from the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from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as theory sources in order to realize an innov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o provide an applicable theory for Chinese social reform planning and to give a new road for mankind's liberation. Currently, we should found a set of institutes and system to promote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propagandize an active teaching of the reformed Marxist philosophy.

On Hegel's Concept of Sensuous Certainty

Luo Bozhong 39

Sensuous certainty is the first element and womb of Hegel's philosophy system. Hegel expressed, in some place, the ideal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knowledge, between being and language, between being and relationship, and between object and ego. These ideas permeated his whole philosophy system. Because of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form, which is by chance, and content, which is by necessity, sensuous certainty has to change into understanding. That kind of contradictions is the basic ones in his philosophy system.

Substitution of Multinationals Products as Promotion Wa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Mao Yunshi and Li Jieming 44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ing market situation that firm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since China's entry into WTO and the advantages of active follow-up strategy in light of strategic theories. After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s that outstanding industrial manufacturers have obtained from exploiting late-mover advantages, we suggest that firms can promote competitiveness in reac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by taking active follow-up strategies. Firms move from gradually upgrading their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through importing and imitating technology to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firm upgrade through a series of substitution for imported products. products made by foreign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and products of multinational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On the Comprehensive Judgment and Measurement about the Fragility of Chinese Bank System

Chen Hua 55

Bank reform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financial reform. That weather the bank system runs steadily or not is related to the whole financial system's development and stabilization. The paper makes a quantifiable analysis of the fragility of bank system with CMAXt index method and Probit multi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discovers that the entire Chinese bank system has been unstable for 22 years from 1978 to 2000, and it was especially unstable around 1992 and 1998 when the bank system appeared with unstable indication and in the biggest financial risk.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blem of Loan -and -deposit Deviation from 1995 to 2004

Zhou Xiangwen 66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1990s,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tal loans amount is much larger than their total deposit amount. However, after 1995, the situation changed. Currently the deposit amount has exceeded the loans amount for 7,000 billions. Economists usually analyze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commercial banks' multi-assets and policy-loans diversion, and the issuing channel of basic currency. Contrastivel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balance sheet of central bank to study the loan-deposit gap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 China, summarized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gin between the deposits and loans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urthermore, the causes that lead to the phenomenon are analyzed in the paper.

Western Missioners and the Practically Ideological Knowledge Tren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Chunhong 90

The paper discussed how scientific ideas, brought into China by western missioners included Matteo Ricci, deeply influenced the thought and thinking way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ose elements of scientific thoughts were embedded in the academic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held by the scholars in the Qianjia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deserved credit for modernizing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On the Voluntary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Sect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1930s

Cao Tianzhong 96

The essence of history study is to discover the inner link among historical facts. The amount of main sects engaged in rural construction was far more than what has been known in a long period past. They communicated and spontaneously interacted each other. The civilian education sect and national elementary education sect are more noticeable. Their actions were helpful to bread through regional limitation, to learn from other's strong points to offset deficiency and to enhance together. It manifested that social thought resources made the sects integrated from separated state, and may also provide model for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oday.

Essays "Reflecting the Situation of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Consuming Time"

Jiang Shuzhuo and others 116

Editorial notes: After the "cultural campaign" came in 1980s, and when aesthetic culture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element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90s, those words of "cultural criticism" and "consuming time" became popular in priority order in the circ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Though the two concepts have been discussed for a period, they are still arguable up till now and it is valuable to inquiry to them more deeply in order to clarify concerned problems. Therefore, caught an opportunity for a biyearly symposium held by Guangdong Society of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and Guangdong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we consulted with their organizers to open a talk about relevant topics in order to direct the concerned study develop deeply. So, we could offer the group of essays here to you.

O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ocused on Writer's Cultivation

Zhu Shangshu 130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concerned abundant content, for example specifically, Chen Yizeng discussed about writer's cultivation. As an important scholar of literary composi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his theory dealt with a lot of important problems, such as "developing spiritual power", and molding temperament, style, readings and experiences. Chen's literary thought is a valuable heritag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literature history.

《学术研究》读者评议表

尊敬的读者：您好！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帮助，为使我们的刊物能够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对我们刊物的评价和建议。请将以下问卷填妥后寄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学术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510050），或（Fax）020-83846177。联系电话：020-83846307、020-83846163，电子邮箱：hjb@gdskl.cn

我们将不定期邀请热心读者召开座谈会，对刊物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的读者，我们将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本刊将予以保密。

姓名：_____ 单位全称：_____
地址：_____ 邮政编码：_____
电话（请务必填写）：_____ 手机：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箱：_____

- 1.在本刊所有学科中，您最关注的学科是：_____
- 2.在本期您所关注的学科中，您最喜欢的文章是：_____
- 3.在您所关注的学科的文章中，您在其选题意义、文章内容、学术价值、研究的创新程度上的评价是：

指标	评价
选题意义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文章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学术价值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创新性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 4.您认为本期《学术研究》在栏目设置、校对水平、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方面做得如何？

指标	评价
栏目设置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校对水平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版式设计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印刷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 5.您认为今后《学术研究》还应该增加哪些栏目和内容，或是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 6.您认为《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今后应该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编辑部

2006年3月

佛山祖庙



祖庙正门

佛山祖庙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历经20余次重修。现存主体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其现存国内最大的明代真武帝铜像、最大的古铜镜、罕见的宋式斗拱、精美绝伦的“三雕两塑”（木雕、砖雕、石雕、陶塑、灰塑）以及华南最大的戏台，均为堪称一绝、流芳百世的人文杰作。佛山祖庙因此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之宝”。199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佛山祖庙曾是佛山民众拜祭北帝神的重要场所。北帝神崇拜，作为岭南



北帝武神

社会的重要历史现象，是岭南民间信仰系统的主干。北帝名玄武，又称真武。自宋钦宗始，历朝皇帝对真武神均赐封有加，北帝神成为官方认可的主要神明。因此，北帝庙（真武庙）遍布广东各地。著名的除佛山祖庙之外，还有三水芦苞祖庙、广州北帝庙、陆丰玄武山等，而其中又以佛山祖庙为盛。正如屈大均所言：“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镇之祠为大，称曰祖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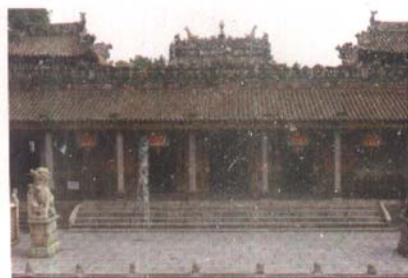
祖庙既是佛山诸庙之首，又是佛山士大夫

议事决事的中心（明代的“嘉会堂”和清代的“大魁堂”均设在此）。它集政权、族权、神权为一体，佛山历史上的诸多大事，均在祖庙议决。至今垂挂在祖庙大殿门外的对联“二七铺奉此为祖，亿万年惟我独尊”，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概括。

佛山祖庙的祭祀仪式，肃穆而隆重，向来是一年中佛山全镇居民最大的祀典。其中主要有四大祭祀仪式，每一种仪式都具有不同的功能和象征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和社区关系。一是北帝坐祠堂，这是将北帝神像逐日安放在土著各宗族祠堂内，供该宗族之人拜祭的仪式。它满足了土著居民精神寄托的需要，明确了宗族父老和士绅的地位，对维系宗族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北帝巡游，它具有明确地方主神控制的社区范围（27铺），重申社区领导群体（士绅）的地位，强化主神北帝对各神明的统属关系，加强社区凝聚力的功能。对维持社区团结，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烧大爆，这是以巨大的爆竹燃放享神，并让众人抢拾炮首以接福的活动。这一仪式使社区成员感受到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从而强化了社区的认同意识。四是乡饮酒礼，无论土著和侨寓的杰出人物，70岁以上均可以参加饮宴，由地方官授爵。这表明了佛山的社会整合程度。

几百年来，祖庙的中心地位不断突出，传统的神明祭祀在适应传统社会多样化需要而不断精致化和复杂化，它调整着社区内部复杂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延续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发挥着建构传统社会的重大作用。

图/文 罗一星、肖海明



祖庙大殿



砖雕牛皋守房州



精妙的斗拱构造之如意斗拱



祖庙匾额



香亭



三门瓦脊

Academic Research



原生态丛林 陈明 作



定价: 8.00元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 510050 电话: 020-83846163
排印: 广州市官侨彩印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010349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期刊基本参数: CN44-1070/c*1958*m*大16*148*zh*P*¥8.00*3200*32*2006-03

网址: www.gdskl.cn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 46-64

国外代号: M268(北京399信箱)